

中国为什么要死死抱定美债？

“次贷危机”果真是次级债造成的危机么？

欧债和CDS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新“慕尼黑阴谋”？

为什么说巴塞尔条约是新时代最大的不平等条约？

西方霸权的终极命门在哪里？

信用才是决定全球秩序的元规则

信用战

全球历史演进元规则

THE CRE[illegible] TA-RULE

张捷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信用战

全球历史演进元规则

张捷

不要说暴力决定人类命运，也不要说利益支配人类行为，更不要说民主是万能的，只有信用才是最本元的规则。

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经由劳动分工组成人类社会，而所有的社会分工与人类集体行为都离不开信用的组织，群体暴力受信用逻辑支配，利益的内涵、外延和存续由信用框定，没有社会信用体系做支撑的“民主”只能是秩序的崩坏。

在核战争无人敢打和金融危机大势下，商战、经济战、货币战、金融战成了热炒的概念，但是金融货币等只不过是全球棋局中的重要方面，各方政治、经济、军事等竞争、斗争、战争的真正重心，是全球信用和信用体系所构成的信用秩序博弈。在当今金融危机背后的实质是信用危机，信用危机的逻辑结果必然是信用体系的深刻变革和全球信用秩序的重建，全球信用体系重建的结果必然是世界财富、权势和价值观的再重组，信用秩序的重建则是全球人类秩序的再重组。信用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元规则；信用战争是终极历史意义的元规则之战。

全部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就是一部取得信用、建立信用体系、信用体系博弈、维持信用体系和博弈信用体系座次的信用秩序斗争史！

建议上架：金融战略、政经

ISBN 978-7-203-07783-1

定价：49.00元

信用战

——全球历史演进元规则

张　捷/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用战：全球历史演进元规则 / 张捷著. -- 太原
: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203-07783-1
Ⅰ.①信. Ⅱ.①张. Ⅲ.①国际金融 - 经济战略 -
研究 Ⅳ.①F8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1612 号

信用战：全球历史演进元规则

著　　者：张　捷
责任编辑：徐晓宇
装帧设计：周　智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21.25
字　数：39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978-7-203-07783-1
定　价：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破译文明演化的源代码

——序张捷《信用战——全球历史演进元规则》

张捷对世界的理解总是与众不同。现今，他再次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是我孤陋寡闻，我以为把“信用”认定为“历史演进元规则”的，张捷应是第一人，并且，迄今尚无第二人。

信用，真的对我们如此重要，以至重要到我们必须把它奉为圭臬，封为元规则，视作人类社会得以传承延续的源代码么？读完张捷的这部新作（当然，这需要很大的耐心），也许你的感觉会跟我一样：信然。

不过，这部书稿首先吸引我的，不是它的书名：“信用战”——这样的书名有耸人听闻、博人眼球之嫌——而是它的副标题：“全球历史演进元规则”。全书一过，我确信，“元规则”更符合本书的意涵。

人类文明数千年，说穿了，就是一部信用嬗变演进的历史。信用是人际关系的定位，君臣主仆，父母夫妻 、兄弟姐妹、亲朋故旧，种种关系，无不内含某种信用约定。

信用是人置身社会的行为规范、个人操守、社群伦理、法律条文、游戏规则、团队精神，无不依信用而确立。

信用使族群乃至国家得以凝聚成型。从家族、宗族、民族到国家，从自然村落的边界到国家疆域的划定，无时无处不显现信用。信用有时是比血缘更有效的粘合剂。

信用更是人类财富价值的度量衡，从以物易物的原始财富交换，到现代信用创造——货币的诞生，信用对人类的意义仅次于水和空气。

因此，信用就成了使人类匍伏其下的权力之源。从号称“君权神授”的皇权王权，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托管权，到民选政府的委托式管理权，再到以强大军力维系的帝国霸权，无不是一种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权力授信。

如是，人类自上古以来的一切社会活动，从本质上说，都是信用模式的演变和争夺。信用，无论是主动恪守的，还是被动接受的，都孕育并左右了整个人类进化的

历史。就此而言,与其说是人类创造了信用这个工具,倒不如说人类自己已成为被她所创造的信用所驱使的工具。

人无信不立,在漫长的进化中,逐渐成了人类行为的基本信条。谁能使人类或心悦诚服或被迫屈从于某种信用,谁就可以获得并拥有某种权力。家族权、宗族权、宗教权、皇权、政权、交易定价权、军队指挥权、企业管理权,甚至黑社会的首领权,各种权力均依信用而生,不一而足。而今,信用已构成人类社会从最小单元到国家及至国际社会共同行为和活动的基石与前提。于是,张捷所说的"信用战",就此拉开了大幕。

张捷的发现,也由此变得生动有趣且富有启示。看看这些或引人入胜或触目惊心的小标题,你一定会在凝神之间,对究竟是什么力量在主导我们这个星球的运行有所了悟:

"古代战争屠杀经济学";

"恶性通胀实质上是信用体系的坍塌";

"宗教战争打得就是公信力";

"中国春秋争霸的礼法战争";

"资本与国家瓜分货币红利";

"货币主义的信用掠夺";

"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信用受限";

"货币轮回:从信仰信用到国家信用";

"信用体系的核心利益在哪里";

"主宰人类社会的信用体系";

"国家的存亡兴衰不再仅靠武力";

"颠覆国家只须破坏基石";

"公信力:摧毁国家信用成为战争手段";

"为什么空军可以打赢整个战争";

"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全球信用体系";

"当今世界信用系统性崩溃";

"巴塞尔协议维护美国评级霸权";

"欧债协议:新'慕尼黑阴谋'";

"美国的控制力在哪里";

"博弈世界信用体系的重建";

几乎不用阅读全文，仅从这些颇有些点穴味道的小标题，我们也可窥见张捷想要告诉人们什么，并由此获得一种认识人类历史和当下世界的新视角，你既会豁然明白，成吉思汗的铁骑为何每攻下一处城池总要血腥屠城；也会顿然了悟，北约空军轰炸贝尔格莱德的民用目标，如供电供水系统，为何最终摧毁的是米洛舍维奇政权的公信力；你更会深刻理解，美国是怎样利用美元体系，建立起一种崭新的全球性霸权。

而所有这一切，无不与信用有关。或者说，无不与争夺信用权有关。因为信用，是撬动人类生存状态的杠杆。这就是千百年来，人类为何要为争夺信用权而战的奥秘所在：谁掌握了信用权，谁就能掌握甚至役使人类！

我，做为本书最早的读者，深感张捷的这本著作对我们认识古代到今天的世界是如此重要。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向所有有机会阅读此书的读者，强烈推荐这部比我们大多数人都更早踏进这片人迹罕至领域的著作。

就我的个人感受而言，尽管本书并非所有的章节都描写得生动有趣，并非所有的观点都阐述的详尽彻底，并非所有的结论都论证得令人信服，甚至某些章节在道理上还有自相矛盾之感，经不起推敲，但作为论述信用和信用战争的第一部书，它毫无疑问已经实现了它的初衷，完成了它的使命，那就是：引起世人对信用和信用战争之于人类现实重要性的严重关切。所以，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们唯有赞赏，不能苛求。何况，在本书中，张捷的呼吁是如此激越、如此恺切，以至于我只能用四个字去形容它：

振聋发聩。

空军少将　乔良

2012年6月9日于隆福寺

绪论　信用：推动历史演进的元规则

出于追求真理的天性，人类对于世界的本源进行了无休止的探索，试图找出普世的社会演进规律，那么整个人类社会演进普世的元规则到底是什么？就是信用，所有社会规则都要以信用为基础，信用规则建构人类社会，信用秩序则是主宰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

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是信用，是人与人的相互作用，这样的作用受到人的意识支配，但其内容和产生的后果又是超越意识和物质而存在的，这些信用的相互作用彼此联系形成难以分割的整体就是信用体系，驱动人类社会运转的正是信用体系；主权实体内部、经济金融货币、国家民族宗教的联盟等都是信用体系，而主权国家、战略同盟所处的体系内外乃至全球人类社会的运转法则和顺序规则就是信用秩序。

信用是一种能力和权利义务，信用体系是一种网络结构和社会体系，信用秩序是一种规则和顺序，信用秩序决定了全球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社会元规则由此诞生。

信用是微观的，而信用体系就变得宏观了，信用秩序则是世界运转的普世规则，信用秩序由信用体系和信用等构建。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信用”这个词已经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在道德伦理、法律、经济等多个层面之上都有其深刻的内涵。信用可能是人类认识中最为复杂、最难以捉摸的概念之一，一些事物仅仅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在所有的这些事物中，没有哪一件比信用更加古怪、更加微妙！

从伦理角度理解“信用”，它实际上是指“信守诺言”的一种道德品质，所谓“诚信”、“讲信用”、“一诺千金”、“答应的事一定办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等等。从经济角度理解“信用”，它实际上是指“借”和“贷”的相对关系，这个经济信用流通起来，就成了现代的货币。而从法律的角度去理解“信用”，它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但凡“契约”规定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不是当时

交割的,存在时滞,就存在信用;第二层含义是指双方当事人按照"契约"规定享有的权利和肩负的义务以及由此产生的债权和物权。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见人们行事的根本出发点在于自己的利益,但问题是怎么衡量利益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类发明了人权、信仰、产权和货币,而货币只不过是一种信用凭证,这已经是世界共识了;产权也是在信用法律体系保障下才有意义;一个人的人权尊严更是有其信用属性支配的,人无信不立,一个没有信用的人,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其人格和人权的社会属性就大打折扣;还有人认为决定世界的是信仰,但是任何信仰包括宗教,能够成为社会的信仰和主流价值观,其决定性因素也是首先要有人"信",其信用要被社会所认可,成为社会的信用,成为公共信用,这公共信用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就是我们常说的"公信力"。这里人权是伦理道德角度的信用,产权、契约等是法律角度的信用,而金钱是经济角度的信用,信仰体系则是以伦理道德信用为基础的一个综合了法律和经济的信用体系。可以说人是生活在一个信用包裹着的社会中,人对于利益的追求也是在信用体系当中进行的。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有各种丰富的信用关系,这些信用关系再通过信用组成有机整体、变成信用体系,人类的信用体系是社会行为和社会运行的规范,这些规范又受信用秩序的支配,这其中所有的信用规则成为人类社会的元规则。

还有很多人看到任何国家和制度都离不开暴力的支撑,于是认为暴力是元规则,甚至还有人创造出了血酬理论,认为所谓"血酬"、即流血拼命所得的酬报,体现着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而血酬理论则从暴力集团与生产集团关系的角度解释历史现象,用暴力集团之间的竞争关系解释一些重大的制度变迁;厘清暴力掠夺生存策略的内外关系,考察各种生存策略的互动和演化,描述演化而成的社会秩序的基本轮廓。

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譬如绑票,其价值则取决于当事人避祸免害的意愿和财力。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真正影响社会运行的不是个体暴力而是群体暴力,暴力也是要有规则的,所谓帮有帮规、盗亦有道,暴力群体内部也是有契约需要遵守、而非暴力决定一切,这些规则实际上就是信用。比如绑票,其"价值"决定于绑匪信用和警察信用之间的比值,如果绑匪没有信用给了钱就撕票,那么被害人再有避祸免害的意愿和财力也不会给一分钱;如果警察有足够的信用能够抓住绑匪,那么被害人避祸免害的意愿和财力就会转为救助

警察而不是给绑匪缴纳赎金了。说到底这还是一个信用和信用体系的问题,信用是更本源的因素,暴力利益的最大化也是要通过信用体系的。在古罗马,大规模的奴役其他民族就是通过这样的暴力压力下的信用体系来完成的。

在中国唯暴力论是很有市场的,很多人认为只要有枪杆子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错,但是要维护一个政权却不能仅仅依靠枪杆子,穷兵黩武治天下的王朝在中国基本上没有超过二代的,一个长命王朝一定要靠自己建立的信用体系!暴力只不过是维持这个信用体系的手段,因此暴力更多地体现在信用体系博弈的战争层面上。论证暴力不能解决一切最简单、最直观的论据就是在任何人类极权暴政时期,代表信用的钱和契约都是存在的!影响人类命运的一切暴力行为——政权的建立或颠覆、政权和国际联盟的战争、犯罪与惩治犯罪等等,基本上围绕建立信用体系、信用体系博弈、维持信用体系和博弈信用体系的位置这几个层面展开的。

人们为什么会更多地看到暴力的影响,原因就是赏罚不对称,利益的诱惑所带来的是赏而暴力所带来的基本是罚!中国春秋时代有一个国君把赏的权力留给自己、把罚的权力交给大臣,结果很快被这个有处罚权的大臣篡位了。因此大家看到了暴力的力量,认为暴力是构建社会规则的本源。但是一个社会只有惩罚是不行的,任何残暴的社会都不长久,原因就是仅有惩罚是建立不了信用体系的。从部落联盟开始人类就进入群体暴力的时代了,大家效忠于皇帝,并不是效忠皇家军队,而是对于天子的信仰和国家信用体系。

暴力体系的内部是要依靠信用体系来维持的,完全的暴力的结果就是体系的极端不稳定,结果会是一个以暴易暴的正反馈;而利益交换才是一个追求均衡点的负反馈过程,只有这样的不断向均衡点靠拢的负反馈机制建立起来了,整个体系才是稳定的。就如我们熟读的《水浒》,梁山好汉是一个暴力集团,但是控制这个集团地位最高的反而是个人暴力有限的晁盖、宋江、吴用等人,个体暴力能力强的要归属于他们领导,内部的稳定不是靠暴力而是他们侠义的信用和价值观。有了信用规则,我们可以在更高的高度上认识暴力博弈的本质,支配暴力的元规则,还是信用。

除了暴力以外,还有人认为是利益才是元规则,唯利益论大行其道。唯利益论推到极致,就是所谓"货币战争"假定,这种假定将"利益"具象化为"货币",认为货币发行权决定利益归属权,进而主张对于货币发行权的博弈才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元规则;更有甚者还认为真正操纵货币发行权的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西方大银行家

族,从而将整部人类历史的演进庸俗化为银行家族之间简单的豪门恩怨。

不错,我们承认货币发行权是人类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权力,为了争夺货币发行权,人类不惜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冲突,但是货币发行权的斗争依然只是人类根本命运大博弈的一个侧翼。我们之所以说信用是更本质的元规则,就是因为"货币"本身不过是信用的外在凭证,信用是一个远比"货币"内涵和外延更广泛、更深刻的上位概念,"货币战争"不过是信用博弈的一个侧翼,虽然是信用战线上极其重要的一个侧翼,但绝非信用博弈的全部。

而广义的利益博弈也是离不开信用的,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契约精神所带来的信用体系,信用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元规则。而利益的价值取向也是很重要的,利益在不同的价值观下看来也是不同的,这些对于利益的认识本身也离不开信用,人类的价值观是由信用构成的,所谓产权、货币等基础概念都是在信用体系下才有意义。

而且人类之所以有别于动物,就在于人类还有群体利益的概念,个体的人会为了群体的利益去牺牲!最典型例子莫过于战争,为了群体的利益一部分人可以上战场牺牲生命,在战争当中为了掩护战友可以牺牲自己。若以个体而言,所有的利益莫大于生命,但是在群体利益面前这样的牺牲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说不要集体利益、将个体利益极端化,就是一种破坏信用体系的行为,给对手的群体灌输这样的价值观就是一种信用战。

当然群体的利益要有合理的分配,如果大多数个体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或者不讲信用规则,那么这个群体的信用体系就要崩溃了,因为被侵犯的个体的利益在群体当中被其他掌控群体利益的个体所剥削。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就是集体的利益最大化,如果大家知道囚徒困境博弈,知道了纳什均衡原理,就知道个体利益最大化的非合作博弈是极端黑暗的,这也是唯利益论不能成为人类元规则的原因之一。一个好的信用体系一定是要在体系内创造最大可能的合作性博弈,让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总效益最大化。

在暴利元规则和利益元规则的思潮之外,还有很多人把各种主义、信仰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元规则,认为有了好制度就一定会有人类的光明,但是这些唯主义论要成立都是离不开信用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前提是人人将劳动当作了高度自觉,劳动自觉这本身就是信用啊!而人人都能够自觉劳动的社会,是一个信用体系多么发达完备达到极致的社会!现在很多人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民主制度成功运转的前提就是一个适合民主的完善的信用体系,

基于这个信用体系一切政治争端和国内矛盾可以在谈判桌上解决,失败的一方能够守信用地接受民主的结果,反之则是民主过后一片狼藉,对于民主的结果还要一番流血斗争才能最终落实,这样就不是选票的力量而是暴力决定了。所以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民主"以后就内乱,各种独立要求、极端宗教事件和恐怖主义横行。

民主能够良性运转,还要求社会的核心利益取向在信用体系内取得基本的趋向一致,否则不同的道路左右纷争会让国家政策反复无常,这个国家也难以成功,印度就是典型的例子;而照搬美国制度的美国前殖民地菲律宾的情况更能够说明这样的问题。在社会信用缺失的环境下,所谓"民主"社会中丧失妥协能力和空间的议员们甚至要依靠斗殴来解决问题,这样的"民主"怎么能够有社会光明?须知民主的前提就是信用。

还有很多人是信奉自由主义的,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高于一切,但个人的权利也是需要信用保障的。自由主义能够存在和成立的关键是契约精神,每一个人的自由是需要由契约来限制边界的,自己的自由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这个边界和契约,就是信用,自由主义是在一个完备契约精神的信用体系之下的自由。所以这些主义理论的背后都需要信用的元规则。

有人厚古薄今,向往中国的古代社会,中国古代社会就是一个信用社会。不要说"仁、义、礼、智、信"本身就是有"信"字,"礼"字实际上就是一个信用体系,而"仁、义"是信用的价值观,如果不仁不义的话就可以不信了。推而广之,所有人类文明的社会都是信用社会,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精髓就是契约精神。而我们今天的经济危机,也是从金融、经济到信用这样逐步发展的,信用的崩溃使得危机从经济层面发展到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而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的进步,背后就是信用体系的完善和发展。经济发展了信用体系完备了,各种问题就都可以在信用体系下迎刃而解。所以说发展是解决各种危机的金钥匙,而信用就是文明的基石。

深入去看,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有别于动物社会,其关键也是产生了信用。首先对于暴力群体而言,暴力群体内部自发演化出信用元规则而非简单的个体暴力,猴群、狼群的领袖一旦自身的暴力能力弱化,其领袖地位自然终止;人类社会则不同,领袖地位甚至可以在暴力群体当中世袭,让其后代也能够享受暴力集团的利益,而其幼小的后代很可能连基本的暴力能力都没有,这样的世袭实际上是一种权利的存贮,在时间上不对等的存贮必然要有私权和契约来维持。在动物的简单暴力群体里面,暴力的能力是不能被体系存贮支持下一代的。结论就是人类暴力群体是信用而不再是暴力维持的,这也是人类暴力群体与动物暴力群体的根本区别。

在信用的其他层面,虽然动物也可以储藏食物,但是动物是没有契约、产权私有和继承的观念的,所谓私有财产继承的信用也仅仅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是一种财富通过信用的存贮。除了物质以外,人类社会的价值来自于劳动,哲学家认为人类的劳动区别于动物的要害在于是否能够使用工具,但是还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劳动成果能否存储。人类劳动能够存储是通过信用来完成的,这个信用在后来形成了货币,大家持有货币的意义之一就是可以以此换取他人的劳动,存钱实际上就是对于他人劳动的存贮。

人类社会有了这样的权力、财富和劳动的存贮能力,也就是有了信用体系之后,人类的物种进化明显加快。以前的生物竞争是好的基因有更多的交配权可以产生更多的后代,但是对于其后代而言却没有物质上的直接支持;在人类社会能够存贮权利、财富和他人劳动的信用出现以后,一个好的基因不但能够产生更多的后代,还要使得他的后代在物质上得到支持、可以产生更多的后代,这样好基因的优势就得到了积累性的发展,人类的进化显著加快。认识信用元规则就是更深层次地认识人类发展的规律。

人类社会的大规模发展有赖于社会分工,信用的产生则使分工得到保障。分工是必须有契约和产权等概念做支撑的,是离不开信用的,自从有了分工,人类就离开了原始社会而进入到社会形态的快速发展阶段。人类信用体系的高级还是低级,主要就是看人类社会分工的程度,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必定是一个分工极其复杂的社会。分工不仅仅带来成本的降低,更带来技能水平的提高,因为人的个体所能够掌握的技能是有限的,掌握全部技能将超过个人的能力。

由于分工导致每一项技能所需要的知识相对简单,人类整体就能够发展和研究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如果信用体系崩溃,原来的分工技能很可能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必定是人类社会的大倒退,就如在天下大乱的时候会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叹,但是社会文明要达到更高的层次,必定是要依靠书生、依靠文化的力量。中国历史上由于总免不了改朝换代,务农为本在贵族子弟里面也很盛行,中国贵族子弟的教育培训技能当中也要会种地,就是要担心天下大变以后没有种田的本事无法生存。

人类进入到现代资本社会,产生了金融体系,更是信用体系在物质上的巨大飞跃。在没有金融体系的时代,人类的信用只可以存贮,在金融体系建立以后,人类的信用还可以透支,人类可以从未来的信用中取得力量来完成当今的博弈。这样的金融体系,实际上是把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放到了博弈的平台之上。

金融体系的力量更体现在可以通过体系利用他人的财富和信用,货币在贵金属的时代只能由其所有人占有使用收益,但是到了金融时代,货币一方面是个人所有,但是银行存款却是被银行控制的,银行取得储户的存款以后贷给谁、收多少利息是存款人决定不了的,这些存款所对应的财富被银行所利用,而储户的存单同时还可以给储户带来信用,这样就出现了金融衍生效应,信用出现了融合。

随着货币信用体系的发展,金本位破裂以后印钞没有了限制,通货膨胀和信用贬值成为盗取他人信用、财富进行牟利的利器,金融战、货币战等多种博弈形式出现了,人类社会进入了空前发展和融合的时代,货币主义成为现代全球经济活动的主流。在金融称霸和全球化的今天,全球的人类信用体系进入到了新的整合时代,新的信用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如果说冷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次信用世界大战就是第四次世界大战。

世界当前是唯暴力论、唯利益论和唯主义论大行其道,认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的有军事霸权论、血酬论、革命论、法制论等,唯利益论则有市场经济论、货币金融论、人权论、厚黑学等,而唯主义论中民主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各种宗教价值观、普世价值论、泛爱主义、绿色主义、恐怖主义等都兴起了,但是这些都是盲人摸象,只看到了事物的一个层面,真正的"大象"是一个把暴力、利益和主义以及唯心唯物、逻辑辩证、性善性恶等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综合的信用体系,信用是这一切的本源。

信用体系既有刚性的一面也有柔性的一面,辩证法和逻辑学都可以在一个信用体系内部找到发挥其作用的空间。唯暴力论、唯利益论和唯主义论阳光的方面是法制、市场、民主等等,阴暗的方面则是血酬、厚黑、恐怖主义,阳光还是阴暗,本质上的差别就是人类的本性是善还是恶。但无论是性善还是性恶,信用是必不可少的。信用在任何理论体系当中都是须臾不可分离的关键成分,因此我们说信用是人类社会的元规则。

当下世界各种唯暴力论、唯利益论和各种"主义"的盛行和乱象,也正体现了世界处于崛起和转型时期信用体系混乱的现实。当下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信用缺失,没有信用就没有光明、没有可持续的发展,在物质发达以后信用体系没有跟上,必然是巨大危机的到来。中国坚持改革的方向之一就是要建立中国新时代的信用体系,让这个信用体系更完备和合理,让信用体系符合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信用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钥匙,是建立中国崛起后规则体系的本源。

人类的历史演进,信用的发展与人类社会不同的形态是高度相关的。在出现

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继承的原始社会,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和父系社会;在分工出现了以后,人类进入了更高级的社会,在古罗马的奴隶社会已经有了大规模的奴隶分工劳作;到信用发展到货币金融时代,人类的资本社会开始了,而随着金融的全球化,人类生产的分工合作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人类的竞争从简单的部落械斗发展到暴力集团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再到军事行动服务于经济和政治围绕信用体系,信用元规则在全部人类历史演进当中都起到了主导作用。我们认识信用,认识信用体系,认识信用博弈的规则,以此认识战争,认识信用战,则在本源上认识了人类社会。

《信用战》从货币的信用起源发展,逐步到古代战争博弈当中的信用规则阐释,再到利用信用的规则来解释当今全球博弈的游戏规则,将以一个元规则的崭新视角来看待我们现在全球化的世界。这将是一片拓新人类视野的新大陆。

目 录

引言:全球信用危机的端倪 …… 1

第一部分 血色的信用春秋

导读:金融危机的逻辑结果是信用危机,其背后必然伴随着全球信用体系的重建,在此基础上世界财富要重新布局。信用体系问题是一个比货币更广泛、更具决定意义的战略问题,它是各方博弈的真正重心。而建立和控制一套信用体系,最重要的就是取得体系的游戏规则制定权和裁判权。

第一章 历史纵深:信用战争话古今 …… 7
一、古代屠城的金融意义 …… 7
1. 古代战争屠杀经济学 …… 7
2. 古代屠城金融学 …… 8
二、贵金属时代的恶性通胀 …… 9
1. 金银货币时代的通胀机理 …… 9
2. 乱世买金的真实原因 …… 11
3. 恶性通胀实质上是信用体系的坍塌 …… 12
三、历史上的信用战争 …… 13
1. 宗教战争打的就是公信力 …… 13
2. 中国春秋争霸的礼法战争 …… 14
3. 为什么后世关公的地位高于孔子? …… 15
背景资料:关公与孔子的历史封号 …… 17
四、宗教、金融势力与信用战形影不离 …… 18

1. 金融资本、宗教与国家的互相制衡 …… 18
2. 资本与国家瓜分货币红利 …… 20
3. 信用战是各种势力博弈的舞台 …… 23
五、从重商主义到货币主义的和平掠夺 …… 24
1. 重新审视历史上的重商主义 …… 24
2. 新重商主义与发达国家的赤字政策 …… 26
3. 货币主义的信用掠夺 …… 27
4. 货币主义在泡沫危机中倒下 …… 28
5. 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信用受限 …… 30

第二章　回看近代中国建立货币体系大博弈 …… 32

第三章　信用社会的形成 …… 39
一、一次伟大的概念偷换 …… 39
二、货币轮回:从信仰信用到国家信用 …… 41
三、政权、资本、宗教与信用社会 …… 46
1. 国家体制构建的信用社会 …… 46
2. 西方契约精神构建的资本信用社会 …… 47
背景阅读:何为契约精神 …… 49
3. 宗教信仰构建的信用社会 …… 50
4. 信用是人类社会上层建筑的基础 …… 51
四、信用、金融与信息的大一统 …… 51
1. 银行经营信用的历史脉络 …… 51
2. 从信用卡看信息与商业信用、银行信用 …… 53
3. 信用、信息和金融的融合统一 …… 54

第四章　金融世界的王者:信用体系 …… 57
一、大象无形的信用体系 …… 57
二、信用体系的核心利益在哪里 …… 59

第二部分 全球信用争霸战开打

导读:财富与权力的凝聚、文化与智慧的传承和人才晋升的通道,是国家强盛的基石。颠覆一个国家,关键就是破坏这些基石。在核恐怖治下,国家之间各种力量实现自己目的的最主要博弈手段,就是这些颠覆活动。其中,金融资本和宗教是颠覆和渗透的主要力量。在现代的世界格局中,宗教和金融资本的力量,已经对国家主权形成制衡,完全可以颠覆一个国家。

第五章 主宰人类社会的信用秩序 …… 63

第六章 针对国家的信用战争 …… 65

一、国家强盛的基石 …… 65

1. 国家的存亡兴衰不再仅靠武力 …… 65
2. 基石之一:财富与权力的凝聚 …… 66
3. 基石之二:文化和智慧的传承 …… 67
4. 基石之三:人才晋升通道 …… 68
5. 颠覆国家只须破坏其基石 …… 69

二、国家解体的背后是信用瓦解 …… 69

1. 信用利维坦 …… 69
2. 凝聚力、公信力和普世价值 …… 71
3. 信用社会的瓦解伴随着财富的巨大再分配 …… 72

三、公信力:摧毁国家信用成为新战争手段 …… 73

第七章 信用战下的军事新思维 …… 75

一、为什么空军可以打赢整个战争 …… 75

二、信用战的眼光看中东巨变 …… 76

三、信用战下恐怖主义的战略 …… 79

四、核时代下的战争地图 …… 81

1. 从朝核危机看核捆绑与全球毁灭的战略制衡 …… 81

2. 日本地震核电事故的核攻击新思维 …… 82
3. 核恐惧下有核国家成为传统军事的禁区 …… 84

第八章　当今时代:看清世界格局 …… 85
一、基金会——各种势力的载体 …… 85
背景资料:胡佛研究所和基金会 …… 88
二、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全球信用体系 …… 90
1. 美国二战后第一目标不是前苏联 …… 90
2. 美国如何占据世界控制体系的巅峰 …… 92
3. 美国军事力量下的石油美元信用体系 …… 94
4. 美军霸权维系资源的定价权和占有权 …… 97
三、中国不能夜郎自大 …… 100
1. 中国金融实力非常弱小 …… 100
背景资料:世界最大与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 …… 102
2. 中国全方位看还是债务国 …… 104
背景资料: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 …… 107
四、竞争印钞贬值会被信用战打断 …… 110
五、经济危机后的战争风险在发酵 …… 110

第九章　信用争霸路径图 …… 114
一、单极世界如何崩溃 …… 114
1. 美国的膨胀与信用限制 …… 114
2. 单极膨胀导致古代中国朝代更迭 …… 116
3. 三权分立下的美式制度腐败 …… 118
4. 当今危机的根源:单极金融霸权 …… 121
5. 信用战:全球大棋局 …… 123
二、负利率在为08年危机埋单 …… 124
背景阅读:《纽约时报》文章《低利率政策严重损害美国储户》 …… 128
三、谁为危机埋单的博弈 …… 130

第三部分　当今世界信用系统性崩溃

导读：西方社会信用的核心是社保体系。这个体系是西方最大的信用体系，也是西方人赖以生存和获得信心的基本条件。如果这个体系遭到破坏，西方社会将受到颠覆性的影响。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西方社保体系体系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临着即将破局的危险。究其原因，金融掠夺的负利率政策是最主要的一点。

第十章　次债谎言与信用危机 …… 135
一、次债危机被错误解读…… 135
1. 次级债误区：被畅销书扭曲的概念 …… 135
名词解释 …… 137
2. 危机中“次级债”与“次级贷”不能因果倒置 …… 139
3. 透视真相：从 CDS 的角度看 08 年危机 …… 141
二、评级下调为何美债价格反而上涨…… 145
三、为什么买德国国债还要倒贴钱…… 148
四、为什么中国要死死抱住美债…… 150

第十一章　负利率挤爆西方社保信用体系 …… 153
附录 1：美国社保简介 …… 161
附录 2：1992 年以来英国利率表…… 163
附录 3：美国历年基准利率 …… 166

第十二章　资源挤爆西方信用 …… 169
一、资源紧缺成为货币信用贬值动力…… 169
二、危机后的优良国家均是资源国…… 175
三、资源特殊：后弯曲线是危机深化原因 …… 183
四、资源挤爆市场经济体系…… 184
五、资源的特殊性与危机再探底的必然性…… 185

第十三章　不动产在信用体系的重大作用 …… 188
一、不动产构建信用基础 …… 188
背景资料:中国历年基地皮和世界基地皮的对比 …… 189
二、为什么外国要妖魔化中国房地产 …… 189
三、渡过危机需要房地产 …… 191

第四部分　信用不平等条约

导读:世界的评价霸权掌握在美国手中,全球金融市场的信用基本上由三大评级机构来"审判"。三家评级巨头及其背后的金融寡头们制定了有益于西方的评价规则,而评价体系是整个信用体系当中的制高点,信用评价权则是西方霸权的核心。而支撑美国评级霸权的,是巴塞尔协议,由巴塞尔协议框定的金融架构,成为维护西方金融霸权的信用体系支撑。

第十四章　评价霸权与不平等的巴塞尔协议 …… 195
一、认识世界的评级霸权 …… 195
二、巴塞尔协议的诞生和发展背景 …… 198
背景资料:了解一下巴塞尔协议 …… 200
三、巴塞尔协议不能覆盖西方银行风险 …… 202
背景资料:欧洲将禁止无担保信用违约掉期 …… 203
四、为什么巴塞尔协议是不平等条约 …… 204
背景阅读:经合组织 OECD230 …… 207
五、巴塞尔协议维护美国评级霸权 …… 207
六、巴塞尔协议是套牢中国的枷锁 …… 210
七、为什么中国几年内不会彻底宽松 …… 212
八、应对巴塞尔协议和评级霸权 …… 214

第十五章　欧债协议:新"慕尼黑阴谋" …… 217
一、十月围城:希腊之乱的背后 …… 217
二、聚焦 CDS:致命武器和利益腾挪 …… 220

三、债务减记:“被自愿”的人权阴谋 …… 223
四、希腊危机需要透明化…… 226
五、减记阳谋将留下历史污点…… 228
六、思考中国:先己后人的中国攻略 …… 232
资料链接: …… 234
国际金融协会(IIF)的表态 …… 234
金融时报:亚洲开发银行敦促中印帮助欧元区 …… 235

第十六章　陷阱重重的中国道路 …… 236
——资本开放路径图、世行报告与欧洲 LTRO …… 236

第五部分　重构未来全球信用

导读:世界在负利率的模式下已经产生了深刻变化,以历史观念应对当今的格局,就好比刻舟求剑,是行不通的。尤其是美元成了世界霸主,且不存在国际金本位的条件下,负债和破产的责任已经与几十年前大不相同。而美国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就是定向宽松和维护美元霸权的政策,其力推的 TPP(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计划,正是美国为后危机时代重建全球信用体系预伏的一步杀招。因此,在金融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国家的货币政策要有全球博弈的视野和全面系统的思维。

第十七章　解析美国:深入认识量化宽松…… 245
一、负利率下西方的国债腾挪…… 245
二、美国暂停印钞为什么反而美元走弱…… 246
三、美联储的扭曲操作是指鹿为马式的宽松…… 248
四、量化宽松谁埋单…… 250
五、美评级下调后不会再推出量化宽松…… 252
六、美联储还有什么武器威力超过 QE3 …… 258
七、量化宽松是定向宽松和维护美元霸权…… 260

第十八章　TPP:未来的资源版图和信用体系 …… 262
一、TPP 衔枚疾进 APEC 或临拐点 …… 262
二、美国的新合纵连横 …… 263
背景阅读:2011 美军重返亚洲 …… 264
三、TPP 的资源版图 …… 265
四、日本将交出生存命脉 …… 268
五、美国的控制力在哪里 …… 270
六、劳动力资源再均衡 …… 272
七、TPP 构建危机后信用体系 …… 275
八、TPP:结婚容易持家难 …… 278
九、TPP 与中国:孤立、忌惮和不需要 …… 279
十、中国应对 TPP 的王牌:高端人力资源 …… 280
十一、资源版图下的地缘政治博弈 …… 282

第十九章　博弈后福利社会时代的新信用体系 …… 285
一、西方的福利体系也是计划经济 …… 285
二、信用社会的瓦解伴随着巨大的财富再分配 …… 293
三、福利信用与经济空心化 …… 294
小资料:庞氏骗局 …… 297
四、福利信用的崩溃意味着什么 …… 297
背景资料:后弯的劳动供给曲线 …… 300
五、博弈世界信用体系的重建 …… 301
六、中国在全球新信用体系的竞争优势在哪里 …… 304

第二十章　树立对中国未来的信心 …… 308

后　记 …… 316

引言：全球信用危机的端倪

规模不到2万亿美元、损失不到4000亿美元的次级贷款，怎么可能变成2008年百万亿规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虚假解释的结果是绑架政府花掉纳税人无数美元进行救市，而这些纳税人的血汗钱总量达到次级贷款总额数倍，这是规模空前巨大的利益输送和掠夺，更是一连串的谎言。之所以上述谎言有巨大市场，原因就是其逻辑的简单和直接，很容易让老百姓直观理解，但是真相往往是很复杂的，就如当年的地心说和日心说之争一样，地心说与大家的日常感知更接近，但却不是真理。

中国学界也在人云亦云的自我蛊惑，正引导中国走向未知的深渊。很多人对于次级债概念的理解是错误的，次级债可以是最优债券，次级债也与次级贷款没有必然关系，西方金融体系可以发行次级债来购买次级债和次级债的CDS，这是一个死循环。全球现在还是可以用次级债充作银行的资本，可以计算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充足率里面。西方的金融机构在巴塞尔协议下可以大量发行次级债不受限制，一家金融机构所发行的次级债被另外一家金融机构所持有，然后另外发行次级债又被其他金融机构持有，最后可以循环回来再由这一家金融机构用发行次级债所得的资金购买持有，出现了次级债循环持有的怪圈，这个循环怪圈造成的虚假繁荣促生了大量的金融衍生品和次级债市场，因此对于2008年危机和未来的危机走势，是要重新全面认识的。

本次危机的根源首先是资源的稀缺性，稀缺的资源挤爆了经济泡沫。资源的供需曲线是后弯的，这个被刻意忽略的现象早在20世纪七十年代萨缪尔森等人就发现了，后弯曲线下供给量随着价格的增加反而减少，西方经典经济学中供需理论的均衡点就无法形成，市场经济的信用体系因之被挤爆，石油价格涨到天价导致整个西方体系的破裂。这样的体系破裂被上述走入怪圈的次级债死循环的杠杆无限放大后，就造成了整个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崩盘。

次级债的崩盘首先是由利率埋单的，以接近零的利率打压资金持有者的收益，

考虑到通胀因素,零利率下的低收益就变成了实际的负利率。负利率的博弈,是实业与金融资产持有者对于危机损失的博弈,博弈的核心问题是实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到底谁为危机埋单,这个问题著者已经在以前的著作《涨价的世界》当中分析过了,西方的零利率政策就是让金融资产的持有者为危机埋单,但是零利率政策导致社保和养老等基金的投资收益不足,结果必然是西方社会信用体系的崩溃危机和政府的债务危机。

到了负利率也不能完全为损失埋单的时候,为次级债的违约风险进行担保的CDS就要受到损失,接着CDS持有者与债券持有者之间就要开始博弈到底谁为危机损失埋单的问题了,旨在解决希腊危机的欧债协议就是这样的博弈,并且伴随着巨大的利益输送。

事实上在政府债务危机和社保信用危机的背后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全球信用大战,政府和社保等债券和CDS体系出现全面危机:债券持有者还是金融衍生品持有者为危机埋单?危机后世界信用体系新秩序怎样安排?全球围绕这两个根本战略问题正在殊死斗争中……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军事争霸和赤裸裸地掠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美苏两种体制之间的冷战,而冷战后发生的瓜分世界的新世界大战,战争的武器变成了各种衍生品、契约信用、保险,这是比货币战争更本质的全球博弈,是一场全新的、革命性的信用战争,这就是第四次世界大战。

认识本轮全球的信用危机,要从美国到底负债多少开始,要把美国债务黑洞完全揭示出来,美国的负债不仅仅是政府负债,还要计算社会保障信用体系的亏空。

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报道,美国主权评级下调以后,里根总统时期经济顾问委员会高级经济学家柯特利科夫(Laurence J. Kotlikoff)公开表示,美国财政部给出的14万亿国家债务总额只是冰山一角,非利息支出和预计收入之间的财政缺口高达211万亿美元。柯特利科夫认为,美国应予以关注的最大财政问题之一是美国如何支付未来几代老人的养老金。“我们有7800万婴儿潮一代人(指1945~1960年西方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在未来15~20年,每人每年的养老金为4万美元。7800万乘以4万美元,我们讨论的是每年给这部分人口的支出就达3万亿美元,这是悬在我们头顶的一张巨额账单,而国会并没有关注这个问题。”早些时候其他美国学者的表述也可以佐证柯特利科夫的说法,沃顿商学院保险和风险管理系教授肯特·斯迈特斯(kent Smetters)指出,在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总共存在80万亿到120万亿美元的缺口,而且该数字在以每年2万亿美元的速度增长。他指

出,美国所有有形资产——住房、建筑物、土地、汽车以及个人财产的总价值是50万亿美元。

《中国经济周刊》曾刊登了一篇“美国在技术层面上已经破产”的文章(作者钮文新),这篇文章宣称美国总共欠债73万亿美元。73万亿美元的数字具体是怎么得出的呢?该文提到“按照美国公开数据,85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全部实施之后,美国国会所能接受的名义国家债务余额为11.2万亿美元……按照美国政府问责局前总审计长、美国彼特·皮特森基金会总裁兼CEO大卫·沃尔克的估计,如果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等所有隐性债务统统加在一起,那么,2007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高达53万亿美元……如果我们把诸如‘两房债券’那样的抵押债券、美国各大财团所发行的、说不清是公司债务还是政府债务以及市政债券等——总计20万亿美元(2007年末美国国债协会SIFMA统计)的债务再统计进来,那美国债务更是高达73万亿美元。”

所以我们认为估算美国的全部负债应当在70多万亿美元左右,是美国GDP的5倍,是全球GDP的一倍半,这样的负债是美国乃至全球难以承受之重,但是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是不会轻易接受衰落命运的,而欧洲和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的负债和信用体系危机更甚于美国。这是一场全球化的危机,如此规模的危机按照历史规律就是要用一场战争来最终解决;而世界走进现代社会,现代战争会出现新的特点,信用大战是未来难以避免的全球战争和利益重组,今天这样的端倪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现在是次级债的死循环造成虚拟金融衍生品的泛滥,资源曲线的后弯刺破了衍生品的泡沫,负利率为危机埋单,维护实业但挤爆了社会保障体系,这样的问题没有一个万能的解决方案,印钞导致通胀和资源价格暴涨,反过来还是加剧危机,世界正在为了究竟谁给危机埋单进行激烈博弈:是债券持有者还是CDS持有人埋单?是资源占有者还是劳动力与就业得利?这就是一次全球信用体系的崩盘和大战,新的信用体系会在战后重建,丛林生存法则支配下,全球都在为了抢占全球信用体系的制高点而殊死博弈,这将是一场决定人类历史命运的元规则之战。

第一部分
血色的信用春秋

导读：金融危机大势下，“货币战争”成了热炒的概念，但是这个世界博弈的却不仅仅是货币，货币只不过是世界经济棋局当中的一个侧翼，各方博弈的真正重心，是世界的信用体系。金融危机的逻辑结果是信用危机，其背后必然伴随着全球信用体系的重建，在此基础上世界财富要重新布局，信用体系问题是一个比货币更为广泛、更具决定意义的战略问题。信用是一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的交易主体不用立即支付对价就可获取资金、物资、服务。而这样的一个体系在经济上就是由市场的信用主体按照一定的规则和规律建立起来的交易环境，在政治上就是一个支配社会资源运转的统治制度。而建立和控制这样的一个信用体系，核心的利益就是取得了这个体系的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和裁判权。

第一章　历史纵深：信用战争话古今

一、古代屠城的金融意义

1. 古代战争屠杀经济学

历史上大屠杀的记载不绝如缕，每次大规模战争总是伴随着一路屠城。对此，一般都以侵略者的残暴、野蛮和血腥来解释，但是对于其后的必然性却没有思考，尤其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其文明开化程度已经超过了当时的中国，仍然进行大规模的屠杀，这里面是有深刻原因的。

征伐要成功，首先要考虑如何能够继续征战。对于占领的地区，如果都分重兵把守，那么军队很快就分散开来，战斗力减弱容易被各个击破；如果不分兵把守，那么被征服的城市和地区又很容易组织起来再进行反抗。尤其在冷兵器时代，武器很容易置备，急了眼揭竿而起，木棒竹竿也能对付一阵子。因此最经济的办法就是把人杀光或赶跑，征战的后方没有人了，就安全了。

进一步考虑的是如何控制征服地区，征服者的军队是非常有限的，要控制广袤的地区，必须将占领区的人口疏散。人口不集中，就组织不起来。屠城会使得受到攻击的城市异常恐慌，城市人口逃散到农村去，同时带走粮食等城市内的大量战争资源，从而使城市人口大量减员、物资大量抽空，缺乏兵员和物资补给。当年明将祖大寿等人在锦州、宁远等地对抗清军时由于辽民逃散，就遭遇到类似问题。所以认为屠城后其他城市会死战到底的想法是非常主观片面的。清军攻城时，一方面是威胁屠城，另一方面却从来不四面围攻，总给城内的人留下逃跑的余地，结果大多数城市因逃亡而失守，包括扬州。

等城市人口逃散到了农村，城市成为一个个空城时，占领和控制就变得容易了，只需要在各个中心节点建立兵站，哪里有反抗的迹象，就派兵过去把人杀散，这样占领区永远起不了大的波折，就如清代的驻节将军、提督和日战时期的日本据点等，只有如此才能够以少量的军队控制广袤的地区。

最后一点也非常重要,那就是以战养战。冷兵器时代,由于武器消耗较小,最主要的战争物资是粮食,在粮食生产有限的情况下,一下子多出来了几十万征服者的大军,供养它们的粮食从何来?将城市人口屠杀后,因为城市本身的粮食供应还存在,这样才能够多出来征服者的粮食。

实际上所有的征服者对屠城的必要性都心知肚明,但是从来不会说出来。日本侵略中国,也是早就把中国的历史研究得极其透彻了,他们在南京屠杀30万人,完全是有组织和计划的,南京被屠杀了30万人口后,才有他们30万侵略军的军粮。南京大屠杀之后,南京地区在以后的抗战中作为日军的后方组织不起来抵抗,同时造成中国人口大量往四川等地逃散,增加了中国未被占领地区的经济和军队的负担,这些事情日本鬼子是很清楚的。

读者们一定要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战争不仅仅是三十六计一类的计谋,也不光是电子游戏般的打打杀杀,在血腥的攻城略地背后,有更加残酷和深刻的经济因素和持久的心理阴影,绝不可以轻言。

2. 古代屠城金融学

古代的屠城,是对于对方经济和信心的毁灭性打击,这样的打击对于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是致命的,这也是蛮族在冷兵器时代征服文明世界的主要武器,历史上的多次文明倒退也是这样发生的,屠城最大的结果就是通过信心崩溃和打击国家信用,造成古代社会的金融灾难。

在古代战争当中,如果是同民族战争或者是国内战争,屠城是非常少发生的情况,在此时战争的各方都希望建立起自己对于社会的信用,得到民心的支持而取得政权,这些民众是统治者财富和权力的来源,但是民族间的战争情况就不太相同了,异族是难以迅速同化为本民族的组成人员的,难以成为自身扩大势力和实力的基础,而这些人还是对手的基础,因此通过屠杀打击对手的基础就是最重要的战争手段。

在屠杀的情况下,认为老百姓会坚守到底的想法是幼稚的,只要有退路和逃跑的路线,被攻击的地区和可能被攻击地区的老百姓首先选择的就是逃难,老百姓的蜂拥逃亡是对于守军战斗意志的严重打击,而老百姓在逃难过程当中要带走守军的重要资源——粮食,同时青壮年的逃散也使得守军难以补充兵员,更进一步的就是这些逃难的人要把他们存的钱在逃难的时候同时带走,原来埋藏在地底下的银子也会被挖出来带走,这样就使得埋藏在地下的相当于广义货币M2的银子变成流通当中的相当于狭义货币M1的银子,这个变化极大地加剧了货币的数量和流通的速度,这样的过程不断的正反馈,使得市场上必然出现恶性通胀,市场上的恶性通

胀直接造成国家经济的崩溃。我们如果熟悉史料就可以知道南宋的物价比北宋高很多倍,在同样多银子的情况下,通胀就与南宋不断与北方蛮族进行战争相关,中国古代地少人多,战争真正破坏的是国家金融。

更严重的是逃难的人群是要往后方逃跑的,结果就是这些人带着银子过来,使得后方银子的供应量加倍,而对于粮食的刚需也加倍,但是粮食的供给在古代是非常紧张的,基本上就是刚刚够本地区的人食用,现在外来的逃难人口来了,钱也多了,投机存粮的也多了,结果必然是后方经济的崩溃,后方的老百姓粮食不够吃。作为同民族同统治者的社会,你是不能屠杀逃难的同胞的,这样的结果就是后方的灾荒,因为灾荒饿死人的情况会比直接在战场上的人口损失要严重得多,也比战争当中直接屠杀的死亡人数要多得多,中国历次改朝换代的人口大幅度减少,也都与战争导致的灾荒饿死人有关。而到了大家都没有粮食的时候,不但组织不起来有效的抵抗军队,就是为了安定内部的饥民不内乱,也需要耗费巨大的军事力量,最后这些军事力量的粮食也不能保障,内部的自相残杀就要开始了。

在内乱和金融压力下,人口减员最大的问题就是发生去城市化,也就是在城市里面粮食供应出现巨大的问题,城市在古代也需要以货币进行交易来购买粮食的,金融危机直接威胁了城市人口的生存,城市人口的大量饿死和城市人口的大量逃离城市,使得城市没有了人口,也就没有了冷兵器时代的防御能力,文明社会的一个个防御堡垒——坚固的城池都成为空城,而文明社会同时也是以城市为中心进行社会管理和统治的,城市成为空城以后,国家对于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的能力也被彻底削弱了。这样在游牧民族的攻击下整个国家就没有抵抗力了,因此通过屠城进行的金融打击是致命的。

在屠杀的金融打击下,屠城成了蛮族征服文明民族的主要手段。以游牧民族的人口,本身是难以全面攻击和控制人口庞大和广袤的农业文明国度的,但是依靠屠城造成农业民族内乱,造成其国家信用缺失后的金融危机和粮食危机,最后造成其社会的人口减员,使得国家的控制力崩溃,最后被征服,这个征服的过程也是国家信用崩溃的过程,其中屠城的金融打击是关键。信用元规则支配下的人类有组织暴力行为,往往可以达到骇人听闻的血腥程度。

二、贵金属时代的恶性通胀

1. 金银货币时代的通胀机理

很多人认为通胀就是印钞过量了,在贵金属货币年代,无法印钞就没有通胀,

但是古代也确实存在着通胀，历史上的粮荒实际上多为通胀，在粮食恐慌下粮价疯涨，这个疯涨就是一种发生在贵金属时代的恶性通胀，那么在货币总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胀又是如何能够发生的呢？

贵金属时代的通胀不是货币的增加而是人们持有货币的意愿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巨大变化，这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和持有货币意愿的变化对于通胀的影响，在近现代的西方经济学里面，实际上是研究的非常清楚的。

我们从剑桥方程式可以解读这个通胀的机理，1917 年，剑桥大学教授庇古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货币的价值》一文，提出 $M = kPy$ 的货币需求函数，即剑桥方程式。式中 y 表示实际收入，P 表示价格水平，Py 表示名义收入，k 表示人们持有的现金量占名义收入的比率，因而货币需求是名义收入和人们持有的现金量占名义收入比例的函数。在此公式下通胀不光是价格与货币数量，更关键是持有货币的意愿，也就是剑桥方程式当中的 k 这个参数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通胀的时候，人们持有货币的意愿大幅度的降低，导致在货币数量 M 一定的情况下，实际收入 y 也是难以快速改变，价格水平 P 必然会出现快速的上涨。

同样，通过费雪方程式也一样可以来解读这个通胀的机理，费雪方程式是传统货币数量论的方程式之一。20 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了交易方程式，也被称为费雪方程式。费雪方程式为：$MV = PT$，其中 M 是货币的数量，V 代表货币流通速度，P 代表物价水平，T 代表各类商品的交易总量。通胀在此公式下不光是货币与价格的关系，更关键在于货币的流通速度，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大幅度增加，在货币和商品不变的情况下，货币的流通速度增加，那么商品的价格必然要增加。

费雪方程式和剑桥方程式都可以给出货币总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胀的机理，通胀下的费雪公式下货币流通速度和剑桥公式下持有货币的意愿二者实际上是统一的，只不过一个是从宏观的角度一个是从微观的角度，人们持有货币的意愿降低，拿着钱就要想着把钱花出去，那么货币流通的速度就要极大加快了。这里大家可能只注意到了在贵金属时代是不能印钞、不能搞货币衍生的，因此货币的总量是不变的，我们还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古代因为没有货币的金融衍生效用，现代社会如果经济下滑人们持有货币的意愿降低，货币的衍生效果也会降低，也就是货币乘数会减少，很多时候是货币流通速度加快以后是遏制货币数量的，甚至货币的数量可以减少，就如中国的广义货币 M2 比美国多一样，美国人不存钱，持有货币的意愿低，同时美国的金融市场发达货币的流通速度远远快于中国，因此在美国收入高和商

品数量多的情况下,美国的广义货币 M2 可以比中国要少!因此对于贵金属不能印钞是要两方面看的,贵金属不能让货币增加,也不能让货币减少,因此在人们持有货币的意愿或者货币流通速度发生变化的时候,反而货币供应量不能调节紧缩,导致贵金属时代的通胀一样会猛烈的到来,而且一样不比现代社会少。

因此认识贵金属时代通胀的机理,对于更深入的认识通胀是有巨大意义的,通胀对应的是货币流动性而不是简单的货币数量,货币的流动性是货币数量与货币的流通速度的乘积,在贵金属时代由于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货币的流动性照样是可以泛滥的,因此对抗通胀更关键的是对抗货币的流动性,而货币的流动性是受到货币持有意愿影响的,货币持有意愿的降低和剧烈变化,本身就是对于货币的不信任,通胀归根结底是一种信用的危机。

2. 乱世买金的真实原因

乱世买金的说法中国自古就有,而中国古代的买金是使用贵金属白银来购买黄金的,不是现在政府所印刷的钞票,因此对于自古传来的乱世买金的真实原因是需要另外深刻认识的。古时乱世买金是讲白银与黄金的比价问题,也就是在乱世的时候,黄金和白银的比价会向着有利于黄金的方向发展,这里又该怎样理解呢?

中国古代的经济特点是王朝一建立就是通缩的开始,因为中国古代白银的数量基本差不多,而人口却随着王朝的建立和社会的稳定快速的恢复和增长,人均的白银占有量是越来越少的,而王朝建立经济发展,古代的经济发展就是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人均的经济数量和生产力一般也是缓慢增加而不是减少,那么对应于社会产品的白银数量相对就要更少,这就产生了强大的货币通缩背景,在通缩的背景下存钱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从事什么生产和投资在通缩下都是比不上存钱的,因此社会有大量存储的白银,这样的白银存储又使得社会流通的白银进一步的减少,导致更大的通缩,中国古代的盛世,实际上就是通缩到极点的时代,这样的通缩基础上进行通胀,通胀的空间就是非常巨大的了。

等到了乱世,人们需要逃难,需要购买商品,社会的不安定会让人们持有货币的意愿降低,根据剑桥方程式会产生通胀的压力;同时人们在灾难下带着货币逃难的行为本身就是加快货币的流通,白银的流通速度会增加,根据费雪方程式也会通胀。在通胀的压力下会将存储的白银释放,进一步加剧了通胀,而人们的逃难把埋藏的银子挖出来带走,也极大地提高了货币的供应量,因此乱世通胀就产生了。

在这样的通胀下,中国古代黄金虽然不是货币但黄金是一种避险商品,在乱世逃难的情况下,怎样携带财富在古代是一个大问题,古代的房地契在异地谁也不知

道的情况下是不好使的,各种钱庄的银票在乱世也是信用全无,只有贵金属是硬通货,但是贵金属的重量是随身携带的大敌,1000多两白银就是近100斤,你怎么带呢?我们现在写的古代小说大侠动辄拿出几百两上千两银子,这要带几千两银子在身边,人是搬不动的,而兑换成金子,按照中国古代大约一比十的比例,重量就小多了,可以随身携带的财富数量大大增加,因此为了逃难携带大量财富必然是要买入黄金的。就算到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上混世的人要带着大金链子,这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出事跑路的时候随时身边有几万块钱,黄金是烟摊都收的东西,比人民币携带方便,可以吃饭睡觉洗澡都带着。

古代乱世购买黄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黄金比白银好鉴别,比重比黄金重或者接近黄金的金属元素古代是没有的,铜的比重是8.9而黄金是19.3,铜的比重不到黄金的一半,如果你拿手里掂量一下,立即就清楚了,而且黄金有颜色,按照含金量不同颜色还有差别,也就是所谓的成色,古代人长期观察使用对于黄金成色是很敏感的,因此黄金造假是很难的。而白银就不同了,白银本身会氧化带有黑色,而白银比重10.5,很容易被铅(比重11.3)和锡(比重7.28)的混合物来冒充,颜色和比重都可以做的比较逼真,也可以以真银包裹在外面,就更难以鉴别了,这些作假问题对于黄金是做不到的。乱世尔虞我诈,交易的时候假银锭泛滥,白银的信用受到巨大的威胁,乱世的时候交易仓促也难以仔细鉴定,这些都会导致大家选择黄金为交易对象,出现了黄金货币作用加强而白银被市场挤出的情况。

在中国古代银本位的情况下黄金出现货币属性肯定是要黄金溢价的,黄金涨价会导致更多的白银追买黄金和持有黄金,进一步加强黄金的价值,因此乱世买金的历史经验就产生了。

3. 恶性通胀实质上是信用体系的坍塌

对于恶性通胀,尤其是认识到在货币总量一定、其基本价值难以改变的古代贵金属货币时代也会通胀以后,我们就对于通胀又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通胀实际上是信用体系坍塌的结果。

对于现代货币是国家信用、政府可以印钞的情况下,恶性通胀的发生是政府信用的垮塌,导致政府信用垮台的经常是过度印钞,而对于不能印钞的时代,货币信用的坍塌就是人们持有货币的欲望降低,到手里的货币总是要以最快的速度花费出去,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提高,这货币流通速度的提高是通胀的来源,在国家信用时代,实际上发生恶性通胀的真实原因也是货币流通速度和人们持有货币的意愿,这意愿和速度的变化是可以异常剧烈的,使得货币贬值的速度远远超过印钞的

速度,就如在恶性通胀时人们领到当月工资不是计划着一个月用光,而是一路小跑到商店把当月所有需要的买齐,而商店也是立即进货等等,这样货币流通速度立即比原来提高30倍,这个30倍是比印钞快得多的。

流通速度的增加源于政府的印钞或者贵金属信用降低后货币溢价的消失,而流通速度的增加按照费雪方程式又导致货币进一步贬值,其后流通速度会更快,这是一个迅速的正反馈过程,恶性通胀就是在这样的正反馈下发生的。

在剧烈的恶性通胀下经济学基本假设将要被彻底打破,这基本假设就是市场出清、信息充分和绝对理性;恶性通胀下货币币值的变化极为迅速使得市场出清、信息充分和绝对理性都无时间达到,市场会产生扭曲,而这样的扭曲就要在通胀下产生投机性和恐慌性需求,使得需求更加不平衡,加剧供需矛盾。例如粮食在恐慌下会多存储一年,或者投机存粮,导致粮食的需求瞬间就可以翻倍,对于粮食这样刚性需求的商品,吃不上饭的压力必定导致价格上天。而投机性需求和恐慌性需求造成的供需不平衡也继续给通胀带来动力,这种正反馈是非常可怕的,只要这样的正反馈发生,由于传统的经济学假设已经不复存在,市场是难以通过自身完成调节的,在贵金属时代也发生恶性通胀,恰恰是最好的实例来说明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金融社会也要发生通胀,对于恶性通胀市场是无法自行解决的,即使在贵金属就是自由金融的天然信用阶段,对通胀的问题也是要皇帝强权干预市场才行的,对于粮食危机除了放赈等打压市场的手段,限制个人存粮等政策也是经常采用的,史书上所谓的平准、输均等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就是这样的市场干预过程。

所以恶性通胀就是一个信用坍塌的过程,在古代的贵金属时代也是会发生信用危机的,而对于现代社会这样的风险就更高,一旦进入到正反馈阶段,政府的强力干预是不可避免的,自由市场是难以完成调节的,市场调节只有在符合经济学基本假设、市场能够迅速形成均衡点的负反馈阶段可行,一旦信用危机进入正反馈阶段,市场的手段是不行的,而进行信用攻击、让竞争性国家进入恶性通胀,也是战争的重要手段,是信用元规则在实战领域的具体应用。

三、历史上的信用战争

1. 宗教战争打的就是公信力

古代的宗教战争是异常残酷的,任何战争都是政治的延续,这些宗教战争说到底也有其自身的政治诉求,这种政治诉求的要义主要不是直接争夺资源,而是哪一

个宗教是正统,或者是哪一个宗教的神更有本领,而这是一个宗教之所以能够让人民信从的根本。在宗教社会,宗教在信仰层面的公信力是生死攸关的。

公信力,《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使公众信任的力量。公信力的概念源于英文词 Accountability,意指为某一件事进行报告、解释和辩护的责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接受质询。由此可见公信力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权力面对时间差序、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公信力既是一种社会信任系统,同时也是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属政治伦理范畴。公信力是一种信用,是国家信用的体现,而宗教战争的焦点就是谁更有信用,谁更具备公信力。

公信力就是宗教的生命力,也是一个宗教国家的根本,这在宗教人士的眼里是比世俗财富更重要的东西,这里的评价标准不是财富而是信仰,但是如果信仰让一个社会团结成为一个整体,这个信仰就是巨大的财富。

个人的财富不等于社会的财富,个人的力量强不等于社会的总的力量强,公信力和宗教是要降低社会总成本提高社会总效益的,通过公信力把非合作博弈变成合作博弈,从而发挥最大的社会效力。

在个人无限追求利益最大化并不自动导致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这就是著名的囚徒困境,这就是纳什均衡原理。如果一个社会的非合作博弈过多,就要造成社会的总成本巨大,如果整个社会的总成本高于总效益,这个社会就要解体了。如果要使这个社会强大,就是要社会的净效益多,也就是社会的总效益减去总成本后的净值大;而这个总成本和总效益所形成的社会净效益,实际上就是这个社会的信用和凝聚力的体现。社会的公信力和信仰,就是提高社会总效益降低总成本,是一个社会强大的根本保障,因此在资源不是特别紧缺的古代社会,提高公信力是更致命的问题,为了公信力的宗教战争是比争夺资源的战争更有意义的事情,因此古代战争多为争夺公信力的宗教战争就不奇怪了。

2. 中国春秋争霸的礼法战争

纵观春秋时期,君主们的争霸活动都是围绕着尊王尊周的活动展开,并且高度重视周礼,是打着周礼的旗号进行的战争,包括强势的君主被挟持威逼做出的承诺,也要信守;而齐桓公号令天下的一致行动伐楚,为的也是要让楚国进贡一车茅草,这样的战争意义何在?

这样的战争实际上就是一个争夺公信力的战争。春秋时代是一个商业发达、人口流动的时代,就如秦国有大量的外来人口一样,各国也在积极争取人口流入,

各国的国界都不是封锁的。当时由于战争频繁人口稀缺，人口成为重要的生产力和军事实力来源，各国变法图强的一个主要内容也是鼓励生育增加人口，这与后来大一统的国家是截然不同的。中国进入大一统时代后，人口增长受到了土地有限的压力，国家已经没有了对外扩张的空间，巨大的人口会成为国家的内部压力，成为改朝换代的基础，这与春秋时代的不断战争是不同的，而对春秋时期的诸侯国来说吸引人口就是重要的强国之策；而国家尊礼，在信仰礼教的古代，是人心所向的，是社会公信力的来源，春秋的霸主实际上就是礼教的教主，君主的仁义和守信，是吸引民众归附的核心优势，也是国家凝聚力的来源。

而春秋也是一个商业发达的社会，因为国家实力有限就必然要依靠商业互相弥补不足，而不是汉代以后的平准和输均等国家计划手段。《管子》所记载的各诸侯国之间的经济战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要知道经济战之所以可以发生，必然要以足够的商业活动为基础，自给自足的社会是难以被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战所影响的，而后来的吕不韦、陶朱公等，都是当时著名的跨国财阀，这样的规模在甚至后来的中国社会是绝无仅有的。而商业和经济的发达，也需要国家守信和礼法为基础，商业是需要信用庇护的，春秋的霸主实际上也是春秋商业活动的庇护者，是国家繁荣发达的保障。

因此中国春秋时期的争霸，除了直接的土地版图的扩张兼并以外，是非常注重礼法的，以尊王为主线的战争很多，虽然里子是争夺利益，但是面子上却是礼法，礼法能够给春秋的诸侯国带来巨大的利益，就如史书上说孔子写春秋乱臣贼子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公信力。到后世的皇帝，对于皇权的公信力也是战争的重点，中国的对外远征经常不以兼并他国为目的，但是需要他国纳贡称臣。

我们再延伸一步，当今的外交礼节和外交对等，也是重要的国家公信力的表现，外交上对一个国家不尊重，足以引发两国的敌对甚至战争。在这里外交礼节实际上也是一种礼法，其中的意义与春秋时代的礼法是一致的。

所以春秋争霸的礼法战争实际上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信用战争，战争带来的利益就是国家公信力的扩张，国家信用在招揽人才、人口和经济活动当中给争霸的国家带来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3. 为什么后世帝王给关公的封号高于孔子？

对于关公和孔子的评价，很多人没有认真进行比较，但是如果真的拿来比较一下，大家就会奇怪地发现后世帝王对于关公的封号是高于孔子的，因为关公死后被尊为“帝”，而孔子只不过是“王”，这之间一个为君一个为臣，是有天壤之别的，为什

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值得思考。

中国古代社会一般是以文制武,文官的地位明显高于武官,以一省来说,一个二品文官巡抚可以挟制从一品的武官提督,并且古代把读书科举放到了社会最高等级的行业地位,练武则没有那么高的地位,因此孔子理应比武将关公地位高才对。

有人会说关公是民间的财神,民间是爱财的,但是对于历代统治者来说,他们给封号不是以财物为标准的,而孔子是读书人的领袖,读书科举拜孔子可是求官的,古代是官本位,当官是比发财更重要的事情,连俗语都是升官发财,把升官排在发财的前面,从这一点而言也是孔子的地位要高于关公才对。

对这一独特现象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给关公的封号高于孔子是中国古代皇权时代的特别需要。

这里首先就是孔子是有传承有序的嫡系后代的,如果孔子被尊为帝王,则他的后代就有继承帝王的公信力了,这个公信力是要分享当朝统治者的公信力的,降低皇权信用的事情是绝对不会让之发生的,因此孔子的地位就绝对不能在死后被尊为帝王!还有就是孔子如果以文德被尊为帝王的话,就给很多阴谋篡位的权臣以文德得到君位带来合法性来源,这对于皇帝也是不利的。

而关公是没有嫡系后代的,因此关公死后成为帝君是没有如孔子般的障碍的,但孔子不能被尊为君并不意味着就要把关公尊为帝君,武将被尊为帝君不是更助长武将的造反吗?在古代统治者看来十个文臣贪污的危害性也比不上一个武将造反,对于武将造反是防范甚深的,但是为什么就把关公尊为帝君呢?这里的关键就是把关公的信义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古代社会的管理成本极大,需要信义的道德进行维护,帝君本身也是信义道德的信仰典范,中国古代是尊崇以信义成为帝君的,古代的农民起义领袖入主大统,都是以信义为号召的,以原来的皇帝失德失信而失去上天的信任为理论依据,因天道改而取得皇帝的合法地位。尤其是明朝皇帝出身低贱,要承袭大统就必须把信义拔高,乃至创造出了明太祖与玩伴共屠牛犊果腹而独担责任的故事,关公也就是从明朝开始被尊崇为帝君的。而清朝入关是以武力得到统治权,崇尚关公的武力和信义就是给他们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贴金,当然会把关公的地位一再拔高,在拔高关公地位的过程当中增加统治的公信力。

因此关公的帝君地位是给古代的统治者带来公信力的,关公死后成为帝君说明了武力和信义的结合可以成为帝君,使得这些武力开国的王朝的皇权信用来源得到巩固,而文臣的孔子是反对礼崩乐坏的乱世枭雄的,只不过是为了笼络天下精

英而必须给孔子地位,这其间是有很大的不同,所造成差别的根本在于皇权公信力的考虑,皇帝的公信力是皇权的根本。

背景资料:关公与孔子的历史封号

孔子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鲁哀公亲诔(lěi)孔子,诔文中称孔子为"尼父"。孔子有封号始于汉平帝刘衎(kàn)元始元年(公元元年),汉平帝刘衎追封孔子为公爵,称"褒成宣尼公"。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元宏改称孔子为"文圣尼父"。大象二年(580),北周静帝宇文衍恢复孔子的公爵之封,号"邹国公"。隋文帝杨坚开皇元年(581),尊孔子为"先师尼父",取消封号。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年(628),尊孔子为"先圣",十一年又改称"宣父"。唐高宗李治乾封元年(666),尊孔子为"太师"。武则天天授元年(690),恢复其公爵,称"隆道公"。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七年(739)升孔子为王爵,谥号"文宣",称"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赵恒加号孔子为"玄圣文宣王",五年又改为"至文宣王"。孔子家族从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第46代起,由嫡长孙世袭"衍圣公"爵位。自此孔氏族人,无论长幼辈分,得以"公爷"称之,并得大礼参拜。元成宗铁木耳大德十一年(1307),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九年(1530)改称孔子为"至圣先师"。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顺治二年(1645),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十四年又复称"至圣先师"。民国年间,"国民政府"派官员祭祀孔子,祭文仍称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

关羽生前除曹操奏请汉献帝封其为汉寿亭侯外,正式官职为襄阳太守、都督荆州事务。刘备封赐的爵位先为荡寇将军,后为前将军,列蜀汉"五虎上将"之首。在其殁后的41年,即三国蜀景耀三年(260,正好是其诞辰100周年),后主刘禅追谥为壮穆侯。然而,从南北朝开始,直到清朝末年,关羽受历代封建帝王的崇封有增无减,"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褒封不尽,庙祀无垠,关羽名扬海内外,成为历史上最受崇拜的神圣偶像之一。

给关羽加爵封王始于宋代。徽宗赵佶于崇宁元年(1102)追封关羽为"忠惠公",使羽由侯爵进为公爵。事隔一年,又于崇宁三年进封羽为"崇宁真君";大观二年(1108)再封羽为"昭烈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又封

羽为“义勇武安王”。在短短的21年内,赵佶追封关羽多达4次,由侯进公,由公进君,由君进王。南宋第一个皇帝赵构也宣称关羽能“肆摧奸宄之锋,大救黎元之溺”,于建炎二年(1128)加封羽为“壮缪义勇武安王”,其子赵昚更称关羽“生立大节与天地以并传,殁为神明亘古今而不朽”,“名著史册,功存生民”,于淳熙十四年(1187)加封羽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

封关羽为帝始于明代。朱棣说他的行动得到关羽显灵保佑,由他当皇帝乃是“天意”。到了明朝中后期的正德四年(1509),朝廷下令将全国的关庙一律改称“忠武庙”。万历二十二年(1594),神宗朱翊钧进封关羽为帝,关庙的称谓亦由“忠武”改为“英烈”。万历四十二年(1614)十月,朱翊钧封羽为“三界伏魔大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见《咳余丛考》《老圃丛谈》两书)。《解县志》和《山西通志》对关羽封帝的记载与上述说法有异:一说是万历十八年(1590)封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一说是万历十年封羽为“协天大帝”。

清代统治者也是极为崇信关羽的。顺治元年(1644),即封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四年(1726)追封羽的远祖、祖父、父亲为公爵。乾隆之后,历嘉庆、道光二朝,羽的封号陆续加成“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羽赞宣德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多达24字,比之历代表彰尤著。文宗奕宁于咸丰五年(1855)追封羽的远祖为“光昭王”,祖父为“裕昌王”,父亲为“成忠王”。

四、宗教、金融势力与信用战形影不离

1. 金融资本、宗教与国家的互相制衡

当今世界,金融资本和宗教已经具备了与国家权力博弈的实力,在当今美国一家独大的世界,限制单极膨胀的力量不再只是国家联盟和区域组织,更多的是超越主权国家的力量,那就是金融资本和宗教的力量,它们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制衡形成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背景。资本、宗教与国家并列构成信用元规则之战的主要玩家。

在这样的制衡关系中,金融资本的流动和操作决定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宗教决定了国家的主流意识和价值观。一方面,国家给金融资本和宗教制定规则;另一方面,国家机器也是金融资本和宗教权益的维护力量。

在历史上,金融和资本均产生于国家的内部,产业资本与金融业的结合形成金融资本和垄断后,就成为决定国家走向的一个寡头势力。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成为世界统一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利益集团,实际影响力和控制力可以超越国家。一个大财团的经济金融实力可以是比一般国家的整体实力还要强悍的。

在西方,宗教在历史上的权力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历史上欧洲国王的加冕需要教皇主持,现在通过民主的形式,宗教的影响力又得到了显现,因为在普选下,民众"意见"的统计平均值就是主流宗教的"意见"。

权力的来源离不开宗教和金融资本,而宗教和金融资本的力量也具备了颠覆国家的能力和手段。在单极世界下,膨胀的美国国家权力和美国的选民权力,正由于金融危机和恐怖主义而受到限制,而金融危机的背后是金融资本的力量,恐怖主义的背后是宗教的影响。我们认为当今的世界,是主权国家、金融资本和宗教之间三方博弈三方制衡的世界,这样的新三权博弈达到平衡,才是当今世界维持和平发展的一个权力机制和社会经济基础,我们对于当今世界的认识要超越主权国家,从更广大的视角来看其中的博弈,在新的博弈视角下,看待世界的运行和谋求我们的生存和发展。

现在世界的博弈理论也在发展,建立了进化稳定博弈理论,我们的世界就是理论中的进化稳定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和博弈中,进化稳定策略是按照宗教信仰进行优化的,什么是好的策略一定要符合宗教的规则,而宗教的力量使得博弈进化的方向朝着钱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所有人都在追求财富,本身造就了金融资本的权力来源,世界进入了财富决定一切的世界,而国家的作用就是保持维护这样的进化稳定状态,把不符合进化稳定策略的突变给淘汰,小到对于小偷的惩处,大的就是为什么国家会为了意识形态而战和前苏联革命资本世界要联合反对。因此在这个世界的博弈中,金融资本、宗教和国家以各自的优势发挥着对于整个世界进化博弈的影响,他们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促进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而我们表面上看得民主社会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主权的民主,实际上在进化博弈中只是模仿和跟随进化博弈的物种个体,对于物种进化和发展是贡献不大的,而且如果偏离了进化稳定策略,还要被淘汰,历史是在博弈下进化发展的,但是对于进化的过程是有其特有的规律的。

当今世界的霸权就是军事霸权、金融霸权和信息霸权,霸权的背后是金融资本、宗教势力和主权国家的博弈,在核战争制约世界大战的时代,军事霸权更多地成为外延扩大的核威慑,而金融霸权和信息霸权的博弈成为世界主流和博弈的常

态。

而对于当今社会全民进入市场化的博弈舞台后,博弈成为世界的进化方式,金融霸权和信息霸权的真实本质就是博弈霸权,就是占有制定博弈规则的权利,把自己变成赌场的老板,而让芸芸众生成为赌徒,赌徒在赌场里面有充分的自由和自主权,似乎一切都是自主地决定和自己控制,但是实际上输赢的结果是早就决定了的。每一个进化稳定博弈的环境就是一个赌场,西方输出他们的制度也就是需要你加入到他们的赌场里面,只不过他们只想让你当赌徒却不让你成为赌场的合伙人。而国家主权、金融资本和宗教,就相当于这个赌场的所有者股东、经营者总经理和决策者董事会的博弈,主权国家是经营者,金融资本是所有者,而决策者是宗教,也就是国家强力保持赌场的运行和秩序经营赌场,金融资本取得赌场产生的财富利益,而赌场的决策需要按照宗教的意识进行决策。中间的官僚体系是赌场的员工,时不时可以出卖企业利益腐败赚钱,而芸芸众生普通老百姓就是被盘剥的赌徒,因此这就是一个类似赌场的博弈,只不过赌场是一个零和博弈,符合人类发展的博弈会有利益产生,但是对于公司而言,总经理、董事会在股权分散不能被股东会某个任命以后,这样就是一个全面制衡的格局。

此后,我们会逐步展开分析国家主权、金融资本和宗教的博弈,它们势力的此消彼长,以及以这样的新三权博弈的眼光,重新验证分析我们过去的历史和看待当今的问题,预测今后世界发展的方向和格局。

2. 资本与国家瓜分货币红利

畅销书《货币战争》把西方间接发行货币的体制弊端描述的淋漓尽致,尤其是以这些弊端面对我们的直接货币发行,更是显出了我们直接发行货币的优越。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西方政客就那么傻吗?这个社会金融力量巨大但也存在其他利益集团,仅仅依靠金融控制一个国家的错误,二战前犹太人已经犯过一次了,世界不会再有那么多的傻瓜,这样的结果应当是各种利益博弈制衡的结果。

在西方的货币发行模式下,《货币战争》所指责的就是以债券发行货币的模式下,国家政府是不能还清债券的,如果还清债券,货币也就随之而消失!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在债券抵押的货币发行模式下,原来金银的货币作用并没有被取缔,只是出现了著名的"劣币逐良币"效应,金银退出金融货币市场,但是一旦债券没有了,金银还会回来,即使是现在银行也经营黄金等贵金属的兑换业务,由于金银的价格早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初金本位的兑换价,谁也不会按照这样的机制执行,金银良币被债券劣币给驱逐了,因此从根本上讲"国家无法还清所有的

债券”这样的前提条件是不存在的。

而发行债券劣币的好处,全部让金融资本给赚取了吗？一经深入思考,问题的本质就浮现出来了,在金银货币发行的模式下,国家发行债券就一定要从社会上收回金银货币,再使用这些货币购物支付国家费用;但是在债券货币发行模式下,政府发行债券从市场上收回货币后,这些债券可以抵押再次发行货币,而国家通过债券取得的货币在国家支付各种费用后也回到了市场上,这样市场上的货币会因为国家债券的发行而增加,这与金属作为货币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为了限制这样的货币增加,一般禁止国家直接发行债券给央行换取货币,而是通过其他机构购买了债券后再到央行抵押发行货币,只是把这样的过程从直接变成了间接,通过间接的方式更主要的是限制了政府以权力要求央行发钞购买其债券变成政府的印钞。

我们应当看到政府发行债券给整个市场带来了货币增量,但是这行为并没有带来物质的增长,其结果就一定是货币贬值,而货币贬值的损失是让全社会的货币持有者来平均承担的,对于发行货币的央行,他人持有的货币是央行的债务,货币贬值就是央行的债务贬值了;同时货币贬值也使得政府的债券贬值、从而使政府的债务贬值,结果是政府和私有央行在债券抵押货币发行的过程中共享了贬值的好处,实际上是一同瓜分了货币发行的红利。

在债券抵押发行货币成为世界的主流后,经济学的理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和央行的政策也继而发生了变化,以获取贵金属为基础的重商主义消亡了,早先的凯恩斯理论推行的积极政府财政政策和政府的赤字政策,实际上就是大量的发行债券,这些债券通过抵押货币发行的模式又成为大量的货币,市场的货币投放量大增。而后来的货币主义经济学更是主张不断地增加货币投放量,促成市场上货币的有序贬值,这些理论和政府的做法,会造成大量的货币发行红利,政府的债券和央行的货币债务都是获益者,红利被他们分享了,这应当是一个双方获益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更应当是共谋而不是金融资本单方面的操纵和控制。

依据债券发行货币还有一个重大的好处就是以往的金属货币是具备资源属性的,变成债券的信用货币资源的属性就没有了,这样的金融“劣币逐良币”的结果是资源退出货币,西方这些国家可以以货币的发行兑换他国的资源,在资源上享有巨大的利益,所以此模式在国际上的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制破裂以后,以货币负债占有资源的国际博弈就开始了,这样的利益也被国际金融资本和国际货币发行国政府所分享。

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货币的需求是越来越多,货币供给不足也是限制经济发

展的瓶颈之一,而如何增加市场的货币供给?通过可以无限增加的国家信用替代不能增加的金属成为货币的基础本身也是解决问题的出路,而且我们现在没有发现更好的出路。国家直接发行货币本质上也是国家的负债,与债券的性质是类似的,除非国家不保证其货币信用了,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货币迅速恶性通货膨胀货币体系和国家信用崩溃;国家保证所发行的货币信誉,这些发行出去的货币就是国家的负债并且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未必比债券的利息小。而间接货币发行的利息承担就是国家义务所承担的成本。

以债券为基础发行货币实际上满足了社会对于货币投放量的需要,对于社会经济只要发行量合理,就是促进而不是掠夺,政府和金融资本所取得的货币红利是有经济发展支撑和利益来源的。社会货币供给充足最大的效果就是极大的降低了社会利率,在金属货币时代受金属保有量的限制货币总量有限利率奇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把社会从传统的高利贷者的盘剥中解脱出来,所以不要只看到这些货币红利的巨大,还要看到其所带来的价值和社会效益。

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在国家债券发行货币的基础上,原来在贵金属货币时代国家难以控制的货币就变成了可以通过国家债券数量和央行的贴现率等等货币政策控制的货币了,社会经济的货币大权被政府和央行所掌握,国家以暴力维持的强权就可以逐步让位于通过金融控制的权力,这是现代社会摒弃血腥的重要基础,国家对于社会的权力和影响力也通过金融货币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的方式加强,只不过这样的权利是与金融资本一同分享的。

所以这样的间接货币发行不是政治权势集团被私人金融机构所掠夺,而是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共同获利和博弈的过程,也是造福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在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后,美国甚至开动印钞机让政府的债券直接发行给了美联储。政府与金融资本的博弈保证了货币发行的权力彼此受到限制,也保证了货币的稳定,在政府直接发行货币的国家,更容易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不仅仅是政府多发行了货币,更有社会投机的推波助澜;而在间接发行货币的资本社会,属于私人的金融资本从直接发行货币时的投机者变成了体制的维护者,要和政府一起维持货币体系,金融资本实力强大渗透产业的方方面面,金融资本与政府一起维护货币体系实际上就变成了所有产业的参与,产业不囤积居奇进行投机,货币体系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概率就会极大地降低,因此间接发行货币比直接发行货币的货币体系的稳定性要高很多,直接发行货币的体制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几率要大很多。所以不仅仅要看到这样的货币红利对于社会的掠夺,也要看到这样的博弈限制了恶性

通货膨胀、增加了货币投放量促进了经济发展,对于全社会也是有好处的。

国家与金融资本共同发行货币、共同牟取利益也共同承担责任,这个责任就是维护货币市场的稳定,货币市场的稳定是对于全社会都有益的,而纸币提供足够的社会货币投放需求也是社会需要,为了这样的利益,即:满足经济发展的货币投放需求和维护货币市场稳定,社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也是合理的,而这样的代价就是国家和金融资本所享有的货币发行红利,从来没有白来的晚餐,而对于国家和金融资本发行货币数量的限制就在于社会的承受能力和他们维持货币市场的能力,否则出现经济危机金融货币体系崩溃,遭受损失的也是国家和金融资本。

因此对于社会最重要的金融行为——货币发行,是一个金融资本与政府合作和博弈的产物,这样的产物既攫取了货币红利,也给社会带来了经济发展,同时还加强了政府和金融资本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一个事物的复杂性是需要全方位认识的。

3. 信用战是各种势力博弈的舞台

国家政权的势力、金融资本的势力和宗教的势力均离不开信用,同时主导当今世界的又是国家势力、金融资本势力和宗教势力三者的制衡博弈关系,他们博弈的方向和纽带就是信用,谁有信用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支持和资源谁就是胜利者。

不同的势力掌握信用的不同层面,国家主要是信用的强制力保障,而金融资本最大的特点就是掌握交易媒介的信用,也就是货币信用,最后宗教的信用体现在价值体系和价值观、评价标准等层面,这些不同的层面都深刻地影响着信用社会的运行。

国家、金融资本和宗教之间的信用影响力是此消彼长的,平衡是可能被打破的,当一个社会进入到了战争状态,各种力量的博弈就更加激烈,原有的势力平衡就要被打破而重新分配,此时国家信用和金融资本信用、宗教信用的利益是要再分配的,这里有财富的再分配,也有权力的再分配,这样的分配是规模巨大的,错过了战争中再分配的机会,平时的调整是很难的,就如交战国的领土在战争当中变化极大,停火前多占一点停火后就基本是自己的了,和平时代想要改变版图是基本不可能的,而各种势力范围的版图划分也是与领土划分类似的,信用战等战争状态下就是一个势力版图的重新瓜分过程。

当今世界已经发生金融危机,现在各国经济下滑经济危机正在来临,按照危机三段论,危机是要有金融、经济、信用三个阶段来发展的,现在世界的经济问题已经

到处蔓延,可以想见的信用危机就要产生,信用危机背后必然伴随着全球信用体系的重新构建,在这样的信用体系构建上世界财富要重新布局,而国家、资本、宗教等各种势力的此消彼长,也是在这样的构建基础上再划分势力范围和财富分配,金融领域的危机主要是金融资本的地盘,而到经济危机则是各国和金融资本共同参与了;一旦发展到信用危机,那就波及宗教了,宗教的信仰是信用社会的基础。因此资本、国家和宗教就全部参与进来,所以只要危机发展到信用危机,进行了世界信用体系的战争,那么就是资本、国家、宗教各种势力全方位的博弈,信用战是这些势力博弈的平台。

因此信用战争状态是各种势力改变自身势力范围最重要的时刻和舞台,一旦爆发信用战,各种势力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博弈,此时各种势力的本来面目也最容易显现,这是一个比常规战争更为隐蔽和混乱的战争状态,本书以后的章节会深入解析。

五、从重商主义到货币主义的和平掠夺

1. 重新审视历史上的重商主义

首先我们温习一下历史上的重商主义经济学思想,以下内容和评述是当前的主流权威说法:

重商主义是18世纪在欧洲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封建主义解体之后的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体系,反映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15~18世纪中在欧洲流行,后为古典经济学取代。认为一国积累的金银越多,就越富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禁止金银输出,增加金银输入。重商主义者认为,要得到这种财富,最好是由政府管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发展对外贸易垄断;通过高关税率及其他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并利用殖民地为母国的制造业提供原料和市场。该名称最初是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一书中提出来的。

重商主义抛弃了西欧封建社会经院哲学的教义和伦理规范,开始用世俗的眼光,依据商业资本家的经验去观察和说明社会经济现象。它以商业资本的运动作为考察对象,从流通领域研究了货币—— 商品——货币的运动。

重商主义基本观点:

1. 认为贵金属(货币)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金银。除了开采金银矿以外,对外贸易是货币财富的真正的来源。因此,要使国家变得富强,就应尽量使出口大于进口,因为贸易出超才会导致贵金属的净流入。一国拥有的贵金属越多,就会越富有、越强大。因此,政府应该竭力鼓励出口,不主张甚至限制商品(尤其是奢侈品)进口。

2. 由于不可能所有贸易参加国同时出超,而且任一时点上的金银总量是固定的,所以一国的获利总是基于其他国家的损失,即国际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

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应该控制国家的经济,以便损害和削弱对手的实力,增强本国的实力。15 世纪初,正当文艺复兴运动进入初期发展阶段之时,重商主义兴起。到了 17 世纪,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衰落,重商主义也逐渐开始崩溃。从时间上看,重商主义可以说与文艺复兴运动同步。同一时期产生两种社会思想——人文主义和重商主义,其中有其深刻的根源,即当时社会上追求商品生产更快发展,追求商业资本的迅速增加和货币资本的不断积累,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这是重商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重商主义的产生和更深层次的背景,则是在追求商业资本增加、追求货币积累这股强大潮流冲击下,所引起的西欧经济形式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新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变化,旧式贵族变成了真正的商人,它正反映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变化。重商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

对于上面论述的重商主义,我们要从资源和信用的层面进行再认识:

贵金属是货币更是金融宏观调控的手段,一个国家内部的贵金属数量实际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货币总数量,如果国家的货币投放量不足,必然会影响到国家的信用和国内经济的运行,重商主义流行的时代是金本位的时代,一个国家发行货币是受到贵金属限制的,这个限制就是对于国家货币信用的限制,通过贵金属的内流扩大内部的货币投放促进经济发展,使得国家信用得以扩张,因此经济得到发展,而这样的流入让竞争国贵金属外流货币投放量下降陷于通缩,国家信用受限,而这样的流动在国际间是此消彼长的,也就变成了各国的信用博弈,在贵金属流动严重失衡的时候,为了货币信用而战就是必然的了,对此最令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史实就是因白银外流而禁烟导致的鸦片战争,这是一场典型的信用战争。

重商主义盛行的时代是大宗"刚需"物品贸易的时代,而非现在生产过剩和生产转移的时代,因为那个时代运输成本高昂而各国高筑关税壁垒,国际贸易的成本

是巨大的,国际贸易基本上是各国必需品的交换,在“刚需”贸易下,贵金属的流动造成对于国内货币的挤兑和贸易失衡,使得贵金属流出的入超国出现通缩,而贵金属流入的出超国则出现通胀,这样的通缩通胀变化以后,再以某种看似等价的价格进行交换,通缩的国家就要吃大亏了,本国的资源和财富会以看似公平贸易的形式外流到外国。中国在清中期以后的白银外流,最大的影响也是这样的价格变化造成的财富外流,因此对于贵金属时代重商主义的信用掠夺是要从更高层面来认识的,这不是简单的流动的贵金属价值的转移,而是定价权和海量财富的转移!

2. 新重商主义与发达国家的赤字政策

“新重商主义”这个术语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像“重商主义”那样熟悉,它是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麦金农、克鲁格曼、萨金特等人在描述美国20世纪70年代对外经济政策中的贸易保护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时候所发明的。同时“二战”后某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建立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以及它们所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也带有某些重商主义色彩,因此也被称为“新重商主义”。可以看出贸易保护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同15世纪的重商主义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这个相似性在于两者都是通过信用的商业扩张来取得利益。

我国与日本、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国家一样,长期以来追求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是新重商主义的信徒,直到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天文数字以后才开始反思。我们为了刺激出口和获得外汇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这些外汇被看作一个发展中国家国际信用的来源,但是这种信用也被外汇和他国货币信用所绑架,结果是成为他国的信用附庸国。

发展中国家货币国家信用不足,实际上是外汇本位制的新重商主义,中国央行的主要货币发行方式就是外汇占款,占到中国货币发行量的80%以上,结果就是国家信用被外汇和外国信用绑架,在新重商主义下不得不储备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就要付出贬值被掠夺的代价,为这些外汇付出足额的资源对价。外汇都是资源换取的,实质上是被发达国家套取资源和印钞贬值掠夺。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储备外汇,那么发达国家印钞就要发生恶性通胀,但是发展中国家已经被外汇绑架了,结果就是发达国家印钞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受损信用下降,发达国家的印钞变成了发展中国家的通胀。

对于新重商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外汇减少的直接后果就是货币被强制性地回笼挤兑,导致国家外汇储备只能增加,经济的对外依赖加重,独立自主的经济能力受限,也就是国家的经济信用受限。这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真正鸿沟是能

否自主发行媒介货币,是否有足够的发行国际货币的信用,信用是一个国家是否发达最根本的鸿沟。

3. 货币主义的信用掠夺

在二战以后,世界的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金融世界的全球化成为主流,其背后是货币主义的流行,而货币主义的泡沫,实际上就是世界资源和资产的一个重新分配过程,这样的过程更加隐蔽也更加"温柔",这不是简单的有钱人剥削穷人,而更主要的是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的货币竞争和掠夺,是一个重新打造金融殖民地的过程,这样的操作对于一国内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影响其实是均质的,差别有限,尤其是货币通货膨胀对于有钱人的财产打击经常更大,就如战争摧毁的有钱人的财产更多一样,这样的游戏更多的是新生经济元素对于老元素的掠夺,是一种新型的博弈游戏规则,这就是战后货币主义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信用掠夺。

信用掠夺的货币主义能够大行其道,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世界金融定于一尊,背景是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欧洲富豪的避难所,几乎所有的欧洲有产者都跑到美国储备资产,因此在美元统一世界这一点上世界巨富们有共同利益,并且这些人也确实做出了集体努力,而由货币主义制造的各种金融游戏也让全世界的金融大鳄和有产者们乐此不疲,在这样的博弈下,给社会精英一个上升的通道,给食利者财产不断贬值的压力,社会比以前进步了,但是这样的博弈使得和平年代的竞争也和战争同样残酷了,美元以其不断贬值的信用不等价地交换了世界各种经济元素。

更重要的是货币主义促成了一个新的全球化的金融资本利益集团,这样的利益集团是超越国家的,并且与宗教一起对于国家的权力实现了制约。限制美国超强权力的不是其他国家,而是宗教和金融资本,宗教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美国平民的思想,在民选时代极大限制了政客的集团利益,在此基础上才实现了三权分立,从而实现了国内和世界稳定。但是这样的三权分立和利益集团,与以前的殖民者集团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从以前赤裸裸的殖民地变成了金融殖民而已,金融殖民实际上就是信用殖民,将其他国家纳入美元的信用体系,在体系内充当仆从甚至奴隶,不断受到盘剥。

货币主义的游戏规则就是不断地制造出泡沫,利用自己制造的金融泡沫兑换他人的实物资产,也就是以不断贬值的货币信用换取资产信用,使得世界进入一个长线的通胀时代,而我们的历史上,使用金银的年代以及实行金本位的年代,通缩是长期趋势,因为新的金银开采量赶不上经济发展对于货币需求的增长,在货币也

是商品的资本时代,钱的价格就上涨了,所以历史上的资产货币是长期通缩的。这样的通缩和通胀不同趋势变化,就是西方可以通过货币主义金融殖民的背景。

在通缩的历史时代大家都要储蓄,而到了货币主义的通胀时代,游戏规则就不再是储蓄,而是贷款了,而且把贷款的利率降到最低,此时的货币概念实际上已经被偷换,社会整体进入了透支消费的时代,而且是透支消费的人群和国家在盘剥那些储蓄的人群和国家,只要这些国家维持高储蓄率让他们消费。但是到危机时,这些借钱的还是爷,跟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往往一样,欠钱的还要说谁叫你借他钱,你借他钱造成的过度消费和泡沫才是危机的根源……所以在世界经济中位置和话语权是太重要了。

这就如我们经常讲的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的故事一样,美国老太太借款消费买了一套房子,这一辈子是房奴还着贷款也住着好房子,到她离开人世时贷款终于还清了,美国老太太说:"感谢上帝,我终于把贷款还清了";而中国老太太住在蜗居一辈子勤俭节约地攒钱,到了离开人世的时候终于攒足了钱买了一个大房子,中国老太太说:"感谢国家感谢党,让我终于住上了好房子。"从这样的故事中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其中的差别,那就是美国老太太是享受了一辈子的好房子而中国老太太住在蜗居里面辛苦了一辈子,因此很多人在讲中国的消费观念问题,认为中国也应当向美国的消费模式靠拢,中国也应当多消费。但是这里中美彼此的信用是不同的,只有中国老太太攒钱才有美国老太太的消费,如果大家都贷款消费,货币主义可以印出钞票但是变不出物资,结果肯定是过热和通胀,而这样的差别就是双方在信用体系内的地位不同造成的,谁能够借钱而谁必须攒钱是信用地位决定的,这样的位置差别在货币时代的金融领域与殖民地时代的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差别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当货币主义取代殖民主义以后,不论说法变得了如何动听,其实质都是一样的,中国对于外来的金融入侵,需要拿出当年反抗外国殖民一样的精神和动力来保卫我们的经济果实和国家国民利益,在全球信用体系下的金融主权成为与殖民时代的领土主权一样重要的国家民族的核心利益,中国不能被信用掠夺。

4. 货币主义在泡沫危机中倒下

在凯恩斯主义后,流行的就是货币主义,虽然其后又有人提出各种后货币主义的学说,但是著者认为这些理论从基本内容看还没有脱离货币主义的范围,而且这些理论更多地停留在学说和理论阶段,并没有如货币主义这样主导世界。

虽然在货币主义盛行的时代,大家总在讲清除泡沫,但货币主义的要害恰恰就

在于泡沫,货币主义能够盛行的土壤是我们可以使纸币脱离原来的贵金属支撑,变成可以无对应物质成本增加的物质索取符号,虽然它需要信用的支撑。

在纸币之初,国家强制流通,统治者可以随意印钞,最后的结果就是破产,从我们宋朝的交子到明朝的宝钞,都是如此;但是现代银行业兴起,采取了间接发钞,并且以国家债券为抵押,这样就产生了银行家与国家信用的一个制衡关系,达到了纸币的基本稳定,这就是现代银行业发行货币的理论基础模型。有了这个制衡,达到控制政府直接发行货币的目的,才有现代经济社会和货币主义的发展,这个制衡就是维持各方信用的一个平衡,但是就是有人在鼓吹政府直接发行货币的优越性,其背后的用意值得深究。

从世界大战开始,大量国家的信用破产,尤其是世界富豪和经济资源向美国集中,就产生了大家把美元作为一种货币的需求,但是又担心美国出问题,就与黄金挂钩。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发现又重新回到货币金银不足的局面,因此美元的金本位破产了,新的货币体系诞生了,而且货币的印刷随着国家债券的过度增长,货币供应量的失控已经是必然了,这样的结果就一定是泡沫。这是货币权利的膨胀超过了信用增加的结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发现货币主义的立论出发点在于银行家和政府在发行货币上的制衡关系,但是在这一模型下,银行家也有多发行货币的需求,政府也一样,银行家需要的对政府的制衡实际是政府不能摆脱银行家单独发行货币,而这种制衡显然不包括他们与政府共谋超发货币,而且货币主义强调存在一定通货膨胀的合理性以及货币投放的适度超量,其真实的效果就是给这样的兑入泡沫以理论支持,有了这层合法的外衣结果不产生恶性泡沫才见鬼了呢,尤其是政府不断增加债券,债券又是发行货币的抵押资产,货币发行了还有对应的金融资产,这样一个泡沫接着一个泡沫的游戏就开始了。

因此在这样的数学模型推演中,假设政府和银行家之间的制衡来控制货币的发行,使货币脱离金银等物质价值基础,实际上也是有问题的,只是问题被掩盖得更加深刻,比政府不受限制的单一发行货币的体制要进步,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不受限制的权利膨胀的要害就是信用的崩溃。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且不说中国的老百姓,就是中国的精英又有多少能够看清,又有多少不为这些洗脑读物所迷惑?

具体到历史的实际经济状态,首先就是金本位的破产,黄金暴涨20倍,然后以石油危机、石油价格的泡沫代替,再下来就是军备竞赛,由军事科技带动推动了高

科技泡沫,2000年网络泡沫破产后,就开始了房地产泡沫和大宗商品泡沫。这些泡沫也是越吹越大的,但是没有可以永远吹下去的泡沫,有朝一日一旦破裂,深度的危机就开始了。2008年的危机让这些泡沫制造者们脱掉了裤子。

问题就是一旦泡沫破裂,下跌也是雪崩式的,在实体经济领域没有金融杠杆的放大时,泡沫破裂也就是企业资产价值的缩水,但是在金融领域,就是几何级数的缩水了。例如保险公司,收入的保费减少,同时管理投资的资产也减少,应当理赔负债的数量还增加,当初保险公司是怎样通过金融工具放大的泡沫,现在也是以同样的倍数来放大损失。所谓出来混,早晚都是要还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次的危机的根本问题在于货币主义的魔笛已经无法再吹出一个新的泡沫,因此深度危机就爆发了,货币主义经济理论在这里也受到了挑战。认识世界需要新的思维,货币主义本身也是西方洗脑世界、给他们的统治权找一个合理解释的工具,如此而已。

5. 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信用受限

根据2011年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中上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我国中产阶级的比例与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相当。很多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即一个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增长放缓,人均收入水平难以提高。中国是否也会面临这一问题?专家分析认为,中国可能正面临落入“陷阱”的挑战。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与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12年《产业蓝皮书》认为,中国虽然被划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中国产业竞争优势的结构并没有转到中高技术产业占主导的阶段。中国目前的产业竞争力结构存在明显缺陷:中国竞争力仍然为低技术产业主导,高科技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主要是由外资企业带动的;服务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近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但市场开拓难度加大,贸易竞争力弱;创意型产业总体素质不高。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突破资源瓶颈,是否能够独立发行媒介货币。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在国际上被他国货币所绑架,货币信用不能独立自主,那么这个国家在国际竞争当中就肯定无法取得定价权;没有定价权的情况下,整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利润就要被压制在成本线的附近,这样的低利润肯定不能支持这个国家的国民收入的增长,继而无法支持这个国家可持续发展走向发达。同时在没有货币权利和定价权的情况下,购买资源的价格会越来越贵,资源价格增长快于你的经济增速,经济增长会被资源

占有者食利，经济发展也将因此限于停滞。

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国家的信用不足，没有取得定价权，老百姓的劳动收入被压低的同时被资源占有者食利，收入增长肯定受限，这个层面就是信用受限，一个大国的崛起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必然要首先实现国家信用能力的崛起，这种革命性变化必然要伴随着国际上激烈的信用博弈，没有一次大的战争难以造成大国崛起的有利国际条件，只不过现代信用社会的战争是没有硝烟的信用战争而已。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成功崛起，都必须深刻认识信用元规则，并力争为我所用。

第二章　回看近代中国建立货币体系大博弈

到20世纪初，世界资本市场已经高度发达，但中国还是一个以白银为主要货币的国家，作为一个最主要的银本位大国，世界银价的变动对中国的货币和经济都会产生影响。当国际市场银价低落，白银就会涌入中国；当国际市场银价提高，白银就会大量外流。白银在国际市场是一般商品，在中国则是通货，所以白银一旦大量外流，就会引发中国经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而西方对于中国的金融货币战争正是通过白银价格波动进行的，中国要进行货币改革，要让控制中国的西方列强放弃货币掠夺收益，需要特别的机缘、付出特别的代价。

1880年代中国的国民收入约27.8亿银两，老百姓税负约占国民收入的3.2%。以此税率推算，根据1903年的10492万两白银财政收入，那年的国民总收入约为32.8亿银两。按照32.8亿银两的国民收入估算，甲午赔款和庚子赔款总计的6.5亿两赔款债务约为1903年国民收入的20%，比今天2.9万亿元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21.6%)还低一点。从这一角度看，晚清的财政与国债状况并不比今天差。但是由于没有现代金融体系，中国所有流通的白银只有6～11亿两。而中国30年代以法币收兑全国的银元，含各地军阀私铸成分极其不纯的大量劣元，所得也只有14亿元，一块银元是0.7两左右。巨额外债造成的白银对外贬值、对内升值极大地掠夺了中国的资源，让列强们放弃这样的巨额利益，让中国获得金融独立并与世界接轨，没有额外的代价和特别的历史背景，是做不到的，然而非如此又无法在中国建立现代金融体系。

1931～1933年整个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出现危机，西方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贬值政策以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达到倾销国内剩余产品、转嫁危机的目的。自甲午战争以来，通过纸币对白银的游戏，西方已经在中国赚足了利益，金融货币的掠夺收益已很难增加，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和市场是西方倾销过剩产能的好地方，如何提高中国的购买力让西方倾销产品走出危机，是当时西方各国利益诉求的重点。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诉求发生了变化，中国的货币改革有了实施的可能。

1931 年"9·18"事变以后,英美支持中国发行纸币,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在华势力扩张。日本大量向中国进行资本渗透,日本将其货币改革建立央行后回收控制的白银,再以资本的形式大量借给中国并在中国投资,力图从经济上控制中国,因此不让日本控制中国也是西方列强的战略重点之一。中日战争很大的原因是中国放弃银本位发行纸币,日本当时给中国大量的借款是按照白银计算的,日本也大量持有白银,日本在华投资更是以白银计算,中国放弃银本位以后,日本要白银也无法当作货币使用,不要白银要中国的法币,肯定是吃大亏。

由于危机中金本位货币制度在主要国家破产,囤积于黄金市场的大量货币资金转入了白银市场,白银的投机造成银价的波动。为稳定世界银价,美国、中国、印度等 8 个产银或用银大国,在 1933 年 7 月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签订了一项《国际白银协定》。其中规定美国政府每年购银不超过 3500 万盎司,中国则承诺不出售 1934 ~ 1937 年销毁银元所得之白银。(注:协定全文及中国的保留意见载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112 - 114 页)但是,一年不到,美国就背弃了它所承担的稳定银价的国际义务。1934 年 6 月 19 日,在美国国会内白银集团的压力下,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1934 年购银法》,它规定美国政府要通过购买的方式,设法使每盎司的白银价格提高到 1.29 美元;或者把白银在美国货币储备金的比重增加到 1/4。这些政策造成白银的价格上涨,在 1934 年 8 月 9 日开始执行该法,下令白银国有化并从世界市场购银。美国的这一行动立即引发世界银价飞涨,从 1934 年年初的每盎司 0.35 美元涨至 10 月份的 0.55 美元,到 1935 年 4 月一度涨至每盎司 0.81 美元。(注:扬格前引书,225、239 页;Blum. op. cit. ,pp. 190 - 191)银价暴涨造成西方在中国购买资源的支出大增,同时中国因受国际金价及银价波动的影响,白银不断外流,1934 年流出 1.80 亿两,1935 年流出 1.86 亿两(《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教程》,国家级规划教材,陈争平,清华大学出版社),银本位币制难以维持,造成了银根奇紧、物价猛跌、利息上涨、销路呆滞、钱庄倒闭、银行关闭等严重后果。

美国收购白银,表面上说是为了提高中国的购买力及稳定本国采银业,实际上是使得其他西方列强在中国采购资源、原材料的负担加重、成本提高,美国所产所收购的白银还可以在中国购买资源控制中国金融,从而使得作为资源大国的美国产品更具有竞争优势,因此英国在美国白银政策的压力下为了自身在中国的金融利益,就需要中国变白银本位为纸币了,而中国要发行纸币也必须与金融实力最强的英国和控制白银最多的美国货币挂钩。同时中国也是西方倾销产品的市场,为

了列强在中国的市场利益,此时改革中国的金融系统、发行纸币就成了中国与列强一致的需要,也成为中国放弃银本位的金属货币进入央行时代、建立自己的金融货币体系的历史机会和时间窗口。

在此背景下南京政府开始实行法币改革,1935 年 11 月 4 日,国民政府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白银流通,发行国家信用法定货币,取代银本位的银元。各金融机关和民间储藏之白银、银元统由中央银行收兑,同时规定法币汇价为 1 元等于英镑 1 先令 2.5 便士,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1936 年国民政府与美国谈判后,签署《白银协定》,由中国向美国出售白银,美国维持银价的稳定,换取美元作为法币发行的外汇储备,法币改为与英镑及美元挂钩。

中国政府发行法币的政策一公布,英国驻华公使立即发出英皇敕令,要求驻华英商和英国侨民遵守中国法令接受法币,不得再使用白银。在中国处于垄断地位的汇丰、麦加利等英资银行也率先交兑库存白银给中国中央银行,让中国政府一下子集中了 3 亿两白银实银,于是国民政府在军事统一中国以后,成功地在经济和金融上再一次达成全国统一。

中国历史上的纸币发行信誉极差屡次失败,中国政府的纸币能够发行成功,关键是有了西方外汇的信誉和垄断中国金融的外资英国银行的支持。中国纸币挂钩英镑对于英国金融资本是巨大的利益,而对于中国更大的意义是中国与英国进一步结盟,这种结盟对于中国将来改变自身地位是非常关键的,这表示英国愿意支持中国在东亚成为列强之一制约日俄以保障英国利益。所以我们需要看到,中国的纸币发行没有当年头号强国英国和崛起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支持是难以施行的,英美的支持也有限制日本在东亚坐大的战略目的,而中国日后能够将不平等条约废除,更关键的原因就是中国的金融与英美挂钩,经济金融一体化后这些不平等条约成了追逐自由贸易的国际金融资本的障碍,否则在抗战中英美不取消这些条约你也一样必须与英美结盟。要知道当年日本逐步废除了英美对于它的不平等条约,也是在日元与英镑挂钩、日本经济与英国经济一体化之后才实现的,但是后来日本想要中日货币一体化把英美排除在外,这也成为英美支持中国的经济根源。

中国实行法币改革的成效是极其显著的。至 1936 年,中国外债是 20.46 亿两白银,各国在华投资 29 亿两,在华民间债权、财产、房产等 70 亿两(《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教程》,34、68 页),将外国资产全部从白银置换为法币,这些财富是中国 GDP 的三倍;是中国法币发行量的 8 倍,不得不说是中国金融界的一场重大历史性胜利。而在华外

国资产和债权自“西原借款”以来是以日本为多,英美的政策是慷他人之慨!

中国发行的货币与英美货币挂钩,本身就是符合英美重大利益的,同时中国发行货币收兑了大批的白银与英美置换成为外汇,这些外汇所换取的白银流入了英美腰包,在经济危机后成为重要的贵金属储备,平抑和控制了英美由于危机和信用破产可能造成的信用危机,中国由于发行纸币购买力增加也消费了英美危机中大量过剩的产能,这样的结果对于英美是大有好处的。

要注意的是,当时绑定英美货币的做法与今天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那个时候是完全可以自由兑换的,并且当时的挂钩还要以贵金属作为储备,这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的金融控制权交给了英美,英美的货币政策变动将直接影响中国,而且此举为英美以纸币换取中国白银提供了方便。这样一来,中国的金融货币制度不是基于本国国家信用而是基于外国(英美)信用,外国信用取代了贵金属天然信用——白银信用。中国所有的白银才 6 ~ 11 亿两,外债是 20 多亿两,根本付不起还不清,而且只要支付白银,结果就是内部通缩,最后会死得很难看。就如现在要是以黄金支付债务,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黄金产量是 12 万吨,也就是 4 万亿美元,美国的 8000 吨黄金只值 3000 亿美元,这个量是远远不够的,黄金要成为货币就必须涨 100 倍。但是按照现在的金价把债务折合成黄金以后让他以黄金支付,他只有付不起然后听命于你,或者就是武力解决了。而将贵金属变成信用货币,那么就可以随着市场贬值,在你所控制的市场下主导权就易位了。

我们还要注意到,日本国家金融体系的建立,也是取得了英国的支持才得以实施。日本首先强迫中国将甲午战争赔款兑换成英镑支付,然后再把中国赔付的 4000 多万英镑作为日元的发行储备,这才建立起日本现代金融体系。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等列强从中获得丰厚利益,等于是日本将中国作为肥肉向英国等列强“进贡”,才换来了他们的支持,日本的现代金融体系并不是紧靠制度维新就能建立起来的。

要知道,西方列强绝对不会无条件让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自己的货币金融系统、取得经济独立。而一个国家维新图强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独立的金融货币体系,中国变法搞了那么久也没有把银本位改革成为现代金融体系,不是中国不想改革,而是中国的命脉操控在他人之手,控制中国的列强不允许中国改革!奴隶要获得解放,武器却被奴隶主控制,能够做到的就是利用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居间博弈争取生存权,其中的艰辛和代价难以对外人说。

在中国的金融货币改革过程中,日本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损失巨大,这也为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埋下伏笔。日本为了控制和侵略中国,一直支持中国国内各

路军阀,向这些军阀提供了大量的借款,这些借款当时都是以白银借出,中国法币改革后,却只能以法币收回,而法币挂钩英美货币,这些借款就要随着英美货币波动。同时日本在华还有大量的投资,在英美货币主导的法币制度下,日本在华投资也间接被英美操控。

在日本的巨大压力下,中国在取消银本位之前做出重大让步,与日本签署了和平协议,让日本在华北驻军,华北不设防等,中国北方的军事屏障没有了。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中国对日战争根本制胜战略需要的是战略收缩,集中兵力在长江沿线的水网丘陵逐级与日军决战,而不是在京津和华北大平原!历史进程印证了这个战略的正确。当时把华北主要兵力调往江淮集结是战略需要,而在貌似丧权辱国的和平协议背后,中国的精英们在经济和金融上就对日本痛下狠手了,经济、金融的利益是国家崛起的实质,是一个国家长远根本利益,国运之博弈要有战略全局观念。

而且中国金融体制的建立没有与日元挂钩,没有与中国经济和债务往来最密切的日本货币挂钩,这就是中国的重大利益。中国与日本的贸易不再以白银结算了,日本在华的白银实银收入变成了纸币,在华投资的资本也变成了纸币,这些都将随着中国政府的金融政策而受到影响,直接影响了日本的外汇安全。

更重要的是中国一旦建立起现代金融体制,中国的金融能力就会发生重大作用,就没有了对于日本资金的依赖。同时中国市场的发展直接对日本产品形成竞争,会吸引西方投资离开日本直接投资中国,这对于日本经济和国家发展影响重大。

1916 年上台的日本寺内内阁在大约两年的任期中,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贷款总数达三亿八千六百四十五万日元(当时一日元大约值二银元,日本多要求银元结算,中国全部流通的银元约 14 亿元,由此可以想见日本对华贷款规模之巨大),日本在政府幕后支持下的民间对华白银走私活动就更加猖獗,日本对华过度贷款导致的严重国内经济问题甚至最终使寺内内阁倒台。日本希望以这些贷款得到中日货币一体化的重大利益,在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下让日元成为中国实际的通用货币,让中国发行与日元挂钩的金券,进一步控制中国主权。而中国通过日本贷款迅速发展了经济和促进了国家统一,但同时中国的精英却利用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利用日元贷款的“民间性质”,成功地与英美暗度陈仓,使得中国的金融体系不与日元挂钩而是与英美货币挂钩,日本的在华金融资产被中国的货币改革大清洗,给了日本以巨大打击,这是日本对华政策和外交的重大失败,直接导致了二战中日本与美英的对抗和中美英的结盟,使得中国得以翻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融资本的力量,一国的金融属于哪个阵营,决定了这个国家的阵营归属。

再往深层看，当初日本要以白银结算，就是要挤兑中国的实银；现在中国发行纸币了，结果就是中日的商务往来和国家债务都变成以中国货币法币进行结算。即使是在当今，为了国际货币的结算权也是值得打一仗的。而后来中国法币大贬值，导致日本对华应收款和债权灰飞烟灭，战后日本的战前债务只够买草纸的了。这是中日金融精英的角逐，而中国的目的也就是依靠英美算计日本，孔祥熙、宋子文、戴季陶等人对于日本是有深刻认识的，日本战败就是中国金融大亨的崛起和日本金融资本的惨败，战前这些中国金融大亨们都是对日债台高筑的，战后他们的资产损失不多，而债务却贬值到可以忽略，新中国成立前所谓中国几大家族的财富更多来自于对日本的金融博弈。

由于有英美的支持，日本无法阻挠中国的货币改革，可日本又不甘心失败，那么就只有制造事端与中国再次开战了，这也是抗日战争爆发的经济根源。而欧洲战场上纳粹德国的威胁让英美暂时脱身不得，也给日本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和金融攻击，提供了机会。

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大量搜罗法币然后运至上海、香港，套取外汇资金，再以此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侵华战争所需的军用物资。面对日本的金融攻击，国民政府在1940年取消了法币“无限制买卖外汇”的规定，结果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利用法币套汇的阴谋，法币大贬值的作用在于一方面集中了经济资源，在经济上支持了抗战；另一方面也使得日本在占领区收集的大量法币成为废纸，更是使日本金融资本在华投资成为废纸（当年使用银元结算被置换成为法币结算了），抵消了日寇在中国掠夺的法币的财富价值。法币贬值后，损失最大的是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府，因为他们占据中国沿海富庶地区，置换和控制了当时大部分发行在外的法币。汪伪在敌占区用储备券以1:1的兑换率置换法币，之后法币大幅度贬值，到抗战胜利时，储备券与法币的比值是1:200。

在日伪收缴大量法币的情况下，维持法币币值，不但要花费巨大代价而且利益被敌人取得，实际会变成给日伪输送巨大利益的资敌行为，因此对于抗战时期的法币贬值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中国让法币贬值并且使法币改革时收兑的银元重新发挥作用，为战争提供了大量经费，因为这些银元也是要到敌占区流通的，这就把敌占区的粮食等物资，通过商业手段弄到了大后方，否则中国的大西北、大西南一下子涌入那么多的逃难人口，粮食供应等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同时要注意，当时的条件下，在非日占区采取换钞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抗战没有形成严格的疆界，汉奸等也可以过来换钞。于是印钞、让法币贬值成为唯一的选择，印钞对于本国国民

相当于特别征收了一项战争税。

抗战爆发导致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金融后果是中国放弃了与英美货币挂钩的政策,这意味着美英丧失在华金融控制权,英美干预不了日本侵华也就干预不了中国的此项金融政策,中国借此取得了货币自主权,这是中国近代争取国家主权方面的重大胜利,为二战后英美彻底废除对华的不平等条约打下基础。

由于美国与中国是金融利益联盟,面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英美在华利益受损,美国对于日本逐步勒紧经济制裁的绞索,同时在经济上大力支持中国的抗战;但美国出于欧洲优先的考虑,又不愿意过度刺激日本立即进入战争状态,故仅仅支持志愿人员到中国参战。美国政府冻结日本资产以后,并没有立即打算实行石油禁运,但由于"鹰派"人物——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坚决主张,冻结日本资产演变成为事实上的对日本石油禁运。事态发展至此太平洋战争已不可避免,实际上是美国人逼着日本在太平洋开战。

在抗战的金融战大棋局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日伪发行的"满洲国圆",也就是伪满洲国的流通货币,在 1932 年 6 月到 1945 年 8 月间为伪满的官方货币单位,发行单位是"满洲中央银行"。"满洲国圆"发行之初采用银本位制,由 23.91 克纯银定位。1935 年 11 月起,改实施与日本相同的金本位制,与日圆等值,另外满铁附属地和关东州也使用朝鲜银行发行的朝鲜圆。由于中国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即使是不断大幅贬值,信誉也始终高于"满洲国圆"、朝鲜圆,与法币挂钩的英美货币信誉始终高于日元,敌占区与内地的疆界无法封闭,因此造成了巨大的吸金效果,沦陷区的广大群众人们不愿意自己的真金白银被日寇掠夺而是换成法币再兑换英美货币,于是大量财富和资本从"满洲国"内流。

同时在日本占领区的欧美租界,法币还是租界的流通货币,法币信誉还远远大于汪伪的储备券。由于抗战初期日本没有与英美宣战,无法控制大量敌占区的财富流向租界变成法币,即使是在日本与英美宣战后法币退出租界,由于战线边界无法完全封锁以及法币信誉高于敌伪货币,法币也在敌占区地下流通换取了大量资源流入大后方,中国金融体系的建立为中国政府对日抗战胜利争取到了大量的经济支持,有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支持才是中国能够持久抗战的根本。中国政府虽然败退西南,但是始终控制着中国金融命脉的制高点,有了金融体系的支撑力量,中国的持久战才可能在日本控制了中国发达地区以战养战的情况下得以实现。可以说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信用元规则的认识和利用水平远在日本军部之上,这是中国抗战最终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章 信用社会的形成

一、一次伟大的概念偷换

说起信用社会，离不开对货币本质的认识。货币的本质就是信用，但是社会的信用却不一定是货币，只不过货币是流动性最好的信用体系，我们理解整个世界信用体系的运转，也要先从货币开始。

世界上关于货币的理解分成各种学派，这些学派的主要分歧就是货币商品说还是货币媒介说，古典经济学派大都主张货币商品说，亚里士多德等人就把金银货币当作财富，重商主义也是以贵金属货币为财富的，马克思把货币变成了劳动价值论统治下的一般等价物。而现代经济学则更多倾向于媒介说，把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媒介和国家信用。依据这两个不同的货币理念，也产生了古典货币和现代货币两个不同维度的概念。

- 古典货币：是指任何一种可以执行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延期支付标准和完全流动的财富的储藏手段等功能的商品，都可被看作是古典货币；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就是古典货币；古典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古典货币的本质就是一般等价物。

- 现代货币：是指以某一权力机构为依托，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内推行的一种可以执行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延期支付标准及作为完全流动的财富的储藏手段等功能的凭证。这样的权利凭证就是一种信用凭证，现代货币使用国债抵押来发行，背后就是国家信用。

通过上述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古典货币与现代货币的区别在于：古典货币本身是商品，本质就是一般等价物，不依附于任何权力机构，不会随权力机构的消亡而消亡。现代货币是一种凭证，依托于某一权力机构而存在，随权力机构的消亡而消亡。可以说现代货币在作为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延期支付标准方面功能绝非古典货币所能比拟，但作为财富储藏手段方面的功能要逊色于古典货币，储存再多的

凭证其功能也会随权力机构的消亡而消亡。而二者的关键的差别在资源!

对于货币价值的认识是有两重性的,即货币的空间价值和时间价值。所谓货币的空间价值,也就是货币的购买力,单位货币能够买到多少商品;货币的时间价值,也就是货币的利率,货币在使用和周转当中是要随着时间按照利率产生价值的。对商品货币来说,要满足其购买力与商品的一般等价物价值对等,因此在通胀下一般需要加息保持其空间价值;对媒介货币来说,在通胀下货币多了就需要按照供求关系降价,所以更多的表现在降低利率,在信用货币成为全球经济主流以后,信用货币所带来的巨大货币投放量也让这个世界进入了低利率时代,低利率使得经济飞速发展。因此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当中中国是加息而西方是降息,原因就是中国老百姓按照马克思理论和传统观念认识货币,把货币当作商品,而西方则是现代货币的概念,在商品货币时代人们更倾向于存钱,因为存钱就是积累财富,但是到了信用货币时代你的信用不仅仅是你的存款,有信用卡能够贷款才是信用的体现,因此也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存钱而西方的老百姓借钱,实际上西方在古典经济学时代老百姓也是存钱的,因此才有大文豪笔下葛朗台等人的守财奴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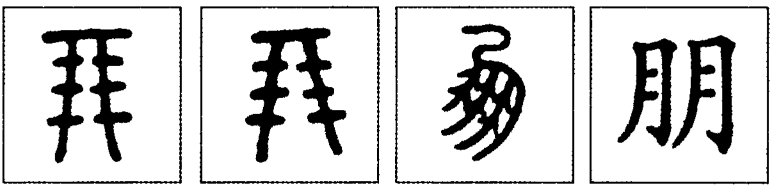
在商品货币时代,货币是贵金属,或者货币绑定了贵金属,金本位就是古典货币,但是古代世界不仅仅是黄金,很多国家是白银本位的,中国还有以青铜作为补充的复本位制,这些商品货币时代,我们也可以广义地看作是货币天然信用的时代,因为当时的国家和商业机构没有足够的信用发行货币,在社会信用和商业信用也不足的情况下必须依赖于某种商品的价值作为标准,这个商品的价值实际上就是货币的天然信用。但是商品货币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以后,这些货币所对应的商品数量是有限的,因此商品货币在当今社会的大发展过程中走向破产是必然的;同时金本位的破裂带来了货币概念的彻底改变,现代货币的概念确定了,但是我们的经济学从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到现在的货币主义,谁也没有告诉人们作为经济理论的基石——货币的概念已经不同,这个不同是可以套利的,信用货币带来了低利率的好处,而信用货币的问题就是货币会有不断的超发和贬值的风险。

货币定义的改变,实质上改变了金融模型,在金本位之下货币的总量是有上限的,这个限制将成为经济模型的边界条件,而现在的模型是没有上限的。这个实质性改变导致的结果就是无限的货币供给,而资源却是有限的。在商品货币时代,货币绑定商品的同时也是资源等价物;在国家信用模式下,对于资源的保障也是关键性的国家信用基石,前苏联的破产就是与粮食破裂导致的信用破产有关。

二、货币轮回:从信仰信用到国家信用

中国最早的货币,被称为“朋”。“朋”字最早见于远古时代的象形文字甲骨文,在青铜器铭文中常常可以见到“贝五朋”类的句子,表明古时朋就是一种货币衡量单位。古代以贝壳为货币,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我们看朋字的甲骨文、金文等文字,可以看到其钱串的象形文字特征,说明朋字最原始的意思就是货币的一个单位,而朋字的其他意义实际上是从其货币应用含义当中引申而来的。

字体演变: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体

对于象形文字,其形象最贴切的就是文字最初始的意义,其他含义都是在初始意义上引申而来的,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朋字的象形文字是非常形象的两串钱的样子,每串是四五枚货币,说明朋字最初始的含义就是钱串子的意思;我们还要注意到我们古代出土的贝壳货币,中间都是有孔的,这个孔实际上是破坏贝壳的美观的,谁都知道在海边可以随意捡拾到贝壳的,而在不靠海的地方却没有直接获取的渠道,这样的贝壳如果出现在我们现在的货币概念中,则靠海的国家拥有廉价的印钞权,这个权利怎么能够被其他国家所接受呢?实际上古代的货币就是一种信用货币,贝壳的孔是用以穿绳子和结绳记事的,是被当作信物的,而“朋友”的“朋”字后来的含义,也是从“朋”字的货币量词的概念引申而来,能够做朋友就是有足够的信用可以做交易。因此孔子说“有朋自远方当来不亦乐乎”的含义,远远比现在直接字面解释的要丰富,因为孔子选注的《诗经》里面就有“朋”字作为钱串的意思。在中国“朋”字的含义本身与“友”字的含义就是有微妙的差别的,“朋”字有更多的社会属性甚至有贬义的味道,比如:朋党,所以我们从朋字的象形和字义的解读,就可以对于古代交易的信用货币情况窥一斑而知全豹。

在贝类作为货币以后,信用是不断被降低的,导致金成为货币,中国古代的金更多是以铜为主的金属块,对于黄金是称作美金的,要特殊地加以区别。中国古代玉是被赋予崇高德行的象征,而金则是信用的象征,所谓的“拾金不昧”就是对于金

要有信用,金玉的结合是道德与信用的结合。这些金制作的货币与海贝的货币类似,也是有一个孔的,直到秦统一中国,以秦半两成为中国流通货币,而汉朝除了著名的五铢钱以外,就是白鹿皮币了。到秦半两、汉白鹿皮的货币统一,是货币的信用属性与商品属性的过渡。

白鹿皮币是西汉武帝时推出的一种特殊货币。据史书记载,汉武帝规定:"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一张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四周绘上花纹,便价值四十万,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汉武帝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发行皮币,用宫苑中的白鹿皮制成。皮币每张一方尺,饰以彩画,值四十万钱。自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出现后,兽皮即为畜牧、狩猎部落与农业部落进行交换之重要商品,在交换中逐渐取得交易媒介的地位。我国商周时期就曾用兽皮充当实物货币。1975年,陕西省岐山县出土裘卫,器铭:三年"矩伯庶人取革(觐)章(璋)于裘卫,才(财)八十朋,厥贾贝舍田十田。矩或取赤虎(赤色虎皮)、(牝鹿皮饰)二,(有纹饰蔽膝)一,才朋贝舍田三田。"反映了西周共王年时一桩交易。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又实行了一次币制改革,发行白金三品及白鹿皮币。《史记·孝武帝纪》:"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

白鹿皮币不是简单的印钞,是有礼制需要的,《史记·平准书》记载:"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里取镕,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一作紫)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汉朝的王室宗亲朝贡皇帝的货币是不能掺水的,如果仅仅如后世所言白鹿皮币就是汉武帝国库空虚的印钞,那么朝觐汉武帝肯定是要以金属货币而皇帝支付的是白鹿皮了,在汉朝以半两钱和五铢钱为主的时代,大量的铜钱是难以统计和计算的,尤其是文景之治造成钱多的已经穿绳腐烂就更不好计算了,这是拥有大面值货币的现实需求的。

但是这个货币一出来就带来了贬值利益,肯定给皇帝带来巨大好处,但贬值是不得已的,而不是开始就以印钞贬值为目的,但贬值到最后不得不以黄金取而代之。《索隐》案:"《食货志》皮币以白鹿皮方尺,缘以馈以荐璧,得以黄金一斤代之。"又《汉律·皮币律》:"鹿皮方尺,直黄金一斤。"亦见《史记·封禅书》。《西汉会要》卷五十三也记载:"元鼎二年(前115年)罢白金币。"白金与鹿皮均为御史大夫张汤所提倡,殆皮币亦罢于张汤死年。

在各种信用货币在现实世界破产的同时,贵金属成为世界普遍认可的货币。贵金属成为货币是世界各国普遍的选择,其时间分布在全球来说也是相当的,对此

可以从贵金属的货币度量衡上体现，世界各国对于它们的重量单位实际是相当的，现在的盎司与中国古代的两是差不多的，因为古代是 16 两一斤，而英国的英镑以前也是真实的一磅白银。但是随着贵金属成为货币，世界财富的货币总量实际上就基本固定了，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本位货币就严重不足，于是产生了大量货币的需求。中国古代对于纸币进行了探索，但以破产告终。中国纸币的破产是与商业资本的恶意投机和社会利率的高涨密切相关的，过高的利率使得期满货币需求就要增加一个利率的数量，这些增加的货币数量在金银货币数量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是要求由经营者的破产损失来埋单的，而变成纸币以后发行纸币谁愿意破产坏账率过高？贵金属是天然的限制，但权力所有人有各种私利，需求是难以限制的，因此必然是信用货币的超发和破产。国家单独发行货币对于类似中国古代的那种独裁专制的国家是难以实现的。

但是民间则不同，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西方是金匠的欠条进入了流通领域、成为货币和银行的前身，在中国则是钱庄和票号的银票，这些流通的票据都是与贵金属紧密挂钩的，但这也只不过是商业票据，直到西方发明以国家债券抵押发行货币的方式，近代金融体系才正式建立起来，这个方式是一个政权与资本共同牟利、互相限制制约的模式，这个模式决定了政府不能清偿债券、总要支付利息，但是在纸币不断贬值的过程当中政府的债券实际偿付也在缩水，这也是政府的货币税，所以政府虽然付息但是政府也收税，资本虽然得到利息但是货币也在贬值，只不过这是宏观上而言的，微观上的具体分配却可以非常不均衡。此时的货币还是对应于商品的，与贵金属的天然商品属性是类似的，古典经济学者在此时对于货币的定义就是商品交易的一般等价物。

在世界进入金本位的纸币时代以后，贵金属作为本位的商品属性和国家债券抵押发行货币的国家信用属性是共存很久的，这是一个逐步过渡的过程，随着这个过程的演进，货币供应不断增加在经济发展下成为必然，贵金属货币经过本位衍生可以让货币数量增加几十倍，但是相对近代开始的工业革命经济大发展，与资本社会商品社会货币需求量暴增相比仍然是不足的，货币的紧缺和利益的诱惑使货币超发成为必然，金本位就处于逐步破裂过程，在最开始是限制用纸币直接兑换黄金，纸币兑换黄金必须要足够的数量，被历史称为了金块本位制。

金块本位制（Gold Bullion Standard）又称“生金本位制”，是指国内不铸造、不流通金币，只发行代表一定重量黄金的银行券（或纸币）来流通，而银行券（或纸币）又不能自由兑换黄金和金币，只能按一定条件向发行银行兑换成金块。金块本位制是

以黄金作为准备金,以有法定含金量的价值符号作为流通手段的一种货币制度。黄金只作为货币发行的准备金集中于中央银行,而不再铸造金币和实行金币流通。流通中的货币完全由银行券等价值符号代替,银行券可以在一定数额上按含金量与黄金兑换。中央银行保持一定数量的黄金储备,以维持黄金与货币之间的联系。在金块本位制度下,金币的铸造和流通以及黄金的自由输出入已被禁止,黄金已不可能发挥自动调节货币供求和稳定汇率的作用,从而使金块本位制失去了稳定的基础。因此,金块本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残缺不全的金本位制度。

金块本位制下兑换的限额是非常高门槛的,英国以银行券兑换黄金的最低限额为相等于400盎司黄金的银行券(当时约合1700英镑),低于限额不予兑换。法国规定银行券兑换黄金的最低限额为21500法郎,等于12公斤的黄金。中央银行掌管黄金的输出和输入,禁止私人输出黄金。中央银行保持一定数量的黄金储备,以维持黄金与货币之间的联系。这400盎司的限额对于现在是大约是68万美元,而12公斤黄金今天则是人民币400多万元。因此这是一个一般人难以承受的门槛,以此限制黄金的挤兑,但是就是这样的金块本位制,在以后的发展过程当中也陷入破产境地,西方国家彻底进入到国家信用货币时代,在这个时代西方国家是严格限制黄金发挥货币属性的,这深入骨髓的政策从美国政府对于1933年双鹰金币的态度中可见一斑。

到1933年,已经持续了4年之久的大衰退不断侵蚀着美国的国力,也终于摧毁了一度被视作永恒的金本位。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家族的第二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宣誓就职,摆在他面前的是全国范围内的衰退与恐慌,银行挤兑的狂潮导致美联储黄金储备陷入危机。4月5日,就任刚满一个月的罗斯福便签署了“6102号总统令”,要求每个美国公民(特殊职业如牙医、金制品艺术家、珠宝制造商、钱币收藏家除外)只能保留价值100美元的黄金货币(相当于160克黄金),其余必须在5月1日前兑换成纸质货币,违者将被处以重罚。1934年1月,国会通过了《黄金储备法案》(Gold Reserve Act),赋予总统将黄金储备国有化并改变美元黄金比价的权力,以便将美元贬值刺激经济。于是总统命令将全国收缴上来的金币全部毁掉,熔化为金条,但是有一些在此之前铸造的双鹰金币在法律公布后流入市场,美国政府为了追缴这些货币可谓是不遗余力,这个行动不是警察而是情报机构进行的。唯一合法拍卖的双鹰金币价值达到660万美元外加100万美元佣金,成为世界最贵的收藏钱币,而直到2011年8月,关于一宗黄金财产纠纷的报道吸引了全球钱币收藏家、黄金投资者和法律界人士的兴趣。来自美国费城的老妇人琼·朗

博(Joan Langbord)和她的儿子,在与政府的官司中败诉,他们被剥夺了继承自上一辈的十枚美国1933年双鹰金币(1933 Double Eagle)的所有权,理由是"这些金币从未合法流通"。

美国之所以这样做,就是美国的货币信用权利不可侵犯,已经被视为国家的根本,这枚货币的重量当时正好与法定金本位的价值相当,具有重大金本位象征意义。美国人不惜动用国家安全力量来进行干预,只因货币信用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只要有一枚货币金币获得了这样的特例,则美国的案例法体系下,整个司法体系和信用系统均有可能为之坍塌,因为美国的每一个案例对于其后发生的事情都是有法律效力的,谁又会预知其后会发生什么、又将发展到什么地步呢?尤其是在当今电子交易、电子支付和电子货币兴起的时代,如果这样的案例被新技术手段引用,结果就将是美国金融权力的失控。



背景介绍:

1900年代初,在那个欧美各国普遍实行金本位的时代,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请雕刻家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Augustus Saint – Gaudens)设计了全新的20美元面值金币的浮雕图案,他希望能"设计一枚可与古希腊艺术品媲美的美国金币",以黄金的永恒来象征美国国力的繁盛。从1907年开始,位于费城的美国铸币厂每年都要铸造一批这种"双鹰金币",一直持续到1933年。

在西方各国金本位破裂以后,世界进入了一个各国竞争性贬值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内借了大量外债、发行了大量债券的战败国德国成为得利者,其发行的恢复经济、偿还战争赔款的道威斯债券和杨格债券大幅度贬值,巨额债券绑架了西方的政策、获得了西方的绥靖,但是即使是这样的纵容,世界大战在印钞大赛下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国家间的贸易只能以黄金为主要交易手段,各国的货币信用都在战争中限于崩溃。这样的黄金交易的结果使得世界绝大部分的黄金均流入美国,全球贸

易在黄金流动性都被美国收取以后限于极大困境。对此不得不在美国主导下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使得世界的金融霸权被美国控制,而这也是一个国际金本位体制,只能由掌控足够多黄金的美联储控制,这个体制的初期是与美国信用和美联储黄金储备密切相关的。但是随着美国深陷越战泥潭,美国国内的经济低迷,美联储不得不印钞导致美国的信用在下降,各国开始了挤兑黄金的行动,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国际金本位不存在了,石油和黄金暴涨,但是美元在全球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因为除了美国没有一个更好的信用能够接盘,在矮子里面选将军的竞赛当中美国还是最好的选择,今天的世界依然是美元主导的世界,欧洲不甘心建立了欧元,现在也是危机重重,当今世界的货币是彻底的信用货币,但是在印钞的压力下,又有大量讨论重回金本位商品货币的可能性了。此时的货币是现代货币的定义,是一种国家信用的托管凭证,这是在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体系破裂以后货币主义兴起后产生的,是与古典经济学的货币定义完全不同的。

综上所述,世界货币史就是从信用货币到商品货币的进化,以海贝的信用到贵金属的商品,然后又反过来从商品货币再到货币信用的进化过程,对于货币是商品还是信用的本身,不但是货币定义的变化也是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整个世界经济模式的发展也与货币的定义方式是分不开的,世界就是从信用货币到货币信用的轮回,只不过古代的信用货币是信仰带来的信用,现在的货币信用则来自国家,来自国家的强制机器和实力。

三、政权、资本、宗教与信用社会

1. 国家体制构建的信用社会

对于信用社会,首先需要的就是国家的力量作为保障,社会经济的主体权利的来源,是需要国家信用保障的,这国家的力量是信用的基础。

首先国家信用体现在国家发行货币的信用之上,再者就是信用主体权利基础也来自国家,所有的法人都需要一个国家进行登记注册,不管是工商登记注册还是卫生系统的医疗机构登记注册,教育的学校注册,民政的社会团体注册等等,都是在一个国家政权下进行注册的,就算是古代,经营者也是需要部照的,法人的存在就是依托国家的。而个人的信用更是依托于国家,有些国家高唱人权高于主权,但是有脱离了主权的人权吗?他说保护你的人权的时候,你到他们国家生活他们同意吗?讲人权和自由最起码的是你行动的自由吧?!他们让你自由地去吗?就算是

免签证地让你去,这背后也是要你的国家与之有外交协定,双方互相交换这样的权利。

最后就是国家的信用是所有信用的强制力保障,除了建立军队和外交等保障总体上国家内部的自然人和法人的总体利益外,还建立各种政府机构对于各种社会和经济行为进行管理,也就是对于社会的各种信用进行协调,同时建立司法制度保障各方利益得到执行,国家的司法体系惩治失信行为,惩治犯罪保障信用主体的合法权利,使得信用具有了实现的强制手段。

腐败让民不聊生导致亡国是一个伪命题,古代中国税收率不到5%,一个县只有三个朝廷命官,其他的是县官雇佣的吏。一个朝代亡国的外力因素是天灾和外患,内因则是皇帝信用体系的崩溃,官场腐败实际上是皇帝信用崩溃的体现和结果。皇帝是古代信用体系的最终信用人和最终责任人,如果王朝被推翻不但自己要死,子孙也要死的,他们合法拥有天下,腐败在古代最大的侵害对象是皇帝的利益,腐败真正的危害是国家信用体系的朽毁。皇帝信用体系崩溃的根源在于皇亲贵族的不断膨胀,这跟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信用体系崩溃的根源在于资本债务不断膨胀是一个道理。高端食物链的食肉动物多了,生态体系就会处于极其不稳定的状态,不是食肉动物自相残杀就是饿死一片剩者为王。

所有这些只有一个结论:政府信用的最终体现就是公信力,就是把个体信用变成了一个整体,因此在信用社会,国家的公信力是根本。

2. 西方契约精神构建的资本信用社会

契约精神是西方的社会基础,也是构成现代资本社会、商品社会的基础,这种精神崇尚自由,但是自由是有边界的,个体的自由不能妨害其他个体的自由,不同个体之间的自由冲突就需要依靠法制和契约来解决,法制不可能面面俱到解决所有问题,也不可能在所有层面都是最佳方案,因此在法制等国家权力、司法和公信力约束之外,更多的个体的自由在群体当中要被各种契约所限制,在西方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是主要的社会治理理念,很多法律是当事人约定优先,没有约定才按照法律规定处理。

这种当事人的契约和意思自治,更通俗地讲就是我们日常可以见到的合同、协议、单据,以及具有合同和协议效义的承诺等等。在现代社会,合同、协议是整个市场经济商业运行的基础,在彼此的商业交往当中以一系列的合同关系维护各种权利义务的边界。

以合同为基础,产生了企业间的商业信用,这个信用比货币的银行直接信用扩

大很多倍,因为你与银行的往来也是合同,而且未必就是货币,银行也可以是商业交易主体,更进一步讲并不是所有的交易都要依靠货币计量,企业可以易货贸易,政府也可以计划分配,各种福利分配也可以直接计划调拨。再有就是债券、股票等市场,债券的实质是实体的债务,其价值由实体的商业信用决定;股票是公司的产权份额,其价值也来自公司的商业信用。最后就是各种实体所管理的总资产肯定是大于、等于其货币持有量的,货币只不过是其资产的一部分,一般情况下总资产远远大于其所持有的货币,实体的商业信用是与其资产数量挂钩的,因此合同、产权文件等维系的企业商业信用体系是远远大于银行的货币体系的,其运作构成了资本社会的信用基础。

在企业的商业信用和银行的货币信用基础上,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就产生了金融资本。金融实际上是产业的商业信用与银行的货币信用的有机结合,把他们统一到一起的就是信用,信用是二者统一的一般等价物和媒介。

在金融信用的基础上,金融的市场化发展和衍生,可以把信用进行交易和衍生,信用是可以杠杆化的,这就产生了现代社会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衍生品市场实质就是信用市场。金融衍生产品是以货币、债券、股票等传统金融产品为基础,以杠杆性的信用交易为特征的金融产品。金融衍生产品(derivatives)是指其价值依赖于基础资产(underlyings)价值变动的合约(contracts)。这种合约可以是标准化的,也可以是非标准化的。标准化合约是指其标的物(基础资产)的交易价格、交易时间、资产特征、交易方式等都是事先标准化的,因此此类合约大多在交易所上市交易,如期货。非标准化合约是指以上各项由交易的双方自行约定,因此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比如远期协议。

金融衍生产品是与金融相关的派生物,通常是指从原生资产(Underlying Assets)派生出来的金融工具。其共同特征是保证金交易,即只要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就可进行全额交易,不需实际上的本金转移,合约的了结一般也采用现金差价结算的方式进行,只有在满期日以实物交割方式履约的合约才需要买方交足贷款。因此,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具有杠杆效应的特性。保证金越低,杠杆效应越大,风险也就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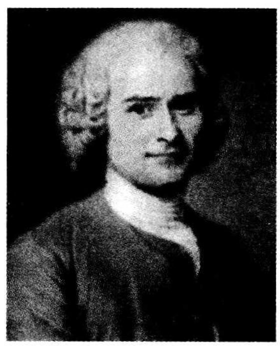
金融机构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以美国为例,参与衍生品交易的金融机构主要有商业银行、非银行储贷机构(Thrift)和人寿保险公司三类,其中商业银行是最早和最熟练的参与者。这里货币的本质是信用,股票、债券、期货等合约和权利也是一种信用,再加以杠杆是信用放大,所有的衍生品交易都是信用交易,同时

也离不开各种信用平台，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货币的信用之上，同时是货币和各种商业信用的交织和衍生，因此金融衍生品市场，实际上就是一个彻底的信用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出现，意味着进入了全面的信用社会，某一个信用的现在和未来都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同时这样的交易还可以杠杆化，更出现了虚拟信用，各种权证是可以比照现有的证券等虚拟创设的；信用还可以进入虚拟的形态被衍生放大，使得整体信用的规模空前发展，因此当今社会就是一个信用社会，也就是信用元规则主导下的社会。

背景阅读：何为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在民主法治的形成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在市民社会私主体的契约精神促进了商品交易的发展，为法治创造了经济基础，同时也为市民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秩序；另一方面根据私人契约精神，上升至公法领域在控制公权力，是西方形成现代信用社会的基石，也是构建当前全球商业模式、金融模式的信用基础。

西方的契约精神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后世的契约理论影响深刻。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关于正义的论述，蕴含着丰富的契约思想，亚氏提出交换正义的概念。交换正义是人们进行交易的行为准则。不得损人利己是交换正义的基本原则，现代契约精神是从自愿交易理论推演而来的。等价交换原则与慷慨理论，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数量，对适当对象施行财物上的给予，恪守允诺。古罗马法学家盖尤斯把债划分为契约与私权两大类。在此基础上托马斯·阿奎那在此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偿契约与无偿契约的划分。



《社会契约论》作者　卢梭

契约精神本体上存在四个重要内容：契约自由精神、契约平等精神、契约信守精神、契约救济精神。

契约自由精神是契约精神的核心内容。西方人权理念中就一直存在经济自由中的契约自由精神。契约自由精神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选择缔约者的自由、决定缔约的内容与方式的自由。契约自由主要表现在私

法领域。

契约平等精神是指缔结契约的主体的地位是平等的,缔约双方平等的享有权利履行义务,互为对待给付,无人有超出契约的特权。为了达到契约的平等精神,违背契约者要受到制裁,受损害方将得到利于自己的救济。正因为契约完美地体现了平等精神,才会被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作为理论武器而创造了社会契约理论,通过每个人让渡一部分权力交给国家代为使用,双方达成合意,建立社会契约,各自履行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以达到社会的和谐。

契约信守精神是契约精神的核心精神,也是契约从习惯上升为精神的伦理基础,诚实信用作为民法的"帝王条款"和"君临全法域之基本原则",在契约未上升为契约精神之前,人们订立契约源自彼此的不信任,契约的订立采取的是强制主义,当契约上升为契约精神以后,人们订立契约源于彼此的信任,当契约信守精神在社会中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主流时,契约的价值才真正得到实现。在缔约者内心之中存在契约守信精神,缔约双方基于守信,在订约时不欺诈、不隐瞒真实情况、不恶意缔约、履行契约时完全履行,同时尽必要的善良管理人、照顾、保管等附随义务。

契约救济精神是一种救济的精神,在商品交易中人们通过契约来实现对自己的损失的救济。当缔约方因缔约方的行为遭受损害时,提起违约之诉,从而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最终的保护,上升至公法领域公民与国家订立契约,即宪法。当公民的私权益受到公权力的侵害时,依然可以通过与国家订立的契约而得到救济。

3. 宗教信仰构建的信用社会

人类的信用最先起源于人类的信仰,中国人讲的信义本身就是一个信用,宗教能够成为左右人类精神世界的主导力量,关键也是要有人信啊!所以宗教对于信用的关注是其存在的根本。

是非对错的判断,就是信用的评价体系,评价的基础就是真理的判断和司法标准。到现代人类社会,信用是更宽泛的概念,就算是不信教的无神论者,唯物主义本身也是一种信仰,科学精神本身也是一种信仰,大家要通过实验和逻辑验证的科学体系也是一种信仰体系。我们的价值标准和真理体系都要来自于信仰,在唯物真理观的世界,科学精神就是一种信仰,没有科学精神我们对是非对错就难以判断,

不能判断对错如何体现信用？而西方司法上的对错判断更多要来自信仰，西方的司法审判是依靠陪审团的内心确信的，如果这样的方式放到中国，让一群来自社会的人根据嫌疑来选举小偷是谁，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在西方之所以能够被认为是永远正确的判断，原因就是大家要把手放到圣经上对上帝发誓，这内心确信的真实性实质上是来自上帝，来自于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教义当年也是依靠投票来完成的，教义对于教徒而言等同于真理，依据信仰的投票成为真理的产生方式，这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所以宗教信仰是创造信用的价值观和评价系统的，信用体系离不开评价体系，以什么标准进行评价就离不开对于真理的认知和价值观了，这些都是宗教所影响的范畴，宗教对于信用体系最重要的影响力就在于评价体系。

4. 信用是人类社会上层建筑的基础

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就是依赖法律和道德体系维护下的一系列的社会生活准则，在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国家强制力和契约对于生活准则的影响，国家强制力和契约构成了这个社会的法律体系，而依托真理价值观和信仰体系，人类的社会道德体系就建立起来了。

一个社会的信用完全依赖法律和国家强制力或者完全依靠契约是不成的，不可能在法律上规定千变万化世界的所有问题，国家强制力的管理必然会让国家的管理成本趋向无限而破产，人与人之间也不可能就所有的事情都进行契约约定，那么在这些更广泛的灰色地带，就是道德的地带，道德体系也是信用体系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社会规则和人与人交往的准则，更多的是在道德层面实现的，道德成为重要的信用体系，因为各种商业模式和信用体系的建立离不开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多的是道德体系维护的。

有了法律和道德的维护，才有了人类社会上层建筑的基础，而信用就是法律和道德的基础来源，因此信用是构成人类社会所有上层建筑的基础。

四、信用、金融与信息的大一统

1. 银行经营信用的历史脉络

银行真实的经营产品是什么？很多人会说是钱，但是著者在这里要从银行的起源和发展讲起，告诉你银行实际上经营的是信用。

西方银行起源于金匠的凭条，凭条流通逐步产生金本位，但是银行会遭遇挤

兑,需要有最后贷款人,而欧洲的历史基本是一部战争史,政府为了战争融资的需要的产生了巨大的借贷货币需求,原来的金本位制度也难以满足,而后来的罗斯柴尔德等人发明了使用国债抵押发行货币的方式,拓展了西方央行的信用,到此银行就已经成为经营信用的机构了。

将历史的视线收回中国,要从钱庄的经营开始说起,中国钱庄的经营不是大家想象的只不过是银两的中介,低息收款高息放贷,后来钱庄的经营是要做金融衍生的,具体的做法就是让人把钱存到钱庄里面,贷款人取得的不再是贵金属而是银票,为了让人愿意拿住银票而不是实银,其中的奥妙就是火耗,也就是说你拿实银的话我要给你扣除实银折纯和熔炼成为银锭的损耗,你拿银票就没有这样的火耗,因此大家交易就使用银票,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多开出来许多银票而无需真实的银子做准备,因为我收取的银子是远远少于我开出的银票的,因此我收银子的利息和我放银子的利息的差价就可以很小甚至没有,因为我多开出的银票的利息是我白白赚取的,结果就是普通的收款再放贷吃利差的人难以与钱庄竞争,而银票能够在一个地域流通的关键就是这个钱庄的信用,银票数量大于实银的数量就是在钱庄的信用下所发生的金融衍生,而过去钱庄的档手们要仔细计算一个地区的经济规模和实银的数量,从而知道可以多开出多少银票,这也产生了所谓“银根”的概念。因此对于钱庄,这个庄字不是聚集成村庄的含义而是坐庄的含义。

而所谓“票号”,经营的是现代银行另外一类业务,也就是汇兑业务。古代搬运银子的成本是很高的,1000多两白银将近百斤的重量,远途运送既费事也不安全,因此票号就采取在甲地收款拿银票可以到乙地取款的业务,因为同样会有人在乙地需要带银子到甲地,就可以直接在乙地把当地人的银子给你而不用实际运输银两,这样一来票号实际上就是只需要运输甲乙两地收款人缴纳银两的差额就可以了,这就是所谓“头寸”的概念。票号可以赚取汇款人搬运银两的费用,并可在运送时间内将持有的银两进行放贷,这就是银行手续费、中间代理业务等最原始的盈利模式,这中间自然也是需要信用保障才可以完成的。票号后来的发展就是汇票的流通,所谓的汇通天下不用指定地点,这样会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让你拿着汇票,只有你兑现的时候扣汇费等手续,你长期拿着汇票的结果就是票号收取你的实银可以放贷吃息了,而且汇票进入流通类似纸币以后,票号也可以多开汇票,这多开的汇票也是历史上银票的一种。这样的做法就是票号与钱庄在业务上的逐步靠拢。

在钱庄和票号的模式下,中国的银票也是基本等同于纸币,中国近代历史最可悲的是信用破产而没有走到央行出现这一步,以单个钱庄或票号的信用基础是难

以与存在央行、以国家信用为背书的洋行竞争的，以胡雪岩为代表的钱庄倒闭使得中国晚清大量流通的银票出现巨大的信用危机，中国的货币陷入极大的通缩之中，这通缩空间也被外国占据了，中国的国内经济开启了洋行为王的时代，中国的主流商人只能变成屈从洋行的买办。

到现代的央行模式，金融货币衍生的经营控制权是被控制在央行之手的，商业银行只不过是央行的代理，不能像钱庄那样多开银票而只能赚取息差，或者是票号汇兑的手续费，而中国历史上的“火耗”被世界所借用成为现钞和现汇的差价，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铸币税。只有差价存在，手续费才能够被接受，这就是国外 VISA 信用卡收取 2% 的手续费没事而国内银联收取 0.5% 商户却不愿意的原因。而外国银行可以收入大量费用中国却变成了银行乱收费而怨声载道，在 2012 年还有一个事情在中国引发热议的就是到花旗银行打印对账单被收费 4200 元，这在现阶段中国人的眼里就是敲诈掠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银行的名称来自金银店，但是所经营的实际上是信用，只有在信用的作用下发生货币的衍生才创造出银行业务的关键。历史上的钱庄等就是这样的机构，现代是这样的信用经营权被国家央行垄断，其他商业银行只不过是国家央行的代理人而已，在西方控制国家央行的资本集团是控制国家命脉的垄断集团，也是控制国家信用的实际统治者，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统治，谁有信用才是关键。

2. 从信用卡看信息与商业信用、银行信用

现在我们谈起信用卡，就是银行卡，其定义是商业银行向个人和单位发行的，凭以向特约单位购物、消费和向银行存取现金，具有消费信用的特制载体卡片，其形式是一张正面印有发卡银行名称、有效期、号码、持卡人姓名等内容，背面有磁条、签名条的卡片。真正的理解信用卡，理解信息与信用的关系，我们需要从信用卡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谈起。

信用卡于 1915 年起源于美国。最早发行信用卡的机构并不是银行，而是一些百货商店、饮食业、娱乐业和汽油公司。美国的一些商店、饮食店为招徕顾客，推销商品，扩大营业额，有选择地在一定范围内发给顾客一种类似金属徽章的信用筹码，后来演变成为用塑料制成的卡片，作为客户购货消费的凭证，开展了凭信用筹码在本商号或公司或汽油站购货的赊销服务业务，顾客可以在这些发行筹码的商店及其分号赊购商品，约期付款。这就是信用卡的雏形。据说有一天，美国商人弗兰克·麦克纳马拉在纽约一家饭店招待客人用餐，就餐后发现他的钱包忘记带在

身边,因而深感难堪,不得不打电话叫妻子带现金来饭店结账。于是麦克纳马拉产生了创建信用卡公司的想法。1950 年春麦克纳马拉与他的好友施奈德合作投资一万美元,在纽约创立了“大来俱乐部”(Diners Club),即大来信用卡公司的前身。大来俱乐部为会员们提供一种能够证明身份和支付能力的卡片,会员凭卡片可以记账消费。这种无须银行办理的信用卡的性质仍属于商业信用。1952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富兰克林国民银行作为金融机构首先发行了银行信用卡。1959 年美国的美洲银行在加利福尼亚州发行了美洲银行卡。此后,许多银行加入了发卡银行的行列。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银行信用卡很快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并得到迅速发展,信用卡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英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欧洲各国也盛行起来。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开始发行信用卡业务。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现在信用卡是银行的专利,但是从其历史上看信用卡根本不是银行发行的,信用卡的起源是商业信用而不是银行信用,但是在银行信用进入到信用卡领域之后,由于银行信用优于商业信用,因此信用卡后来基本由银行发放,商业信用退出信用卡市场,但是从信用卡的发展过程和信用卡的内容,我们看到的是信息的记录和信息的真实性,信用卡实际上就是记录使用人的信息和保障其信息的真实性,并且对于这个信息进行评估,只要信用足够就可以交易了,信用卡不是先贷款再消费的,信用卡的主要模式是可以先消费赊账,大家持有的信用卡具有所谓的免息还款的时间,这背后是商户结账各有一定的周期,在银行介入以后收取了手续费,即使是商户立即拿到钱也是商户与银行的交易,银行以信用垫付了,取决于商户与银行的合同而不是持卡人。

对于信用,更本质的是反映其真实情况的一组信息,以及对于这些信息利用经济模型和信息系统进行评价形成的深入信息,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信息与信用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信用就是一种信息,而信息系统性的变化,也可以影响对于信用的评价影响你信息的高低,因此信用体系与信息体系是分不开的,世界各国进入信用社会首先就是征信系统的建设,信用社会也是伴随各国进入信息社会的重要方面,中国建立自身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近年来也在大力建设中国的征信体系,这个征信体系就是一个信息系统。

3. 信用、信息和金融的融合统一

我们从前面的论述看到了银行的经营实际上就是一个经营信用的历史,银行经营的本质是信用,而在信用卡的发展当中,我们看到信用卡一方面是信用,另外

一方面则是信息，是反应持卡人真实情况的一组信息，信息和货币是不可分割的，而金融体系是什么呢？现代的金融体系就是信用和信息的集合。

以往的金融运作，还离不开各种纸质的凭证，与纸币一样，是各种银行票证和债券的一个体系，证券票证上记载的是与信用卡类似的信息，而其价值是其信息所反映的内容的信用来决定的，到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尤其是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整个金融系统已经完全是一个信息系统了，一个银行的IT部门已经是银行的核心部门，所有的银行运作都是电子数据的，我们的货币、证券等金融资产和交易，都已经成为央行和商业银行计算机和数据库里面的一组数据，这些交易已经完全信息化了，完全脱离了纸质的凭证，一个信息数据系统的故障，对于整个金融体系而言就是致命的，各种交易也就灰飞烟灭，金融与信息在这个系统当中是完全不可以分割的，只不过是一个内容的两个方面而已。

在这个系统内，信用是被系统所内化的，在现代金融工程之下，社会上的法律、财会、政策等规章也被内化到信息系统之内了，成为信息系统运行的规则，还有就是各个机构和个体的契约，也成为构建系统运行的法律依据保障被内化了，就如证券交易所制定了股票的规则建立了证券交易系统，所有的券商就要按照这个系统构建自身的子系统，我们炒股就要使用这个子系统的客户端，这系统就是按照交易规则建设的，我们炒股的规则就是依据各种证券法规具体化的，其强制力由证券法规所保障，交易的同时是与银行的货币账户托管连接的，账户的变化是联动的，你能够交易也是被银行货币信用保障的，变化的是一组数据库内的信息，而大家都信任这个信息在这个信息系统上交易的行为就是信息的信用，这里是由契约、法律、财务、政策等构建的信用体系，因此所有的信用也是被内化在这个信息系统当中的。这里有法律和国家强制力保障的你与券商、银行等一系列的契约，你持有的股份也是信息系统内的数据而不是历史上的纸质股票了，相反的纸质股票由于难于确认真假和权利的最终归属反而没有这一组信息更有信用。这种事在中国股市建立时发生过的，那个时候上市公司以前发行的股票要在公司股票上市后进入系统，是需要复杂的认证手续的，很多股票还成为非流通股。而现在大家拿着股票没有凭证只不过是券商的一组数据，谁也不担心自己的资产没有了，这就是这组信息数据的信用。

因此在金融电子化、无纸化的时代就是信息化时代，金融本身就是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结合的产物，在此阶段就是金融、信用和信息的完全融合统一，这样的统一使得金融交易的速度极大地加快，商业信用下的证券也起到了类似货币的作用，

从而使得在银行资产证券化的时代对于货币的需求被债券等证券替代,总的货币量会下降。而进入电子信息时代以后,交易的速度比纸质凭证时代极大加快,以前要各个银行的人员到票据市场人工交换票据,现在直接电子指令即可,尤其是网络时代成为网络间的数据交换,这使得交易的速度一日千里,使得货币流通速度大大加快。

我们经济学所讲的流动性不是简单地指货币,而是货币与货币流通速度的乘积,在货币流通速度极大加快的时候,同样的流动性货币的需求量就要大大降低,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美国的广义货币 M2 可以没有中国的 M2 多,原因就是美国的债券市场是有货币信用的替代作用,美国的金融市场的衍生速度大大快于中国的结果,如果把在信用系统内衍生的高级货币 M4、M5 等计算下去,就可以发现美国的超广义货币量是远远多于中国的,这也是信息、信用和金融相统一的结果,在这个大一统的时代,信息、信用和金融的大一统的体系就是世界的控制体系,我们所看到的信息、信用和金融只不过是这个体系的一个方面,而货币、价格体系、证券、衍生品等又是这个体系更小的一个方面。世界在这个大一统的年代,是把各种经济要素全部整合在一个体系之下的,而信用就是这个体系最关键的方面,认识了信用,认识了信用社会,认识了这个控制世界的大一统的体系,也就找到了认识这个世界的钥匙,这个钥匙就是信用元规则。

第四章 金融世界的王者：信用体系

一、大象无形的信用体系

世界危机的三段论是金融、经济、信用，金融和经济都是全球信用体系的组成部分，危机的发展最终的根本是信用问题，也就是从金融危机发展到信用危机。现在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如同达摩克利斯神剑一样悬在世界人民的头顶，各国主流媒体上“货币战争”都成了热炒的概念，各种世界经济论坛中被讨论的最多的也是货币问题，但是这个世界博弈的却不仅仅是货币，货币只不过是世界经济棋局当中的一个侧翼，各方博弈的真正重心，是世界的信用体系，眼下正在进行着的，就是这样一场信用大战。

当今世界已经发生金融危机，现在各国正在滑向经济危机的深渊，按照危机三段论，危机是要经过金融、经济、信用三个阶段的，在2008年危机的时候世界舆论认为不会出现经济危机，现在经济危机已经四处蔓延，可以想见的紧接着信用危机就要产生，信用危机背后必然伴随着全球信用体系的重建，在此基础上世界财富要重新布局，这里信用体系问题是一个比货币更为广泛、更具决定意义的战略问题。

首先货币本身就是一种信用，现代以前通用的贵金属货币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一般等价物，而现代货币本身是一个国家信用的产物，国际间货币全球化市场化以后还形成了汇率和利率的市场，现在的各种“量化宽松”、开足马力印钞票，只不过是给国家信用不断兑水。

甚至产权也是依靠国家强制力维护的信用体系，财产权利是需要国家的司法强制体系维持的，这个体系和制度也是构成世界信用体系的基础，其中的所谓“股权”就是对于你在企业当中的保护体系，你的房契就是对于你的不动产的保障，这都是国家信用所维持的，不同国家的产权制度和概念也不同，就如各国的公司法不同，公司股票的内涵也会因此而有所差异，这也是一个信用问题。

更需要注意到这些信用与货币信用的比价和对价关系，产权的泡沫与货币的

泡沫是不可分的,企业产权的泡沫造成股市泡沫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从更深层次来说,房地产等不动产信用是抵押贷款等货币信用的来源,美国的危机与房地产的泡沫破裂高度相关,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对于中国整个经济信用体系的颠覆性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

笼罩在货币和所有权之外,更广泛的体系是依靠契约和国家强制力维护的信用体系,各种货币相关的合同和协议是这个信用体系的一部分,这些合同也被市场化为可以交易的产品,各种期货合约交易也是基于这样的信用体系而形成的。现在世界的危机也是伴随着各种大宗商品期货和现货及其金融衍生品的价格危机而出现的,尤其是期货市场的投机过度和崩盘风险,就是一种信用危机。甚至对于风险的保险也是一种信用保证,现在的世界性危机对于保险影响尤其重大,因为各种债务的发行等都附带风险的信用担保,信用保险本身就是直接针对信用的,而这个保险产品的再保险和分保,形成了信用掉期合约(CDS,Credit Default Swaps),这是巨大的信用衍生品市场,这个市场对于2008年的危机和今后的危机走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现在讲信心经济,背后与之相关联的还有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所有这些背后的信心来源都是对信用体系和信息系统的信用,如果信息系统没有信用的话,哪里来的信息和信心?依靠这样的信心来促进经济的背后需要的是产生信心的信用,所以现在网络社会要瓦解一个经济体和国家,要害也是攻击其公信力、打击其信用,没有了信用的纽带,就没有一切。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中东巨变,无不与政府的公信力丧失有关,西方的示威游行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也与政府信用丧失、尤其是在资本面前对于公众的信用丧失有关。

最后国家和社会的保障体系也是一个信用体系,大家在这个体系下能够得到的保障,完全是基于国家的信用支付和分配,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根本差异实际上就是经济资源的分配依据不同:市场经济是以货币为纲,就是以国家信用票证的交易为主要分配手段和指标的国家信用分配体系;计划经济则是通过计划和体制原则为分配手段的信用分配体系。现在西方主要人群的生活是离不开政府的社会保障信用分配的,而这个分配体系的膨胀造成的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已经使得这个信用体系濒临崩溃,这将是西方国家信用的彻底崩溃。

本次危机对于西方世界最大的威胁也就在于社会保障信用系统的危机,这是比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对于西方社会更大的威胁,是要直接造成社会崩溃的。因此我们看到的西方的印钞、通胀是信用问题,股市、楼市的泡沫背后有信用问题,金融

衍生品和期货等市场危机也是信用问题,更本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国家债务赤字问题更是一个国家的信用问题,因此我们要认识到当今世界的博弈和战争本身就是信用问题,如果仅仅把目光停留在货币,仅仅以货币来论述问题而看不到货币背后的信用支撑和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种信用危机,则难以深入认识这个世界。

我们认为当今世界乱战的背后就是一场全球的信用战争,本书的内容就是讨论比货币战争更广泛的信用全球战争,让读者认识到信用是怎样决定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信用战争是怎样掠夺和再分配世界财富的。

二、信用体系的核心利益在哪里

认识信用战,首先要认识信用战博弈的主战场——信用体系,信用是一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的交易主体不用立即支付对价就可获取资金、物资、服务。而这样的一个体系在经济上就是由市场的信用主体按照一定的规则和规律建立起来的交易环境,在政治上就是一个支配社会资源运转的统治制度。

建立和控制这样的一个信用体系,核心的利益就是取得了这个体系的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和裁判权,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者同时参与这场游戏,在游戏当中的有利地位是不言而喻的,甚至体系的强势者会拥有各种的特权和违规权,而信用体系里面的参与者,从来地位就是不平等的,谁都希望自己取得优势地位,要让优势者与普通者平等,违反了自然竞争的丛林法则,是难以在丛林法则的国际社会实现的,所谓平等是天堂上的事情,天堂的事情还是到天堂上去争取,谁想在人间建造天堂的,结果就是一定为地狱,只不过你可以把这个地狱叫做“天堂”。

权力是来自信用的,为什么大家服从权力?为什么这些东西属于权力?为什么货币能够充当财富代码?所有这一切都是要信用支持的,都是要有一个信用体系的,即使是在贵金属时代,也只有到了商品交易建立起来信用体系了以后“钱”才成为财富的代表。

人类的社会离不开信用体系,信用战就是在信用体系内博弈权利、博弈利益。对于信用体系,最根本的利益就是体系内的各项特权,尤其是规则制定权和裁判权,现在全球范围内的信用争霸,就是要夺取信用体系的制高点,成为全球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世界宪兵,全球信用体系的核心利益实质是全球的统治权。这就是当下信用元规则之战的奥义所以。

第二部分
全球信用争霸战开打

导读：在现代的世界格局中，信用元规则的外在表现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宗教和金融资本的力量已经对于国家主权形成制衡，宗教和金融资本力量的联合完全可以让一个大国独立，也可以让一个超级大国解体。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石是财富与权力的凝聚、文化与智慧的传承和人才晋升的通道，颠覆一个国家，关键就是破坏这些基石，而在当今世界，由于现代科技的发达，通过文化和经济渗透颠覆一个国家变得非常方便，而且可以让渗透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核恐怖统治下，颠覆活动变成了国家之间、各种力量实现自己目的的最主要的博弈手段，而金融资本和宗教就是颠覆和渗透的主要力量和手段，他们已经完全具备了颠覆一个国家的能力，对于这种强大力量，国人不可不察。

第五章　主宰人类社会的信用秩序

人类社会是信用社会，信用社会分为信用、信用体系和信用秩序三个层面。信用是各种人类关系的基础，由逻辑关系、信用关系等联系起来的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关系构成了信用体系，在信用、信用体系内和信用体系之间的逻辑关系、地位关系、信用关系建立起来的顺序规则和体系运转法则，就是信用秩序。

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是信用，是人与人的相互作用，这样的作用受到人的意识支配，但所作用的内容和产生的后果又是超越意识和物质的，这些信用的相互作用彼此联系形成难以分割的整体就是信用体系，驱动人类社会运转的正是信用体系；主权实体内部、经济金融货币、国家民族宗教的联盟等都是信用体系，而主权国家、战略同盟所处的体系内外乃至全球人类社会的运转法则顺序规则就是信用秩序。这里信用是一种能力和权利义务，信用体系是一种网络结构和社会体系，信用秩序是一种规则和顺序，信用秩序决定了全球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社会元规则由此诞生。

信用是微观的，而信用体系就变得宏观了，信用秩序则是世界运转的普世规则，信用秩序由信用体系和信用等构建。在物质世界，物质的相对作用就是力，由各种力的驱动下物质相互作用形成体系，就如大家熟知的太阳系等；在抽象的人类社会，连接和驱动人与人关系的“力”就是“信用”，信用秩序则是这体系的“力”所构成的“场”，市场也是场，这与自然界的“引力场”、“电磁场”等概念是类似的，只要一个物体置身在场当中，就要不可避免地受到“场”内各种力的相互作用，按照场的规律运行。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信用多少，就是他能够作用于他人的力量的大小，人群和社会构成体系，信用的秩序是“场”，人们的行为被这样的信用秩序所包围，并受信用秩序所支配。人是社会当中的人，社会是信用决定的社会，一切都在信用所决定的秩序当中运转。

人类的战争实际上是从信用到信用体系、最终是信用秩序的博弈，信用战是人类战争的核心，《信用战》一书旨在分析这种元规则的性质、内涵和功能。

一切人类博弈归根结蒂都是信用斗争。个人为了财富和地位的斗争,实际上是一个信用的博弈;围绕名誉和民族、国家等展开的斗争,则是信用体系的博弈;而以游戏规则的制定权,以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的归属为标的物的斗争,则关乎全球的信用秩序。

美国霸权是全球信用秩序决定的,信用秩序让美元成为世界秩序的核心,让美国处于了信用秩序的金字塔顶端。美国所有军事战争行为都是为了保障其全球信用秩序主导者的地位。

当前的信用危机就是信用缺失、信用体系崩溃和信用秩序混乱造成的,信用危机的发展也是从信用到信用体系、再到信用秩序逐步发展的。

一个体系内部需要信用,体系之间也需要信用。体系内部是大的体系嵌套小的体系,大的体系之间也形成了体系的信用秩序,就如同不同的集合可以有交集、并集和子集一样,信用体系是一个信用和信用体系的集合,信用秩序是集合内部的关系顺序和运转法则。因此信用、信用体系和信用秩序之间的地位高低也是相对的,依据参照物的不同,信用秩序可以是信用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信用体系外的,还可以是信用体系间的,原因就是信用体系的大小是相对的。

把全球看作一个信用体系时,全球信用秩序是这个体系内的秩序规则;而把国家民族看作一个信用体系时,国家民族的国际丛林法则成为国家民族的运转法则,其势力实力强弱成为顺序规则,全球信用秩序就外在于这些信用体系了。这里信用体系的范围是特殊的,信用秩序的规则是普世的。一切走向本源的时候,必然也是走向普世的。

信用是维系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石,信用秩序是人类秩序的元规则。

第六章　针对国家的信用战争

一、国家强盛的基石

1. 国家的存亡兴衰不再仅靠武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国家获得了独立，与以往的国家独立相比，我们看到在二战以后许多国家的独立或建立不是依靠战争实现的，比如印度，印度的独立更多的是一个非暴力的过程。

印度能够以非军事、非暴力的手段争取到国家独立，要归功于“圣雄”甘地，因为他成功地将西方法治与印度传统文明相结合，提出了一整套的政治哲学思想和行动方略，打开了印度通向现代国家的大门。甘地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巧妙但也是真诚地将法治观念与印度传统文明结合在一起，赋予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强大的精神基础，也为该运动赢得了世界性的同情与支持。

“圣雄”甘地发起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仅是20世纪殖民地国家中最成功的独立运动，而且影响了日后许多国家的民族独立和公民权利抗争运动，包括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而非洲很多国家的独立和种族隔离制度的消除，也是依靠非暴力的方式达到目的，这在以前一定是要经过一场激烈的独立战争才可以完成。

以非暴力方式能够成功获取独立，关键是有金融资本和宗教的支持，而且也只有在金融资本和宗教力量成为能够与主权国家分庭抗礼的强大主导力量后，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等缔造的非暴力运动取得成功的奇迹才可能出现。首先，战争毁灭财富和人口，并不符合金融资本和宗教的利益，同时，独立运动将大国拆小，国家相对于金融资本和宗教的力量被削弱，也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我们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在这些国家独立过程中，原来的宗教基础和金融资本的利益都要得到保证，这是和平独立的基础；二是这个独立过程是原来国家统治者不愿意接受的，而能够和平实现，说明历史发展到二战后，金融资本和宗教力量的强大足以制约主权

国家的力量。

到上世纪末,随着超级大国苏联解体,前苏联的整个盟国阵营也解体了,整个过程也是没有经过任何战争。对于前苏联这样拥有毁灭地球的核力量的超级大国,已经不是依靠军事战争可以打败的了,但是它也是突然就解体了,背后还是经济问题和宗教民族问题,国内的经济危机和民族、宗教的矛盾成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前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都可以在非战争的情况下由金融资本和宗教的力量将其解体,标志着现代的世界格局中,宗教和金融资本的力量已经对于国家主权形成制衡,并且宗教和金融资本力量的联合完全可以让一个大国独立,也可以让一个超级大国解体。信用元规则支配下的大国游戏规则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2. 基石之一:财富与权力的凝聚

什么样的国家是一个强盛的国家?这并不由国家的财富总量决定,而是由一个国家在必要时可以调集的财富和资源量决定。GDP 有多大只是一方面,你能够调动多少资源却是另一方面。在国家间的竞争中,成败更多地取决于一个国家能够调动多大的经济力量,而要调集这些经济力量,离不开财富和权力的凝聚,这个凝聚的程度就是一个国家凝聚力的体现。

中国古代的税收率很低,中国对外战争能力的不足也正体现在这里,游牧民族除了武器装备在冷兵器时代具有优势以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优势是他们可以轻易地调动国内的所有资源参战,每个人都是战士,武器也是自备。但是农耕社会,虽然生产率高于游牧社会,但是农业的生产方式也决定了财富和人口无法快速集中。游牧民族可以迅速骑马而来,一路放牧一路征战;而农耕状态下,农民很难离开土地,战争中的粮食运输和供应也是大问题,因此古代有“千里不运粮”的说法。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生产率的提高,有赖于分工的进一步的明确和分化,分工越细,要求的工序越多,生产的规模也越大,需要共同劳动和居住的人就越多,需要的资本也越多,城市化的需求就越来越强烈,对于产业的资本化和金融化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现代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以城市化和金融体系建立为标志的,而国家的管理、控制和防御等,也都是依托城市进行,随着人口的集中,国家的权力也向城市凝聚。

因为依托集中于城市的权力和财富才能够产生足够的反抗力量,所以历来破坏国家瓦解政权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破坏城市。城市被破坏之后,这个国家的权力、人口和财富无法有效凝聚,反抗就没有了人员和物资等经济基础。翻开历史,你可以看到历来的征服战争都是伴随着一路的毁城和屠城。

而在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金融业发达以后,屠城就没有必要了,完全可以通过经济和金融的手段达到目的。当然这种方法在历史上也有试验,朱元璋得到天下后就把全国的富人登记造册进行打压,同时发行宝钞禁止白银流通,以各种罪名株连巨室,把大量城市人口流放到边远地区,从而巩固了明朝的统治,之后即使发生"靖难之役"这样的变故也没有动摇朱家皇权,其根本就是做到了权力的凝聚,把一切可能造反的力量予以分散。

现代的做法是控制该国的央行和金融体系,通过金融手段操纵你的汇率和金融市场,发行过量货币让你必须接受泡沫,以金融手段而不战制胜。要控制你的金融体系,首要的就是限制你的财富集中,不让你产生本土的金融力量,而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被外国控制后,国家的经济命脉和兴衰就掌握在他人手中,政府也得听命于人了,否则你就只能在不断的经济危机和财务压力下垮台。

同时在宗教和文化上,给要颠覆的国家制造混乱,搞社会的阶层矛盾和民族矛盾,让这个国家内的不同势力增多、不同意见增多,导致国内权力博弈关系复杂,权力在国内无法集中;只要在国家内部出现难以调和的激烈权力之争,国家的权力不能凝聚和统一,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强大。

最后我们从统计上来说明权力和财富集中是怎样产生力量的。从统计上讲,样本越分散,每一个样本随机能够产生的方向和力量越平均,最后正负抵消统计下来,所形成的合力几乎为零;而如果样本集中,有共同的方向,那么统计平均就是巨大的,而且很可能会发生类似共振一样的力量超常地倍增。因此把权力和财富分散,结果就是在统计平均上很难产生一致的力量,整个国家无法产生一致的力量。国家对外的力量是国内各种力量的加权平均,国家财富不能凝聚,虽然整个国家的每一个个体是富足的,但是统计下来国家的力量却没有。中国古代 GDP 第一而国家实力不足也就是这样,现在中国很多行业总量世界第一而企业过多(例如钢铁),也是要被境外垄断巨头盘剥,背景也是一样的统计模型。因此国家强盛的一个基石就是权力与财富的凝聚,而金融资本和宗教,恰恰是在财富和人流两个不同的角度体现了这样的力量,一个国家凝聚力的大小,也就是国家盛衰的根本因素,凝聚力是国家的基石。

3. 基石之二:文化和智慧的传承

一个国家的高度,由这个国家决策层的智慧高度决定,而智慧是需要积累和历史的传承,积累多代人的思考才能够有过人的高度。同时,很多历史智慧并不能依靠书本学习到,甚至产生这样智慧必要的知识也无法写进书本,比如很多的历史问题,因为要考虑到与邻国的外交关系等就不能真实记录。

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存在的根基是文化和智慧的传承,一个民族和国家可以在灭亡后复国,从根本上还是文化没有消亡,文化凝聚力还坚强。犹太人能够在千年后复国,正是如此;而中国历史上各个少数民族被汉族融合,其关键也是我们的文化把他们的文化融汇了,他们的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了。

中国近代的竞争失败,撇开实力的问题,外交的失败更加惨重,背后也是我们当初的天朝没有国与国的平等外交观念,只有藩国朝贡的观念,相关智慧积累不足,同时即使有几个有识之士,因为文化差异太大,也不能被国人所理解,见识成为空想。而日本的维新接受了全盘的西方文化和智慧,也是他们国家成功的关键之一。在甲午海战之前,日本不仅仅在朝鲜外交上占了便宜,更是在琉球问题上不战而让高傲的大清朝低头,不但给了琉球,还给了 50 万两的赔款,但你能够说甲午前的日本比中国强吗?

因此我们要明确地认识到文化的力量,认识到智慧传承的重要,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智慧的传承被破坏,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了。当今世界,民族国家成为一个国家的主体,而文化的传承是一个民族的精髓,是一个民族存在的基础,如果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不存在了,这个民族就要消亡,所以文化和智慧的传承,还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存在的根本精神因素。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统计规律上来看,文化的认同和智慧的一致性,在统计上可以使本来分散的个人产生一致的和正确的趋向,这样趋向越一致,统计平均后的力量就不会被抵消而变得越强大,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也就体现在全体的国民能否在很多问题上保持一致,或者说在多大的程度上保持一致,不一致就会是力量的抵消造成内耗。一致性来自文化,而产生一致的力量要走对路,走错路更要跌入深渊,国民正确的一致性,则来自本国的智慧传承,因此国家力量昌盛的另外的基石,就是国家文化和智慧的传承。

4. 基石之三:人才晋升通道

一个国家要强盛,需要好的制度来不断选拔出最有智慧的人才。中国古代一直在摸索人才晋升制度,从战国的客卿传统到汉代的举孝廉,从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度,发展了一系列的方法,世袭制逐步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因为权力者的后代不一定是优秀的,僵死的世袭制度不利于把权力交给能人。而西方从教会选举中逐步摸索出来的民主制度,也是一种快速选拔人才的方式。

良好的人才上升通道,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把社会上可能造反、造成不稳定的因素和精英等等都纳入进来,都拉入了博弈的棋盘,只要他们进入了体制内有

了体制所带来的利益,他们就要死心塌地、不遗余力地维护这样的体制。就如隋唐建立科举制度后,唐太宗的名言:“天下的读书人尽入吾彀中”。如果没有发达的科举制度,中国的帝王集权难以维持2000年。而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建立,也把原来需要暴力革命的社会因素,拉到竞选的公平竞争轨道上来,极大地避免了社会的动荡。没有了暴力的动荡,社会的财富就可以持续积累。因此人才的上升通道和合理的人才制度,也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石。

最后我们还是以统计的经济模型来说,人才的上升通道就是在统计上使得优势因子的权重得到加强,最后加权平均的统计结果肯定是更有力量;而把权力交给最智慧的人,也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方向错误,因此这样的系统也是最有效率的系统。

5. 颠覆国家只需破坏其基石

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石就是财富与权力的凝聚、文化与智慧的传承和人才晋升的通道,而颠覆一个国家,关键就是破坏这些基石,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最后覆亡,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

因此破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让国家的权力集中、财富集中出现障碍,在现代社会通过经济、金融的渗透是很容易破坏财富的集中和权力的集中;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经济渗透,则可以通过破坏这个国家的文化传承实现;而人才的晋升,更是各国制度的竞争,一个国家的制度好,可以吸引人才,当今人才是流动的,而金融领域的利益和宗教领域的信仰,对于人才的吸引力是难以抗拒的。

古代的时候,各国的交往受到交通和通讯的限制,国家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除了直接的战争冲突和间谍细作的活动外,大规模和全民性的渗透和颠覆活动是难以进行的,更多的是局限于这个国家的贵族层面。但是当今世界,由于互联网的便捷,全球瞬间就联系到了一起,通过文化和经济渗透颠覆一个国家变得非常方便,而且可以让渗透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核武器要毁灭全球的世界战争越来越难以开打的时候,颠覆活动变成了国家之间、各种力量实现自己目的最主要的博弈手段,而金融资本和宗教就是颠覆和渗透的主要力量和手段,金融资本和宗教具备了颠覆一个国家的能力,对于他们的强大力量我们是需要深刻认识的。

二、国家解体的背后是信用瓦解

1. 信用利维坦

利维坦(Leviathan)的原型产生自基督教,在《旧约》中是一条混沌之龙,是耶和

华所创造出来的生物中号称最大的。这个时候它还不是恶魔,只是神所创造的怪物罢了。但是到了《新约·启示录》或后来的基督教文学时,它就摇身一变,被视为反抗神、要让世界毁灭的恶魔了。这里讲的信用"利维坦",是借助英国古典政治哲学家霍布斯的著作《利维坦》的含义来说的,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也是圣经中利维坦的一个引申比喻的含义,《利维坦》一书把国家比喻为一种动物——利维坦,让无生命的事物具有生命,让抽象的事物变得具体。在这本名著面世以后,利维坦又有了更深的内涵。

霍布斯的《利维坦》,主要描述自然状态中人们不幸的生活中都享有"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又都有渴望和平和安定生活的共同要求,于是出于人的理性,人们同意订立契约,放弃个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个人或集体能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能把大家的人格统一为一个人格;大家则服从他的意志,服从他的判断。传说,在上帝造人之后,人请求上帝:"上帝啊,我们太弱小了。请你再创造一个英雄吧,让他保护我们"。上帝说:"英雄在保护你们的同时,也会欺压你们,吃你们"。后来人们为了抵御各种外来的风险,自己创造了一个利维坦,创造了一个能让他们有归属感的庞然大物——政府,但政府这个利维坦(Leviathan)有双面的性格。它由人组成,也由人来运作,因此也就具有人性的那种半神半兽的品质,它在保护人的同时,又在吃人。所以,就有了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就是把政府这个"利维坦"关进笼子里一说。

在凯文·凯利的《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这本书里,通过对蜂群的观察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个体是无意识的,群体在整体的失控中却找到了方向。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逻辑:从失控到把控。如果没有一个群体的利维坦,个体的行为不会产生有价值的社会结果,也形不成社会信用,在人类社会,一个国家更应当是一个利维坦,他把人的个体信用整合起来放大成群体信用,以一个统一的信用来保护人类社会和人类的群体,当然这个利维坦的控制者也是要渔利的,他保护人群的同时也可以吃人,不要过于夸大它的负面因素而忽视它对于群体的贡献,就如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因为奴隶主的存在使得人类群体抵抗自然的能力增强,而且原来的战俘不再被杀死而成为奴隶,利维坦就是这样的一个怪物和双刃剑。

对于利维坦的作用,我们还可以利用信息理论和控制理论里面的"信息熵"的概念进行理论上的阐释,信息是个很抽象的概念,我们常常说信息很多,或者信息较少,但却很难说清楚信息到底是什么、到底有多少,比如一本五十万字的中文书中到底有多少信息量?直到 1948 年,香农(C. E. Shannon)提出了"信息熵"的概

念,才解决了对信息的量化度量问题。信息论之父香农第一次用数学语言阐明了概率与信息冗余度的关系。香农借鉴了热力学的概念,把信息中排除了冗余后的平均信息量称为“信息熵”,并给出了计算信息熵的数学表达式。信息熵是信息论中用于度量信息量的一个概念。一个系统越是有序,信息熵就越低;反之一个系统越是混乱,信息熵就越高。所以,信息熵也可以说是系统有序化程度的一个度量。信息熵的计算公式是:

$$H(x)=E[I(xi)]=E[\log(1/p(xi))]=-\sum p(xi)\log(p(xi))\ (i=1,2,..n)$$

通过这样的公式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个社会存在一个利维坦的时候,是信息熵最低最有序的社会,也是最有信用的发达社会,在个人都有最大化选择可以恶性博弈的社会,反而是社会内耗最大的社会,信用利维坦是一个有序化最好的方式,国家和国家信用的实质就是一个利维坦,在当今世界的丛林法则当中,一个国家的国民或者一个民族就是需要有一个利维坦来保护个体,进而建立自己社会的信用体系。而上面那条信息熵的公式,则是上帝就信用元规则对人类发出的耳语。

2. 凝聚力、公信力和普世价值

国家利维坦的诞生造就了国家的存在;国家强盛的基石就是财富和权力的凝聚、文化与智慧的传承、人才晋升的通道,这里维持这基石稳定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公信力和普世价值。

凝聚力比较好理解:财富和权力能够在国家的层面上凝聚,就是有凝聚力的;而人才愿意留下,是因为有人才上升的通道,得到人才的认同,而这是需要国家公信力的;同时国家的价值观要得到人才的普遍认可,这就是普世价值的意义所在。

国家在精神层面的统一,就是国家公信力,如果国家丧失了公信力,人民就无所信,就会总是以怀疑的目光看待国家行为,对于其进行有罪推定,国家管理成本就要急剧增加,国家的凝聚力就将难以维持。可见公信力和凝聚力实际上是一个事物的不同层面。

所谓“普世价值”的情况有点特殊,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挥舞着道德大棒敲打中国,引起了很多国人反感;而西方所宣称的所谓“普世价值”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西方价值”。一个号称“普世”的价值观,如果没有包涵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和中国历史文化、智慧的传承,岂非贻笑大方?而在古代东亚社会,中国儒家思想长期就是“普世价值”,因此著者这里所言的“普世价值”是明显区别于西方价值观的,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国家需要一个统一的核心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一个国家的社会价值观混乱必然招致巨大的社会问题,因为价值观的混乱必然

导致社会对于事物的价值判断多样化、扭曲化,对于国家行为就要有多种理解,多种理解下公信力就难以建立,没有公信力就没有有凝聚力,从而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石就要动摇。

孔子著《春秋》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现代中国也是一个价值观多元化的混乱时代,西方的价值观在基督教等宗教力量左右之下是非常稳定的,但是中国社会的信仰却很多元,所有这些对于国家的凝聚力、公信力等都有巨大不良影响。这里说一个国家的信用,实际就是这个国家的凝聚力和公信力,没有公信力的政府是难以生存的,没有公信力的社会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国家的信用体系是在这个国家公信力的基础上建立的。

3. 信用社会的瓦解伴随着财富的巨大再分配

当今社会是信用社会,信用社会的瓦解必然伴随着巨额的物质财富再分配,这是一个系统性掠夺与反掠夺的过程。

货币是信用的一种体现,在信用社会瓦解、信用崩溃的时候,货币的信用肯定也是要崩溃的,货币信用的崩溃直接体现为恶性通胀,恶性通胀之下百姓的现金收入会遭受巨大的损失,而在经济生活当中,人们是不可能手上没有一点儿现金的,经济越发达、金融化程度越高的社会,人们就越是不得不持有现金,而这个社会如果不是贵金属货币而是将货币绑定国家信用的话,货币恶性通胀的程度就更深化,恶性通胀将席卷整个社会的财富。

信用体系的崩溃还体现在商业运行的违约率暴增,违约使得社会进入了双输博弈的快车道,违约的背后往往伴随着非法占有和利得,违约横行将进一步加剧财富的非正常转移。

在信用崩溃的时候,破产也会大量发生,在破产和违约的压力下,人们倾向于停止生产和交易,这样正常的经济体运转就会猛踩刹车,经济运转停滞的结果反过来又加剧危机,加剧供给不足和通胀的发展,使得信用危机正反馈扩大。

现代社会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有证券等金融衍生品市场,信用危机使得衍生品市场交易体系崩溃,各种投机资金及其暴利,使得正常的交易和投资无法继续,市场就要向过度投机的方向转向,过度投机后的泡沫破裂反过来会进一步造成新的信用危机。

如果信用危机造成市场供应体系混乱,尤其是粮食等刚需物品的供应体系产生恐慌,必然是造成社会的政治危机,政治危机会使得国家强制力保障的司法体系崩溃,社会纠纷需要司法来解决,产权需要司法来维护,司法体系混乱的结果就是

产权体系也要出问题。

在现代社会，所有人的财富都构建在信用体系的基础上，货币是信用体系，产权也是，债权更是，在信用体系崩溃坍塌以后，财富体系就不存在了，那么财富所有权归属的问题就要出现了，新信用体系的构建就是新财富归属权的确权，就是新货币发行替代恶性通胀的老货币，这样的重建就是一个重新分配财富，因此信用战争是再分配社会财富的战争，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就其信用体系而论，都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信用的变化实质上就是财富的变化。

三、公信力：摧毁国家信用成为新战争手段

现代中国西风东渐的结果之一就是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伪命题：如果每个人都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社会总福利自然最大化。这是彻头彻尾的忽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囚徒困境”，每个囚徒都选择最有利的方式出卖对方，最后双方得到的都是最不幸的结果。实际每个个体都在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最后集体得到的利益反而最小。为什么会最小？就是因为没有公信力而恶性非合作博弈，产生纳什均衡的效果。如果罪犯之间有黑社会维持的公信力，彼此相信对方会采取合作博弈争取团体利益最大化，此时的囚徒就会选择相信对方、不认罪而不是出卖对方，因为他们知道失去公信力互相出卖对方的结果是最糟糕的；就算他这次出卖同伙的博弈可能成功，最终还是要被黑社会惩罚。所以任何博弈只要加入公信力的催化剂都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

从古代战争开始，统帅们就都知道战争当中军心的重要，士兵如果认为打不赢了，就会崩溃性逃跑，这是谁也控制不住的；反过来如果士兵们抱着必胜的信心坚持，只要坚持的时间比对方长、对方先崩溃，就可以追着对方的屁股打了。古代战争以少胜多的战例也是这样诞生的。军队在冷兵器时代能够交战，两军对圆的接触面是有限的，人再多实际也伸不上手，就是 10 万对 50 万，真正打起来也就是不到万人在正面拼杀，其他人堆在后面难以上手。如果因为失败预期而乱起来，50 万人会顷刻覆灭。就如淝水之战，百万大军对八万人，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队列调整，被敌人宣传成为战败以后，百万大军的心理被失败预期所控制，竟然风声鹤唳！因此军心至关重要，这个军心实际上就是军队对于胜利的公信力，在冷兵器时代公信力就已经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了。

现代社会进入了信用社会和信息社会，公信力就变得更加重要了。信用战争

是社会所有的信用层面参与的总体战,公信力贯穿博弈的所有层面,成为信用战的重要武器。在信用社会,诞生了信心经济理论,信心经济就是围绕社会公信力而建立的信用经济模式,公信力是信心经济的核心,公信力被攻击也就是信心经济的彻底崩溃。195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史怀哲说,对任何国家、企业、个人而言,信心是最重要的资产。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通信环境下的市场经济,就是典型的信心经济。因为在虚拟的资本市场中,“预期”是市场波动以及资产配置的决定因素,预期的背后体现的就是投资者信心的消长。

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国家的公信力所维系的,如果这个国家的公信力被摧毁,整个国家必然是要崩溃的!在中国,威胁国家公信力的主要火力来自腐败,然而腐败造成民不聊生导致亡国是一个伪命题,古代中国税收率不到5%,一个县只有三个朝廷命官、其他都是县官雇佣的吏,这样的官民比例下,就算是翻着翻地贪腐,也不会影响民生大局;反观西方历史上一贯税率高达40%左右的贵族社会都没有产生改朝换代的问题。中国皇帝是古代信用体系的最终信用人和最终责任人,如果王朝被推翻不但自己要死,子孙也要死,他们合法拥有天下,腐败在古代最大的侵害对象是皇帝的利益,古代的民不聊生多半是经济危机的结果;腐败真正的危害在于国家信用体系的朽毁。古代中国一个王朝的真正灭亡,也是要等到老百姓认为天道改了才可以水到渠成,也就是原来皇帝的信用体系彻底崩溃才行,就如王莽篡汉,最后还是要汉室后裔来推翻它;北宋灭亡了,南宋的建立还是要以北宋的公信力为基础。

如果一个国家的公信力被攻击,国家的信用体系被摧毁了,国家的所有运转就不灵了,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就没有了,结果就是国将不国。以前缺乏军事以外其他的攻击手段,即使是军事手段也只可以屠杀人口但是难以征服人心,文天祥的人心道德力量是当时中华公信力的集中体现。而现在不要说经济、金融、货币等手段,当今的媒体、网络等都可以攻击一个国家的公信力,攻击一个国家公信力的战略具备了多重战术手段,因而公信力战争是一个总体战,在全球融合的大背景和信息革命的浪潮下,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摧毁一个国家的信用成为新的战争手段。在信用元规则支配下,人类战争法则也将发生深刻变化。

第七章　信用战下的军事新思维

一、为什么空军可以打赢整个战争

虽然早在二战当中空军就已经成为战争胜利绝对重要的因素，但是一直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不能单靠空军打赢一场战争，因为要占领敌方的领土和控制敌方的国家，是离不开陆军的。然而这个定律在海湾战争的时候发生了改变，到科索沃战争就基本上是完全依靠空军来制胜了，这种战争形式的变化与世界信用体系的发展是离不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间战争的情况有很大的变化，世界的战争模式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国家间的战争不再以取得对方的领土为主要战争目的，取而代之的是在战败国建立新秩序，这个秩序有利于战胜国的金融资本掠夺战败国的财富和资源，这种掠夺的方式就是一个资本运营的方式。占领领土这样高昂的战争方式已经不存在了。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巴拿马和格林纳达等战争中，美国更多的是建立秩序，这个秩序就是一个被美国所控制和主宰的信用体系，其后科索沃战争的空军制胜更是如此，只要信用体系的秩序建立了，美国就撤军，只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由于恐怖主义的力量，美国希望的新秩序迟迟不能独立稳定运行，让美国陷入了泥潭。

在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发起的系列战争中，美国更多是依靠空军制胜，在传统的战争理论中空军是不能单独打赢战争的，但是现在能够做到，原因是现代社会中的信用系统高度发达，这种发达的背后就是脆弱容易受到打击。例如城市体系的薄弱，一个大型城市如果运输供应被切断，如没有了水、电、煤气、粮食、清洁等的支持，连做饭、喝水、上厕所都会有问题，根本不能生活。就在几十年前，城市还不是这样的情况，古代的城市更加不同，因此美军在科索沃可以仅仅凭借空袭就达到最终的胜利。

在信用体系越来越发达的时期，当今的城市分秒离不开市政等各种信用体系

的支持,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交通、供应、物流成为城市的生命线,城市的日常运转是高度集中化和金融化的,这集中化和金融化就是国家和城市的信用体系。因此,空军的打击完全可以让一个城市瘫痪,以前筑城坚守的战争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旦遭到强力的空中打击,城市人口根本无法生存,而由于现代城市的人口规模太过庞大,也无法有效疏散。空军的打击实际上是打击的敌方信用体系。

占领性战争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打的是控制性战争:控制关键的战略节点!控制关键战略节点的战争可以是多角度、全方位的,战争的打法也是多元化的,除货币战、金融战、信息战并举外,在地缘政治上合纵连横并且用代理人战争、错位战争打你的油路、商路、原料路等,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信用大博弈。对于军事力量打控制性战争,最好的手段就是空军和空中打击,不用大规模的陆军占领,而使用经济金融手段的战争就是货币战争,而所有这些战争打的都是信用。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今天劳动生产中的分工越来越精细,劳动分工的发展极大提高了生产率和科技,但是也使得个体所掌握的技术越来越单一,离开了其所处的工作环境,个体的劳动者就什么也不是。因此通过战争把原有的生产组织和程序打乱,那么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就成为没有任何劳动能力的人,社会的生产能力、文化、技术等等就会极大地倒退,就如现代城市人有几个会种粮食?如果城市被破坏,自己都不会给自己种粮食让自己吃饱,完全没有生存能力!分工的背后就是维系这样的分工和分配运转的信用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强力的空军破坏维持社会分工、分配和经济运转的信用体系,可以使得社会的生产分工和组织环节混乱,经济大倒退。没有了经济基础,战争肯定是失败。

所以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运行体制远远比历史上自给自足的时期要脆弱得多,一旦破坏了一个国家的信用体系,这个国家就只有投降,所以当今的制空权战争模式,已经不是在战场上作为交战双方的压制力量,更多的是发挥破坏敌国信用体系,打击敌方经济基础的作用。而信用体系维系的经济基础是战争的根本,依靠制空权能够单独打赢战争的实质,就是在当今的城市经济模式下,仅仅依靠空军就可以破坏整个国家的信用系统造成经济基础崩溃,让老百姓吃饭都出问题,让社会退回石器时代,变成原始社会的信用体系。

二、信用战的眼光看中东巨变

从 2011 年初期开始的中东巨变,对于未来的历史发展有深刻的影响,这样的变

故本身就是一个新形式的战争，这是与传统军事战争不同的思维。

在网络突飞猛进的时代，这样的战争就是通过网络攻击一个国家的公信力，使得国家的公信力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以后，国民对于政府丧失认同，人民对于自己的前途绝望而渴望变革。这种攻击是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灵最柔软的地方，激发其心底的力量。在网络的作用之下，突尼斯小贩之死引发的“茉莉花革命”，推翻了突尼斯的政权。示威浪潮随即蔓延至埃及、约旦等多个中东国家。埃及连日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游行，要求总统穆巴拉克立刻下台。随着中东革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仍在持续，昔日强人如穆巴拉克、卡扎菲等人接踵从神坛滚落人间，比赛着谁更惨。

也门总统萨利赫最终签署了交权协议，换取体面下台。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继续演绎革命激情，解放广场的示威者连续以百万计，埃及人民声势浩大地举起反旗，誓要逼退军政府。所有这些都离不开网络的推波助澜和政府公信力的丧失。这样的攻击国家公信力的做法，就是一场信用战争，这个信用战争的主体可以是多个层面发起的，包括人民的暴动也可以通过信用战的形式来完成。正如英国《金融时报》在英国骚乱的时候总结所称：“这次骚乱恰恰证明了，网络是同街道一样的公共空间。如同街道会被匪徒洗劫，网络也会被不怀好意者侵袭。”在“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是评论员”的环境中，现代的网络既提供了海量信息、多元表达，也容易使有害信息泛滥、不良情绪传染；既为个人生活提供了各项便利，也对个人隐私造成威胁；既可能是真相的爆料者，也可能是谣言的传播者。这就是网络信用战的强大之处，也是其防不胜防的地方。

在网络的公信力攻击下，中东革命有可能彻底打乱世界发展的节奏，深刻改变半个多世纪积累下来的世界利益格局。它带来的后果无论是不是红利，都不会在世界上平均分配。中东革命的影响必将在全球化时代被放大，而很多国家未必有能力迅速看透并消化这些影响。在信用战的模式下，宗教势力是最容易渗透到其中的，比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可能在中东抬头，它对外部大国的风险有多大呢？它是一场宗教力量在背后以平民为主体的社会底层要求民主、平等与均富的革命。其锋芒以针对只求暴富不顾民生、实行独裁压制民权的有产者与统治者为名，实际上是颠覆上世纪中叶阿拉伯独立以来所建立的世俗政府，恢复到由宗教势力主导的政府上去的过程。从这种愿望和要求出发，普通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伸张民权与平均分配的政治制度，但是实际的情况会事与愿违，埃及在革命后持续的动荡就很说明问题了。这场革命是内向的，而不是外向的。

我们在中东剧变的主导舆论当中特别注意到，在中东阿拉伯世界整个斗争发

展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强烈反对美国与西方的呼声,或者表现出任何想要以阿拉伯革命来消灭基督教以色列的强烈敌对情绪,这与西方控制了网络是密切相关的,网络的搜索引擎和主要网站都是控制在西方人之手的,关于西方不利的言论是很容易被网络屏蔽的,因为网站的管理者和网络的域名解释服务者想要屏蔽不良信息是非常容易的,而没有这些网络优势的国家则必须要依靠实名制和"绿坝"类似的客户端软件才可以,双方的力量是不对等的;而且对付网络攻击如果中国屏蔽网络则世界一片哗然,中东的巨变当中网络始终在推波助澜,而西方如果有类似的事情怎么样呢?这次英国骚乱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国首相卡梅伦关于网络管理的言论。摘录如下:——"政府有关部门决定屏蔽 twitter 和 facebook 网站,因为这些网站起了很坏的作用";"在骚乱时关闭社交网站禁发手机短信";"警方已宣布,正在监控推特等社交媒体,鼓动骚乱者将被逮捕";"如果有人利用社交网络制造暴力,我们需要阻止他们。所以,我们正与警方、情报部门和业界合作,研究是否应当在我们知道有人策划暴力、骚乱和犯罪时,阻止他们通过这些社交网站和服务串联。";"此次骚乱的发生和蔓延与一些年轻人热衷模仿暴力游戏并利用微博、社交网站和拥有免费加密通信功能的黑莓手机互通声气有很大关联"等等。显然,这与之前卡梅伦鼓吹的"我们要保持网络信息的自由流动,不论我们对(网贴)内容的态度是什么"迥然不同。换句话说,这次意料之外的英国骚乱,让卡梅伦忘了以前面对其他国家加强网络管理时所做的表态,不再抱着"绝对的网络自由"不放,改口也要加强英国网络管理。但是对于阿拉伯的巨变他们可不允许对于网络做任何的限制,以网络的攻击加速了阿拉伯原有政权的垮台,这里西方完全是双重标准,而且对于这个双重标准进行了军事保障。

在中东巨变的重头戏利比亚战争当中,网络的公信力攻击培养了利比亚的反对派、激化了利比亚国内的矛盾,利比亚乱了,成了全球瞩目的热点,不仅仅是因为国家内乱,还因为有众多列强参与杀戮,这场游戏还披着联合国授权的"合法"外衣——保护平民,可最受害的也是平民。但是利比亚的领导人卡扎菲还是有很多人支持,有英国媒体援引利比亚通讯社的最新消息,利比亚政府已经开始向全国超过 100 万人分发武器。报道援引利国防部官员的话说这项工作预计在数小时内完成,"有望武装全国超过 100 万的男人和女人"。卡扎菲敢于给利比亚六分之一的人民发武器,说明卡扎菲在利比亚有强大的民意支持。西方列强打着民主自由、保卫利比亚人民的旗号发动侵略战争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更何况利比亚的反对派当中成分很复杂,甚至还有原教旨主义者和恐怖分子的影子。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策的转向，美国纵容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背后，是降低自身的恐怖袭击压力，同时将中东问题从阿以矛盾转化为穆斯林的教派矛盾，届时中东穆斯林各个教派都要对美国人马首是瞻，美国可以控制中东石油的同时，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也是中俄内部分裂势力的来源。尤其是对于利比亚，各种公开宣称的战争理由难以服众，石油战争说也就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利比亚460亿桶的石油储备和邻近地中海控制欧洲能源通道的重要地位是西方国家军事干预的动机。美国在战争当中取得了对于石油更大的控制权，欧洲则对于其摇摇欲坠的欧元信誉，必须及时的捆绑上石油的砝码，因此利比亚战争是欧洲的英法比美国更积极，背后就是欧洲对于石油资源控制的迫切，利比亚的石油可以在地中海直接运往欧洲，运输通道也很关键。

所以这个中东革命不是伊朗式的“伊斯兰革命”。自从1979年伊朗激进伊斯兰教派推翻巴列维王朝，实行“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内外政策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国内以神权取代政权，以教士取代教师，对妇女实行歧视，对舆论加以钳制；对外则以美国和以色列为天敌，誓言要消灭以色列作为国家的存在，企图彻底改变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尽管伊朗宣称埃及与中东的动乱和革命是伊朗式的革命，但并没得到事实的印证。

由于资源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中东北非地区阿拉伯国家，即使像埃及那样的地区大国，也存在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困难，每年仰赖于美国的大量援助来支撑财政开支。这种因素，实际上制约了中东地区是否应该像伊朗那样奉行极端反美政策的一个取向。美国强势压制伊朗和叙利亚的背后，就是要主导中东革命后的局势走向，使得革命的结果变成革命成功的各派必然要更加投靠美国，没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就没有新统治者的统治权！但是这个行为是很隐秘的，原来的阿拉伯亲美政府被抛弃的背后就是这些未来的新领导人要更加紧密地投靠美国等西方国家。美国在中东的石油信用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三、信用战下恐怖主义的战略

“9·11”事件以后，国际的战争更多是出于反恐的需要，而恐怖主义的盛行，也是有背后的利益博弈的体现。20世纪以后恐怖主义的盛行也要从利益上分析。以恐怖的手段达到政治目的，我们从贬义上讲是恐怖主义，但是从另外的角度和手段上看，也可以叫做游击战，绝大多数的恐怖组织都自称为某某游击队。恐怖主义的

攻击战略实际上就是造成恐慌,在恐慌下攻击一个国家或者实体的信用。

恐怖主义能够实行,首先的背景就是屠城不存在了,过去对恐怖主义活动的地区进行屠杀是遏制恐怖主义反抗的最有效手段,比如成吉思汗采取反抗就屠城的做法,使得很少的蒙古人可以统治广袤的地区,否则在恐怖攻击下需要维护治安的军队是承受不了的。而中国古代还实行更残酷的以恐怖对恐怖的方法,这就是种种公开的凌迟等恐怖死刑和株连!现代社会关注平民伤亡、保护平民利益,所有人都不担心被屠城也不担心被残酷处死株连家人,这种情况下恐怖主义的民众土壤就诞生了。这是一个国家强权的合法暴力与恐怖主义暴力的差别变化造成的,这个差别本身也是一种信用上的差别。

其二,我们发现很多恐怖组织都有宗教背景或者类似宗教的泛宗教背景,比如:原教旨主义、宗教与教派差异、邪教、极端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等。因为没有宗教的精神力量支持,一般人是不会置生死于不顾从事恐怖事业的,仅仅依靠金钱收买是形不成恐怖主义力量的。而宗教的根本就是人们的信仰信用,没有人相信的宗教是生存不了的,恐怖主义背后有宗教的支持,同时恐怖主义也维护支持它的宗教的信用。

恐怖主义实际上也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很多实行恐怖主义的组织被招安成为合法组织甚至还执政,在很多国家的独立过程中恐怖组织也起到了重大作用,只是他们成功以后就叫做什么游击队、什么解放阵线了,不会有恐怖组织的帽子,但这事实上就是一种成王败寇的游戏,提法的不同,也是他们信用地位变化的结果。

通过恐怖袭击破坏信用体系增加国家财政经济的压力是恐怖主义的战略方针,国家在这种压力下有可能向恐怖主义妥协;同时金融资本需要和平的环境,恐怖主义威胁金融资本的和平土壤,因此金融资本也有向恐怖主义妥协的空间;而恐怖主义本身就是不同宗教或者教派博弈的手段,其中有宗教力量的影响。在金融资本、宗教和国家的博弈中,在这博弈构架社会的信用体系中,恐怖组织找到了利益空间和生存空间。

世界上对于恐怖主义妥协的例子是很多的,非洲很多国家的独立就是这样的背景,不能只看到各种关于非洲战乱不断的宣传,也要认识到这是恐怖主义的战略,如果不造成这样的混乱,把原来的殖民者的信用体系打乱,西方的势力不会退出这个国家而让其独立。西方让这些国家独立恢复秩序,背后就是金融资本的需要,而这些恐怖源的消除,本身也是西方民众的需要,这些民众的思想受宗教的影响,但他们是宗教的基础也是民主国家的权利来源。

因此恐怖主义是有空间的。团体组织不同于个人的疯狂，团体是非常理智的，对于没有希望成功的事情，除了狂热极端分子是没有团体组织愿意献身奋斗的，因此恐怖主义背后的恐怖组织有非常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有明确的攻击信用体系的战略。而在国际霸权主义无限膨胀的情况下，就催生出国际恐怖主义的怪胎。不论是霸权主义还是恐怖主义，都是人类文明的恶之花，都是需要加以坚决反对和谴责的。只不过国际恐怖主义实际上是在无法以传统军事手段对抗国际霸权主义的情况下，以恐怖袭击的方式攻击敌方信用体系的一场信用战争。恐怖袭击是一种信用战的方式。实际上西方强国也搞类似的恐怖活动，例如西方对于敌对国家首脑的斩首行动，这样的特种兵军事打击，与恐怖袭击的行为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强势话语权下的褒贬不同和名称不同而已。

四、核时代下的战争地图

1. 从朝核危机看核捆绑与全球毁灭的战略制衡

朝鲜也有核武器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对朝鲜的核武器很多中国人不觉得害怕，因为国人都认为我们与朝鲜有鲜血凝结的友谊，朝鲜有核武器能够站出来对抗美国，中国的压力就会小了很多，但是这样的想法是非常一厢情愿的，在核捆绑战略的今天，这样的思维是一种幼稚的想法。

我们这个世界的核战略，首先是核报复战略，也就是你打我我必定毁灭你；其次是核威慑，即以自身核力量给对手足够的威胁压力，现在已经达到了全球毁灭和核捆绑战略了，这样的核捆绑战略是核武器俱乐部中弱者的战略，而全球毁灭战略是核武器俱乐部中强者的战略，但是这样的战略却让最强者也不寒而栗。

所谓的“核捆绑”学说：就是核力量相对弱小的国家，将某个具有更强核能力的国家捆绑于自己的战车上。其目的是防止一个核战力强于己方、而己方难以打击的第三方对自己发起核攻击。

而全球毁灭的核战略就是美国或者俄国在遭受核打击以后，不可能只报复打击你的对手，这样的结果是让其他国家渔翁得利，仅仅是交战双方成为废墟是不成的，所以在这样的打击下，美国或者俄国一定要把全球其他国家也一起打烂，让大家一起回到石器时代。

为什么能肯定“核捆绑”战略可以引发世界大战呢？这基于如下原因：①美国和俄国的终极核战略都是“全球毁灭”战略；②核大国建有自动化核反击体系——

"死手系统",即在首脑指挥机关被消灭的情况下,可自动打击预先设置好的打击目标。对于"核捆绑"战略的基本构想是:以美国、俄国等核武器超级大国为主要防范对象,通过以核武捆绑另外的核超级大国以及英法等有核国家的方式,阻止对美国或者俄国对某国可能发动的核进攻。一旦美国或者俄国对某国发动全面核进攻,某国将集中核武对另外的核超级大国以及英法等有核国家发起攻击,并以此引发全面核大战使整个世界都退回到石器时代。

在这里中国也可能被别国核捆绑,就如中国可以对俄国等国家实行"核捆绑"政策对付美国一样,别的国家或地区也可以对中国实行"核捆绑"。比如日本、韩国、朝鲜、越南、巴基斯坦、印度等等,若他们拥有核武器之后也可以对中国实行"核捆绑",以此来防范其他国对它的核打击。

在核捆绑战略下实际上是只要小国有了核武器,就等于有了护身符,而核大国的核能力,早就可以毁灭地球很多次了,只要核战争开打,或者常规战争威胁了核国家的生存,结果就是全球的毁灭,在全球毁灭的情况下任何国家的条约、结盟和承诺都会是非常苍白的。所以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的传统战争越来越局限于无核国家的局部战争和反恐战争,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越来越多的小国也有了核武器,甚至恐怖组织也有了核武器的时候,想要依靠过去的战争解决问题的基础就不存在了,战争思维就要改变。这是一种核战略的全球制衡关系!

2. 日本地震核电事故的核攻击新思维

日本地震了,地震引发的海啸造成了日本东电的核事故,事故给世界造成巨大的影响,中国因为这个事故对于核电站的战略发展规划重新开始思考了,原来推崇核电的欧洲开始讨论关闭核电站了,整个核电事故大家都不说的就是这次事件带来了核攻击的新思维。

日本的核电站在看似绝对安全的情况下被地震破坏的事实证明它是非常脆弱的,而核电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是超过前苏联当年的核事故的,但是日本对于核电事故的真相进行了隐瞒,日本众议院科学技术革新委员会出于"彻底查明事故原因的需要",要求东电提交相关资料。该委员会于2011年9月12日透露,东电应要求提交的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发生严重事故时的《事故后处理报告》仅有封面和目录3页,且被大幅涂黑。日本这样的"民主社会",公众力量强大的情况下还这样隐瞒事故,背后就是事故的严重程度肯定超过了外界的想象,日本的事故到底有多严重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参照一下当年的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日本的事故影响在正常的情况下是要超过前苏联核事故的。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前苏联时期在乌克兰境内修建的第一座核电站。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可靠的核电站。但1986年4月26日，核电站的第4号核反应堆在进行半烘烤实验中突然发生失火，引起爆炸，据估算，核泄漏事故后产生的放射污染相当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产生的放射污染的100倍。爆炸使机组被完全损坏，8吨多强辐射物质泄露，尘埃随风飘散，致使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许多地区遭到核辐射的污染。辐射危害严重，导致事故后前3个月内有31人死亡，之后15年内有6~8万人死亡，13.4万人遭受各种程度的辐射疾病折磨，方圆30公里地区的11.5万多民众被迫疏散。1986年事故发生后，苏联政府为建造水泥石棺封闭事故反应堆，花费了180亿卢布，在那石棺下面就是当年爆炸后的反应堆，数十万吨的放射性核物质被封存在那里。而在当时卢布和美元的价值相当。如今将近25年过去了，经过最新的考察，石棺已经出现了多条裂缝，并且整体结构已经不那么坚固，甚至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而现在的乌克兰政府似乎也没有财力和技术实力来解决这一问题，因此乌克兰政府决定在2011年的夏天，趁切尔诺贝利事故25周年之际召开一个专门的论坛，邀请世界各国代表参加，共商修建新的石棺，以继续维持切尔诺贝利，乃至整个欧洲、整个世界的安全。

日本的情况比前苏联问题大太多了，因为日本是土地狭小的国家，前苏联有广袤的土地可以作为无人区，日本是不可以的，势必有大量的人口要在核危机当中不正常的死亡，这些威胁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更关键的是前苏联当初是依靠大量的人力投入来应对危机的，参与的人群以万人计算，而日本呢？因为已经被西方宣传下高度的个人自由化了，谁会冒生命危险进入核事故现场？日本好不容易的才找到了50个人，而这一点人只不过能够进入现场关一下电源而已，根本难以处理。西方现在是不会有人为集体的利益自愿牺牲的，美国为首的西方战争之所以能够现在畅通无阻，就是每一次战争死亡的人数寥寥可数，如果阵亡的人数增长一些，就必定要发生反战情绪，如果有越战那样的伤亡，社会的信用体系就要崩溃了，没有多少人会冒这样的生命危险来干事。

当今世界的恐怖主义者拥有核武器不容易，因为核技术控制得严密，核原料控制得更严密，就算是这些难关都通过了以后把核弹制造出来，你要打到他国的运载工具洲际导弹的研制是比研制核弹更困难的事情，因此真正的核攻击的门槛是非常高的，世界上一般的小国是难以做到的。但现在全球都看到了，一次核电站的事故对于他国的伤害超过一次核弹的爆炸，攻击核电站只要常规武器就可以完成了，甚至一般的恐怖袭击也可以做到，比“9·11”的飞机撞大楼要简单，因此核电站的

风险凸现了,攻击对方的核电站成为新的核攻击的方式了。

各国核设施的地点很多是处在发达地区的,这样的核攻击给对方巨大的心理压力,这样的压力威胁国家的信用,这也暗符恐怖主义的核心战略了,这样的核攻击压力本身就是一场信用战,打击的是大家对于安全的信心。

3. 核恐惧下有核国家成为传统军事的禁区

只要发生核大战,大量的伤亡就不可避免,而在核捆绑下谁都有可能被核捆绑战略绑架,因为被绑架而受到攻击,再在全球毁灭核战略下,地球会被毁灭的,人类已经拥有毁灭地球很多次的核武器了,在世界对于核的恐惧下,谁敢挑起核战争呢?

而以传统军事方式打击一个国家,且该国拥有核武器,则该国被攻击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核战就不可避免了,这样战争的结果就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成为胜利者,而在核捆绑和全球毁灭战略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成为旁观者,甚至是中立者都是不行的,就如伊拉克的萨达姆被打急眼了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一样。

由于传统军事战争的最终结果是核战和毁灭,这样的战争就没有人会去打了,有核国家就成为传统战争的禁区,而通过网络、信息、金融等手段,进行信用攻击,达到瓦解这个国家的目的,就会成为唯一的选择。而这一新型战争方式,在2011年的中东剧变当中,已经取得了非常丰厚的战果。现代的战争区别于传统军事战争在核战的威慑下发生了突变,信用战为主的战争方式成为主流,信用战也是一个总体战,与传统战争的海陆空一样,在信心、公信力、金融、网络、信息等多个层面都可以发起攻击。信用元规则之战,在不同时代条件下,会变化出截然不同的多种外在表现形式。这需要时代的观察者们长出一双火眼金睛,从纷繁复杂的乱象当中一眼看到事物亘古不变的本质。

第八章 当今时代：看清世界格局

一、基金会——各种势力的载体

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大量的基金会，这些基金会大多以各类研究、公共服务、慈善活动为目标而运作，这些基金会掌握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和经济力量，影响无所不在。在这里著者要说明的是这些基金会是西方各种势力博弈的经济载体，如果说贵族小集团作为载体还是一个模糊的维系，那么基金会作为各种势力的载体，就是一个极其紧密的、由法律、经济和国家武力保障的核心机构了。

报端时常可以看到西方的顶级富豪把财产全部捐献给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云云，他们将资产捐给基金会而不留给子孙的行为，曾经让国内很多人称赞不已。后来有人提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逃避遗产税，西方的遗产税是非常高昂的，可以超过遗产数额的一半。当然避税的说法实际上也只是说到了一点皮毛，避税只是基金会的一项功能。我们知道捐赠是可以免税的，而富豪所捐赠的都不是现金，而是他们持有的股份等实物资产，这些资产变现要缴纳高额的所得税，比如当初设立公司可能只投资了10万美元，现在股票价值10亿美元，一旦股票变现，所得收入基本都要大额纳税，而这些资产转入基金会却是免税，避税利益经常超过各种慈善的支出。

对于各类基金会，核心问题是基金会的所有者是谁呢？在西方私有制社会，基金会的所有权不属于国家，还是在私人手里，虽然很多基金会名义上是属于全社会所有的，但是基金会章程等是保密的，基金会实际的所有人就是在基金会担任实际职务的人，基金会所有人的产生过程有秘密的程序不为外界所知，外人也没法参与。富豪捐助基金会的实际结果是基金会掌握在这些富豪的后代手里，而避税只是最直接表面的好处，核心利益不在这里，而在于保持家族的长久控制。历史上耳熟能详的著名富豪们，都留下了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基金会。

如果将巨额财富直接留作遗产，继承人怎样处置遗产难以干涉和限制，而且继

承人经常有纨绔子弟把财产败光,子孙越多导致家族财产被分割的越分散,最后家族的竞争力极大下降。设立基金会及其运作规则,一方面限制了后代对于遗产的使用,使得他们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另一方面也相当于建立了一个家族公社,后代的各项花销可以在基金会名下支付,给子孙们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而所有子孙的社会影响力也给基金会的势力添砖加瓦,基金会还可以聘请最好的职业经理人操盘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因此基金会这样的机构就是把家族的利益长久凝聚在一起,看似为了公益事业实际上巩固保持了家族利益,使得西方的富豪家族势力突破中国富不过五代的瓶颈,家族的财富不会被分散,而且家族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围绕这个基金会发挥自己的力量,使得西方的贵族家族可以有长期的影响力。

基金会的规则是保密的,资产数量也是保密的,基金会对外公布的资产数量一般都被低估了很多,因为基金会大量的资产是以取得成本记账的,比如基金会拥有的大量文物和艺术品等在当今拍卖市场上都是价值连城,可是这些文物和艺术品等当年都是以很低廉的价格获得的,在账面上计算的价值很低,而对于各种公司、产业的投资也是如此处理的。因此这些家族基金会的实力从来不公开,我们在富豪榜上所见到的富豪们,相对于这些势力只能算是小小的"暴发户",金融危机就是真正主宰世界的强大势力对暴发户"剪羊毛"。我们都知道,各种金融、经济的博弈都是"零和博弈",有一方输了就有一方赚,在金融危机中大家都亏损,是谁赚取了大家损失的财富呢?就是这些保密的基金会。

基金会不是上市公司,其资产和经营行为本身不需要对公众说明;西方保护个人隐私的规则,也保护了基金会的幕后秘密规则。西方的媒体虽然是有言论自由,但是这样的"言论自由"是西方的势力集团制定的,西方媒体没有侵犯他们"隐私"的权利,西方的言论自由是建立在不得侵犯公民隐私和商业秘密的基础上,各类基金会的运作就属于"隐私"和"商业秘密"。

西方社会通过遗产税调节社会财富只是一个美好的童话,西方富豪们捐献所有资产用于慈善和服务百姓也是一个美好的童话。试想在一个移民非常方便的社会,如果对于富豪们的遗产税收掠夺过重,还有谁会在这样的国家投资和定居,如果真是那样肯定会资本外逃,特别是移民国家,往往还会有优惠政策来吸引新移民,吸引外来富豪移民是他们立国的国策!西方遗产税政策的真实目的,是通过制定规则要西方富豪们都建立基金会这样的机构,这些机构在本国设立,受到本国的管辖和控制,而设立他的富豪死后,基金会很多规则是不可更改的,也不可能再迁往国外;这些机构只要在国内,就是该国的财富,成为国家富强的经济基础。一方

面,富豪在该国建立自己家族的基金会,需要这个国家的强大;另一方面,国家以法律和规则保障富豪的资产和子孙,也是富豪们需要的。这样一来,富豪们的财富受国家的保护,反之他们也要影响国家的政权和维护国家的长期强势,这是一个追求共赢的博弈。

在西方国家,“以捐抵税”是一项基本政策。各个基金会捐款、筹款用于各类公益事业,不但分担了政府的工作,管理成本也比政府小。同时这样的做法,也让各种势力参与到国内政治中来,基金会从事慈善行为也是西方各种势力博弈政治资本的游戏规则之一,西方的基金会通过慈善渗透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各个方面,影响了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决定了民主选举的方向和规则,把势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西方,不仅仅是富豪热衷于设立基金会,政党也设立各类基金会作为政党的经济来源和重要实体,各个政治领袖也利用个人政治魅力,建立自已的基金会,因此形成来源于政治贵族和利益集团的各种带有政治倾向的基金会;西方宗教组织更是号召教众奉献资产支持教会的慈善基金会,这是宗教以其精神影响力合法占有教徒财产的方式,也是宗教活动的经济来源和宗教影响力的经济基础。总而言之,决定西方社会的各方博弈力量都建立了代表自己利益的基金会等经济博弈实体,掌握经济力量,各种势力就找到了一个在民主竞选中政治博弈平台之外的一个经济博弈的平台。基金会作为一种平台,还促进了西方各种博弈规则的公平建立,因为金融资本、政客集团和宗教的经济命脉都在同样的金融、资本市场上同台竞技,他们的势力彼此限制对方的阴谋和罪恶,维持了博弈的公平和市场的竞争,让当今社会走向光明。

操纵基金会的贵族家族之间也是广泛的联姻和联盟,使得各个历史贵族、富豪所建立的基金会之间紧密联系,成为一个决定世界的群体,也就是幕后决定世界的小集团,他们与政治精英、宗教领袖等也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而且西方世界这样的幕后群体是跨越国界的,东方的新兴国家如果没有人能够进入这个圈子,实际上就没有真正融入西方的世界,与他们永远是隔着一道玻璃天花板的。当今中国的崛起不在他们的规则之内,所以他们要一致遏制,这个世界是以财富决定为基础,一切都是为了利益在博弈。

所以对于西方的各个基金会,我们不但要知道其在西方世界的强大经济实力,也要认识到与他们捆绑的各种政治势力和人群的力量,他们是各种势力博弈的一个经济平台,每一个强大的基金会背后均有真正影响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强大势力,

基金会是金融资本、政客集团和宗教的经济载体,承载了金融资本、主权国家和宗教势力等多方面的博弈,是这个世界幕后决定体系的载体之一。

背景资料:胡佛研究所和基金会

胡佛研究所创办于1919年,最早称作"胡佛战争图书馆"。1938年,为了真实反映该图书馆不断扩大的文献与藏书量,更名为"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图书馆"。1956年改为现名。创立人是后来任美国第31届总统的赫伯特·克拉克·胡佛。胡佛在一战后,为他和妻子的母校斯坦福大学捐赠了50万美元,请该大学协助贮藏历史资料。斯坦福大学派出的历史资料收集小组,在胡佛的带领下,开始跨越欧洲搜集与战争相关的材料。当时的斯坦福大学校长威尔伯十分赞赏胡佛的搜集历史文献的能力,他说"胡佛是历史的硕鼠,每留下一吨粮食,他就拿走一磅历史材料"。

胡佛研究所的背后是胡佛基金会,其影响力除了当过美国总统的老胡佛和执掌美国中央情报局多年的小胡佛以外,与世界各个著名的基金会的紧密联系也是一个关键。1927年,胡佛还在劳拉斯·佩曼·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创立了其他几个领域的研究所,包括:德国革命研究所、俄国革命研究所。在二战以后,依靠胡佛最初的启动资金以及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等美国及世界知名财团、基金会的慷慨资助,成立了胡佛基金会,建立了数以百计的研究所、世界事务委员会、外交政策学会。这些研究机构提供了美国几乎所有的政策的导向性研究依据,而这些机构的被世界的金融资本所资助,由政治贵族家族所创建,其研究结论的利益倾向性是非常清楚的,这也是幕后力量主导世界的重要方式,成为各种势力博弈的载体之一。

胡佛基金会对于世界的了解是让人难以想象的,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胡佛基金会却以美元为诱饵与俄罗斯国家档案委员会签订了一项西方传媒中闻所未闻的缩微拍照前苏联秘密档案的协定。胡佛基金会自称其宗旨是研究"战争、革命、和平"问题。这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借口,其实是研究如何攻击和战胜社会主义的问题,创办人当时说的一句令其部下至今恪守不忘的话就是:"了解敌人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以服务金融资本和西方政治利益为己任的胡佛基金会于1992年与俄罗斯国家档案委员会主席鲁道夫签订了缩微拍照苏共近几十年秘密档案的协定。价格为

2500万页付300万美元。协议有效期从1992年至2000年。根据协议,1993年伊始,胡佛基金会便将缩微拍照设备搬进了俄罗斯现代历史文件保管和研究中心,雇用了五名莫斯科技术人员以每天5000张底片的速度进行拍照。摄入底片的内容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历史文件、1917－1953年苏共历次代表大会文件、第三国际文件、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1956年)的文件、欧洲各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档案材料等等。其中许多内容是一直保存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绝密档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与德国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会见并签署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时的照片、前苏联当年在古巴布置导弹的详图等。(《参考文摘》1996年第7期)

2005年2月,蒋家与胡佛共同宣布,同意将两蒋日记暂存胡佛50年,并逐年公开蒋介石日记。目前,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档案几乎尽被胡佛收入囊中,2007年11月29日的《南方周末》做了一个与档案密切相关的专题.“蒋宋孔陈四大文档先后入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最为瞩目的蒋介石日记已开放到1945年”,从2004年4月,胡佛研究院打开处于保密状态中的宋子文的19个私人文件箱,到2005年2月16日,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的私人日记转交至胡佛档案馆暂存50年,并且为2006年3月31日胡佛研究院档案馆正式开放的第一批档案:同年8月胡佛研究院又得到孔祥熙的全部档案资料,共计133箱,计划于2008年春天对外开放.其实为什么中国的四大家族愿意把档案放到美国的胡佛基金,还有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所说的“四大家族”的财产哪里去了?虽然在内战中他们的资产损失巨大,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剩下的资产还是很多的,这些资产也是交给基金会进行管理的,没有利益渊源是不会把家族秘密交给人家的,由此可见美国的这些实力基金会对于中国的渗透远不是老百姓所想象的,而且这些基金会以其政治力量,以人权为借口,对于发展中国家也会成为各种贪污腐败和黑钱的庇护所。

由此可以看到胡佛研究所对于中国、俄罗斯等国的了解和研究是让人可怕的,即使是公开的档案,谁也无法证明是否为了利益的需要被节选、断章取义或者篡改,由此可以看到这样的基金会的力量的强大,胡佛基金和胡佛研究所对于中国的了解比中国人还要清楚深刻,我们的决策如何能够赶超世界?

二、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全球信用体系

1. 美国二战后第一目标不是前苏联

对于二战后的世界格局,普遍认为是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对抗,因为美苏因对抗而产生了北约和华约两大世界军事集团,他们的竞争产生了我们所说的冷战。

但是著者经过思考后认为,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世界上的政客们出于自身的各种需要,给全球人民进行的一次大洗脑,世界的格局远远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我们要对世界的格局有更深入的认识才对。二战后美国的核心战略是美元的全球信用,这个信用的取得首先是要打击英镑信用并取得资源控制权,这和战略目标肯定是放在与前苏联争霸的前面,只有取得这个信用美国才真正统治了西方世界,才有与苏联对抗的资本。

我们要看清事情的原委,需要从结果的受益和受损中寻找答案,就如《基督山伯爵》里面所说的,要从谁获益来进行分析,一个国家的行为一定是经过精密策划才实施的,不理智和无利益的行为除了独裁者的一时冲动外,在现代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就要看美苏对立的表面之后各自的利益究竟在哪里。

前苏联霸权是陆地霸权,而且苏联在欧洲直接的压力对象是德、法,美国全球争霸也是无利不起早,在这些二战的战胜者之中,我们主要要看的就是实力的变化。美国是发战争财的,当然得利,前苏联被战争侵略,战火燃遍前苏联的欧洲地区,战胜后会比以前强大很多吗?而其他欧洲国家呢?这里我们尤其要注意到大英帝国的衰落。

我们再想一下,如果大英帝国还是日不落帝国,现在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整个阿拉伯地区、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南非等国家和地区都是英国的领土,今天美国还能成为世界霸主吗?中东的石油、非洲和澳洲的矿产,都被英国控制,美国怎么发展?战后美国不到5%的人口消耗世界45%的能源,不控制中东的石油可能吗?

所以战后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国与英国的帝国主义争霸,前苏联是西方世界共同的敌人,对于资本家的游戏规则是一个根本威胁,但是前苏联的实力是被严重夸大了的,因为前苏联的国力不可能比二战前强大,而英国是美国的盟国,美国不可能直接把英国作为自己的对手,但是如果战后英国恢复了国力,对于美国才是真正的噩梦。

美国削弱英国的主要战略就是策动英国的殖民地独立,采取的手段是冠冕堂

皇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推动殖民地独立的背景还在于美国没有什么殖民地,因为美国在200多年前才取得了独立,独立后逐步扩张领土增加了数倍,在世界大战前一直是一个美洲的区域强国,美国发展起来后世界的殖民地已经被欧洲列强瓜分完毕,因此美国需要的是新的殖民方式。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要独立本来是需要独立战争的,要经过充分的武装斗争才有可能实现,结果在美国的强大军事压力下,殖民地独立变成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用脚后跟想想仅仅靠"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能够让一个数亿人口的大国独立吗?

美国为了彻底削弱英国,实际上是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在允许列强殖民地独立后又建立一个新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过美元与黄金挂钩,把世界的贸易货币从传统的金银变成了美元,美元成为世界的主导。世界被美元这个货币统一,在美元世界形成统一的金融体系,保证了美国位于世界的金字塔尖上。

对于美元的货币世界化,最需要的就是更多的殖民地独立,国家越多,国际贸易就越多,结算也就越依赖国际货币。而拥有众多殖民地的大帝国是没有太多的国际贸易的,基本是宗主国与殖民地的贸易,以本国货币结算。所以美国就是促使更多的国家独立,在此政策下英帝国被肢解,所谓的英联邦国家就和后来苏联解体的独联体国家一样,日不落帝国名存实亡了。而现在美国也是在不停地促使各个地区独立成为国家,理由是各种冠冕堂皇的民族自决、民主反独裁等。没有日不落帝国的解体,怎么可能有美国控制资源的空间,日不落帝国内部的贸易肯定是其国内法定货币英镑,美元的贸易空间在绝对数量上永远要落后于英镑,怎么可能有美元的今天?这背后就是美国的信用要落后于英国的信用,一旦英国在战后恢复了元气,美国依靠二战取得的优势地位和胜利果实就不在了。

在美元取得世界货币地位后,美国滥发货币的行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直到上世纪70年代,金本位破产,黄金暴涨10多倍,美元又与石油挂钩,继续新的滥发,通过发行货币掠夺世界,比一次战争战胜要来得容易太多,而且不流血。而对于前苏联,美国的军备竞赛是通过滥发钞票取胜的,例如里根当年就采取巨额赤字政策以虚拟经济搞了星球大战计划,而前苏联是通过自己的有限物质资源参与军备竞赛,当然无法支持,最后国家崩溃了。

美国要推动他的国际货币美元,需要改变世界的游戏规则,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以前的规则制定者;在二战以前,英国是世界老大,世界的游戏规则是英国制定的,所依据的是重商主义,是一种海洋文化的经济学,后来

是古典经济学,再后来是凯恩斯主义,这些世界规则都是以一个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基础上构建的信用体系,不是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国际金融和货币的国际信用体系,改变的背景就是打败了以往的经济规则。美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西方世界建立起来了一套美元信用体系和美国统治秩序,在这个信用体系下取得了游戏规则的制定权,这才是美国最核心的利益。

二战后的对抗就出现在美、英之间,但是战后英国已经没有反抗的实力,而英国在战前是世界第一的国家,在二战开始不久如果与德国议和、让德国进攻前苏联他好从中渔利,英国也会是世界二极的一极,但是在好战分子坚决地进行战争后,英国成为二流国家,英国在二战中也是实际上的战败者,失去了英镑控制世界的信用,这是英国政客打落门牙和血吞也不会公开讲的。

2. 美国如何占据世界控制体系的巅峰

美国能够打败老牌的世界霸主英国和后来的冷战对象前苏联是有其巨大的资源优势的,美国的资源优势就是美国实际上其本土拥有的资源就足以对抗世界的波动,并且还有粮食和石油两大利器。

全球石油资源地理分布很不均衡。从东、西半球看,约有3/4的石油资源量集中于东半球;从南、北半球看,石油资源主要集中在北半球;从纬度上看,全球油气资源主要集中在两大纬度带,一个在北纬20°~40°,拥有驰名世界的波斯湾及墨西哥湾两大油区和北非产油区,该带集中了世界51.3%的石油储量;另一个在北纬50°~70°,内有著名的北海油区、前苏联伏尔加及西伯利亚油区和阿拉斯加湾油区。

中东是石油产量最多的地区。从2002年往前的20年来,除1982至1988年等少数几年外,中东地区的石油产量一直是世界最多的,但世界上产油最多的国家并不是中东国家,而是美国(除2000年外)。2001年,中东地区平均每天生产石油达2252万桶,占世界日均总产量的29.23%;石油产量居全球前5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11.63%)、沙特(11.33%)、俄罗斯(9.46%)、伊朗(4.95%)和墨西哥(4.7%),合计占全球产量的42%。我国2001年的石油产量为330万桶/天,占全球的4.28%,居第7位。随着伊拉克战争美国得到了伊拉克的石油,美国有意降低了石油的产量,沙特填补伊拉克的空间和俄罗斯的大量增产,美国才到了世界产油国的第三位,但是美国完全控制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加拿大、墨西哥的石油产量也是世界前列!在2009年世界主要国家石油产量排名中,俄罗斯仍以4.96亿吨高居榜首,沙特阿拉伯以4.1亿吨位居第二,排名第三的美国为2.67亿吨,中国石油产量

略高于伊朗的1.86亿吨。与2008年相比,世界产油国第六至第十位并没有变化,分别是墨西哥、加拿大、伊拉克、科威特和阿联酋。

目前中国的油价只是略高于美国却远远低于欧洲、日本、香港,但在西奴的带领下舆论要求中国油价向美国看齐,全然不顾美国常年是世界第一产油大国的事实,只不过近年来俄罗斯崛起和沙特填补伊拉克的份额以后超过了美国,同时控制在美国手里的加拿大、墨西哥石油也是超过科威特、阿联酋等国的,要求中国油价与世界第一产油国看齐肯定是一个阴谋!

中国的石油储量非常有限,根据美国《油气杂志》公布的2009年世界主要国家石油剩余探明可采储量排名,沙特阿拉伯以359.5亿吨的可采储量继续居于首位,其次是加拿大、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和委内瑞拉等国。较2008年的21.9亿吨增长27.2%的情况下,中国的剩余探明可采储量仅仅为27.9亿吨,按照中国目前的石油消费量只有不足7年的余量了,前景堪忧!虽然中国还有增加探明储量的可能,但是大幅度增加是不现实的,可是中国的石油消费还在暴涨中,没有价格杠杆进行调节的结果必然是油荒!

美国的粮食更是一个强有力的武器,曾任美国里根政府农业部长的约翰·布洛克曾说:“粮食是一件武器,用法就是把各国系在我们身上,他们就不会捣乱。”美国粮商与美国政府互相需要,当局将粮食视为战略武器,粮商要靠政府撑腰,推行利于自身的贸易政策。美国政府对粮食生产予以高额补贴,因此粮价比一般国家低,食品公司想尽办法推动各国实现粮食自由贸易,以便顺利出口牟取利润。但这对进口国而言却意味着一场劫难。美国粮食武器的杀伤性就在于倾销!

粮食援助是食品帝国常用的“毒品”:在诸多非洲国家,接受粮食援助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为美国生产香蕉、可可等经济作物,这些国家的粮食生产因此荒废,沦为帝国附庸。海地的悲剧十分生动:20年前,该国年产大米17万吨,可满足95%内需,但1995年向美国敞开大米贸易,比海地米便宜一半的美国米迅速占领市场,农民失去土地和生计,如今海地3/4的大米都来自美国。

美国大型食品公司,它们首先控制了全美大部分粮食,而后获得国际影响力。目前掌握全球粮食运销的是4家跨国公司,四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即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业内称之为四大粮商。人们习惯根据他们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把这四家称作“ABCD”四大粮商。这四个占据世界粮食交易主要份额的四大粮食集团行事低调,关于他们的新闻并不算众多,但是他们对于世界粮食环境的作用却没有人能够小视,而美国在转基因领域还有超强的实力,孟山都等公司

控制了全球绝大部分的基因专利!

近年来,美国食品业的结盟,大大加强了其市场垄断力度。在北美,康纳格拉冷冻食品公司与杜邦公司,谷物巨头嘉吉与种子公司孟山都,诺华公司与粮油公司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已经形成了三个食物联合体,控制了北美的整条食物链,影响力扩张到全球。孟山都控制全球谷物与蔬菜种子23%~41%的份额,与谷物巨头嘉吉结盟后,如果农民需要贷款购买孟山都种子,就得去嘉吉旗下的埃尔斯沃思银行。无论粮价涨跌,它们可旱涝保收:涨价会使粮食初级产品受益增加;跌价时食品加工贸易则可受惠。受粮食短缺之苦的,则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此外,美国国民也是受害者,因为这些食品帝国研制出的加工食品令本国农民受惠甚少。例如在艾奥瓦州一盒麦片中农民收益还不到售价的1.5%。对于粮食的垄断就是占据最初的种子和最后的加工,把中间最大劳动量最大风险的事情交给农民,而且把农民的收入压到最低。

在压低粮价的过程当中,最有力的效果就是控制了最低工资水平,最低工资水平是要与粮食价格挂钩的,也是要受到粮食必须能够养活劳动力的数量所限制的。不光是政府的补贴,美国有条件依靠石油农业搞大规模的机械化,把粮食生产成本降到最低!美国有世界最好的耕地,耕地面积巨大平整,既不是中国西部大量荒漠、东南大量的丘陵山地,也不是俄罗斯等国的过度寒冷,在美国石油农业的压榨下,很多国家的农业破产成为美国的附庸,还有很多国家大量农民被迫进入城市成为廉价劳动力,这达到了一场新圈地运动的效果,这些工业人口保障了美国的繁荣。

基辛格有一句名言是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全人类!美国通过其美元霸权和军事实力控制世界石油和粮食,恰恰是在基辛格作为国务卿的时代完成的,这使得基辛格的个人政治影响力在当今世界也长盛不衰!美国控制当今世界的信用,关键就是美国控制了石油和粮食。

3. 美国军事力量下的石油美元信用体系

二战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美国霸权的代名词,是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维持了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然而好景不长,不久美国深陷越战泥潭,经济危机加剧,再加上前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发展壮大及其争霸势头的扩张,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黄金价格从当时的35美元每盎司飙升到800美元以上,美国国家信用遭遇空前危机,美国要解决美元危机,就需要为美元找到另外的信用捆绑。随后美苏争霸在中东展开,中东的美苏代理人进行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第四次中东战争。



第四次中东战争场景

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表面上是阿以冲突，实际上就是美苏争霸的一个中东马甲，阿、以双方分别使用苏、美先进武器装备，苏、美战略空运给予双方及时补给，苏、美侦察卫星分别为冲突双方提供情报。美国支持以色列自不必说，前苏联在埃及与叙利亚的请求下分别对两国展开军援行动。前苏联除了以运输机将装备与物资输送到这两个国家以外，也从部分东欧盟国调动装备支援阿拉伯联军。

战争的头一至两日埃叙联盟明显占了上风，但此后战况逆转。至第二周，叙军退出戈兰高地，从1973年10月11日至10月14日，以色列部队攻入叙利亚本土，在叙利亚的巴珊（Bashan）攻克了20平方哩的土地，以此为前出阵地，以色列得以用重型火炮炮轰大马士革。叙利亚加上约旦和伊拉克的部队发动反击以阻止以色列进一步攻势，然而，他们也无法击退以色列部队在巴珊的突出部。在西奈方向，以军越过了苏伊士运河，一路高奏凯歌，到战争结束时，以色列部队已攻至距离开罗101公里的位置。原意干涉以军攻势的前苏联，慑于美苏核大战的恐怖前景，最后接受了阿拉伯国家战败的事实。埃及也同意了美国的要求，不再要求前苏联支援，这场危机于是得以结束。

除了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以外，其他阿拉伯国家也不同程度卷入这场战争，提供各种军火和资金，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提供了金融上的支援并派出了象征性的支援部队参战，甚至摩洛哥也派出了1个旅，未建国的巴勒斯坦人也派出部队支援（Rabinovich, 464），连远在南亚的非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也派了16名飞行员助战。然而这一切在以军凌厉的反攻下化为乌有，阿拉伯世界最终向美国屈服，《戴维营和约》使埃以关系正常化，也是首个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同时埃及几乎完全脱离前苏联的势力范围。

在战争中为了报复美国支援以色列，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里的阿拉伯国家，由沙特阿拉伯领导，在1973年10月17日决定每个月减低石油产量5%，并威胁彻底禁运，到10月20日，沙特阿拉伯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其他阿拉伯产油国紧接着加入，并且扩大到对荷兰以及其他一些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施禁运，造成了1973年石油危机。但是随着阿拉伯的战败，石油武器反而成为美元的信用支持。

赎罪日战争最重大的后果并非阿拉伯暂时的军事失败和前苏联的政治滑铁卢,而是阿拉伯向美元屈服,战争中埃及只在西奈战线获得一小部分土地,以色列却在戈兰高地以及苏伊士运河西岸获得更多的土地,这场战争使阿拉伯国家了解到他们无法在军事上击败以色列,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向以色列的幕后支持者美国屈服。具体表现就是主要产油国沙特阿拉伯同意了三件事:一是石油只能用美元结算;二是将大部分石油税收收益用于向美国政府缴纳保护费购买美国国债;三是把获取的大量石油美元投资到伦敦和纽约的大银行。随后,欧佩克其他成员纷纷效仿,与美国签署了相似的协议。

阿拉伯各国使用美元交易石油,使得美元与石油绑定的结果就是美元在黄金之后取得了石油的信用支持,这对于美元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在美联储高利率和石油美元必定购买美国国债的情况下,结果就是全球美元回流美国之后,作为国际贸易中需要使用美元进行交易结算的流通中的美元严重不足,美元的货币媒介价值得到了提升。

更关键的是:美元是只有美国才能够印刷的钞票,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了,但是国际贸易和国家债务以美元结算的体系却没有改变,所有的国际间债务人都需要使用美元进行还债,但是此时的美元流动性已经被美联储收光了,世界各国为了取得美元就不得不廉价的出售资源,实际上就是这些国家受到了美联储的美元挤兑,他们难以得到足够的美元还债,只能出售其硬通货资源换取美元,包括黄金在内!其他国家廉价出售资源的行为本身,也就是使得美国的通胀得以下降,黄金价格也一路走低。在这个时候美联储大幅度加息,阿拉伯国家将多余的美元变成了美国国债以后,使得世界其他国家的美元借贷成本大幅度提高。我们要注意到在布雷顿森林体制存在的时候,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是债权国,而不是现在的债务国,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80 年,发展中国家所欠外债总额不过为 4300 亿美元,在 1980 年到 1986 年,为这些债务支付的利息就高达 3260 亿美元,本金又偿付了 3320 亿美元!到了 1987 年,109 个债务国反而还欠着西方国家 13000 亿美元!

美元霸权在国际金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制破裂以后再度得到确认,这个确认的结果对于前苏联等计划经济的经济体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前苏联也需要有一定的国际贸易来维持其国内经济的平衡,尤其是前苏联到 70 年代后不得不进口粮食,前苏联能够出口的石油、黄金等硬通货价格随后被压低,而前苏联参与国际贸易也不得不以美元结算,前苏联的整个信用体系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全球美元成为国际信用以后,美国可以印钞进行军备竞赛而前苏联不行!里根的星球大战

计划就是在美国政府大规模赤字和印钞下开展的,这个计划也是把前苏联最后拖入深渊的杀招。

美国把这个美元挂钩石油的信用体系视为其全球霸业的根本,这个体系本身又是在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强权下得以保障的,谁挑战必然是要搞死谁,当年的海湾战争到后来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最近发生的利比亚战争,下面的叙利亚问题和伊朗问题,背后都是为了这个美元石油信用体系。

美国在其军事力量下维持的美元石油信用体系建立了,石油被美国控制,也就是基辛格所说的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第四次中东战争看似一个局部战争,美苏没有直接参战,但是战争的结果却是美苏两国国运的转折点,在此之前美国在越战泥潭当中,西方舆论是不断打气要大家对于市场经济有信心,其后就变成计划经济必定要垮台了,这里的关键就是占据世界信用体系的制高点,建立了美元石油信用体系,这个体系也是掌控世界经济的价格体系,也是世界的货币体系和资源体系,执世界牛耳者在信用。

4. 美军霸权维系资源的定价权和占有权

美国对于石油的控制,很多人是不敏感的,很多人天真的认为,中国可以按照国际油价购买石油,所以每当国际油价下跌,总有一大堆的声音出来说中国应当比照国际油价降价,但是由于背后的石油限产,中国实际上难以按照国际油价得到石油。

欧佩克就是限制各国石油生产的,限产的方式就是大家熟悉的配额！由于中国在欧佩克成立和限产的初期是石油出口国、且没有加入这个组织,中国是没有一点原始的石油配额的,这个配额虽然是生产性的配额,但是西方的石油公司早与阿拉伯国家签署了供油的长期协议,配额是被这些长期协议绑死的,因此配额成了中国取得海外石油的重要门槛,我们看一下稀土的出口,配额的本身价格异常昂贵甚至超过产品本身。

这里很多人会说俄罗斯不是欧佩克成员,俄罗斯的石油应当不受限制吧？但是大家对于俄罗斯的石油交易规则可能不太了解,俄罗斯极度缺乏资金,俄罗斯给你提供石油的对价就是你必须要有巨额的预付款,就如在08年危机的时候中国就不得不给俄罗斯300亿美元的借款来换取俄罗斯未来的石油,而最近我们与俄罗斯的天然气谈判,俄罗斯要求中国预付400亿美元的预付款作为保障,这是中国采购十多年的预付款！如果计算了付款的利息成本是多少？更何况俄罗斯政治不稳定,他出现问题不履约了,你有什么强制性的手段保障你的预付款不受损失呢?

我们看到西方指责中国的石油产业垄断,国内很多人也跟风,但是阿拉伯国家却在纷纷将石油公司国有化,1975 年科威特实行石油国有化,目前外国公司与科威特的合作仅限于承揽石油设施建设,难以涉足油气上、下游领域。沙特于 1980 年实现石油工业国有化,继续给国家石油公司输血打气。国有的沙特阿美公司是全面控制沙特油气勘探、提炼、运输与销售的一体化企业,原油产量占到全国的 97.5%。现在拉美国家包括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也是将石油公司国有化。委内瑞拉是西半球最大的石油资源国、全球第五大石油出口国,也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员中唯一的拉美国家。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执政以来就力主政府对石油产业的控制,频频出台颇有力度的国有化政策;2011 年 6 月厄瓜多尔政府也将美国能源发展公司在厄瓜多尔的分公司能源诺布莱公司的友谊油田国有化。

俄罗斯也在大刀阔斧地进行石油天然气资产重组,重头戏是将尤科斯公司收归国有化。尤科斯石油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私人石油企业,控制了全国石油总产量的 17%。2004 年 12 月,政府通过法律手段把尤科斯的核心子公司"尤甘斯克石油天然气公司"拍卖给国有的俄罗斯石油公司。

国有化使得阿拉伯等产油国家取得了竞争优势和石油话语权。为什么西方允许阿拉伯等国家国有化油田?阿拉伯国家的国家安全是完全被美国控制的,而拉美更是美国的后院,其他势力难以染指;而俄罗斯在西方的压力下私有化以后反过来也搞石油国有化,这些西方都没有说什么,甚至是纵容,为什么就是对中国的石油产业要指责为垄断而坚决要逆向行动?这里我们要发现的就是世界石油博弈机制下西方的利益取向!

西方允许石油国家国有化,使得后来者中国进入这些国家市场的门槛骤然提高,但是西方的先行者们却已经在里面了,更关键的就是他们控制这些产油国的国有石油公司的手段不是由股份体现的,而是通过长期协议来实现的。阿拉伯等产油国国有化石油公司,公司的产权变更成为国有,但是按照西方的司法体系企业的股权变更并不影响协议的执行,因此这些长协是继续有效的,西方通过协议层面控制石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政权更迭和各种革命等等这些长协均不受影响,而中国等国在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遇到利比亚"革命"等事件是影响极大的。

西方与这些产油国早就有各种石油长期协议,而且这些石油长协很多是盯死价格的,就算没有完全钉死价格,这些长协也锁定了欧佩克的配额,使得西方石油公司可以有保障地取得石油。即使是浮动价格,美国对于我们也有优势,因为美国的石油贸易结算是按照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结算的,中国等国的石油结算指数却是

不能使用而要使用其他指数，比如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指数，这里纽约石油期货指数是比布伦特指数低很多的，美国金融资本是可以打压这个指数的，并且由于其他国家在纽约交易原油难以交割，这个指数就是控制在美国人之手，使得美国人的石油成本大幅度低于其他国家。中国在配额和指数上都是吃亏的！中国能够获得石油，很多情况下是要在中东统治者之间合纵连横的，还有一些欧美国家制裁的国家的石油可以卖给中国，还有一些是通过灰色方式得到的石油，而现在中东巨变的结果就是中国能够得到的石油更少，一旦降价必然就是油荒。中国的石油能够便宜是因为有中国自产的石油，对于一个石油依存度极高的国家，廉价的以自产石油补贴油价是非常不可取的，西方所谓的让中国的石油企业打破垄断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的石油企业变成第二个铁矿石进口企业群，让原油进口成为铁矿石一样的被掠夺对象。可是产油国都在西方的纵容下国有化和垄断化了，凭什么要中国的石油企业变成竞争行业？

对于这些长协，中国急需的铜等金属资源的长协也是类似的，只有铁矿石不同，但是铁矿石是贱金属，它的价格被运输等物流成本控制，就如在非洲很多地方铁矿石每吨只要 1 美元，关键在运费，这里不光是海运费，把铁矿石运输到港口是最大的瓶颈；石油是液体可以石油管道运输，铜等价值高运费可忽略，铁矿石等运输就很关键，运输是需要对他国拥有控制力的，筑路权是与矿山开采权一样的国家核心权力。在石油和铜等长协当中，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体现了矿产的渠道融资，这些矿主通过长协要求巨额预付款，以预付款来开发矿藏，但是不同国家的预付款的成本差异极大，就如前面说的俄罗斯要求近 20 年采购的预付款，以日美不到 1% 的资金成本与中国 6% 以上的贷款成本相比，取得资源的价格计算了这部分财务成本以后要相差 100% 以上的，这些差别的背后就是一个国家货币信用的不同，在这里信用又显示了其价值。

对于资源，无论你直接投资的产权层面还是长协的协议层面，对方都是有保障的，因为投资是你的企业跑到人家的土地上，长协则是你要预付款资源在人家手里，对方违约违法地搞你怎么办？在这里也是需要国家实力做后盾的，产权层面、协议层面离不开实力层面，美军的势力在这里是关键，中国如果没有军事力量的存在，你的海外资源权利就得不到保障，上述定价机制实际上就是在美国军事强制力下得到保障的，产油国的国有化也必须得到美国等西方军事势力的认可，其能够国有化的关键也就是保障美国等国家的长协而把势力弱的没有长协的国家排除在外，这是一个预设目标再设定规则的游戏，不要简单地说中国人思维不超前，如果

中国搞的是长协美国搞的是投资,他们就要把规则完全变过来了,他们就要说中国人垄断了,要依法打破垄断了,就如他们在国内强力指责中国石油产业的做法一样。因此目前这个定价机制不是中国人傻而是实力上的巨大优势让美国左右逢源,这挥洒自如的背后是军事实力的保障,也是美军强大军事实力和巨额军费所带来的利润,中国为了自身的信用不得不持有美债,而美国为了自身的信用就不得不花费巨额军费让其军事实力成为世界霸权,所有这些最本质的内容就是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的信用,以及信用所带来的控制力。

三、中国不能夜郎自大

1. 中国金融实力非常弱小

中国这些年崛起的速度很快,中国的 GDP 增长也很快,中国的 GDP 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了,因此很多人就以为中国非常强大了,甚至想要挑战美国的霸权,在这里著者要说的是中国实际情况是非常弱小的。外国媒体经常渲染中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是在“捧杀”中国。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中国的金融实力实际上是非常弱小的。

很多人说中国有 3 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天下无敌等等,还有人说这个储备的数量是太多太大非常冗余,但是中国央行持有的这些储备在国际上就是一个主权基金,就是一个与基金管理公司类似的机构,如果我们看一下世界的机构巨头,立即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这一点儿外汇储备是怎么样的渺小了。

根据韬睿惠悦全球 500 大基金公司研究显示,2010 年有 9 家新的大陆基金公司上榜,总数上升到 27 家,而 2006 年仅有 5 家。研究表明,这 27 家大陆基金公司 2010 年总计管理 3500 亿美元的资产,而 2010 年全球最大的 500 家基金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增长 4%,达到 65 万亿美元,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前 20 家大基金公司中的美国公司管理了 15.82 万亿美元。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的就是世界最大的机构黑石(Black Rock)就管理着 35600 多亿美元的资产,其资产管理规模是超过我们央行的,而中国进入世界 500 大的机构所管理的总资产不足他的十分之一!对于这些动辄万亿美元的金融大鳄们,我们熟知的高盛等投资公司只不过是他们的代理人和投资服务提供者,他们这样庞大的资产管理规模有非常恐怖的金融攻击力,我们的央行实际上是很弱小的,我们的民间力量就更无法和央行的实力比拟,不要看西方是政府债务危机重重,西方是小政府大社会,真正有实力的是这些金融大鳄

们，金融的实力不在政府而在这些超级机构。

在这里我们要认清 GDP 只不过是一年国家创造的财富增量，并不是你拥有的数量，更不是你社会累积的财富总量，当今世界的金融霸主不是中国，中国的 GDP 在全球化和再分配当中真正归属中国的部分要打折扣的，比如我们有大量 GDP 是外资创造，这些财富的归属是属于外国投资者的；而西方的经济领先上百年，百年来大量的社会财富积累是极其可观的，不仅仅是美国，欧洲的老牌强国英法德也有超过万亿美元的资产管理机构，在亚洲就算是龙头日本，其资产积累也是有很大差距的，在世界 20 大资产管理机构当中只有日本的生命人寿 Nippon Life Insurance 在第 20 名，资产管理规模是 6562 亿美元，这个资产规模与中国的整个保险业的投资额是相当的，中国保监会 2011 年 11 月 25 日公布的 2011 前十个月经营数据显示，1～10月，保险行业资产总额达到 5.8 万亿元，保险资金投资共 3.68 万亿元，其中，银行存款 1.68 万亿元，占比 29%。而产业垄断的集中度高在金融领域的影响力是指数型地增加的。

相对这样大的资产，中国的社会商品总额是多少呢？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我国 2010 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455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4.8%。虽然中国的社会零售商品总额达到 15 万亿元以上并且在快速增长，但这只不过才 2 万多亿美元，总量与这些巨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相比，还是很少的，如果外来的流动性攻击中国的商品市场，以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容量，也是难以承受的，中国是没有那样大的实力的，同时西方资本也在快速地圈占中国商品的销售渠道，从大型超市到粮站等，如果这些渠道被外资控制，外国资本就可以不设防地长驱直入攻击中国的商品市场，也可以通过渠道控制中国的商品市场了，对此风险我们也是要有充分认识的。

综上所述，中国是刚刚 GDP 达到了世界前列，但是人均的 GDP 就很低，人均收入更低，更关键的是中国没有足够的财富积累，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实力还很弱小，远远不足以与老牌强国全面对抗。信用是需要积累的，是对应于社会财富总积累的，虽然西方遇到了很多问题，但要充分认识到他们积累的财富总量是很强大的，尤其是西方的问题多在政府层面，对于他们资本层面的强大实力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在未来的全球信用战争和博弈当中，中国需要的是虚心和韬晦，保护好我们刚刚取得的一点点来之不易的经济果实。

背景资料:背景资料:世界最大与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

中国大陆地区基金公司排名

2010 排名	基金公司	2010 年资产(百万美元)
196	华夏	43,820
220	嘉实	37,060
249	易方达	29,856
254	博时	28,528
319	南方	17,899
336	广发	15,647
345	大成	15,014
364	银华	12,917
372	华安	12,467
417	富国	9,388
426	上投摩根	8,934
429	工银瑞信	8,738
432	汇添富	8,597
434	鹏华	8,520
441	交银施罗德	8,000
443	融通	7,960
450	华宝兴业	7,452
453	建信	7,333
459	国泰	7,146
463	诺安	7,090
467	景顺长城	7,013
478	兴业全球	6,659

续表

2010 排名	基金公司	2010 年资产(百万美元)
487	海富通	6,352
490	长盛	6,225
493	招商	6,136
496	国投瑞银	6,082
499	中银	5,908
	总计	**$346,741**

(注:新浪财经配表 来源:Pensions & Investments/韬睿惠悦全球 500 大基金公司调研)

资产管理规模排名全球前 20 位的基金公司—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排名	基金公司	市场	资产管理规模(百万美元)
1	BlackRock	美国	3,560,968
2	State Street Global	美国	2,010,447
3	Allianz Group	德国	2,009,949
4	Fidelity Investments	美国	1,811,901
5	Vanguard Group	美国	1,764,960
6	Deutsche Bank	德国	1,562,352
7	AXA Group	法国	1,462,966
8	BNP Paribas	法国	1,313,882
9	J. P. Morgan Chase	美国	1,303,372
10	Capital Group	美国	1,223,412
11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美国	1,172,314
12	UBS	瑞士	933,209
13	HSBC Holdings	英国	925,000
14	Amundi Asset Mgmt.	法国	915,016

续表

排名	基金公司	市场	资产管理规模(百万美元)
15	Goldman Sachs Group	美国	840,000
16	Prudential Financial	美国	784,046
17	Natixis	法国	719,336
18	Legg Mason	美国	671,799
19	Franklin Templeton	美国	670,719
20	Nippon Life Insurance	日本	656,153

(注:新浪财经配表 来源:Pensions & Investments/韬睿惠悦全球500大基金公司调研)

2. 中国全方位看还是债务国

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很多人就认为中国的国际金融竞争力超强,似乎有了这个天下第一的外汇储备中国就是世界债主了,但是我们透过面子看里子,中国实际上还是一个债务国:中国的政府和国有资产、央行方面可能持有巨额外国债券,但是要是把西方金融资本的在华权益也放到里面一起考量,就可以发现中国实际上还是一个债务国,我们崛起还是任重道远。

在国际资本流动中,FDI往往被认为是稳定的、非投机性的。但目前中国FDI体系中的留存利润,已经具有明显的投机性质。上世纪拉美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证明,在危机时期FDI同样会掀起撤出浪潮。对于国家国际收支的安全考量来说,这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黑天鹅"。现在已经有此端倪。如果FDI在中国国际收支的计算体系里,从1万亿美元,进行资本市场溢价,放大到2万亿美元、3万亿美元或5万亿美元,乃至更高,中国的对外投资头寸表、国家资产负债表、央行外汇储备适度规模评估,会呈现怎样一幅场景?

按照外管局2010年的国际投资头寸表,2010年底的外汇净资产是41260亿美元,但净头寸仅仅是17907亿美元,负债却达到23707亿美元,资产负债率是很高的,且这个负债没有足额计算外资在华投资的滚存利润和利润投资收益,不让外资撤离有巨额亏损,中国就是真正的债务国,外资大规模放手撤离,中国的外汇平衡问题隐忧巨大。

FDI在华留存利润问题,没有进入官方统计,且规模日益巨大,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暗物质"。由于在中国市场运营,FDI利润以人民币形式存在,并日渐成

为游离于主流讨论间的“人民币热钱”。以中国社会平均市盈率来说3、5年就收回投资翻倍了,富豪的收入增长就是佐证,这一暗物质的规模是可怕的。按照2009年的国际投资头寸表计算,2009年中国对外资产净头寸为1.8万亿美元,但这其中FDI是按历史成本法评估为9974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FDI资产采用“市场价值法”,评估为2.8万亿美元,那么中国就将从一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一个地道的债务国,而且外国在华投资增值和利润还在不断地增加中。看外国资本在华盈利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产权增值,中国“招商引资”政策的结果就是给外商大量优惠土地,甚至零地价进行招商,土地增值在FDI当中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我们控制地价、土地招拍挂和提高土地税收都有这方面的考虑,且不说外国投资的利润,外国投资占有的中国土地等资产的增值是可怕的,很多地方这几年土地价值的增值都在10倍以上。

从2010年三季度开始,按照国际标准,将外商投资企业归属外方的未分配利润和已分配未汇出利润同时记人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账户收益项目的借方和金融账户直接投资的贷方。2010年各季度以及2005~2009年年度数据也按此方法进行了追溯调整。根据外汇局国际投资头寸表,2004年FDI为3690亿美元,08年末9155亿美元,到2010年为14764亿美元,外来资本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增值极快,这1万多亿美元外国在华资产,每年都在生成高额利润,而这些利润绝大部分并没有汇出中国,而是留存国内,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中国经济形势已经严重地为之所左右。除此之外在华外资所记录的各种利润还存在大量的人为压低现象,很多投资所产生的利润没有计算在其中,外资投资中国所控制的企业的资产力量没有计算在其中,中国大量移民海外的富人的资产还是以内资的形式存在、而没有计算到外国投资之中。

从中国的国际投资头寸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外国资本还拥有中国的债券和股票各2000亿美金左右。中国债券的利率远远高于国外水平,而投资中国股市的资本现在则是以成本计价的,在股改和锁定期满后实际的价值已经大幅度增值,甚至是翻了好几倍,这方面也是巨大的黑洞。如果在中国的QFII在国内赚取了大钱,中国的外汇平衡压力还要增加,而QFII的经营情况在国内的投资机构当中是收益领先的。

在负债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中国的外汇资产收益却很低廉,“2004年以来中国共有14家企业在海外发生巨额亏损,14个项目累计亏损达950.5亿元”——这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前驻伊朗、阿联酋、荷兰大使华黎明在首届

外交官经济论坛上给出的数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院长万猛也在《华夏时报》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对外投资企业中,70%都处于亏损状态。中国对外投资持有的更多的是外国的债券,以目前西方接近零的利率,收益更加有限,因此中国的外汇资产不平衡的风险也在不断放大,对于中国所谓"有3万亿美元的资产"千万不要过于乐观。

我们仅以外国在华明确的直接投资1.4万亿美元和证券投资4000亿美元的账面资产来计算,这已经是10万亿人民币规模的资产,而我们的股市总市值是多少?当前沪市AB股总市值16万亿、市净率平均1.88,深圳AB股总市值7.2万亿、平均市净率2.78,我们的股市所有的净资产也就是与外国在华资产相当,这些外来资本对于中国的压力是巨大的。如果这些外来资本所持有的资产和证券出售卖出了溢价,那么中国的外汇平衡和外债情况就又要加剧了。

对此我们要改变对于外资的态度,西方各国对于外来投资都是有各种限制的,但是中国非但不限制外资流入,反而各地竞相以各种超国民待遇的优厚条件来"招商引资",我们在人民币贬值的阶段招商引资实际上就是给外资的汇率补偿,想一下在2元人民币兑1美元的汇率条件下,美国投资与8.31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时候一样吗?而现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到6.30左右了,人民币的国际化需要人民币的升值周期,在这时候外资进来是要在实体投资和汇率上双重得利的,因此我们招商引资的政策应当反思了!

反思之余,在行动上中国首先应当考虑以税收来限制外资的作用,外资变现的资本利得一定要合理征税,土地增值也要征税,还有就是以企业形式投资的外国投资人的最终个人所得税没有在国内收取,外国人在中国赚了钱却在外国交税。对于外国投资征收股东税,甚至非洲国家都早已经这样干了。在资金汇出的时候征税!要知道中国人投资的利润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以后,分配给投资人的利润还要交纳个人所得税,但是外国投资人的个人所得税是缴纳给外国或者离岸公司避税的,这部分收入来自中国,不征税就是对于中国纳税人不公。而对于外国资本在华所得征税,是可以极大限制外资变现和取得过高利润进而攻击中国金融体系的,这对于中国的金融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分析了金融资本在华的投资和在华的证券资产以后,分析了这些资产的增值和滚存利润以后,再计算了移民海外富人的所谓内资资产,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政府对外国政府而言是债权国,但是把外国资本的负债加上以后中国就是债务国。西方大肆要求中国开放金融监管,尤其是开放金融资本项目下的监管就可

以知道,只要这样的监管放开,对于中国的金融攻击是随时可以发生的,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不足以应付这样的攻击的。所以人民币的国际化一定要先汇率接轨然后才能够放开监管,否则金融"珍珠港"的风险太大了;开展国内汇率期货市场也是很好的应对之道,中国在有巨大债务压力的时候必须把安全放到第一位。

假设中国处于债务国的境地而贸然放开监管,把资本项目开放,如果被西方攻击中国的信用,则重蹈俄罗斯当年的覆辙可期。中国的金融边疆是国家的核心利益,绝对不能自毁长城。虽然依托长城被动防御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也非长久之计,未来开放资本管制也是大势所趋,但是在中国还很弱小的时候自毁长城是万万不能的。

背景资料: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

2004－2009修订前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

单位:亿美元

项目	2004年末	2005年末	2006年末	2007年末	2008年末	2009年末
净头寸	2764	4077	6402	11881	14938	18219
A. 资产	9291	12233	16905	24162	29567	34601
1. 对外直接投资	527	645	906	1160	1857	2296
2. 证券投资	920	1167	2652	2846	2525	2428
2.1 股本证券	0	0	15	196	214	546
2.2 债务证券	920	1167	2637	2650	2311	1882
3. 其他投资	1658	2164	2539	4683	5523	5365
3.1 贸易信贷	432	661	922	1160	1102	1646
3.2 贷款	590	719	670	888	1071	942
3.3 货币和存款	553	675	736	1380	1529	1409
3.4 其他资产	83	109	210	1255	1821	1368
4. 储备资产	6186	8257	10808	15473	19662	24513
4.1 货币黄金	41	42	123	170	169	371

续表

项目	2004 年末	2005 年末	2006 年末	2007 年末	2008 年末	2009 年末
4.2 特别提款权	12	12	11	12	12	125
4.3 在基金组织中的储备头寸	33	14	11	8	20	25
4.4 外汇	6099	8189	10663	15282	19460	23992
B. 负债	6527	8156	10503	12281	14629	16381
1. 外国来华直接投资	3690	4715	6144	7037	9155	9974
2. 证券投资	566	766	1207	1466	1677	1900
2.1 股本证券	433	636	1065	1290	1505	1748
2.2 债务证券	133	130	142	176	172	152
3. 其他投资	2271	2675	3152	3778	3796	4508
3.1 贸易信贷	809	1063	1196	1487	1296	1617
3.2 贷款	880	870	985	1033	1030	1114
3.3 货币和存款	381	484	595	791	918	1034
3.4 其他负债	200	257	377	467	552	742

从2010年三季度开始,按照国际标准,将外商投资企业归属外方的未分配利润和已分配未汇出利润同时记入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账户收益项目的借方和金融账户直接投资的贷方。2010年各季度以及2005-2009年年度数据也按此方法进行了追溯调整。

2010年修订后的国际投资头寸表

单位:亿美元

项目	2009 年末	2010 年末
净头寸	15107	17907
A. 资产	34571	41260
1. 对外直接投资	2458	3108

续表

项目	2009 年末	2010 年末
2. 证券投资	2428	2571
2.1 股本证券	546	630
2.2 债务证券	1882	1941
3. 其他投资	5173	6439
3.1 贸易信贷	1646	2261
3.2 贷款	974	1174
3.3 货币和存款	1310	1985
3.4 其他资产	1243	1018
4. 储备资产	24513	29142
4.1 货币黄金	371	481
4.2 特别提款权	125	123
4.3 在基金组织中的储备头寸	25	64
4.4 外汇	23992	28473
B. 负债	19624	23707
1. 外国来华直接投资	13148	14764
2. 证券投资	1900	2216
2.1 股本证券	1748	2061
2.2 债务证券	152	155
3. 其他投资	4416	6373
3.1 贸易信贷	1617	2112
3.2 贷款	1636	2389
3.3 货币和存款	937	1650
3.4 其他负债	227	222

说明：1. 本表记数采用四舍五入原则。

2. 净头寸是指资产减负债，“+”表示净资产，“—”表示净负债。

四、竞争印钞贬值会被信用战打断

本轮金融危机后,各国均采取印钞的方式渡过危机,其中美国就搞了两次量化宽松,以购买国债的方式印钞16000多亿美元,但是美国QE3的推出已经受到限制,因为连续印钞的结果就是资源价格的暴涨,各国的货币信用出现巨大的问题,资源暴涨是让资源国家得利,而货币信用则是控制世界的美国的根本利益,印钞印到最后威胁国家的货币信用是不行的。

在危机初期各国负债巨大,印钞使得货币通胀就是让其负债缩水,这明显有利于已经成为债务国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外汇储备不得不在这样的印钞下贬值承受损失,但是美联储再度量化宽松的结果就是要让资源价格涨上天,而美国是最大的资源消费国,必然是得不偿失,美联储的QE3是要权衡其印钞得利和资源价格涨价损失二者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现在资源价格的回调对于美国也有利,而QE3不推出欧洲难以宽松,欧债危机就发酵了。各国的竞争性贬值与资源的有限性成为一对矛盾互相制衡。

在印钞的模式下,谁能够印钞而不恶性通胀,谁就有印钞权,这印钞权本身也是一种信用,博弈印钞权就是一种信用博弈,在博弈矛盾激化下就是信用战,而对于资源的占有和控制,也是一种信用的表现,在印钞的情况下能够控制资源的价格,与资源占有者的激烈冲突,也是一种信用战。在不断印钞的情况下,印钞者不断注水得利,必然会激化各方的矛盾,把矛盾激化成为激烈的冲突,信用战就开始了。所以说印钞必然会被信用战打断。

五、经济危机后的战争风险在发酵

经济危机发展到目前的阶段,西方能宽松的已经宽松、能借债的已经借债,现在到了债务危机的地步经济还不见起色,西方的经济牌已经基本没有了;而中国拥有巨大的宽松空间、巨额的外汇储备、大量的税收盈余、没有泡沫的资本市场,已经做好了一切经济准备,西方能够限制中国崛起唯一的牌就是攻击中国的政治稳定,以挑起政治内乱或者军事战争等手段打断中国的崛起进程,因此我们对很多挑衅要忍耐,要韬晦到中国真正实力强大再最终解决,西方从外部干扰到内部扶植带路党,还有一批人故意以似是而非的理论造谣蛊惑,动摇中国人民的信心,在当今信

心经济时代,信心是至关重要的。针对你的信心和公信力的攻击,就是一场信用战,是替代传统战争的新的战争形式,未来是要有激烈博弈的。

2012 年注定是动荡的一年,中国目前是大国中情况最好的,政治已经在平稳过渡,所有的矛盾暂时得到控制,俄罗斯已经发生了反普京的游行,不过普京还是俄罗斯的强人,俄罗斯如果不是强人政治,以其国内复杂的矛盾,必然是要内乱的。而美国也要在 2012 年进行大选,欧洲债务危机已经在 2011 年让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更迭,未来政府更迭的情况可能会更多。欧债危机是否能够熬得过 2012 是一个重大考验,这个危机没有一个大国的倒下是难以最终解决的,不断发酵就是危机不断深化走向战争的危险前景,而美国的国防授权法,对公民权限制之严苛超过想象,完全是战时法律,美国已经在准备打仗了,现在很有些 1929 ~ 1933 年危机后二战前的味道。中国是需要极力避免打仗的,发达国家都希望以战争来了解他国的债务,一旦战争对中国就是重大的危机,外汇储备和外向型经济都是被算计的标的,多稳定一年、多发展一年,对方的内部压力也会增大一年,未来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破局还是走向战争?中国需要的是忍耐和等待,等待他们自身危机的破局才是关键,大到国家小到散户,机会都是等出来的。

如果中国真的要学习美国的话,就要学习一下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后美国是怎样立法的:《爱国法案》和《国防授权法》,这两个法案的作用概括起来,就是剥夺“内奸”的所有人权,法律规定对“内奸”实行“三不主义”——只要政府官员认为某人有可能危害国家利益,就可以采取各种措施,而不需要出示任何证据,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不承认对方具有任何宪法权利。但凡稍微了解这方面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国这两个法案完全是在国家处于战时状态,才会采取的严酷法律,中国相对于美国是太讲人权而不顾国家主权的利益了,太讲个体权利不讲集体利益了。西方在讲自由但是西方也有契约精神,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以契约精神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本位、限制个人的无限自由。

美国此时出台这么两个法案,一是看到了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中“汉奸带路党”的巨大作用,防止美国也出现类似“汉奸”;二是美国之所以要做这种防范,是在进行更大规模的战争准备,美国制定如此严苛的法律,背后显然不是为利比亚、叙利亚这样的小国局部战争做准备,伊拉克战争美国也没有如此立法,美国的这个战争立法是对谁呢?同时美国国税局公布了《海外账户纳税法案》(FATCA)部分实施细则。根据税法规定,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居住在美国境内、在海外拥有 5 万美元以上资产或者居住在美国境外、在海外拥有 20 万美元以上资产的美国公民和

持有美国绿卡的外国人都需要在2012年4月15日前向政府申报;藏匿海外资产拒不申报被视为有意逃税,一经查出会被处以高达5万美元的罚款,严重的还会被判刑。这个税收法案的背后除了获取巨大的税收利益之外,就是要清查海外的各种渗透和进攻美国的经济和情报活动,掌握暗中的财富流动和不正常的资金流动。世界的大战经常是在世界经济危机矛盾巨大的不稳定当中,由不经意的小事情引发的,如果世界进入全面战争,情况就将完全是两个样子,资金能够在战前撤离逃跑,哪怕是割肉得再低,也是赚了便宜。

对于帝国主义以战争手段打断中国崛起进程是需要警惕的,就如牌局上打牌把自己的好牌打光了而对手还有一把好牌没打,耍赖掀桌子不玩了的情况是很多的。想当年中国东北的GDP与日本本土相当,中国发行法币清洗了日本在华债权,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赶超日本进程中,日本发动战争打断了中国发展进程。相比一些人在中国诋毁爱国主义,美国人怎么做是可以学习的,这些人在学习美国的问题上不能搞双重标准,他们不是要全盘西化吗?就从美国的《爱国法案》和《国防授权法》开始吧!美国人的人权从来不能对中央情报局来讲,美国的律师在警察局和中情局完全是两个样子,按照美国现行法律,美国公民在涉嫌危害国家的时候根本没有与中情局讲人权的权利。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稳定,西方能够遏制中国的切入点就是中国的稳定,中国内部再有问题,也要等中国崛起了以后再说,就算是贪官污吏和权贵资本,也是要让财富资源先成为中国的再说,然后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因此中国当前维持稳定一致对外抓住崛起的战略机遇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时不我待机不可失,崛起是失不再来的问题,其他可以以后解决的问题都要让道。

美国现在是盯住了中国内乱的利益,只有他们觉得你内乱无望才会和解,就如中国是怎样从抗美援朝的美国制裁走向中美建交。1972年中美建交,尼克松访华,借着茅台的酒劲,在宴会上说了一句美国谚语'打不过的敌人,就是朋友',不自觉地道出了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一贯做法。现在世界都盼着中国政局出问题、中国倒下给全球释放资源呢!实际上对于中国崩溃释放资源的需求欧洲更迫切,所以现在一些叫嚣要中国进行所谓"改革"的声音越来越急切和疯狂,背后有其主子的需要!

本轮世界危机要得到彻底解决,必然是大国倒下释放资源,就如上世纪70年代的资源危机最后的博弈结果就是前苏联逐步衰落解体,西方现在更直接的想法就是要中国通过所谓的改革进入到不稳定的状态释放资源解决危机,现在对于中国

的政治风险是要深刻认识的,想要所谓的联吴抗曹进行几出祁山式的抗争的结果就是蜀国先灭,因为吴国是想要蜀国灭亡释放资源解决其内部危机的！现在欧洲自身危机深重要找替罪羊和埋单者,欧洲内部矛盾重重根本没有统一意见,欧洲内部就是一个非合作的恶行博弈,这样的博弈结果就是纳什均衡下的囚徒困境,必然是一个双输的结果,谁加入进来和他们联合就算前景广阔,在恶性博弈下也必然被咬一口,这样的欧洲谁想要跟他们联合必然是被他们咬一口,一起拖入深渊。中国需要的就是维持自身的稳定,让世界其他各国自身的问题发酵,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根本的问题是他们的内部问题！只有中国稳定让这些发达国家看不到通过颠覆中国取得解决他们自身危机的希望,中国才能走出在全球被孤立的境地,届时在国际丛林法则下就会来一大堆想要和你做朋友的人了。

现在的国际战争未必就是传统战争形态,更有可能是一场信用战,是让你的国家信用破局的战争,中国有核武器、洲际导弹和太空能力,传统战争的风险远远小于针对我国国家信用进行打击的战争风险,如果中国政治进动荡,则中国的信用就要大打折扣,各种势力现在唱空中国,夸大地方债危险,放大中国各种社会矛盾,都是恶意攻击中国公信力的行为,是一场针对中国的信用战的前奏。

因此在这些所谓的“冰冷的经济真相”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火热的崛起希望、政府韬晦的智慧和各种势力颠覆中国冰冷的心,对于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那些攻击中国的专家们难道不懂吗？以他们的水平而言装不懂的可能性更大,中国现在就是需要稳定压倒一切,违反这样的大原则的任何因素,都要毫不留情的牺牲掉,哪怕是有益而破坏稳定的,也要暂时的牺牲掉,以后再平反再让历史评价。著名军事家吴起带兵,有一个士兵为了表现英勇抢先杀入敌阵带了两个首级回来,吴起将他立即斩首示众,因为他的行为破坏了军队的整体行动和军纪,这样的纪律才是军队胜利的保障,而中国目前崛起也是类似的情况。

一时的胜负在于力,千古的胜负在于理。信用的胜负才是最终的胜负,建立了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信用,才有长久的胜利,西方的发达不仅仅是其科技,更不完全是其制度,其深处最本质的是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信用体系。这就是信用元规则告诉我们的大道至简之道。

第九章　信用争霸路径图

一、单极世界如何崩溃

1. 美国的膨胀与信用限制

在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实力远远超越其他国家。美国的GDP占世界总额的21%左右,军事实力是世界各国根本无法抗衡的,美国的科技是世界翘楚,互联网、半导体、航天、核子、基因等等科技尖端均是美国占据了世界第一,而美国的金融能力更是控制了全球,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已经让原来的黄金货币边缘化,美联储统治了世界的金融体系。美元成为世界的霸主,世界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和美元的信用成了世界主宰。

成为单极世界后,美国军事科技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模式,通过空军袭击,割断敌国的指挥系统,切断敌国的物资供应,使得战争伤亡缩小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从而让美国摆脱了越战伤亡重大对于国民的战争阴霾,变得越来越穷兵黩武。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美国不断挑起局部战争。而在金融领域,从拉美债务危机到暗算日本的广岛协议,再到亚洲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金融战,美国也是战果辉煌。美国的信用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但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无限制地膨胀下去,膨胀到一定的程度就一定会出现新的限制因素,而限制美国为所欲为的因素已经初步显现了。

第一个给美国下马威的就是恐怖主义,“9·11”事件成为美国人心中永久的痛,其后针对美国人的各种恐怖袭击事件层出不穷,让美国人谈之色变,而美国针对恐怖主义的各种对抗措施耗费了大量的国力,同时让老百姓一直处于精神紧张状态中,而这个限制美国的恐怖主义,背后就有伊斯兰极端宗教主义的影子,也有美国在海湾伊斯兰世界的为所欲为造成的普遍的民众敌对情绪。你很容易征服世界,但是不容易征服人心,就如当年的蒙古铁骑可以屠刀杀遍世界,但是不能让南宋的状元宰相文天祥屈服,民众的信仰就是对美国强权的一个限制,是恐怖主义的

民意基础,在极端的情况下,恐怖主义就产生了,恐怖主义实际上是对美国的一个限制。美军固然强大,但是对于散布各地的恐怖分子,实在是有狮子抓老鼠无处使劲儿的味道。这些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是有信仰的,在信仰层面即使是单极的美国也没有为所欲为的信用。

而美国的权力膨胀,导致美国的过度消费,美国的所有权力机构的利益都在膨胀,结果就是美国的政府赤字只能不断增加,因为美国所有的权力机构都是通过各种形式的选举产生的,而选民所需要的就是不断地得到利益实惠,但是哪里有无限增加的利益实惠呢?结果就是压力加载到社保体系上,社保体系就要让政府预算不断地赤字,政府就只能把赤字转嫁给金融体系,金融体系再通过美元的货币政策转嫁给全世界,但是全世界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就在全体美国人民享受"美国的生活方式"的同时,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连年增加,2011 年美国就为了赤字和国债上限问题两党展开激烈的博弈,美国的信用评级被历史性地降级,美国的国债上限已经超过 14 万亿,而美国一年的 GDP 才有多少?国际上公认的债务占 GDP 比例的安全线是 60%,美国则奔着 100% 去了。这还仅仅是公开的国债,据估计,加上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隐形债务,美国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 73 万亿美元的债务巨坑。每个美国人平均从社保系统拿走 37 万美元,而存入的只有 11 万美元,每人在社保系统有 20 多万美元的赤字,对 3 亿美国人而言就是几十万亿美元。73 万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呢?每年全球 GDP 在 50 万亿美元左右。也就是说,美国 3 亿人,把全世界都花破产了一次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美国欲望与权力的膨胀超过了美国信用的增长,美国可以印钞,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货币信用支撑,则必然要面临贬值和危机。

美国这样的行为,引出了第二个限制美国的因素: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样的消费膨胀、货币膨胀,不出现危机才怪呢!由于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发起于美国内部,美国强大的军事机器根本没有用。按照危机的三部曲,在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后,必然是导致信用危机,信用问题是这些危机背后的总根源。单极世界的问题就是不受限制的膨胀下,信用是无法无限扩张的,这样的膨胀必然是信用的崩溃。

中国古代的信用体系的崩溃的体现就是土地的恶行兼并,土地兼并让古代中国人民不聊生,但古代的土地兼并是通过合法的手段经济行为实现的,与现在的华尔街大鳄的做法是一样的,现在华尔街的过分已经引发美国民众的不满了。这还是信用体系的问题,信用体系会在美国的膨胀下崩溃的。

2. 单极膨胀导致古代中国朝代更迭

我们注意到一个有价值的线索:一方面古代中国形成著名的东方朝贡体系,是东方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超过今天美国在全球的地位;但同时中国这个实力最强的国家,却又有着最为激烈的改朝换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相信,探索中国朝代更迭的动力和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单极世界的权利博弈。

说起中国改朝换代的原因,首先会想到粮食问题。按照马尔萨斯的理论,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战乱,导致人口大量减少,用马尔克斯理论解释中国的改朝换代有一定道理,每次中国的内乱,均起于饥荒。但是需要注意到,中国人口发展有特别的地方,中国清朝的人口远远多于其他朝代,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数量即使盛世也不超过6000万,一般在4000万左右。但是清朝康乾盛世时就超过一亿,到民国达到4亿,虽然有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进入中国,但是粮食的产量也没有增加那么多倍,因此古代发生战乱和朝代更迭,并不是因为粮食产量达到极限。

还有人会想到外患,确实很多朝代是被外族入侵推翻,但是即使是五胡乱华、金元灭宋、清灭明等,也都是中原王朝先出现问题,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清灭明,实际上清朝入关是在明朝被李自成的内乱灭亡之后。

还有人会想到吏治的腐败,但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消除腐败,腐败从王朝的开始就一直存在,比如朱元璋以酷刑对付贪官,也没有消除腐败,但明朝国运长久;又比如在康熙盛世,腐败也非常严重,而且互相勾结得非常紧密,以致雍正即位后整顿吏治根本无法下手,只能采取暗杀的下策。在管仲治理下的齐国是空前的强盛,但是管仲富比齐桓的生活肯定是腐败横生的。古代中国税收率不到5%,一个县只有三个朝廷命官其他的是县官雇佣的吏,这样的比例下就算是贪腐很多倍,我们看到西方一贯收取40%左右税收的贵族社会都没有改朝换代的压力,因此腐败使得民不聊生导致亡国是一个伪命题。粮食不足、外患、腐败这些因素我认为都不是引发改朝换代的根本原因,我们比较世界历史就可以知道,这些因素在其他各个国家同样存在,但其他各国却没有中国这样激烈的朝代更迭,所以这背后必定还有更加深刻的原因。

对于王朝更迭,著者个人读史的认识是中国的中央集权不受限制,导致权力无限膨胀,最终造成系统的崩溃。中国的中央集权在西方古代是没有的,西方的封建制限制了君王的权利;即使后来欧洲国家进入中央集权,但是因为欧洲是一个多极和均衡的世界,各国统治者的权力被周边王国限制。而在中国这样的中央集权无

限膨胀下，王朝的信用是难以跟上的，尤其是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一个国家利维坦的信用是难以跟上这个膨胀的步伐的。

而中国的情况与欧洲极为不同，周边国家的国力与中国不是一个数量级，根本不能形成制约。中国的王朝一旦建立，皇权就在不断加强，皇帝有几乎无限的生杀大权，这与外国的皇帝、国王实际上是很不同的，外国的皇帝本身受很多限制，地方也是分封的，国王出现经济问题还要破产，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所有中国人对于皇帝实际上是奴隶与主人的关系，皇帝在中国是国家领袖与宗教领袖的统一。中国古代皇帝就是公信力、就是信仰、就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维坦。

权力一旦不受制约，就会不断膨胀，官僚体系越来越庞大，人员不断膨胀，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比如明朝，太祖的后裔到明亡时达到了 4 万人，这些人是天潢贵胄，俸禄是极高的，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到，清朝灭亡时满族人口是 300 万人，全部被国家养着，总耗费也远远少于朱元璋的 4 万子孙，而且明朝还得负担大大小小其他高官贵族。清朝吸取明朝教训，采取了不同于任何朝代的世袭递降继承制度，铁帽子王只有六亲王二郡王，对于爵位控制极严，所以清朝容纳的人口也远远高于任何朝代。

古代以禄养廉，其中一个基础就是官员人数是很少的，一个县内官员一般就县令、县丞和教官，这样能够吃皇粮的是非常少的，每多一个官，给老百姓的负担绝对不是那个官员的一点点的俸禄，每增加一个官员就会增加各种他存在的理由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即使他不贪污也会如此，因为他要证明他的这个职务存在的必要性！所以一个朝代权力膨胀导致的崩溃，实际上体现在其官僚体系的膨胀上，国家的官员在不断地衣增加，各个级别候补的官员在不断地增加，在一个县下又有带有很多个办差事的委员，不入流的官吏数量大大增加。

权力膨胀的另外一个可怕结果是，庞大的官僚机构再派生出庞大的监察机构，监察机构一旦膨胀，又需要监察原有监察机构的新机构。以明朝为例，出于监察的需要先是设立了御史官员，然后又建立了锦衣卫，为了制衡锦衣卫又建立了宦官掌管的东厂，最后为了平衡东厂，又建立西厂。如此庞大的监察机构和监察官员，其腐败程度最后甚至超过他们的监察对象。

中国有一句老话“不患寡而患不均”，权力膨胀不受制约，不均和不公就会疯狂滋长，王朝开始的时候，饿殍遍地也不会崩溃，但是到了末年，即使有崇祯般的励精图治，也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而这样的权力不受限制的膨胀，就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纳什均衡博弈的一个体现，每一个处于统治集团内部的个体均要追求自身的最

优化策略,结果造成整体策略的低下。这也造成信用体系的失控,皇权信用体系的失控,各种权力的膨胀最终造成了信用体系的崩溃。

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不受限制地膨胀下去,权力在政治上没有限制体制,无限膨胀的结果一定是会产生更加强烈残酷的限制,信用体系是不能无限膨胀的,最后社会就一定能够产生这样的机制,这就是破坏力极大的朝代更迭,是皇权信用体系的坍塌,把一切都推倒从来。改朝换代能够成功的前提就是要整个社会相信天道改了,新的朝代是真命天子,这是一个旧的信用体系到新的信用体系的重建过程。中国今后能够长期发展,跳出朝代更迭的历史大破坏,就一定要产生限制权力的机制,形成制衡权力的稳定的信用体系,否则无限膨胀的权力总有让国家崩溃的一天。

古代中国成为单极世界后,就陷于权利膨胀和改朝换代的不断震荡过程中,是不断的信用体系的破裂和重建的过程,这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对于这样的不稳定系统全世界都在研究,所以西方国家中限制权力的机制就开始运行了,宗教和资本的力量成为政府权力的限制,而当今社会能够处于稳定的状态,就说明这样的权力限制机制的存在,对于集体低效的纳什均衡如果不崩溃,一定要发展成为能够限制个体权力最优化策略的新的博弈机制,社会才能够长期稳定,这些博弈机制是要依托一个信用体系而存在的。而对于单极世界的超级大国,没有国家能够限制它,那么限制它的力量就一定是超越主权的力量,它的膨胀必然受到它的信用极限的限制。

3. 三权分立下的美式制度腐败

三权分立,亦称三权分治,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它是指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政府机构共同存在,地位平等且互相制衡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当前世界上民主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民主政治制度。相对立的政权组织形式是议行合一制。这是一个在国家内稳定制衡的政治信用体系,它提供权力的合法来源的公信力。

三权分立制度的理论基础是17~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洛克和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提出的分权学说。这一学说有一个理论前提,即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国家权力应该分立,互相制衡。最初洛克提出的是行政与立法的两权分立,目的是用以巩固当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后来洛克的学说被演化为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形式。

三权分立产生的理论背景是西方封建制度崩盘、国家进入了资本和集权的轨

道，原来的封建的国家信用体系出现崩溃的结果。在封建的体制下是这样的一个信用体系限制权力的，分封的领主对于国王的王权是有限制的，甚至大领主的权利比国王还要大，而同时王权还要受教会和教皇的约束。但是随着欧洲国家进入中央集权、资本主义革命爆发和宗教改革造成宗教力量式微，国家的权力失去了制衡：一方面再也没有分封领主从下而上制约国家权力，同时也没有了教会和教皇从上而下制约国家权力，原有的信用体系的约束机制不存在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限制国家权力的膨胀，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三权分立理论也就应运而生了，一个新的政治信用体系诞生了，西方思想家们希望据此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

美国是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的典型国家，原因是美国独立恰好在三权分立理论提出时，并且美国没有历史包袱，建立三权分立制度没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制度建立得特别完备，成为世界的典范和楷模。

美国宪法规定，立法权属于由参、众两院组成的合众国国会，行政权属于美国总统；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国会随时制定与设立的下级法院。根据三种权力相互制衡的原则，美国宪法还规定，国会有权要求总统条陈政策以备审议，批准总统对外缔结的条约，建议和批准总统对其所属行政官员的任命，通过弹劾案撤换总统，有权建议和批准总统对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宣告惩治叛国罪，弹劾审判最高法院法官；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法案拥有有限的否决权，副总统兼任参议院议长，总统还拥有特赦权、对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和任命权；最高法院法官在总统因弹劾案受审时担任审判庭主席。此外，根据惯例，最高法院有权解释法律，宣布国会制定的法律违宪无效。

政治信用体系的先进和运转良好，使得美国建国后在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也是美国的内在竞争优势，在美国的榜样之下，全世界实行总统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逐步修改本国的制度模式，模仿美国的制度后一般都采用类似的三权分立形式。但是在当今世界，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却受到了挑战！设立三权分立制度之初，世界呈现多极相互制约的局面，最强如英国，即使称霸海洋，但是对欧洲大陆仍然无力插足。但是发展到美国称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后，情况就不同了，美国的军事、科技、金融力量渗透整个世界，成为没有制衡的单极。

三权分立是圈定在一个国家内的，每一方权利都为争取自己的权益最大化而博弈，如果这个国家的行为在世界上不受限制，这些权力对内虽然受限但是对外却没有了限制而无限扩大，这样的膨胀会造成国际信用体系的重大问题，其结果一定

就是灾难。

美国的议会和总统都由选举产生,每一个想当选的政客都会向选民承诺更多的利益,谁说要限制选民的利益谁肯定竞选失败。不断地给选民利益且不能减少,造成选民的胃口越来越大,以前对于这样的膨胀是由国家的承受能力限制的,现在国家成为世界的单极而不受限制,选民的需求就无限膨胀成为绝对的权力。这样的膨胀就是选民要求的福利待遇等无限的扩张,国家就不得不大量赤字和不断负债,造成央行就不得不不断印钞来满足其需要,这样的恶性循环必然要破局的,这要造成国家和央行的信用危机,美国已经因此百年来首次被评级下调。

还是那句话,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腐败真正的含义本质就是信用体系的溃烂。这里的腐败是广义的,不仅仅是狭义的贪污受贿,也有国家机器的朽毁,即使是在独裁年代,绝对权力给国家的损害也不仅仅是贪污受贿,还要包括过度的骄奢淫逸和穷兵黩武等等。而美国选民的过度的社会福利造成国家资不抵债的赤字,以及美国汽车业工会把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搞到超过大学教授造成整个汽车业的垮台,都是这些选民们的绝对权利造成的骄奢淫逸的表现,同时美国对于世界的穷兵黩武激发恐怖主义的盛行,等等因素,已经让大家看到这个绝对权力所带来的制度性的腐败,美国的腐败是全民腐败,不到5%的人口消耗世界45%的资源,这样发展下去一定是整个世界的灾难。美国的负债不断的突破赤字不断的提高,仅仅奥巴马总统执政的3年美国国债就增长约3万亿美元,马上美国国债就要奔15万亿美元了,几乎各学派经济学家都认为,若政府再不祭出具体作为,那么庞大国债将引爆下一次全面性经济危机。目前看来,加税或缩减联邦福利与服务,是解决国债问题不可避免之道。但是对于美国的民选社会,谁对选民说要加税和降低福利,谁就要竞选失败了。

而这样的选民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造成国家难以承受的压力,本身就是一个非合作的纳什均衡的实例,每个个体对于自身策略的最优化策略的追求导致集体策略的低效,如果这样的低效长期发展下去,一定是信用体系的崩溃,因此需要的就是改变纳什均衡博弈使之成为一种新的博弈形式,把非合作的博弈均衡变成合作式的博弈均衡,这样在博弈的过程中权利是受到限制的,在繁殖无限资源有限的自然界,早就形成了这样的进化稳定博弈策略,世界的一体化也就是这样的进化稳定策略的一种体现,进化稳定一旦形成,突发的变异就会被淘汰,因此让人们的经济行为在金融资本层面形成进化稳定状态,让人们的意识形态在信仰上形成进化稳定状态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原来的三权分立无法解决的问题,是世界博

弈的新机制。而进入进化稳定博弈状态,也是建立一种新的信用机制。

国家权力膨胀、选民权利膨胀所产生的制度性腐败,威胁国家的信用体系,原有的三权分立制度是无法限制的,现在需要的是对于大国绝对权利的新限制和一个新的制度规则,因此超越主权的权利分立与制衡的背景就产生了,新生力量与国家的强权达到了新的平衡,这个世界才能够是一个稳定、和谐、繁荣的世界。这样的新机制的博弈是要依托信用战争来完成的,新的机制应当是一个由宗教、资本和超级大国等共同构筑的机制,对于这样的新机制当中的位置和主导权,就是当今世界争霸的目标。

4. 当今危机的根源:单极金融霸权

2008 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直到现在依然没有过去,欧债危机至今还在不断发酵,原因就是美国和美元主导下西方的单极金融霸权无限扩张。

当下的全球性危机首先就是表现在金融层面,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因为给信用不好的人贷款买房,这就是次级贷款,次级贷款证券化以后就是次级债,最后贷款人还不起贷款以后发生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引发了次级贷款危机,次级贷款危机再发生了经济危机!但是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总计才 7 ~ 8 万亿美元,其中次级贷款只有 1.5 万亿,房地产的崩盘所造成的损失才 4000 多亿,到 2008 年金融危机时这些债券的发行金额大幅度减少,根据 ESF(European Securitisation Forum)统计,于 2008 年 6 月发布的 2008 年第一季度报告,欧洲与美国发行的资产类证券(ABS)、住房与商业抵押证券(RMBS)与债券抵押债券(CDO)的发行总额,分别达 4537 亿欧元与 24049 亿欧元。虽然是欧美银行的金融杠杆很大,但是总额是有限的!根据汤森路透数据:由于信贷危机加深,投资者纷纷撤离,美国资产支持证券(ABS)2008 年发行额较上年暴跌 82%,至 1,598 亿美元,2007 年此类证券发行规模达到 8,980 亿美元。由于市场流动性枯竭和发行方融资成本飙升,ABS 在 2008 年最后一季的供应总额仅为 36 亿美元,上年同期为 1,063 亿美元。摩根大通在 2008 年承销的 ABS 规模居首,共达成 67 笔交易,总承销额为 311 亿美元。这样低迷的发行量下又如何能发展成为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呢?想一下救市就动用了多少亿?西方央行又印钞了多少亿?美国危机以来的国债增幅超过 3 万亿,美联储的二次量化宽松购买了 16000 亿,怎么可能会有持续的危机呢?次级抵押贷款给没有信用没有房的人贷款让他们买房住,这不就是政府的福利保障房吗?两房也是被公认的美国政府最大的赞助企业,这个解释是有阴谋的,是绑架政府让政府埋单的做法。

西方真正的金融问题是金融衍生品的问题,而炒作金融衍生品的资金来源也是依靠发行次级债得来的,同时次级债需要信用掉期合约CDS的担保,CDS也是金融衍生品,炒作CDS的资金还是次级债得来的,这就是一个死循环!这样的死循环造成了数百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虚拟市场,在大宗商品暴涨以后,这些炒作大宗商品期货的金融衍生品损失是很大的,带动次级债的风险增加,CDS的风险更大,这在金融杠杆当中是资金逐级放大、风险也逐级放大的过程,最后就是数百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虚拟市场的崩溃。这些市场中不但发行的金融衍生品数量巨大,而且是杠杆率极高的,次债危机前的2006年,在98.7万亿美元的利率衍生产品中,摩根大通独占鳌头,占有74万亿的份额。在金融领域中,用10:1的资金杠杆比例进行投资已属非常"冒进"了,100:1则是"疯狂型"投资。美国财政部公布的2006年第二季度的商业银行金融衍生市场报告中指出,美国最大的五家银行,摩根大通、花旗集团等,占全部902家银行金融衍生产品总和的97%,收入占94%。在所有银行金融衍生产品类别中,规模最大的是"利率产品类",占整个盘子的83%,名义价值为98.7万亿美元。摩根大通做利率衍生产品时的杠杆潜在比例竟然高达626:1,堪称世界之最。

在危机当中这些控制国家的金融寡头把爆发危机的责任转嫁成为穷人的保障房贷款的问题,所以才有流行的次级贷款到次级债再到金融危机的解释,结果就是政府大规模的投入资金救市和政府赤字和负债双增加,随后政府的赤字和债务危机又阴霾不去了。

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单极的世界金融资本的行为不受限制,不受限制的膨胀已经透支了信用的极限,如果受到限制的话,金融资本是无法不断地加大杠杆介入次级债的,而炒作金融衍生品也会受到限制,衍生品的数据就将是公开的,在数据公开的情况下,市场进入到死循环的情况下大家是都可以看到的!而美联储的做法就是公开宣称不监管金融衍生品的政策,最终使得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失控!而美联储不监管不公布金融衍生品的数据,不等于美联储不知道这些数据和数据当中显示的风险,这里面肯定是有人得利的,因为金融衍生品是一个零和的博弈,有人亏损就要有人赚钱的,大家都亏损了那么谁赚钱了呢?美联储是私人机构,他的股东和控制者不知道吗?这里不要说什么阴谋论,这里是根据社会常识和逻辑关系进行的判断,这样的判断在西方司法上的说法叫做自由心证!

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无限扩张的金融体系的信用破裂的过程,这过程当中伴随着重大的利益转移,这利益转移就是一场信用战争,现在这个战争依然在

继续,大家要为决定谁是胜利者、谁是埋单者而殊死奋战,全球的信用战争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

5. 信用战:全球大棋局

当今,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样的全球化,就是建立一个全球的信用体系,这个体系的建立是需要激烈的信用博弈乃至战争来完成的。对于这样的全球化趋势,可以从下面的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联合国成立了,虽然这个国际机构被强权所左右,但是在冷战时期,也是世界各国维持平衡进行博弈的舞台,有力地降低了正面直接武装冲突的可能。在苏联解体后,美国对于联合国的主宰作用越来越强,并且有绕过联合国独自行动的情况,但是联合国对于强权的制约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在联合国框架外,北约的力量在扩大,虽然陷入危机但欧盟的形成也是制衡美国权力的产物,还有大量的区域化组织在建立自己的信用体系,同时如 G7、亚太经合组织(APEC)、泛太平洋合作组织(TPP)等全球或区域组织也逐渐形成,这些国际力量的壮大,使得国际外交关系不再是国与国的博弈,而是全球一盘棋了。

从经济和金融角度看,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占一国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成立后,国际关税贸易和金融统一了规则;产业制造在不同的国家间进行了整合和分工,各国间经济的关联性也越来越强。这里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齐了信用,这样的全球分工合作就是一个新的信用体系,这样的信用体系的建立,打破了原有的宏观与微观的疆界,在某个国家内部本来是宏观的事情,放到全球就是微观的了,而某些经济微观环节在一个国家内达到空前规模,也就变成宏观的了。

以上情况使得现在的人流、物流、资金流都处于国际化的状态,成了一个信用体系内的经济活动,从而在这个信用体系上围绕着人流、物流、资金流进行的政经博弈也一定是一个统一的国际化的状态,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棋局就形成了。而这样的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就是把全球各个要素的博弈从非合作的纳什均衡博弈变成了进化稳定博弈,形成全球信用体系,那些不加入全球一体化和不按照全球规则运行的突变个体将被淘汰,所以中国在国际金融、贸易和货币等问题上融入全球社会就是必然的了。

金融发展到资产证券化的今天,实际上就是把以前不作为商品流通的资产也变成了可以流通的商品,这样就使得再次分配世界财富成为可能。在贸易时代,只有少数的财富可以在国际间流通,但是在金融时代,所有财富都可以通过资产证券

化在全世界流通。经此一役,所有国家的财富都放到了全球博弈的棋盘上。同时,金融体系不止是通过资产证券化把已有的财富放到博弈的舞台,而且通过期货、金融衍生工具等,把未来的资源和财富也放到了博弈的棋盘上。这个信用体系是要把你的过去、现在、未来放到同一个体系内进行博弈和再分配的。

在全球一体化的格局下,当美国的权力膨胀成为世界单极,美国国内的各种势力,就会在美国强权的护航下,发展成全球化的势力,这些原来在国家内部运作和膨胀的势力,在国际化的舞台上会重新受到限制,它们的受限反过来也限制了单极国家权力的无限膨胀,世界的平衡重新产生了,不过这个平衡是要不断面临危机和斗争的,围绕这个信用体系的权利斗争,博弈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金融这样的平台,包罗了当今世界的各种经济因素,就是各种势力博弈的舞台,是信用战的战场。而本轮全球信用博弈的结果将决定美国单极霸权的结局。

美国前总统布什有一句名言:“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他们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对于这段话语,我们可以有另外的理解——如果把美国比作单极世界中的统治者,那么全球各种力量博弈的最大目标,就是通过新的权力博弈,把这个统治者关进规则的笼子,不能让它为所欲为,这是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的关键。而这个笼子,就是一个公平的信用体系。

二、负利率在为08年危机埋单

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年CPI涨幅达5.4%,大幅超过去年年初设定的4%的目标。这个涨幅也是近三年来的最高值。不过,好的趋势是2011年12月份的CPI仅仅上涨4.1%,创下近15个月以来的新低,物价上涨让市民钱包缩水的局面有望在今年改变。此外,《广州日报》关注了通胀给百姓生活带来的另一个影响:以2011年的通胀水平计算,定存一万元钱,一年将亏损190元。这就是当今全球进入负利率时代的现状。

其实现在全球都是负利率,不要看中国的定存最后一年下来可能是亏了190元,看一下现在西方国家的通胀率是2%左右,但西方国家利率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现在金融全球化以后,全球的差距就要拉齐,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不搞负利率而是

维持正利率的情况下，就会有更多的热钱到中国来；这些热钱到中国来以后，央行被迫因外汇占款增多而自动增大人民币的发行，这就要被迫造成更大的通胀，被迫把利率跟世界水平接轨。不要简单地说中国的负利率有问题，其实全球已经就是处在负利率的阶段，实际是通过存款缩水为2008年的危机埋单。要认识到全球一体化的博弈，而且这个博弈会变得异常激烈。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在通胀的模式下欧美等国是怎样应对的？金融危机下美国为什么把利率一下子降低到几乎为零，来一个彻底的负利率，而且在经济好转以后还继续保持这样的超低利率？从2007年9月开始到2008年12月底美联储连续九次降息，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5.25%下调至0.25%共下调500个基点，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走完了所有的降息路。利率调整政策力度之大，速度之快，十分罕见。其他欧美发达国家也是这样，在美联储实行零利率政策数周后，英国也正快速向其迈进。2009年2月5日，英国央行将其基准利率下调了50个基点至1%；捷克央行也将基准利率降低50个基点，至1.75%。英国基准利率此次已降至创纪录低位。即便在1930年大萧条时期，英国利率也没有低于2%，为英国1694年设立央行以来的最低点。欧洲的利率也一直处于降息通道，在危机以来就是不断地降低利率的呼声，导致欧洲利率一降再降，欧洲央行理事会(ECB's Governing Council)2010年9月2日宣布，决定继续将基准利率维持在1%的水平不变。据悉，在过去的17个月，欧洲央行一直将其基准利率维持在1%的历史最低水平。此前接受彭博社调查的57位分析师也曾悉数预期欧洲央行不会改变其利率水平。

我们还要注意到的就是央行对于人民币的海外利率政策与国内利率政策不同，也是实行的负利率，这样的负利率也有利于增加投机人民币升值热钱的成本。人民银行突然宣布自2011年4月1日起将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利率下调27个基点，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央行在此后的一周内加息，宣布于2011年4月5日提高国内人民币利率0.25%，相比香港的人民币离岸利率不足1%，国内人民币的贷款利率早已经高于5%，目前为6.31%，而存款利率也是3%以上目前为3.25%，高于香港人民币海外利率很多倍。

经济学家还表示，因美国经济再次出现衰退迹象，并且有可能对欧洲地区经济带来冲击，欧洲央行有可能将向银行提供的无限制流动资金的举措至少延长至2010年年底以后，直到2011年初再开始讨论退出策略。目前，美联储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维持在0到0.25%之间。同样的欧元区16国也是再融资利率1.0%、边际贷款利率1.75%、存款利率0.25%的超低利率。对于这些超低的利率如果计算了

通胀率,就是实际上的负利率。但是他们对于中国的说法就不同了,2010 年 4 月,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撰文表示,“中国负利率问题严重,加息不宜再拖”。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和他们自己完全不同的做法,我们不应当引起警觉吗?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中央银行于 2010 年 10 月 5 日决定进一步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把银行间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从 0.1% 下调到 0 至 0.1%,实际上时隔 4 年多再次实施零利率政策。与此同时日银当天还宣布考虑购买长期国债和其他资产,以防止日元升值拖累经济复苏。日本的央行购买长期国债,实际上就是西方货币发行体制的不折不扣的印钞行为。

美联储、日本和欧盟搞负利率是出于他们的利益需要,美联储低利率直接的结果是造成已经发行的债券升值,使得新债券容易发行,这些债券就是在固定利率下资产证券化的债券,在通胀的模式下美联储反而实行的负利率,利率下降债券等固定利率的金融产品升值,以此保障了市场流通的债券的价值。与此同时对于股票的估值也会因为利率的下降而提高,在通胀的背景下使得股市可以更快地膨胀,以此可以吸收大量的流动性,使得资金流向证券市场的虚拟领域进行消化,避免过多的资金流向实体投机领域囤积居奇,避免了金融危机的深化和进一步发展到恶性的通胀,否则一定是恐慌性的抛售债券抢购商品造成恶性通胀。

更重要的就是西方金融体系已经进入了虚拟时代和金融衍生品泛滥的时代,这些债券、股票只不过是这些虚拟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基础支撑,通过降低利率保障了这些金融衍生品的基础证券的价值,也就支撑起了原来摇摇欲坠的金融衍生大厦,如果高利率使得股票债券的价值崩溃的话,那么衍生了多少倍的金融衍生品就更要崩溃,这样的大厦倒塌下来就将要释放海量的货币,最后的结果就是恶性通胀必然要发生了。而实行了负利率的结果就是使得债券、股票和货币比实体经济更加保值,因此我们看到的是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下石油的下跌速度和幅度要快于道琼斯指数的下跌速度和幅度,美元汇率反而大涨,石油、有色金属等能源、资源、原材料的下跌使得陷于危机的实体经济的成本反而下跌很多,从而使得实体经济得到喘息。但是如果反过来让利率增高的话,股票、债券以及建筑在这些证券上的金融衍生品价值崩溃,涌入实业和资源领域的资金就要把资源进一步的炒高导致实体经济的崩溃。

更重要的就是负利率实际上是在通胀经济模式下分配资源的方式,在通胀的博弈下出现经济金融危机造成社会普遍损失的时候,合理分配各方的损失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采取正利率,结果就是这样的损失完全由实体经济承担,金融体系是

不承担损失的,因为实体经济需要融资成本高于通胀而实体经济必须持有备付现金、要忍受通胀的盘剥,结果就是通胀下财富从实体经济流向金融体系,并且还有可能像前面论述的那样利用通胀下实体经济的现金流问题占有抵押财产进行渔利,这样的结果一定是诱发金融领域的投机使得通胀更加强烈,相反的如果实行负利率政策使得金融业也在通胀中承受损失,那么金融资本本身就有抑制通胀的强大需求,而且负利率使得已发行债券和股票增值,也保护了金融资本的利益,同时在实体经济必须持有大量备付现金的情况下,金融业的资金成本本身就是负利率的,这样的结果就是在负利率的情况下社会财富得以合理分配,产生抑制通胀进一步发展的负反馈,保障通胀不向恶性通胀发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在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通胀压力巨大的时候,西方国家普遍的做法是采取负利率的政策,而且西方二战以后一直是长期通胀却没有恶性通胀,即使是经济金融危机的时候也不发生恶性通胀,其中的原因与通胀下西方的负利率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却极力排斥负利率,似乎只要是负利率就是重大的金融风险,为什么我们的政策取向与世界背道而驰,这背后的经济利益、部门利益的取向是不可忽略的。

而在西方负利率下的社会方面,由于社会上的货币持有者是富人而穷人多是借钱,负利率的实行使得穷人在危机中收入减少的情况下,贷款消费所承担的利息减少,促进了穷人的借款消费,穷人的消费是社会需求的主要来源,在西方需求经济模式下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负利率恰恰保障了这样的利率。而对于富人看似在货币购买力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他们也可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富人们还持有大量的股票和基金,在股票和基金上负利率是非常有利的,如果富人还投资有产业,负利率对于他们所投资的产业也是财务负担降低非常有利。美国社会在股票和共同基金上,1% 最富有家庭拥有的资产额占全部股票和共同基金额的38.3%,接下来9%富有家庭拥有的资产额占全部股票和共同基金额的42.9%,而余下90%家庭拥有的资产额仅占全部股票和共同基金额的18.8%。在投资资产上,1%最富有家庭拥有的资产额占全部投资资产额的49.7%,接下来9%富有家庭拥有的资产额占全部投资资产额的38.1%,而余下90%家庭拥有的资产额仅占全部投资资产额的12.2%。这样美国社会在负利率面前各方得利是平衡的。即使是金融业在负利率下收益下降,但是也避免了货币的立即贬值,而在本来应当有所收益的货币资金时间效益变成了负值,成为一个时间换取空间的游戏,把本来要贬值的空间置换成为负利率下的时间,通过时间的磨合把本来激烈的矛盾冲突变成了缓和、渐变的过程,这样的渐变就使社会、经济各个方面有时间调整、缓冲和适应了。

负利率埋单的结果,就是挤爆了西方的社会保障体系。西方人民的养老钱都是以各种存款、债券等形式存在的,依靠养老金等社保生存的人群是西方的弱势群体,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长期负利率对于这些社会弱势群体是非常不公平的。

背景阅读:《纽约时报》文章《低利率政策严重损害美国储户》

http://www.sina.com.cn2012年03月05日23:54 新浪财经微博

导读:《纽约时报》今日刊载该报专栏作家兼助理商务和财经编辑格雷琴－摩根森的(Gretchen Morgenson)文章称,根据美联储理事萨拉－布鲁姆－拉斯金上周四言论所传递出来的信息,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文章指出,对于美国储户而言,低利率政策已经对其造成了很大影响,导致他们银行账户中的存款几乎不能给其带来任何收益。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全文。

不要再无故抱怨了。

那就是上周四传递给美国人的信息。而在当下,美国人银行账户中的存款几乎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收益。

这一信息来自于萨拉－布鲁姆－拉斯金(Sarah Bloom Raskin),她是美联储的内部人士。作为美联储理事会中的一员,拉斯金以常有的方式作出了"免责声明",称其言论仅反映她自己的想法。但美联储观察家指出,她的言论很可能映射了美联储内部的观点。

现在的问题——像任何正在寻找能创造利润的投资者都知道的那样——是美联储将利率下调至接近于零的水平,来为大型银行以及在这些银行助力下被推落悬崖的经济提供支持。时至今日,没有做过任何事情来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储蓄人则正在受到惩罚。

这是美联储在拯救金融系统的过程中最令人感到困扰的悖论之一。而且,根据拉斯金的言论,这种悖论很可能还会继续一段时间。

因此就别再抱怨了,美国人——如果这对金融体系是好的,对你们是好的。

是的,这就是拉斯金在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Westport)发表演讲时所传递出的信息,她同意低利率对储户造成了压力。但她随即就开始颂扬创下历史最低点的利率能给普通美国人带来的好处。

"许多家庭都正在得益于较低的利率水平,而对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持批评意见的一些人士看起来正在极度看轻这一点。"发布在美联储网站上的拉斯金言论中有这样的内容。"汽车及其他家庭耐用品的购买活动可以获得更加廉价的融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家庭都有能力对其抵押贷款进行再融资,使其变为利率

更低的贷款，从而释放其收入来用作其他用途。”

很明显，拉斯金最近并未尝试对住房抵押贷款进行再融资，而我曾这样做过，其过程十分繁琐、冰冷，甚至会把人气死。将潜在借款人放到“榨干机”中是银行的特权，而我没兴趣重返那些 E－Z 贷款“反斗城”的日子。

但是，那种有关最近以来有成千上万人都能对其抵押贷款进行再融资的想法有些乐观了。在我对抵押贷款进行再融资时，我的信用分是 800 分左右，而贷款的价值仅相当于房产价值的 30% 左右，而且房屋净值还在。鉴于这种经历，有一件事情似乎变得很明显，那就是那些陷入困境的借款人——其中包括那些房屋价值低于抵押贷款价值的借款人，以及那些最需要援助的借款人——能对其抵押贷款进行再融资的可能性最小。

美国经济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研究员、曾在克利夫兰联储担任法律总顾问和研究官员的沃尔克－托德（Walker F. Todd）表示，对于美联储政策给储户造成的代价，拉斯金应该知道得更加清楚。

“她毫无忧虑地假设能以当前利率在对其抵押贷款进行再融资的所有人都已经这样做了。”托德说道。“她无视信用分以及银行为这些再融资活动收取的令人忍无可忍的服务费所带来的后果。我愿意邀请任何人跟我一起去造访克利夫兰任何一家银行的本地分行，来询问一下到底需要什么条件才能以当前宣传的低利率来进行再融资。”

拉斯金曾担任马里兰州金融监管负责人，还曾在华盛顿监管顾问公司 Promontory Financial Group 中担任董事总经理。当我在上周五要求与拉斯金进行记录在案的公开访谈时，她的发言人称其没有时间。

但在韦斯特波特发表演讲时，拉斯金对低利率对投资者造成的影响未予重视。她表示，不到 7% 的家庭资产是以存款证、储蓄债券以及诸如此类的方式直接持有的，而“大多数的家庭财富都是以股票、退休账户、公司股票和不动产的方式持有的”。她说道：“对于这些类型的资产而言，回报率主要依赖于经济的强度以及经济能以多快的速度实现增长。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回报应该能获得我们现有的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

但是，拉斯金所援引的 7% 这一数字来自于 1998 年～2007 年之间收集的数据，也就是金融危机发生以前。在住房价格仍在下跌的形势下，消费者所持有的房屋净值贷款（指授信申请人以贷款人认可的住房或商用房作抵押，向银行申请具有“合法用途”（如购房购车、个人流动资金）的单笔贷款或循环额度的个人授信业务）已经崩溃。与此同时，有理由猜测以避风港账户持有的家庭资产百分比已经有所上升。

考虑到美联储在2014年底以前将基准利率维持在接近于零的计划,看起来这项政策将会维持6年时间。对于储户来说,那会是一场漫长的“干旱”。但根据拉斯金的观点,这是为健康的经济所付出的小小代价。

到现在为止,美联储已经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实行这项计划。是的,我们确实看到这里或那里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是,财富从储户口袋中流出的趋势也已经变得十分重大。在汽油以及其他商品的价格上涨的形势下,这把“老虎钳”正在变得越来越紧。

“我们正在迅速地接近一种状况,”托德说道,“那就是国会和政府不愿面对就住房融资和信用报告/信用分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的需求,原因是这样做会让银行家亏钱。”而与此同时,大型银行们正在“悲痛地”抱怨增强后的监管措施,但却闭口不提监管措施在帮助消除危机的问题上所起到的作用。

“政策制定者确实需要考虑一下我们正在向银行转移什么。”托德说道。“为何公众有义务向它们提供所有那些补贴?没有哪位政策制定者会问这些问题。”

这真是一种奇耻大辱。(金良/编译)

三、谁为危机埋单的博弈

2008年的金融危机,产生了大量的资产损失,这些损失由谁来承担,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爆发的信用大战中各方博弈的关键点。

负利率政策本身就是让债权持有人为危机埋单,因为货币存款是对于银行的债权,货币本身就是央行的负债,而各种借贷成本的降低就是资金持有者的损失和贷款人的得利,在西方的社会各种债权债务是被高度证券化的,债券成为市场化承担损失的主流,在债券的市场交易当中,让持有债券的债权人的财富不断缩水。

但是随着危机的发展,在美联储、欧洲央行等把利率降低到接近为零,负利率已经不能为危机埋单的时候,就要有现实的债权本金损失了。对于次级债损失的相关人,有次级债的债券持有人,也有给这些债券进行信用担保的人,现在问题的焦点是到底由债券持有者还是担保人承担损失。

信用违约掉期是由信用卡贷款所衍生出来的一种金融衍生产品,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金融资产的违约保险,债权人通过这种合同将债务风险出售,合同价格就是保费。购买信用违约保险的一方被称为买家,承担风险的一方被称为卖家。双方约定如果金融资产没有出现违约情况,则买家向卖家定期支付“保险费”,而一旦发生违约,则卖方承担买方的资产损失。在信用违约掉期中,1个基点的价格相当于每

年1000美元,可保护1000万美元的债券在五年时间里免于违约。

2011年11月25日据路透社报道,欧元区成员国正在讨论将私人部门投资者排除于2013年开始实施的永久援助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ESM))之外。德国坚持要求银行、保险公司等私人部门投资者承担援助希腊的部分损失,这里就是CDS持有者德国与债权持有者的博弈了。欧元区成员国起初同意将相应条款写进永久援助基金ESM,强迫私人部门参与。但现在欧元区多数国家希望将这些条款移除,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所有外围国家都支持这样做,反对的只有德国、芬兰和荷兰。

到底谁来为金融危机的损失埋单,是下面博弈的一个焦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大鳄们主要持有CDS,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大量公众投资者是主要持有债券,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阵营,现在围绕着欧债危机的希腊援助等问题,正在展开激烈的博弈。

危机是按照金融、经济和信用的步骤发展的,到了债券持有人、还是CDS持有人承担损失的时候,信用危机就开始了,所以现在围绕的是希腊开始的欧债违约危机,违约本身就是失信的行为!而让信用掉期合约承担损失,造成信用掉期合约危机的话,就将立刻引爆一场巨大的信用危机,真到了那一步,就到了信用战全面爆发的阶段了。

而信用战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新的信用体系,在当今的危机下原有信用体系的格局要彻底改变。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将打破原来信用体系的平衡。世界危机是按照金融、经济、信用三段发展的,在0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其后就是现在各国巨大失业率下的经济危机,其后就应当是信用危机了,信用危机的解决是要建立新的信用体系为最终的解决方案的。

只有新的信用体系在各国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地建立,信用战争才到了告一段落的时候。战争总是从利益之争到损失巨大,再从损失承担发展到新的瓜分体系,信用战争也不例外,这就是战争的一般路线图。

第三部分
当今世界信用系统性崩溃

导读：西方信用社会的核心就是社保体系，与中国人自己攒钱和养儿防老不同，西方人是要依靠社会保障体系生存的，这个保障是西方人生存的信心来源，这个体系也是西方最大的信用体系，如果这样的体系破局，将对西方社会造成颠覆性的影响，但是在西方金融危机影响下，西方社保体系正在承受巨大的压力濒临破局。这种破局源于西方人的贪婪吗？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简单，西方的统治者是金融资本，这里面有不受控制的掠夺和谎言，西方的社保体系实际上是被金融掠夺的负利率政策挤爆的。一切蔑视信用元规则的行为，都必将为信用元规则所惩罚。

第十章 次债谎言与信用危机

一、次债危机被错误解读

1. 次级债误区：被畅销书扭曲的概念

这里首先纠正国人的一个误区，就是大家对于次级债的理解，往往将“次级债”(Subordinated Debt)与“次级抵押贷款”(Subprime Mortagages)两个概念弄混淆。次级债可以是3A评级的优质债券而未必是垃圾债券或者不良资产，次级抵押贷款对于银行而言是债权而不是债务，但这两个概念往往被偷换，而就是这样一个低级错误居然为中国经济界普遍接受。次级债(Subordinated Debt)是指固定期限不低于5年(包括5年)、除非银行倒闭或清算不用于弥补银行日常经营损失，且该项债务的索偿权排在存款和其他负债之后的商业银行长期债务，可见“次级债”概念的核心是清偿顺序的“次级”。次级债在大多数国家已成为银行附属资本的重要来源，对银行提高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加强市场约束力等具有重要作用。

次级债是巴塞尔协议确定可以作为银行次级资本、算作银行资本充足率，那么银行资本怎么可能是垃圾债券或者不良资产？我国的银行为了补充资本大量发行次级债，这些国有大行的次级债是垃圾债券吗？次级债的实际意义是债务清偿顺序处于次级而不是债券本身是次品，次级债对应的应当是优先股，不用于弥补银行日常经营损益的背后是有些次级债按照约定清偿顺序甚至不如股权，但是清偿顺序低不意味着债券的信用就低，次级债不但可以成为3A级的债券，次级债还可以优于清偿顺序比自己优先的同样一个机构发行的一般债券，因为一般债券虽然在次级债前面清偿，但是次级债的抵押物是可能比机构其他资产要更值钱的资产，次级债抵押物是次级债评级的关键，同时次级债的担保和保险也是次级债评级的关键，因此次级债的是否优良关键是要看其抵押物和信用保险的情况的，07年次债危机的问题就是次级债的抵押物房产大跌，抵押物不足值了，08年的金融危机则是信用保险的危机，在抵押和保险都出这样的问题基础上相关债券才是垃圾债券。

很多人把次级债与次级抵押贷款混为一谈,次级抵押贷款等高风险贷款,通过信用保险和资产打包以后,以出售次级债的方式收回贷款,同时形成了次级债市场和信用保险的再保险衍生品信用掉期合约,2007 年是次级债危机,2008 年是信用掉期合约危机,两个市场出现关联危机。次级债的“次级”是指债务清偿排序上处于次级位置,而次级抵押贷款是指借贷客户偿债能力较差,二者不是一个概念,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国家的国债也是次级债,因为这些国债的清偿顺序位于国家“必要的”开支之后。

更重要的是由于次级债债券持有人难以判断债券的好坏,出于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等原因债券也不能如股票一样公布全部公司信息或者债券抵押物的变化等,因此次级债是需要有信用保险的,而保险公司无力单独承担风险,它再把担保的产品变成金融衍生品在市场上销售,让市场共同承担风险,这就形成了信用掉期衍生品(CDS, Credit Default Swaps)市场。

这里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对于次级抵押贷款的资产证券化,可以发行次级债,也可以发行普通债券筹集资金,由于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规定次级债可以作为银行的次级资本计算进入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因此银行才倾向于发行次级债,发行次级债是要付出购买信用保险的代价的,而对于银行的优良贷款的资产证券化,银行照样是选择发行次级债,而银行为了补充资本也可以发行次级债与贷款没有关系,银行还可以发行次级债筹集资金,筹集来的资金可以发放次级抵押贷款,也可以发放其他贷款,还可以使用这些贷款给证券、期货市场上的投资者融资,甚至自己投资于金融衍生品等,因此次级债根本不是完全对应于次级抵押贷款的,也不存在先要次级贷款证券化成为次级债这样必然的先后次序关系。更进一步的是次级债还可以由保险公司等非银行机构发行,例如:像 2011 年来,中国人寿、平安人寿、太保寿险分别获准发行 300 亿、40 亿、80 亿的次级债,合计 420 亿,远远超过去年的次级债发行规模。所以次级债与次级抵押贷款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而对于次级抵押贷款,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也不是不良贷款,只有还款出现问题的次级抵押贷款才是不良贷款,而优良客户的抵押贷款如果还不上也是不良贷款,银行的次级抵押贷款在放贷的时候都是信誉良好和安全的,因为对于次级抵押贷款银行是要求有信用担保的,有了信用担保对于银行贷款就安全了,就如我们的消费贷款对于某些人银行也是要求担保公司担保的,担保公司进行担保以后贷款的信用就足够了银行资金也安全了。这个信用担保在未来也可能要进入 CDS 市场的,未来银行将这些抵押贷款打包发行债券时,这些信用担保也就同时被打包了,

成为所发行的次级债的 CDS 了。次级抵押贷款之所以会利率浮动，不是我们中国那样的央行调整利率贷款利率随之调整，而是要按照其信用保险价格的调整而调整，在市场风险大的情况下 CDS 的暴涨直接导致了浮动的利率暴涨，贷款人难以承受。

对于次级抵押贷款，之所以成为次级抵押贷款贷款的信用不足，除了贷款人的信用记录以外，抵押的折扣不足使得房屋变现时折价难以让抵押物价值足值偿还贷款是重要的因素，而更重要的是这些贷款人没有其他居所，贷款人破产以后银行止赎收回房产也不能将其赶到大街上流浪，只能让他们继续居住在房屋内直到其有能力获得其他住所为止，这样所有权中的占有和使用的权利就无法实现，这些房屋就难以取得完全的所有权，对于这个问题在房贷律师意见当中是必须写明的，美国房价是土地很便宜主要是房屋建筑价值，在人工很贵的情况下砖瓦房是木制房屋的几倍价格，大量的房屋是木头的时间很不耐久，不能及时占有的损失是很大的。

相比之下中国的住房抵押消费贷款，如果是唯一住房的贷款人银行也会要求贷款人提供其他住所的证明。由于这些贷款不能取得抵押物完全的所有权，这样的抵押就是有瑕疵的，对于抵押物有瑕疵显然是最大的贷款信用问题，但是这些无房户恰恰是社会不安定因素，政府是应当承担责任的，美国的两房给这些人放贷和发行次级债，是带有社会公益性质的，两房也是有政府背景的公司，是美国政府赞助企业，因此在危机前大家把两房的次级债的信用视为政府信用，因此对于这些债券的问题市场上会认为应当由美国各级政府承担最终的责任。但是危机发生了，美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财政严重困难，对于这个问题是有意地回避了政府的责任。在社会舆论压力下，直到 2008 年 9 月 7 日，美国政府宣布从即日起接管两大机构。但是美国的接管的做法是让两房退市，让里面的问题不透明起来，总给人以阴谋的感觉。

因此现在国内的所谓专家讲次级债是次级贷款资产证券化而来的垃圾债券，是混淆了次级债和次级抵押贷款的概念，二者是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的。同时带有次级债就是垃圾债券，次级抵押贷款就是不良贷款两个根本性的错误，他们的概念是充满了错误和扭曲的，所以他们对于 08 年的危机的解读完全是似是而非的。因此我们也知道了次债危机和次贷危机的背后不是那样完全相同的。

名词解释

Sub – prime mortgage

次级贷款或次级按揭,是为信用评级较差、无法从正常渠道借贷的人所提供的贷款。次级贷款的利率一般较正常贷款为高,而且常常是可以随时间推移而大幅上调的浮动利率,因而对借款人有较大风险。由于次级贷款的违约率较高,对于贷款商也有较正常贷款更高的信用风险。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债务担保证券,简称 CDO,是一种信贷挂钩票据形式的结构性投资产品,是一种包含有资产担保证券(ABS),由金钱债权构成的证券化商品。

Credit default swap

信贷违约掉期是信贷衍生工具之一,合约由两个法人交易,一个称为买方(信贷违约时受保护的一方),另一个称为卖方(保障买方于信贷违约时损失)。当买方在有抵押下借款予第三者(欠债人),而又担心欠债人违约不还款,就可以向信贷违约掉期合约提供者买一份有关该欠债人的合约/保险。

Pension fund

养老基金通过发行基金股份或受益凭证,募集社会上的养老保险资金,委托专业基金管理机构用于产业投资、证券投资或其他项目的投资,以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

Sovereign fund

主权财富基金,指由一些主权国家政府所拥有并主导,用于长期投资的金融资产或基金,一般由专门的政府投资机构管理。其来源多来自自然资源出口或外汇储备的盈余。

Muture fund

共同基金,又称为信托基金,在美国又称为投资公司,在香港一般翻译为互惠基金,台湾也是使用共同基金为翻译。在中国大陆,一般的投资者并不使用共同基金这个词汇,而是以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等词汇取代之,此种金融商品的产生利基点是建立在专业金融从业者的知识和信任之上而得以产生,由于一般大众不懂跨国投资外国金融商品的诸多法律和语言问题;也没有专业操盘的技术分析能力,所以支付一点手续费将钱交由有公信力金融机构的团队操盘,大众只需约略的选择投资标的和风险度即可。

Swap Contracts

掉期合约(Swap Contracts)是一种内交易双方签订的在未来某一时期相互交换某种资产的合约。更为准确地说,掉期合约是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在未来某一期间

内相互交换他们掉期合约认为具有相等经济价值的现金流(Cash Flow)的合约。较为常见的是利率掉期合约和货币掉期合约。掉期合约中规定的交换货币是同种货币,则为利率掉期;是异种货币,则为货币掉期。

利率掉期合约是互换双方交换一系列现金流的合约,不交换名义本金,双方按合约规定,一方定期向另一方支付名义本金的固定利息,而后者则定期向前者支付名义本金的浮动利息。

2. 危机中"次级债"与"次级贷"不能因果倒置

现在国内的主流经济学者对于07年开始的次债危机或者次贷危机的解释是这样的:因为给信用不佳的人发放次级贷款,次级贷款证券化以后就是次级债,次级贷款成为不良贷款以后就发生了次债危机或者次贷危机,次债危机扩大变成了金融危机。这样的说法是次债危机乃至以后的金融危机均是由于次级抵押贷款危机而来,由于给信用不佳的人贷款而来。在这里我们要说的就是这样的说法是本末倒置了,真实的情况是次级债的危机反过来造成了次级贷款的危机!

次级贷款的证券化未必一定是次级债,而次级债的发行所对应的资产可以是很多元的,对应于次级债的只不过是一小部分,也就是说就算真的是次级贷款出现了危机,也不一定会导致整个次级债的危机。

在西方的金融体系内,银行的杠杆在危机时是达到30~40倍的,按照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大量的资金来源都是次级债,西方融资炒股、炒衍生品等的资金来源也主要是以次级债为主,西方几十万亿美元到几百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融资也主要依靠次级债来完成,而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规模就小多了,次级抵押贷款出现问题的就更小,美国整个住房抵押贷款的规模约为7~8万亿美元,次级贷款存量约为1.5万亿美元,这部分贷款的规模只占整个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20%,危机中估计直接损失为4000亿美元。而危机当中且不说美国金融机构的损失,美国政府的救市所动用的资金就是这个4000多亿的几倍了,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又是这个4000亿规模的几倍。以次级抵押贷款的规模,是根本无法造成08年金融危机的,也不会需要这么多的资金救市。

20年前全世界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名义价值总额几乎为零,到2006年这个市场的总规模已经达到37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的GDP总和的8倍多,这样大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当中几万亿的房贷规模就是可以忽略的小量,西方金融机构的各种杠杆投资都是要依靠次级债等融资完成的,而且这些投资的杠杆率是极高的,在金融领域中,用10:1的资金杠杆比例进行投资本来非常冒进却被说成了杠杆率很

低,美国现在的杠杆率在7倍就被称作是冰点,100:1的疯狂型投资是很常见的。其中最激进的摩根大通做利率衍生产品时的杠杆潜在比例竟然高达626:1,堪称世界之最。在用这一杠杆比例投资时,只要流动性不足,就要赔光而且可能会拖垮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以次级债融资再炒作次级债形成的金融衍生品市场,造成市场的死循环和泡沫才是问题的关键。现在全球GDP为70万亿美元,而债券市场则为9500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000倍以上,各种金融衍生品的价值则达到46600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6657倍还多。世界上每2.4小时流动的资金总额,就相当于一年全球GDP的总值,这些超额的债券市场远远超过了实物资产市场的规模,能够有如此的规模就是次级债的死循环造成的,是以次级债不断的抵押和购买之循环造成的,在这样的循环当中金融体系变得异常的脆弱,一点的风吹草动都会被市场所放大,由此造成给次级债信用担保的CDS的危机,而07年、08年市场的风吹得可是狂风暴雨,石油价格飙升到了147美元的历史高位又暴跌到30多美元的低位,这些市场的剧烈波动,足以让超级杠杆化的市场破局,出现超级的危机。

真正的问题来自于次级债的危机,因为次级债金融机构可以炒作金融衍生品,次级债的风险大幅度增加,导致次级债所必需的信用掉期合约CDS暴涨,CDS的暴涨的结果就是资产担保债券CDO当中的CDS费用暴涨,也就是次级贷款所必需的CDO偿付利息要暴涨,CDO的价值是需要次级贷款人以贷款的利息来承担的,因此造成贷款人所承担的利息暴涨,贷款就还不起了,次贷危机就爆发了,次贷危机是次级债危机和次级债的CDS暴涨所导致的,CDS的暴涨是造成所有的次级债并不完全是次级贷款所对应的次级债暴涨,在超级杠杆率的情况下超过5%的快速涨跌都足以造成巨大的灾难,而暴涨是要造成次级债融资的利率掉期衍生品和融资杠杆体系的系统性崩溃的,次级贷款只不过是这个崩溃下最大和最弱势的破产群体而已。而次债危机的发展,导致CDS市场的崩盘,这个崩盘就是08年的金融危机。

这里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西方舆论都说次级贷款是次债危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这里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西方总说给信用不良的人贷款云云,但是西方的银行家是傻瓜吗?次级贷款是有CDS合约担保的,在这个担保下真正的贷款是安全的,而次级贷款给这些穷人贷款,不恰恰是社会福利的需要吗?次级贷款的"次级"就是指抵押物不能拍卖只能止赎,因为这些人没有其他住房、不能把他们赶到大街上,对此贷款政府是有其社会责任的,因此两房(房利美、房地美)是美国政府赞助企业,两房债券因此被认为美国政府会兜底而信用等同于国债,而事实上也是在次

贷危机以后美国政府接管了两房，这个贷款是带有政府福利背景的，同时美国政府对于住房抵押贷款是高度干预的，美国政府有很多机构来促进公众购买住房，美国政府成立了联邦住宅管理局和退伍军人保险局等住房服务机构，为住房抵押贷款者提供保证和保险以促进一级市场发展；又相继成立了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政府抵押贷款协会和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等机构分别作为二级市场的做市商来推动二级市场发展，因此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是美国政府干预下的市场，次级抵押贷款基本不是商家的无节制放贷的结果而是在美国政府干预和促进下的结果。

因此以次级贷款成了整个危机的替罪羊，危机的根源变成给穷人住房的福利贷款，这种说法既套牢了政府也套牢了公众舆论，然而危机实质并不是次级贷款，而是次级债的风险和 CDS 的暴涨，这次危机是衍生品危机也是资源危机，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在 07 年匪夷所思的暴涨暴跌让期货衍生品的炒作风险剧增甚至崩盘，尤其是发行次级债融资再炒作次级债形成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变成了一个炒作的死循环，催生巨大的泡沫，所有这些才是最大的原因，但是这个金融衍生品是华尔街的罪恶，华尔街是美国真正的主宰，他们怎么能够有罪呢？所以次级贷款就成为众所周知的“问题根源”；问题是如果真的是那样理解的次级债，我们的大银行还怎么发行次级债，次级债又怎么能够成为银行的次级资本、可以在巴塞尔协议当中充当资本充足率呢？

在次级债和次级贷款问题上本末倒置，不能让国人正确理解当今世界危机的根源，将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崛起造成长期的损害。中国是主要的债券持有人，也是次级债持有人，两房债券就持有 3700 多亿美元，把次级债的实质扭曲，背后是为给次级债担保的 CDS 持有人逃避责任，在舆论大肆攻击中国的外汇储备持有次级债可能出现风险的舆论当中，又有谁提到了次级债还有担保？提到这个担保还有衍生品？提到次级债按照担保约定西方的金融机构要首先承担担保的责任？现在对于世界危机博弈的白热化，就是在博弈债券持有人和 CDS 持有人谁承担危机损失的问题，中国是主要的债券持有人而西方金融机构是主要的 CDS 持有人，所以这些关键问题中国人是绝对不能被忽悠的！

3. 透视真相：从 CDS 的角度看 08 年危机

美国证券托管清算公司（DTCC）08 年金融危机时发布报告说，目前全球范围内政府债券、公司债和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违约互换（CDS）产品总额达到 33.6 万亿美元。DTCC 称其统计了约 90% 的全球 CDS 交易。总体来讲，15.4 万亿美元的交易与公司、主权国家和资产支持类证券有关，14.8 万亿美元交易与指数有关。而

危机以来 CDS 价格变动剧烈,市场规模继续扩大,这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市场。

西方炒作 CDS,是可以长期没有担保进行恶意投机的,这样的投机造成了庞大的 CDS 市场,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这实际上就是对于政府违约的概率进行投机,对此欧盟直到最近才明令禁止:2011 年 11 月 15 日欧洲议会正式投票通过禁止 CDS 过度投机的决议,该决议在 641 名参与投票的立法者中,以 507 票的绝对多数赞成票通过,从 12 月 1 日开始,“无担保信用违约掉期”(Naked CDS)将在欧盟全线被禁。这也是欧洲首次禁止一项金融产品。欧盟认为这项投资产品是建立在投机国家主权债务的基础上的,并提速了债务危机。但是在此之前对于 CDS 的投机已经造成了 2008 年的危机,而此后到现在这个 CDS 还是可以无担保投机,世界的规则是给谁定的?对于这次危机的根源,要认清各方利益博弈的背景,就要从次债危机开始。

西方的次级债发行出来可不仅仅是用来进行次级抵押贷款,次级债发行出来还可以给期货和证券的投资人融资,或者是银行直接投资于金融衍生品,甚至是用来购买次级债的 CDS。次级债的发行由于其债权清偿顺序低于一般债权,因此次级债是伴随着 CDS 担保的,现在你使用 CDS 再来炒作次级债的 CDS,而且 CDS 市场还可以在 CDS 之上虚拟创设新的金融衍生品,这样的循环炒作因此造成了巨大的泡沫,这样的循环一直没有得到改进,直到现在,全球 GDP 为 70 万亿美元,而债券市场则为 95000 万亿美元,是全球 GDP 的 1000 倍以上,各种金融衍生品的价值则达到 466000 万亿美元,是全球 GDP 的 6657 倍还多。世界上每 2.4 小时流动的资金总额,就相当于一年全球 GDP 的总值,如此巨大的杠杆和资金流动,其结果就是危机的风险一步步的加大没有释放。

无限炒作风险增加的结果必然是 CDS 担保的基础费用增加,导致 CDS 的暴涨,同时股市的泡沫和大宗商品的泡沫,也使得给这些投资融资的次级债的 CDS 必然暴涨,尤其是 2007 年石油等大宗商品屡创天价突破历史新高,造成大量投资者崩盘,更造成了 CDS 的暴涨,而 CDS 的暴涨直接影响到了次级债融资的成本,但是这个暴涨又影响到了次级抵押贷款,因为次级抵押贷款的利率是要随着 CDS 的价格浮动的,CDS 的暴涨使得次级抵押贷款的利率成为高利贷,造成次级抵押贷款的大量违约,因为进行次级抵押贷款的人所能够承受的利率上涨是有限的,以次级债融资投资于金融衍生品的利率承受能力要高得多,所以必然是导致危机从次级抵押贷款开始,但是问题的症结并不在次级抵押贷款,原因就是次级抵押贷款是要解决穷人住房问题,政府是有社会责任的,归咎于次级抵押贷款的做法实际上把最终责

任暗中推给了政府。所以次债危机与次贷危机本身是有关联的同时区别也是巨大的。更准确地讲次贷危机是由于次级债的CDS暴涨导致的,CDS的暴涨是次级债和次级抵押贷款的危机,次贷危机实际只是次债危机的一个侧面而已。

次债危机从2007年8月起席卷美国并迅速蔓延到全世界。2007年9月18日美国东部时间14:15,美联储宣布降息50个基点,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5.25%降至4.75%。这是2003年6月以来联储首次降息。与此同时,联储将贴现率降低0.5%至5.25%。可以看到当初次债危机开始时美联储的利率超过5%,而现在意大利国债的收益率高于7%大家就开始恐慌,在危机开始时美联储为什么要把利率降低为零呢?

当时次级债收益率是远远高于今天的,在次级债大规模出现问题以后,美联储的降息是为了保持债券的价值,也就是说房价下跌后违约抵押房产不足值会导致债券的收益率大幅度下降,而联储降低了利率以后,使得下降的债券收益率高于资金的利率,从而可以保持债券票面价值不至跌破,否则即使是债券可以还本,只要收益率低于利率就可能让债券跌破面值。这里的次级债是被多层嵌套的,很多次级债是被投资于次级债、衍生品、CDS的组合的,原始的次级债跌破面值就要对后来的次级债带来信用风险,这是一个连锁反应的过程。如果债券保持在面值的价值以上,债券不能完全清偿就不会让CDS担保方承担责任,因为保险一般都是保本而不保收益的,债券在面值之上就使得触发债券的保险赔偿压力大大降低。

同时降息是保障投资于其他金融产品的融资成本不会暴增造成系统性风险和连锁反应。在融资利率下跌以后,投资证券、期货和金融衍生品的次级债资金成本下降,在原来的价格之上由于资金利率下跌,则可以承担更高的CDS价格而保持总成本的不变,从而保持他们的融资成本上涨有限不至于大规模崩盘,因此当时美联储信誓旦旦地说次贷危机不会发展到金融危机。

美联储降低利率,还使得很多次级贷款的贷款人所承担的利率不至浮动的太高。次级贷款人的利率是由其CDS价格和资金成本利率构成的,在次贷危机CDS利率暴涨后降低资金成本利率,让二者对抵使得贷款人的实际利率不至于上涨过多,不要因为利率的上涨导致更多的次级贷款的贷款人无力偿还贷款而选择破产,从而避免恶性正反馈导致危机不断扩大。

最后利率降低实际是降低了破产的次级贷款人抵押房产的持有成本,在破产人没有居所不能从房屋搬走的情况下,这些房屋只能由金融机构持有而不能变现,利率所决定的资金成本就是其持有资产的成本,持有成本直接决定债券最终偿付

的比例,因此持有这些资产的成本是CDS担保机构巨大的成本压力,降低利率是有助于降低CDS价格的。

在银行层面,西方的银行是带有巨大的资本杠杆的,西方的债券是可以拿债券不断抵押和利率掉期合约取得杠杆来购买的,这个杠杆也是通过次级债来实现的,这个次级债也是包含资金利率和CDS价格的,CDS暴涨以后次级债的总的利率成本不能增加就必须降低美联储的利率,因为债券的实际利率低于资金利率原有的杠杆就要被打破,如果发生大规模的金融衍生品去杠杆化,则利率掉期合约的衍生品交易就要系统性崩盘,由此引发的危机会比信用掉期市场崩盘的危机更大。

而且按照西方的会计记账原则,在债券跌破面值以后,CDS的持有者是要记录损失的,在次债危机的时候,通过降息而保证不触发CDS的危机,这个损失只不过是债券的不停贬值而已。但是降息的结果使得房贷等的借款人不惜房屋止赎也不还贷了,因为高额的利息使得其实际购买房屋的价格大大增加,以5%以上利率贷款和后来不到1%利率的贷款,承担的房贷压力是5倍的差距,而最终实际偿还的利息可以相差到房价的60%左右,很多人就会更乐意选择破产而不多付相当于60%房价的利息,而有能力还款的人也希望低价亏损卖房还清高息贷款,这样就造成住房贷款的违约和抛售风潮引发房价进一步暴跌,情况发展下去就是次级债的本金也得不到保障了,尤其是美国的破产制度规定破产者的唯一住宅不能被剥夺,房价跌破其购买价后大家申请破产了也会住在原来的房子里面,破产就是得利的情况发生了,这使得CDS的价格进一步的走高,依靠CDS担保下的次级债融资进行债券投资无法承受这个成本了,银行次级债融资炒作CDS更是进入了恶性反馈,这个依靠次级债和CDS建立起来的62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市场难以承受出现了崩盘,这个市场的规模是远远大于美国的货币规模、证券市场规模的,大厦就此倒下了,雷曼兄弟公司这样的巨无霸是谁也救不了的,于是2008年开始金融危机发生了,信用掉期合约(CDS)出现了系统性违约和崩盘,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了,AIG也岌岌可危,CDS市场陷于不得不救助的境地。

美国政府不得不救助AIG等公司,原因就是这个公司是次级贷款CDO的主要始作俑者,维持其不倒下,对于金融危机的恢复影响举足轻重,更何况次级抵押贷款是面对穷人的有政府公益性质的贷款,这个贷款的信用担保也是有政府的职责在其中,因此AIG得到救助雷曼却没有,这是有深层次的原因的。但是政府的救助只能维持个别企业,市场的恢复还要看美联储,美国进一步采取措施保持CDS担保方不承担违约责任,就是采取大家熟知的量化宽松政策,以美联储收购债券的方

式，将债券价值维持到不跌破面值到触发 CDS 损失或者违约赔偿的程度，因此对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不要简单地看作是提供所谓的“通缩压力下的流动性不足，解决金融系统的流动性淤积问题”，其购买债券支撑债券价格、保障其债券 CDS 持有人的安全才是更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因为金融大鳄们是持有 CDS 的，而社会是持有债券的。

而美联储降低利率和收购债券等行为本身是一个国家央行的权力，这样利用政策保护 CDS 还是属于一国的主权，虽然也转嫁了损失，但还是属于“剪羊毛”的方式，但随着时间的发展，欧洲情况就不同了，下面的博弈就没有这样“温和”了。应对以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为代表的欧债危机的主要方式就是减记国债，而西方货币是以国债抵押来发行的，私人机构的国债被大量减记的背后，是大量的货币被蒸发了，2008 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是货币过多的危机，而欧洲主权债务债券的减记是消灭货币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的成本是让债券持有人承担还是让 CDS 持有人承担，却是博弈的焦点；所谓危机的二次探底和深化，实际上是找到危机的最终埋单者，这是一个损失划分的利益再分配过程，中国要警惕不要被这个过程所掠夺。

二、评级下调为何美债价格反而上涨

标准普尔在 2011 年 8 月 5 日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AA +”，并指出美国的信用可信度有所下降，但尽管如此，美国国债价格却逆市大幅上涨，到 8 月 10 日，其二年期国债最低收益率竟然达到了 0.169%，这个利率是大幅度低于美联储的 0.25% 的利率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竟然还赶不上美联储的利率，那么人们为什么不存钱而是要买入国债呢？

要理解这里面的关键，我们先从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开始，读过《红楼梦》的朋友大多知道这样一个情节，贾家抄家是抄出一大堆当票的，很多读者把这个现象解读为贾家实际上早就已经败落了，不得不靠典当度日；不过这是现代的文学研究者对于古代金融避险的操作不熟悉所产生的误解，在中国古代一个家族遇到政治风险，就是要把自己的资产放到当铺当中避险的，这样的典当与老百姓一般所谓的典当是不同的，因为在抄家的时候，你的房契地契及其所代表的房产地产是无处可逃的，但如果放到当铺，则变成了带有当铺权益性质的资产，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典当规则与现在中国的抵押规则不同，死当财产是直接归当铺的，因此典当给当铺的财产是不能被没收的，而典当的价格如果大幅度低于资产价值，当票也是有巨大价

值的。

这样的做法在西方也是类似的,广为流传的一个西方的故事是某犹太商人把他的巨额财富抵押贷款了1美元,银行为了以后做他的大生意就同意了,但他最后的解释就是依靠这个抵押,实际上是银行给他保管了这些资产凭证。这些行为的背后都是为了风险而不是为了利益,无论是王熙凤的典当还是犹太人的贷款,都是要额外支付利息和手续费的,但是这样的费用支出换取了安全,对于当时面临巨大政治风险的贾家和身处歧视环境下的犹太人,更多的都要考虑风险,而资产类似货币、当票和贷款的债权更类似债券,理解了这样的行为背后就可以很好的理解美国国债与美元的价格关系了。美国被下调了评级,按照常理看未来债券的违约风险加大,美国债券的价格是应当下跌的,而评级下调以后必将要以更高的利率发行新债,债券的利率收益是要更好的,但是市场却给出了相反的走势,对此我们也需要在理论上认识这个事物的本质,才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

美国的评级下调是一个信用事件,美国的信用降低,反而美国国债更值钱了,这就要体现上面所说的风险与收益的关系了,这就要从美国的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的认识。美国的衍生品市场中利率掉期合约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美国国债的利率预期对于这样的衍生品市场有翻天动地的影响,如果美国利率突然大涨,必然造成利率掉期衍生品市场的崩溃,这个崩溃造成的结果会比雷曼兄弟的破产要厉害很多,而且基本上所有的银行都是参与利率掉期业务的,银行利率掉期的崩盘对于美国银行业而言是灭顶之灾,会造成美国大量银行破产,在这样的破产压力下,持有美元现金就变得不再安全。

对于美元来说,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在海外流通的美元,最终都要成为美国金融系统内的美元,就如在香港流通的人民币,如果是人民币账户,则开户行就要在中国内地的银行内拥有相应的人民币资产,境外取得人民币的来源肯定是国内的金融机构。对于流通在世界各国的美元,如果是现金的话,西方是要收取3%的现钞和现汇的差价的,这实际上就是美国搞的铸币税!这决定了绝大多数美元资金只能以存款的形式留存在美国的金融体系内,这些银行存款在美国银行业面临利率掉期合约崩盘可能性造成的破产风险面前,美元银行存款是不安全的。

成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人已经没有了银行破产的概念,对于存储在银行账户的资金也没有了会因为银行破产而损失的概念,但是世界不是这样的!按美国法律中对于银行破产的规定,10万美金以下的储户是优先偿还的,对于10万美金存款以上的储户是在小额储户偿还完毕以后再按照比例偿还,这样保障了普

通人存款安全的同时也使得大资金的风险被杠杆放大，对于美元而言大资金和小资金的持有现金风险是完全不对等的。在美国评级下降后虽然美债的风险提高但是大资金持有现金的风险变得更大，结果就造成大资金纷纷买入美国国债避险，这是一个美国国家信誉与美国银行信誉二者之间的一个相对性的关系！

很多人还认为美元现金有风险、美国国债有风险，那么持有大宗商品一定是好主意，但是事实是残酷的。用于追踪24种商品期货价格变动的标普高盛商品指数（Standard & Poor's GSCI Index）2011年8月8日最多下跌了3.6%，至598.46点，创下自2010年12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因为大宗商品的价格一方面严重依赖未来经济的走势，美国国债和银行如果出现危机的话，经济必定崩盘，大宗商品的需求和价格会下降得更快；另一方面大宗商品的囤积成本和利益诉求是与利率挂钩的，利率如果大幅度上涨的话会造成原来大量囤积的成本增加难以承受或者收益预期少于利息收入而抛售，因此大宗商品在危机深化的过程中一样也是风险重重，2008年金融危机中石油跌破40美元就是最好的例证。

2011年8月11日夜，美国国债市场大跌，新发行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25%上升2.31%；30年期国债，收益率3.75%。均超出交易员预期。发行结束后，二级市场上30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猛涨21个基点，至3.74%。这背后是欧洲开始干预市场，造成资金离开美国市场，但是美国自然有其杀手锏：炒作欧洲债务问题。而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到2013年的承诺，也稳定了银行利率掉期市场，银行破产风险降低，因此美债大跌，此时也是美国要发行新债的时候，国际金融资本需要美国政府承担更高的利率来赚钱，降低评级是在不提高美联储利率的情况下提高美国债券利率的方式。

在世界经济进入下行轨道以后，即使是美联储不提高利率，实际的利率也要提高，因为风险在加大，银行也一样受到冲击，对于美国国债的价值，不但要考虑所得利息的收益，也要考虑风险，而且这个风险是美国国债与美元现金之间的相对性的风险！美国国债上涨的背后，在风险因素下虽然美国国债评级下调但反而相对地成为最安全的产品，这是美国信用和美元信用的一个博弈和比价关系；在使用美元来定义美国国债价值的时候，由于美元的信用也在变化，美债的信用就是一个相对的而不是一个绝对的关系，美国信用降低以后的结果是美元信用降低更多，一个国家的信用一般是要高于这个国家央行的信用，而这个国家在外流通的货币实际上就是央行的债权形成的可流通的信用票据，所以美债的上涨就好理解了，美国评级下调是美国绝对信用的降低，却不是美元所反映的相对信用的降低，相对于美元，

美债的信用反而提高了,所以美债要涨价,这不过是美元信用降的更加不堪的结果,这是一个信用博弈的结果。

三、为什么买德国国债还要倒贴钱

就在欧债危机哀鸿遍野、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的情况下,德国的国债拍卖,居然出现了匪夷所思的负利率,也就是说谁要借钱给德国人,德国人非但不用支付利息,还要倒贴德国人钱,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此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导致利率上升、利率掉期合约和信用违约掉期CDS的损失压力增强,使得银行的破产压力和信用风险更加增大,在银行会破产的情况下,人们持有美国国债比拿着美元现金更安全,尤其是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优先赔偿10万美元以下的小储户,造成银行破产时对大资金的风险杠杆放大,大资金为了安全都抢着拿美债,美债的收益率低于美联储的资金成本,所以美联储作为私人机构搞QE3(第三轮量化宽松)是要亏损的,更何况如此低的国债收益率使美国CDS违约的压力也没有了,由此可以断定美联储是不会搞QE3的。但是美国不实行QE3使得欧洲更难以搞货币宽松,而欧洲是难以靠收购债券来规避其CDS的违约责任的,欧洲稳定基金的融资也受到了压力,目前欧洲央行利率经过08年危机已经处于历史低位,欧洲央行降息的空间和边际效益已经有限,危机的损失通过降低减少资金持有人的利益来埋单已经难以解决,欧洲危机的解决必定是一场债券持有人和CDS持有人的利益博弈,要以债券和CDS一方的损失来为危机埋单了,如此血淋淋的博弈已经到了大家都无路可退的地步,完全是赤裸裸的掠夺和阴谋了。

这样的博弈使得欧洲金融系统的风险空前加大,因为银行的破产风险使得持有现金已经没有利益,大家要拿住最稳定、不会国家破产的德国债券才保险,一时间德国国债成了欧洲资金最好的安全避风港,结果就是德国债券收益率竟然出现负值。据汇金网2011年11月9日讯,德国2011年11月9日拍卖15.25亿欧元至2018年4月到期国债,收益率为-0.40%,而前次拍卖同类国债平均收益率为1.22%。德国国债出现负利率,说明欧元本身的风险是怎样巨大!利率是绝对的负值,给你钱用还要倒给钱,背后就是欧元破产风险巨大,拿着欧元这颗烫手山芋实在太危险,而拿着德国国债则德国必须还给你钱,安全价值飙升的另一面是巨大的危险。

在世界金融危机深化、欧洲债务危机危急的情况下，德国的国债成为负利率，实际上就是国际资本市场已经用钱投票认定欧元的破产风险巨大，且欧元破产后的实际的得利者将会包括德国，因而资本的避险需求在危机下已经超过了投资盈利的需求，宁愿在德国国债付费倒贴，也要保证自己欧元资产的安全。假定未来世界信用破产，欧洲大多数国家债务深重，美国的债务压力也将非常巨大，欧元破产后美国印钞和贬值美元的战略是容易预见的，此时德国货币的升值可能性会非常大，德国货币的升值收益会远远超过那一点利率收益，因为现在欧盟各国内的现金欧元是完全等价的，而在欧元解体以后如果恢复各国原来的货币，德国马克和意大利里拉的价值能够一样吗？这样的币值分化是要带来巨大利益的，德国对于本国之外发行的欧元肯定是要当作外汇并且要按照分化后的汇率来计算价格的，但是如果你持有的是德国国债，德国怎么可能会用外国货币偿还本国国债？因此抢购德国国债就合理了，倒给钱也就合理了。这在历史上是有前车之鉴的，中国改革开放后，日本曾经给予中国大量所谓日元无息贷款，但是这些日元无息贷款在其后广场协议日元大幅度升值的背景下实际上都成为高利贷。

但是其他各国也不会坐视不理德国的国债负利率，2011 年 11 月 23 日晚，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公布了该委员会拟定的发行欧元“稳定债券”计划，以此作为欧债危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内容。这份被外媒称为“绿皮书”的计划提出了发行欧元债券的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在欧元区范围内发行完全联合债券，即 17 个成员国为联合“稳定债券”提供共同担保。这种方案需要对欧盟公约进行大范围修改。第二种方案是，欧元区成员国为联合债券提供有限担保，同时仍保留现有各自国家债券。第三种方案是妥协性提案，即发行欧元债券，但高负债成员国债务水平超过一定的比例后，将被迫恢复发行本国国债融资。后两种方案相对第一种方案更为保守。这样的政策就是使得欧元解体以后各国的国债难以分割，这个政策也直接导致德国债券发行的不利，同日的德国国债发行就出现了问题，11 月 23 日德国基准国债“灾难性”的拍卖结果引发债务危机甚至将威胁德国的担忧，德国央行不得不出资买入国债，以避免拍卖失败。根据德国央行数据显示，德国本次发售 2022 年 1 月到期国债，整体投标量达 38.89 亿欧元(52.1 亿美元)，目标上限则为 60 亿欧元，收益率达 1.98%。但此次拍卖实际只出售了 36.44 亿欧元，德国央行保留了 23.56 亿欧元债券，如果计入德国央行持有的国债，认购率才达到 1.1 倍。否则就是 0.65 倍。这是欧元问世以来德国最不成功的一次国债发售，10 年的年均回报率只有将近 2%。商业银行只买了 36.44 亿欧元债券，所以在 60 亿欧元债务中，德国

央行必须要承担39%。但是欧洲债券在德国的坚决反对下,能够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未来国债的作用更多的是对于货币风险的博弈而不是货币的收益,这说明世界的信用危机已经濒临崩盘。

这样的历史是会不断的重演,知道这样的历史,德国人卖国债能够不付利息还会倒收钱就不奇怪了,但同时这个倒贴钱的国债也预示着未来历史发展的方向。无独有偶据路透社报道,法国2012年首次国债拍卖需求强劲,短期债券收益率略微高于2011年上次拍卖时创造的纪录新低。尽管在国际评级机构的威胁下有担忧认为法国或将在数月内甚至数日失去3A评级,法国国库署2011年12月19日以接近于零的收益率拍卖了45亿欧元的短期国债。投资者寻求在年末持有较高数额的短期债务。在欧盟内除了德国以外,法国是最值得期待货币升值的国家,欧元解体持有法郎也是不错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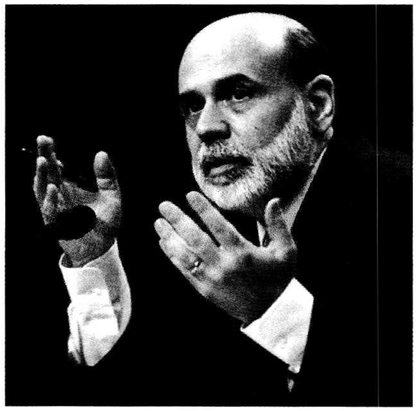
四、为什么中国要死死抱住美债

由前面的论述,我们知道了美元和美国国债在信用方面的博弈,知道了国债价格的涨跌是美国信用与美联储信用的一个相对关系,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国债在美国信用评级下调以后反而上涨,原来在美国评级下调以后想要攻击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外汇政策的人自然就闭嘴了。对于中国为什么要以持有美债的方式大量持有外汇储备,需要有一个从浅到深的认识过程。

中国央行持有美债首先就是一种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的手段,中国央行不得已持有这么多的美国国债而不是美元现金的背后,是中国央行外汇储备存储于美国银行系统的风险大于持有美国国债的风险。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即使是分散存储于几百家银行那么每一家银行也要存款上百亿美元,这些银行在危机中破产的风险再加上西方法律上对于大资金清偿程序上的倾斜杠杆,中国外汇储备相对的还是与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绑定、购买美国国债更安全一些。看着满社会对于央行持有美债的责难,也让人深切地体会到了愤青怒骂易、老成谋国难的道理,对于发展中的中国,维持外汇储备的安全远远比依靠外汇储备盈利要更重要,在美国评级下调以后美国国债上涨,其收益率最低达到0.169%大幅度低于美联储利率0.25%的背后是国际金融市场对于风险达成了共识的结果,这不仅仅是中国央行的思路。

再进一步的是我们应当看到美国货币信用的基础是美国政府的信用,也就是美国国债,美国的货币发行是通过美债在央行的抵押贴现发行或者央行直接收购

美债来完成的，在2008年危机后美联储也是通过大量收购美国国债来进行所谓量化宽松的，而美联储是私人机构，收购美国国债给市场提供钞票的同时也加强了美联储在市场中的地位。本来在2008年前美联储对于美国经济的作用已经大不如前，逐渐让位于美国政府来主导市场，但是2008年危机后这一局面得到了扭转，持有美国国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具备了对于美国金融市场的话语权。而中国持有这些美国国债，持有量大到不能动就是中美博弈当中的一张王牌。美国已经扬言说谁抛售美债就是对于美国的攻击和金融战争，但是如果中国经济和外汇受到攻击以后中国不得不要抛售美国国债，那么就变成了美国必须出手维护的事情了，就如希腊要违约欧美都要维护救助它一样，因此中国持有这么多的美国国债给中国换取的是国家的金融安全，中国这三十年来的飞速发展，没有受到金融大鳄掠夺式的金融攻击，和我们持有大量的美债是分不开的，持有美债达到规模效应的背后就是让中国的信用绑定美国。这是一种绝妙的金融恐怖平衡的局面。



中国需要做的就是居安思危，不要以为相对于西方政府财政的捉襟见肘，中国政府的3万亿外汇储备显得非常强大、非常安全，须知西方是小政府大社会，西方社会财团的力量不是中国所能够比拟的，仅仅是美国的黑石（BlackRock）资产管理公司一家2010年所管理的资产规模就达到了35609.68亿美元，超过了中国央行所管理的全部外汇资产，而2010年中国前20位的基金公司所管理的资产总额也就是3500亿美元，此外德国、法国、英国还有多家资产管理规模上万亿美元的公司。中国才刚刚发展了30年，在财富积累方面与世界差距实在太大了，即使是战后飞速发展和财团高度垄断的日本，在财富积累上面的差距也是很大的，人们总说日本的大财团如何如何，但日本2010年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日本生命保险公司（Nippon Life Insurance）到2010年所管理的资产仅有6561.53亿美元，因此日本为了自身的信用安全也是大幅持有美国国债的，其幅度仅次于中国达到了9000多亿美元，抱定美债实际上就是抱定金融安全。虽然我们在美元贬值和美债收益率下跌过程中是要遭受不少损失的，但是相对于被金融攻击和掠夺所造成的损失，这些损失是可以承受的，就如你要买商业保险就要付保险费，就要让保险公司获得利润是一样的道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避免风险没有代价是实现不了的。

根据美国2010年底的数据,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额的8.7%,美国个人和机构持有42.1%,美国社保信托基金持有17.7%,美国军队退休基金持有6%,再加上其他机构。美国国债大部分还是美国社会持有,军队和社保是美国国家信用的基石,中国持有的国债还是非常安全的,这与欧洲的情况截然不同。根据2011年8月11日法国《世界报》网络版刊载“谁拥有法国国债?”一文:65%的法国国债是由“非法国居民”持有,外国人持有希腊国债比率是71%,外国人持有葡萄牙国债比率高达75%!欧洲国债竟然都是“外国人”来购买的,欧盟一体化以后欧洲各国交叉持有国债的比例是很高的,这样欧盟各国就可以抱团取暖彼此进行信用绑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债务危机各国交叉持有国债信用互相绑定以后,欧债危机的整体风险就在增加,这样的绑定就如赤壁之战时曹操把自家战船锁定一样,平时是安全稳定了,但一旦一场大火袭来是要一起被烧毁的,现在欧盟和欧元就是这样的危机。

所以在中国没有足够的财富积累支撑建立自身独立的信用体系时,唯一的选择就是绑定他国的信用,而最好的绑定对象就是美国,这个绑定更关键的不是持有这个国家所发行的货币,而是大量持有这个国家发行货币的国债进而达到某种规模效应,这也是未来信用战的结盟基础和战略筹码。因此中国死死抱紧美债是中国外汇安全的需要,是中国金融安全的需要,也是中美博弈的需要,更是中国信用绑定美国应对未来信用战争的需要。这也是信用元规则支配下,中国不得不做的战略选择。

未来的道路极其艰险残酷,中国是要有长远战略眼光不计较一时一地的得失,国家崛起的大计需要经过多次战争历练和几代人的努力,面对眼下和未来的信用战争,中国需要更多的准备、布局和思考。

第十一章 负利率挤爆西方社保信用体系

西方信用社会的核心就是社保体系，因为与中国人自己攒钱和养儿防老不同，西方人是要依靠社会保障体系生存的，这个保障是西方人生存的信心来源，这个体系也是西方最大的信用体系，就如我们中国人现在离不开户籍和当年离不开粮票一样，西方人到哪里都需要他的社会保障号码，这个号码与中国人的身份证号码是对等的。显然，如果这样的体系破局，将对于西方社会造成颠覆性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在西方金融危机下，这一个体系正在承受巨大的压力濒临破局。这种破局是源于西方人的贪婪吗？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简单，西方的统治者是金融资本，这里面有不受控制的掠夺和谎言，西方的社保体系实际上是被金融掠夺的负利率政策挤爆的。

西方的社保信用体系给西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赤字压力，这个体系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西方的政府负债加上社会保障的资金缺口，大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据 IMF 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盟国家中，国有养老金债务是其 GDP 总和的 5 倍左右。据弗赖堡大学研究机构报告，早在 2009 年，这些国家的养老金债务规模就已经达到了 39.3 万亿美元(30 万亿欧元)，其中，德国 7.6 万亿欧元，法国 6.7 万亿欧元。目前，欧洲年龄超过 60 岁的人口比例为全球最大，2009 年这个数字为 22%，到 2050 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 35%。沉重的债务负担正吞噬着政府的财政资源，这也是这些国家难以真正有效削减债务的真实原因。

此外，处于人口危机边缘的日本，在 2011 财年养老金发放金额预计将出现 2.5 万亿日元(289.7 亿美元)缺口。根据日本 2005 年人口普查结果推算，日本将在 2012 年～2013 年迎来一个退休高峰，但是在 2011 年～2014 年日本却又将迎来一个偿债高峰期，到期债务总额约达 2246 万亿日元，约为 GDP 的 5 倍。偿债高峰与退休高峰的叠加将令日本政府破产风险一触即发。

美国社保体系的缺口更是一个庞大的黑洞，只不过美国拥有全球金融霸权，危机没有欧洲和日本那样的明显罢了。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是美国联邦政府最大的

两个福利体系,去年用于社保和医保的资金总额超过了1万亿美元,占美国政府预算的三分之一强。根据2009年公布的报告,美国社保基金将于2016年入不敷出,比去年预计的时间提前一年;而到2037年,社保基金将全部耗尽,比去年预计的提前4年时间。

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报道,美国主权评级下调以后,里根总统时期经济顾问委员会高级经济学家柯特利科夫(Laurence J. Kotlikoff)公开表示,美国财政部给出的14万亿国家债务总额只是冰山一角,非利息支出和预计收入之间的财政缺口高达211万亿美元。柯特利科夫认为,美国应予以关注的最大财政问题之一是美国如何支付未来几代老人的养老金。“我们有7800万婴儿潮一代人(指1945-1960年西方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在未来15到20年,每人每年的养老金为4万美元。7800万乘以4万美元,我们讨论的是每年给这部分人口的支出就达3万亿美元,这是悬在我们头顶的一张巨额账单,而国会并没有关注这个问题。”沃顿商学院保险和风险管理系教授肯特·斯迈特斯(Kent Smetters)则指出,在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总共存在80万亿到120万亿美元的缺口,而且该数字在以每年2万亿美元的速度增长。他指出,美国所有有形资产——住房、建筑物、土地、汽车以及个人财产的总价值是50万亿美元。

《中国经济周刊》曾刊登了一篇“美国在技术层面上已经破产”的文章(作者钮文新),这篇文章宣称美国总共欠债73万亿美元。73万亿美元的数字具体是怎么得出的呢?该文提到“按照美国公开数据,85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全部实施之后,美国国会所能接受的名义国家债务余额为11.2万亿美元……按照美国政府问责局前总审计长、美国彼特·皮特森基金会总裁兼CEO大卫·沃尔克的估计,如果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等所有隐性债务统统加在一起,那么,2007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高达53万亿美元……如果我们把诸如‘两房债券’那样的抵押债券、美国各大财团所发行的、说不清是公司债还是政府债务以及市政债券等——总计20万亿美元(2007年末美国国债协会SIFMA统计)的债务再统计进来,那美国债务更是高达73万亿美元。”很多人把西方养老制度的问题归结为人口寿命的变化。二战以来,未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战争对人类生命的威胁减小。而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和健康医疗保障的不断完善,疾病造成人口死亡的可能性也降低了,老年人寿命延长、死亡率下降。美国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因此逐年增大,1929年为5.32%,1990年达到12.3%。

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

到或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或超过7%，即为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依照这一标准，美国人口结构最晚在1980年已达到老龄化，而此后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日趋严重，真正进入“老龄化”社会：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65岁的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的平均时间分别为男子11.9年，女子13.4年；到了九十年代，这一数字增长为男子15年，女子18.8年。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组数据可以看到美国人领取养老金的年限只不过增加了30%左右，而美国养老金的亏空是远远超过这个比例的，每一个人需要的养老金与其缴纳的费用之间是3倍左右的差别，因此所谓的人口寿命增长只不过是一个掩盖问题真相的次要矛盾，真正的主要矛盾应当是社保体系的投资增值出现了问题，而这是西方长期负利率制度所导致的，负利率制度正在挤爆社保信用体系，社保体系的问题给西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赤字。

按照西方一些国家的养老保障方式，政府承担了巨大的责任，与之相伴的就是政府长期公民养老支出的迅速扩大，这些支出的最终承担者，仍然是国家财政，结果就是巨额财政赤字。

美国平均每个人在退休前存入社保体系10多万美元，而在退休后将要从这个体系拿走30多万亿美元，也就是每一个人要透支社保20多万美元，如果以美国3亿左右的人口来计算，就是50～60万亿美元的隐形债务，再加上美国的国债就是73万亿左右了，如果再计算未来的医疗费用增长和现在通胀与利率的倒挂贴现，说成是200多万亿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总之是美国的社保信用体系到了崩溃的边缘。

西方国家的社保投资是需要回报的，低的资金回报惠及企业主但是老百姓的社保没有增值，寅吃卯粮，最后是演变成为一个庞氏骗局。西方历史上的利率可不是这样低的，而且遇到问题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是负利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美联储还把利率提高到了21.5%的最高水平来遏制通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通缩的时候也是可以达到5%，在08年危机前美国的利率也是5.25%，但是现在西方的舆论是完全的转向了，意大利的利率超过7%就被西方认为是不可持续的，然而长期的低利率主义实际上就是要让西方的社保信用体系破局。

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会造成当今的危机，根本上还是因为美国的社保资金的投资的收益率出现了巨大的问题，美国的社保等保障体系的资金投资是受到很大限制的，社保投资的主要方向是国债等债券投资，这些投资的低收益是难以满足社保体系的需要的。我们可以想一下一个劳动力是25岁开始工作给社保存钱，65岁退休的时候逐步从社保取养老金，这里面是有四十年的期限的，我们按照5%的

利率计算,如果是四十年的复利累积,那么这位仁兄的资金是1.05的40次方,那就是原始投资的7.03倍,这里还没有计算意外早死的人群,即使是医疗保险,也是年轻的时候生病很少,老年生病多,中间也是有巨额的时间增值效用的。但是在现在美联储0.25%的低利率下,1.0025的40次方只有1.105倍,也就是增值了10%多一点,这样的增值根本无法满足社保偿付资金的增值,如果是逐步存放的,增值也就是5%左右,更不要说还有通胀的影响,因此在如此低利率之下,社保的投资收益没有了以后,再按照原来的模式就无法满足需要了。

在美国,由联邦政府直接掌管的全国社保基金(以下简称"信托基金")是由一个信托基金托管委员会来具体掌握、监督和投资的。截止2007年底,美国养老、遗属及残疾保险基金总资产为22385亿美元;社会医疗保险基金总资产为3690亿美元(美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基金主要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医疗支付,而65岁以下的美国人主要依靠雇主提供的团体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来支付医疗费用);失业保险基金总资产不详(这一基金由联邦失业保险基金和州失业保险基金所组成)。只有2万亿的养老等保险,也就是只能支付美国人当期的各种社保而已,能够增值的部分根本不可能满足这些人的养老等需要。我们可以想一下美国婴儿潮是7800万人,如果每一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有10多万美元,在美国的社保体系中就会形成10万亿左右的巨款,再经过几十年的投资增值,这10万亿美元就应当变成30万亿以上,到婴儿潮一代65岁退休,退休以后的预期寿命是80岁的话,按照前面美国专家计算的要给他们3万亿美元的养老费,这30多万亿美元的资产是完全可以支持的,这个体系当初就是按照这样的模型计算出来的,我们很难想象当初计算这个模型的时候就会有如今这样大的亏空。在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市场利率大幅度上升,国债收益甚至超过了10%,所以这在当初是计算的很美的模型,而西方后来制定政策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到货币政策的改变对于这个模型会有什么影响呢?现在社保体系内只有2万亿美元,也就是支付一年的费用,完全是寅吃卯粮把当初投保到保险体系的资金吃干净了,社会保障信用体系怎么能够不破局?

如果社保体系的资金没有经过投资大幅度增值而是在当期就支付给了其他使用人,社会保障就不是保险而是税收了,也就是说这是对于你收入的税收,而老了以后享受的福利是政府征税后的责任和回馈纳税人,但是这样的模式必然造成税收的高企,只有北欧等地的资源国家能够承受这样的高税收,否则必然是政府的赤字,尤其是在进入老龄化以后,老年人比青年人要多,年轻人是负担不起老年人的!这样的结果就是不断地以年轻人来负担老人,而老人养老等花费越来越高,就变成

了庞氏骗局了，必须要政府贴入大量的资金。现在奥巴马上台以后，政府每一年的赤字平均下来是上万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局2012年1月31日公布的报告预测，在2012年9月底结束的2012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将达1.1万亿美元，这将是美国政府财政赤字连续第4年破万亿美元。

现在美国的国债上限已经被迫提高到16万亿美元以上，而奥巴马上台的时候国债上限才多少？2008年～2010年，美国国债上限分别为10.61万亿美元、12.10万亿美元和14.29万亿美元，分别占GDP的比重为70%、84.1%和92.1%。2011年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曾达成协议，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债务上限将在原来约14.3万亿美元基础上至少提高2.1万亿美元，到奥巴马卸任的时候债务上限将是16.4万亿美元。对于美国的收入和赤字情况，社保的黑洞是难以承受之重，而这样的社保黑洞，是完全与负利率的政策有关的，在原来的高利率时代，社保的资金投资生利是完全可以覆盖成本的。

对于西方社会的负利率产生的历史根源，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裂，西方的印钞机不再受到限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摩肩接踵。在此过程中，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让世界各国的美元需求大幅上升。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放弃了美元货币供应量的管制，而改用利率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货币手段。从此，美国的印钞机开始满负荷运转，铸币税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美元债务也随之骤然膨胀——美国债务经济模式就此起步。因此，在世界上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圈：美国所需要的商品，只需印刷钞票去外国买就是了；美国买东西花掉的美元，通过出售美国债务（国债或公司债）重新回到美国本土，变成美国政府或公司可以任意支配的现金；这些现金被用在美国人身上，使他们有能力去消费那些从外国买来的东西；美国的商人通过在本土出售外国商品而获得收入，然后继续购买别国的商品。如此循环往复，只要美元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永远不倒、外国政府永远需要美元储备，美国欠下的债务就永远不必归还。理论上说，是“只需付息、不必还本”的债务，但其实利息也不必付，因为通胀或美元贬值会自然蚕食掉利息率。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现在的低利率被认为是刺激经济的必然选择，在著者的另外一本书《涨价的世界》当中对于负利率的意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西方的印钞负债模式下，多印出来的钞票是必须要有人埋单的，如果是正利率则所有的印出来的钞票都值钱，那么就只能是实业或者实体经济为印钞埋单受损；负利率是把印钞的利益分配控制在金融货币领域，保障了实体经济不受损失，而金融货币领域的损失

就得要让社保资金等承担了,这里面是非常巨大的利益输送。

对于这样的负债经济模式,负利率到底侵害了谁呢?美国舆论给公众的印象是必须储备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是负利率政策的埋单者,但是情况果真如此吗?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额的8.7%。美国个人和机构持有42.1%,美国社保信托基金持有17.7%,美国军队退休基金持有6%。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截至2011年11月底,外国主要债权人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仅为4.7509万亿美元。通过上面的数据我们看到美国国债贬值的损失,真正的承担者主要还是美国的社保养老金,社保养老和军队养老持有了23.7%的美国国债,同时在个人和机构持有的42.1%的比例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企业的退休养老计划间接持有的,因此美国国债的超低利率,主要就是由美国养老金等社会保障体系来埋单的,西方几十年来的负利率长期化的结果就是社保体系的入不敷出,造成西方信用体系的巨大隐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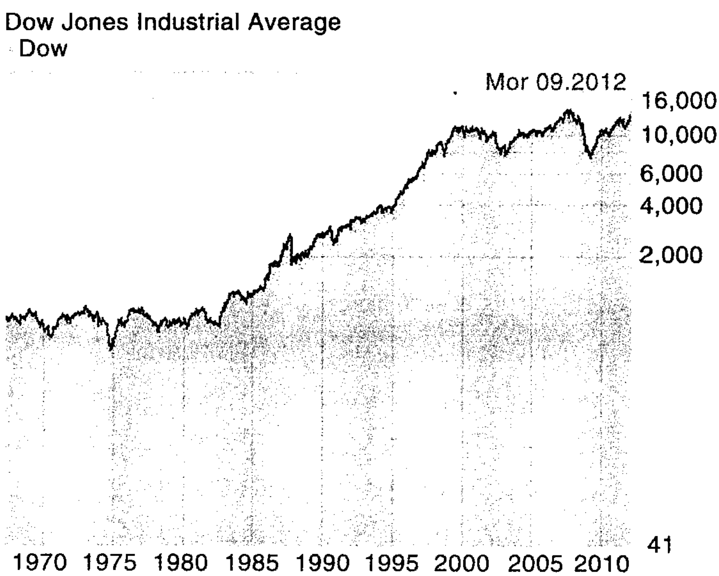
西方的印钞掠夺,势必要造成通胀,我们看到随着美国印钞和通胀的发展,虽然美国公开的通胀率并不高,但是这并没有反映美国经济社会的全貌,因为在印钞模式和资本定价权模式下,美国的真实通胀情况是被掩盖的,真正的通胀是要向社会的"刚需"传导、通过"刚需"向下游转嫁的,对于美国印钞的输出,中国的"刚需"是资源和地产,我们所要购买的大宗商品和房地产就要暴涨;而美国的通胀则反映在医疗上,因为在美国物质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很多中国的"刚需"资源不是美国人的"刚需"了,美国人的"刚需"是医疗,于是医疗费就进入了暴涨阶段,以医疗保障为例,心脏搭桥手术的费用1970年为1.4万美元,1991年增至40.7万美元,涨幅惊人。这样造成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社会保障各项目最低标准提高,开支不断扩大。印钞和负利率的最终埋单人还是转嫁到了社会保障体系上,成为挤爆社保信用的推手。

西方对于这样的负债,舆论上给民众的安慰就是可以不断的印钞保持政府的信用,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通胀使得西方社会的保障体系所承担的压力更大,印钞将导致社保的"刚需"也增长,甚至社保的"刚需"和通胀的增加超过印钞的利益,印钞的掠夺方式在西方社会保障信用破局面前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因为印钞越多的结果就是通胀让社保的货币需求更大,让社保资金因印钞贬值以后的负担更重。

美国社保资金的低收益,还与美国社保基金70年不入市有关。关于社保基金不入市,被西方舆论和政客拿到台面上谈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美国政府认为社保基金安全性最重要,入市有风险,社保基金不能入市,只能购买国债或存入银行;二

是美国大众认为庞大的联邦社保基金入市，有悖于市场的自由竞争与公平，甚至会带来政府对私人经济的操纵与控制，因此，社保基金“入市”是美国民众所不能接受的。但是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负利率下不寻求高收益才是真正不可消除的最大风险，而社保资金的入市将会打破金融大鳄们对于市场的控制权，而金融大鳄是绝不会把金融市场控制权交出去的，西方的股市就没有操纵和控制吗？控制西方资本市场的美联储是私人机构，美国是一个资本控制国家的国家，如果社保入市并且在民众和政府的控制之下，美国金融资本怎么还有控制权？

我们可以看一下1970年以来的道琼斯指数走势图，从1970年的1000点翻一番到1985年以后的2000点只用了大约15年，而1986年以后的整整20年是美国股市的大牛市，从2000点一路飙升至逼近16000点，竟然涨了8倍！如果这一阶段社保基金可以入市，那么即使不领跑大盘，只是随着牛市上行的话，规模在17万亿美元左右的社保基金可以获得何等丰厚的盈利是不言而喻的，这20年的巨额回报将足以填上今后20年的社保黑洞。然而历史不容假设，靠社保金过活的居民们赚取如此庞大的盈利，这是金融资本大鳄们无法容忍的，在他们看来这是对“28法则”的彻底颠覆，是对人类财富分配自然法的彻底蔑视。



资料来源：http://finance.yahoo.com/q/bc?s = %5EDJI&t = my&l = on&z = l&q = l&c =

在社保基金不能进入股市的前提下，只能进入债券市场牟利，要在债市实现足够维持自身运作的盈利就必须仰赖联储的利率政策，高利率高回报，低利率低回

报,零利率零回报,负利率负回报。80 年代社保基金盈利一路高歌猛进是因为联邦基准利率高达 20% 的“沃尔克冲击”;而今天,自 07 年次贷危机以来,实际负利率已经延续了 5 年。

小资料:沃尔克冲击

1979 年 8 月,民主党人保罗·沃尔克被美国总统卡特任命为美联储主席。1983 年,他再次被里根总统任命为美联储主席。

任职美联储主席期间,沃尔克以有效地抑制了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的滞胀而被世人称道。1981 年,美国的通胀率达到 13.5%,但在 1983 年被沃尔克成功地压降至 3.2%。1981 年 6 月,沃尔克成功地将联邦基金利率从 1979 年的 11.2% 的平均水平提升至 20% 的历史新高,贷款利率也提升至 21.5%。

如此匪夷所思的高利率政策一时间使得国际资本市场一片混乱,沃尔克的政策被人们称为“沃尔克冲击”,为此沃尔克曾遭受到史无前例的政治抨击和普罗大众的强烈反对。

1987 年,沃尔克离开美联储,之后他成为著名的纽约投资银行罗思柴尔德·沃尔芬森公司的主席。这家专事于企业咨询和投资的公司由詹姆斯·沃尔芬森创建,沃尔芬森后来成为世界银行的行长。

现在负利率似乎已经成为西方的共识,意大利国债长期利率超过 7% 就被一堆人跳出来攻击,认为高利率将导致金融危机,但是在几十年前利率高涨的年代里,怎么就能够承受高利率呢?这里的关键就是资源的占有问题,当初的高利率模式下谁在资源上囤积居奇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的,囤积资源的成本就是利率!这里有很多的隐形囤积,也就是以矿山不开采的方式进行囤积,在正利率的模式下肯定是多开采持有货币合算,但是到了负利率的模式下就要变成存着矿藏不开采换取现金合算了,于是西方国家自己的大量矿藏变成了储备,以此炒高矿藏价格让发展中国家埋单是现在的主要模式,中国崛起购买资源就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而当年则相反,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尤其亚非拉那些借有外债的国家,由于美元和英镑利息暴涨,全部都陷入到无底洞一般的债务深渊,不得不通过贱卖国家战略资源还债。据世界银行数据,1980 年,发展中国家所欠外债总额不过为 4300 亿美元,在 1980 年~1986 年,为这些债务支付的利息就高达 3260 亿美元,本金又偿付了 3320

亿美元！到了1987年，109个债务国反而还欠着西方国家13000亿美元！

在当今的负利率的模式下，得利的是货币使用者而不是所有者，现代金融体系的关键就是可以让货币的使用者和所有者分离，这是传统的贵金属货币时代所做不到的。现代体系下你能够拥有货币，就是把自己的信用等交给了金融体系，你的账户存款无论你是否愿意，就是银行可以贷款的资金，甚至你持有的现钞，也是一个国家央行的负债，是央行的金融资源之一。西方在信用货币体系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以后，印钞就是占有你的信用的手段了，谁有权印钞、谁有权使用资金才是根本，结果也造成了西方收入差距的拉大，金融业和华尔街成为最大的得利者。从1971年到2007年，美国企业平均工资从每小时17.6美元降到了10美元；同期，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了357∶1。以大摩为例，2008年初至危机爆发前已向员工发放薪酬共达107亿美元，超过了大摩目前的总市值！雷曼破产前也支付了61亿美元，摩根大通是65亿美元，高盛114亿美元，美林117亿美元，花旗高达259亿美元。这些高企的收入，仅仅是资本大鳄代理人的收入，在后面资金的操盘人还有更高的收入。

西方的负利率只不过是央行的利率和国债的利率，不等于企业利率，这里面利益输送才是关键。在西方负利率的情况下，企业的利率不低，里面有风险的价值，而信用卡利率在美国已经达到了历史高位，有百分之十几，其间利率的差值就是贷款偿还的违约信用担保的价值，由此生出来了著名的金融衍生品CDS，而当今希腊债务违约压力让债券持有人减债但不算违约，出让信用掉期合约的金融大鳄是赚钱没有风险了，这是巨大的利益输送，这个问题将在欧债协议相关章节当中分析。

附录1:美国社保简介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美国的社保投资情况。

根据法律规定，信托基金不仅要联邦政府统一集中管理，而且收支节余必须投资于联邦政府连本带利担保的证券，所获利息也被存入信托基金。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是不允许社会保险基金“入市”的。自从信托基金成立以来，由信托基金购买或持有的所有证券都是由联邦政府发行的。它们主要分为两类：

(1)财政部特别发行证券。只有信托基金可以购买或持有，不可上市，不可转让，只能赎回。

(2)财政部公募发行证券。所有投资者均可购买或持有，这是一种可

上市证券。

在过去,信托基金曾经持有过可上市的财政部公募发行证券,但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信托基金持有的公募发行证券逐渐减少,并且从2005年2月15日开始,信托基金不再持有公募发行证券,而只持有财政部特别发行证券。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可上市证券能在公开市场上买卖,若在到期日前卖出,则有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损益。然而,与可上市公募证券不同,特别发行证券却可以在任何时间按面值赎回。

信托基金可持有的财政部特别发行证券有两类:

(1)短期国库券。这类证券以日为基础每天发行,亦可每天赎回,到期日为发行后次年的6月30日。

(2)长期债券。也称特别发行债券。这类债券只在每年6月30日这一天发行。债券到期日为1~15年。

一旦信托基金收支相抵有盈余,就会投资联邦财政债券。这就相当于将剩余的信托基金贷款给联邦政府。信托基金持有的财政债券表示政府有义务在证券到期时进行偿付,并支付利息。一旦信托基金需要兑现支付相应社会保险福利,则可随时用证券向财政部赎回现金及利息,以便及时支付受益人应付福利。

通过以上的说明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美国的社会保障资金是投资于国债等债券资产的。

美国除了政府的保障之外,企业的保障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美国“企业年金”类似的保障计划是很多的,通用称呼包括“私人养老金计划”(private pension plan)或退休计划(retirement plan),因为美国不仅企业有私人养老金计划,而且像行政事业单位也可以建立私人退休计划,因此,在美国一般不称为“企业年金”。美国的私人养老金计划大体分为以下几种类型:最有名的401(K)计划主要在企业采用;403(b)计划则主要在教育和非盈利部门采用;457计划则主要适用于两类雇员:一类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雇员,另一类是免税的非教育机构雇员;TSP(Thrift Savings Plan)则是专门为联邦政府雇员创设的一种退休储蓄和投资计划。在美国,几乎所有企业都要为其雇员建立此类“私人养老金”计划,否则,企业是没有资格从人才市场招聘用人的。401(K)计划的最大投资对象是共同基金(即证券投资基金),其投资比例历年高达70%左右。另有10%以上

的比例则投资在“担保投资合约”及其他稳定价值基金上，而真正直接投资公司股票的比例历年都没有超过20%。

附录2:1992年以来英国利率表

2011-06-09 19:15:11 以下为英国央行自1992年以来历次调整利率情况:(1基点相当于0.01个百分点)

调整幅度	调整后水平(%)
2009年	
3月5日	调降50基点 0.50
2月5日	调降50基点 1.00
1月8日	调降50基点 1.50
2008年	
12月4日	调降100基点 2.00
11月6日	调降150基点 3.00
10月8日	调降50基点 4.50
4月10日	调降25基点 5.00
2月7日	调降25基点 5.25
2007年	
12月6日	调降25基点 5.50
7月5日	调升25基点 5.75
5月10日	调升25基点 5.50
1月11日	调升25基点 5.25
2006年	
11月9日	调升25基点 5.00
8月3日	调升25基点 4.75

2005 年	
8 月 4 日	调降 25 基点 4.50
2004 年	
8 月 5 日	调升 25 基点 4.75
6 月 10 日	调升 25 基点 4.50
5 月 6 日	调升 25 基点 4.25
2 月 5 日	调升 25 基点 4.00
2003 年	
11 月 6 日	调升 25 基点 3.75
7 月 10 日	调降 25 基点 3.50
2 月 6 日	调降 25 基点 3.75
2001 年	
11 月 8 日	调降 50 基点 4.00
10 月 4 日	调降 25 基点 4.50
9 月 18 日	调降 25 基点 4.75
8 月 2 日	调降 25 基点 5.00
5 月 10 日	调降 25 基点 5.25
4 月 5 日	调降 25 基点 5.50
2 月 8 日	调降 25 基点 5.75
2000 年 2 月 10 日	调升 25 基点 6.00
1 月 13 日	调升 25 基点 5.75
1999 年	
11 月 4 日	调升 25 基点 5.50
9 月 8 日	调升 25 基点 5.25
6 月 10 日	调降 25 基点 5.00
4 月 8 日	调降 25 基点 5.25

2 月 4 日	调降 50 基点 5.50
1 月 7 日	调降 25 基点 6.00

1998 年

12 月 10 日	调降 50 基点 6.25
11 月 5 日	调降 50 基点 6.75
10 月 8 日	调降 25 基点 7.25
6 月 4 日	调升 25 基点 7.50

1997 年

11 月 6 日	调升 25 基点 7.25
8 月 7 日	调升 25 基点 7.00
7 月 10 日	调升 25 基点 6.75
6 月 6 日	调升 25 基点 6.50
5 月 6 日	调升 25 基点 6.25

1996 年

10 月 30 日	调升 25 基点 6.00
6 月 6 日	调降 25 基点 5.75
3 月 8 日	调降 25 基点 6.00
1 月 18 日	调降 25 基点 6.25

1995 年

12 月 13 日	调降 25 基点 6.50
2 月 2 日	调升 50 基点 6.75

1994 年

12 月 7 日	调升 50 基点 6.25
9 月 12 日	调升 50 基点 5.75
2 月 8 日	调降 25 基点 5.25

1993 年

11 月 23 日　　　　调降 50 基点 5.50

1 月 26 日　　　　调降 100 基点 6.00

1992 年

11 月 13 日　　　　调降 100 基点 7.00

10 月 16 日　　　　调降 100 基点 8.00

9 月 22 日　　　　调降 100 基点 9.00

附录 3:美国历年基准利率

美国历年利率(2007 - 03 - 20 08:21:55)转载▼

1991 年 ~2006 年美国利率变化

—变动时间—变动基点—变动后利率

1991.04.30 (-25) 5.75%

1991.08.06 (-25) 5.50%

1991.09.13 (-25) 5.25%

1991.10.31 (-25) 5.00%

1991.11.06 (-25) 4.75%

1991.12.06 (-25) 4.50%

1991.12.20 (-50) 4.00%

1992.04.09 (-25) 3.75%

1992.07.02 (-50) 3.25%

1992.09.04 (-25) 3.00%

1994.02.04 (+25) 3.25%

1994.03.22 (+25) 3.50%

1994.04.18 (+25) 3.75%

1994.05.17 (+50) 4.25%

1994.08.16 (+50) 4.75%

1994.11.15 (+75) 5.50%

1995.02.01 (+50) 6.00%

1995.07.06 (-25) 5.75%

1995.12.19（-25）5.50%

1996.01.31（-25）5.25%

1997.03.25（+25）5.50%

1998.09.29（-25）5.25%

1998.10.15（-25）5.00%

1998.11.17（-25）4.75%

1999.06.30（+25）5.00%

1999.08.24（+25）5.25%

1999.11.16（+25）5.50%

2000.02.02（+25）5.75%

2000.03.21（+25）6.00%

2000.05.16（+50）6.50%

2001.01.03（-50）6.00%

2001.01.31（-50）5.50%

2001.03.20（-50）5.00%

2001.04.18（-50）4.50%

2001.05.15（-50）4.00%

2001.06.27（-25）3.75%

2001.08.21（-25）3.50%

2001.09.17（-50）3.00%

2001.10.02（-50）2.50%

2001.11.06（-50）2.00%

2001.12.12（-25）1.75%

2002.11.06（-50）1.25%

2003.06.25（-25）1.00%

2004.06.30（+25）1.25%

2004.08.10（+25）1.50%

2004.09.21（+25）1.75%

2004.11.10（+25）2.00%

2004.12.14（+25）2.25%

2005.02.02（+25）2.50%

2005.03.22 (+25) 2.75%

2005.05.03 (+25) 3.00%

2005.07.01 (+25) 3.25%

2005.08.10 (+25) 3.50%

2005.09.21 (+25) 3.75%

2005.11.12 (+25) 4.00%

2005.12.13 (+25) 4.25%

2006.02.01 (+25) 4.50%

第十二章　资源挤爆西方信用

一、资源紧缺成为货币信用贬值动力

信用贬值,在货币层面的表现就是通胀。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政府的负债超标,而解决负债问题唯有通过一次长期的通胀来完成,且政府的负债和过度赤字本身也给社会、经济注入了流动性,尤其是那些通过国债抵押来发行货币的国家。但是很多人对此还是有所疑虑的,原因就是我们进入了过剩经济,而通胀是供给不足产生的,通胀的压力似乎可以完全被过剩经济所消耗,因此当今世界舆论是一片通缩的言论,08 年危机后是有很多国家的媒体都在高调说要防止通缩,通胀可以使得过剩经济下的危机得到缓解,让经济重新进入高增长。对于这种舆论导向,著者认为只不过是各国政府在赤字无法消除、需要不断举债度日的情况下,如果不从舆论上给世人以通缩的预期来促进国债的发行,其负债运营就难以为继。如此一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全球在“恐通胀”问题上“同此凉热”了。

那么在过剩经济下如何会产生通胀呢,通胀的长期动力在哪里呢?

事实上,现在的过剩经济是产能的过剩而不是资源的过剩,由于产能过剩和对于人们提高生活质量的期望限制,已经从以前生产不了那么多变成了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可以生产,我们所需要的资源在质量守恒和能源守恒的定律下是生产不出来的,在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熵增加的原理下可利用资源也是要减少的,制约世界的经济发展从人的创造力限制逐步要变成资源的供给限制,从而造成资源将长期紧缺的趋势。资源的紧缺就是通胀中最大的供给不足,也就成为通胀的巨大动力。过剩的产能背后,实际上不仅仅是消费的不足,更是要满足这些产能的原材料和能源的供给的不足;解决不了“过剩不能有效地拉动需求”的背后,是没有满足这些产能的资源供给。因此产能的泡沫遇到资源的紧箍咒以后就不得不破灭了,通胀在过剩经济下就是产能泡沫被资源挤暴的结果。

不过,对于当今世界资源会长期紧缺这一观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的。反对者的主要理由就是对于世界资源的紧缺在上世纪70年代就成为世界的热门话题,当时预言"石油即将用尽",结果过了三四十年也没有发生;而且随着科技进步、石油替代用品的出现,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笔者将在下面详尽分析这种看法能否成立,以及形成这种看法的原因。

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为什么没有发生预想中那样大的资源紧缺?与前苏联逐步走向没落直到解体大有关联。当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前苏联从世界强国变成了不得不以出售资源为生的"乞丐"国家俄罗斯时,这样的变化给世界市场注入了大量的资源,俄罗斯当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产油国和石油出口国。同时,1978年后,中国也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原先封闭的中国打开国门,不得不以廉价出售资源来换取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也给世界注入大量资源。比如我国曾经大量廉价出口石油,而当年廉价出口稀土的格局至今仍未得到全面逆转,如此等等。与此同时,还有一个资源大国南非,此前由于种族隔离政策被国际制裁,大量资源也不能进入国际社会流通,在80年代消除了种族隔离政策以后,南非重返国际贸易体系,也为世界带来了大量资源。随着中国、南非以及前苏联国家的资源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逐步流入世界市场,极大地减缓了世界资源供给的紧缺局势。

但是当今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已经走向了崛起的道路,南非也成为非洲新的经济发展领头羊。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第二大的石油进口国,这样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已经造成了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大宗商品的大牛市,虽然这牛市被2008年所发生的金融危机所遏制,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过去,这牛市一定还会卷土重来,现在铜价破万美金,石油价格重新突破110美元,就是这样的牛市再现的端倪了。因为在世界上属于发达国家的人口也就是10亿人,而当前世界在崛起的人口却远远多于发达人口。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的金砖四国的人口是世界总人口的一半左右,这些国家的发展和国民对于资源的需求,会造成世界资源的长期紧缺,如果这些人要享受发达国家同等的资源消耗下的生活,对于世界的资源供给就是灾难。哪怕仅仅是中国人要享受到目前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都是世界目前的资源格局所不能承受的,所以2010年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造访澳大利亚时说"中国人要享受美国人或者澳大利亚人那样的生活是世界的灾难",虽然他的立场有问题,但是却如实地反映了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世界资源供给格局必然要改变的客观事实。

我们仅以能源来说明,美国不计算输入产品消费能源的情况下也消费了世界

23%左右的能源。而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以上，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要是与美国持平的话，世界100%的能源给中国都不够，因此发展与紧缺是如影随形的。更何况美国人实际上消费的能源远远要多于23%，因为大量美国人消费的高耗能产品是在美国之外的国家生产的，这些产品所消耗的能源实际上也是美国人所消费的。

对于这样的资源紧缺的变化，我们可以使用美元与黄金的走势来观察。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资源危机以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黄金兑美元从35美金/盎司涨价到800多美金/盎司。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前苏联的解体，黄金价格一路下滑到不足300美金/盎司，而现在已是一路上涨屡破新高，最高摸至1400美金/盎司以上。这说明在黄金的货币属性不断弱化的时候，其资源等价物的属性反而更明显。因此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需求下，尤其是“金砖四国”的腾飞下，资源紧缺的形势只能是越来越严重。

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5000美元之间是对于资源需求增长最快的时期，因为这个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在追求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之外，对于生活的质量和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明显看到人均粮食消费量和能源消费量暴增。与此同时国家也进入基础建设积累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国家和社会的所得之处主要是以消耗资源为主的物质文明为主，而超过这个范围资源需求的边际效用就会降低，因为人们在物质得到满足以后新增的消费需求更多地在精神文明方面，也就是人均单位GDP所需求的资源量降低，人们更多的收入被花费在资源需求低的精神享受需求方面，物质享受需求的增加有限了。

如今发展中的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都还处于人们对于基本的物质享受还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如中国老百姓每天都可以洗一个热水澡，这样的需求应该说很基本吧？但实际上在中国农村仍是难以满足的，也就是中国还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没有满足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基本需求。而满足每天洗一个热水澡的小小愿望，就需要水资源、加热的能源、污水回收等多方面的配套建设。以中国这样大的人口基数，要满足每一个老百姓一天一次热水澡的需求，这需要多少能源、资源来支持的？而对于发达国家，再发达也不至于平均每天在现在的基础上多洗一次。因此在这样的边际效果下，发展中国家崛起时的资源短时期需求量更大，中国等国崛起的资源瓶颈也是世界长期的资源紧缺压力的来源。

对于财富和价值的认识的发展是非常曲折的。在古希腊时代，人们把财富的使用价值作为财富的衡量标准；到了重商主义时期财富变成了贵金属货币；但到了古典经济学时期人们开始转向，把财富变成了社会财富，也就是人类的劳动是财

富,而其他资源的变化只不过是物质和能量的转化。正因此,以社会财富为主要财富的劳动价值论在西方古典经济学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评估当下,不能也不应忽略自然科学发展的背景,应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下对这样的认识加以修正。当年经济学财富变成了社会财富而没有资源的自然科学基础,是因为当时人们认识到了化学中的质量守恒和物理中的能量守恒这两个科学规律,认识到了资源中的物质与能量在各种经济、社会、生产活动中的转化是完全守恒的,物质和能量不会创造出来也不会消失,对于这样守恒的东西当然无法成为经济发展中不断增加的财富来源,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财富是其社会属性人类劳动行为创造的。

但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还在进步,在能量守恒定律被认识以后依然有人在能量守恒得到满足下试图建造第二类永动机,但是在热力学第二定律建立起来以后,世界认识了熵和熵增加原理,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能量守恒和质量守恒的转化是要付出熵增加的代价的,熵是不可转化为做功的能量和世界无序度的度量的,这个世界的有序和可以利用的能量是在不断的减少的,也就是资源的总量是守恒的而可以利用的资源却在减少。比如,很多人认为在世界 2% 的铜矿被开采光了以后,世界还有 1% 的铜矿可以开采、还有废铜可以回收,还有其他材料可以替代等等……但是我们开采 1% 的铜矿所需要的能量消耗肯定要高于 2% 的铜矿,就如居里夫人当年提取镭一样。我们提炼 1% 的铜矿和提炼 2% 的铜矿本身所消耗的熵是不同的,各种替代的材料本身也是要消耗熵的价值造成熵增的,因此以熵为尺度,就可以把各种可以替代和混淆的因素都给屏蔽,熵增加原理确立了资源财富在转化中的代价,也确立了资源的有限性,因为回到熵增加的本质上是不能替代的。

取得石油的成本也是急剧增加的,之所以如今还未出现上世纪 70 年代预言的“石油用尽”的情形,背后原因是油价高涨以后很多没有开采价值的石油进入了开采程序,开采成本的增加也是要输入通胀的,而人们在石油替代品尝试上所付出的代价也极其高昂。据美国农业部(USDA)2010 公布的乙醇能源回报率报告,2002 生产的玉米乙醇为 83961 英热单位,产生的副产品为 14372 英热单位,而消耗能源为 77228 英热单位。在 2004 年需要花 72052 英热单位能量来生产 1 加仑乙醇,但到了 2010 年仅需 53785 英热单位能量就能生产 1 加仑乙醇,而副产品则为 20409 英热单位。对于本身能量增加的效率,美国人要投机取巧地把所产生的副产品热单位能量扣减在生产消耗上才能够超过 100%。但实际上,生产乙醇所消耗的是有效的可以利用的能源,而乙醇作为动力燃料的效率不超过 50%!这已经非常得不

偿失了，而生产乙醇的副产品热利用效率就更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计算一下乙醇以及副产品的效率这样的生产是否合算，就要细细思量了，而这里还没有考虑耕种玉米所需要的土地资源。

欧洲所谓的降低“碳排放”，是依靠大量的核能生产电力，但是如果中国也要以核电为主的话，以中国仅处于世界第十的铀矿储量是难以满足原料需要的，要知道铀资源可比铁矿石更容易被人“卡脖子”，有钱也未必买得到。而对于核污染处理，现在是丢入公海，没有人计算其间接损失。2011 年日本地震后的核电站污染问题，就让人不得不思考核电在安全和污染方面的代价，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是依靠上万人救灾和 6 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为代价的，这个代价在现代社会是难以承受之重，核电安全问题已经让国家有关部门反思，为此国家已经下文对于新批核电站全部暂停审批，已经审批的要进行安全核查。

再进一步讲，很多的所谓环保和节省资源的绿色投入，也要消费其他额外的资源，这样的结果就是造成产品制造成本提高，原来粗放生产的低成本被环保绿色资产的高成本所替代，其价格也要提高很多，如果以货币购买力的角度来看待高涨的价格，同样的货币所能够买到的东西变少了，这就是通胀。在这里要看到的是好环境也是一个人类生存离不开的资源，为了环保增加成本受到限制导致的产品售价增加，实际上就是环境资源紧缺的结果。

至于“科学能够解决资源紧缺”这一观点，如果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打破热力学第二定律，不能改变熵增加的方向，这样资源随着熵增加逐步紧缺的趋势就无法改变，熵值不能无限增加、每年从太阳能量得到的负熵有限就决定了资源的有限性，在热力学第二定律下这个有限性不能被新技术所打破。在资源的每一次转化过程中均要有效效用大量损耗的情况下，可以利用的有效资源就应当成为价值的一部分，在世界资源丰富的时候这样每一次转化的损耗可以忽略，使得经济行为的资源可以视为无限和不计算其中的价值，但是在世界所消耗的资源接近地球的供给量的时候，资源的价值和转化中的损失就不能忽略不计，因此美国主导的石油美元体系中的石油，并不是简单的对于美元的替代，而是把石油当作资源的等价物计算到价值体系之中了。

在资源有限性的前提下，中国等金砖四国的经济崛起，必然要伴随着世界资源的紧缺与再分配的过程，而这样的资源再分配在侵略、掠夺无法进行的情况下就会产生资源先占者的一个资源渔利、食利的过程，这样的渔利与食利得益没有付出劳动，体现在劳动价值主导的信用货币体系中，就是通胀！

这样的资源先占者的渔利体现在多个方面,大到主权石油公司的崛起和欧佩克对于石油市场的影响把油价推高,再到与中国经济密切相关的铁矿石矿山卡特尔不断地推高铁矿石价格卡我们的脖子,小到如今被热议的房地产拆迁,都有体现(拆迁就是原来的土地和资源的占有者对于新来者的一个利益博弈)。对于资源占有者的渔利,这样的交易不再是原来的等价交易,而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易,也就是要资源占有者觉得占了便宜才会出售,而这不等价交易中便宜出来的货币,就是对于整个经济体的流动性输入,成为通胀的动力来源。

而通胀泡沫输入的多少也与资源占有者态势的强弱有关。以石油为例,我们按照2010年的数据,美国与中国取得石油的成本绝对不相同,中国只能按照国家价格购买石油,但是当前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含30%左右的燃油税只有每加仑不到3美元,不含税的在2美元左右,而当时国际原油油价已超过90美元/桶,一桶是42加仑,原油的FOB成本为2美元多,再加上运费、炼油成本与损耗、批发零售的差价和合理利润,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美国人享受的低油价,只能说明美国得到了远比国际油价便宜的石油。这样食利的多少背后就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国际政治实力、金融实力的全方位博弈。

在过剩经济下的资源紧缺通胀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世界肯定是滞胀的。因为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资源先占者的食利肯定是要导致资源的暴涨,而过剩经济又使得工业制造的价格因过剩而下滑,因此滞胀是世界性的主题。这样滞胀的结果是掩盖了世界通胀的真相,尤其是科技制品价格迅速下跌的方式,更是对冲了资源产品的涨价,就如电子产品的摩尔定律,产品的性能在18个月内提高一倍,价格降低一半,使得同样的一个产品中的电子部分的成本大大降低,对冲了产品生产所需要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使得产品的价格在一定时期维持相对的稳定。与此同时,现在是一个把各种传统产品电子化的时代,产品的电子化的结果就是加速了产品的更新周期,使得你难以发现产品的资源涨价,尤其是在产品不断地换代的情况下,你是基本无法与前一代的产品对比价格是否上涨的,结果必然是一个滞胀的过程,而滞胀的过程,也是社会和国家的财富新一轮再分配的过程。

在过剩经济下,过剩的产能对于资源的需求增长是长期的,资源需求增长导致资源的紧缺是长期的,资源占有者的先发渔利也是长期的,对于资源食利者的通胀再分配也是长期的。这样的博弈过程和正反馈的循环,就是当今世界在过剩经济下通胀的长期动力来源。

二、危机后的优良国家均是资源国

据外电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考察了全球98个国家的财政状况，其中84个国家公共财政优于美国。北欧国家财政状况最优，多数没有净债务。根据净公共债务占GDP比例衡量，多数垫底国家为比利时、法国、葡萄牙、希腊、日本等所谓“发达国家”。令人惊讶的是，仍有部分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政治稳定的发达国家成功维持健康的净公共债务水平。其中最突出者当属挪威，该国没有一点净债务。北海油田开发收入注入庞大的主权财富基金，这相当于政府拥有现金等价物。减去政府债务后的公共资产为GDP的160%。IMF的报告显示，其他主要北欧国家的财政状况也不错。瑞典、芬兰政府的资产规模均超过债务，丹麦的净债务仅为GDP的2%。

在世界其他地区，智利收支平衡，沙特阿拉伯坐拥众多石油现金。澳大利亚、新西兰净债务约为GDP的8%，加拿大为35%。2011年11月22日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1.96%，挪威、澳大利亚同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为2.5%和4%。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危机后自由市场经济下还实行高福利政策的国家不完全是危机重重，这些债务情况优良的国家都是资源国家，资源所带来的利益巨大，在危机和世界的通胀中为高福利埋单了，因此能够推行高福利政策是有诸多条件的，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强国维持高福利制度也是举步维艰，两党为达成减少赤字的协议在恶性博弈，这个恶性博弈已经成为美国首次失去3A评级的理由。

背景资料：

《经济学家与生态学家的赌博》

张玉路

http://www.81jr.net/magazine/paper/2008/420/420735.htm

SARS病毒在全球的肆虐，引起世人的极大恐慌，同时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类和环境的关系。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争论在新世纪又异常热闹起来。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老问题，但却是为数不多的能长久活跃于人类历史的“新鲜”问题之一。其实在上个世纪，就有一位经济学家和一位生态学家为地球的未来下赌注。这是一个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非典过后，重新回顾一下这场赌博，可能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地球未来的十年之赌

1980 年,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L·西蒙(Julian L. Simon)在《科学》杂志上大谈他对未来的幸福憧憬。他认为,当前人们颇为担忧的人口快速增长不是危机,而最终将意味着大有裨益于更洁净的环境和更健康的人类。未来的世界将更美好,因为将有更多的人提供更聪明的思想。人类的进步是无限的,因为地球上的资源不是有限的。

西蒙的文章引来了大量愤怒的书信。其中就有斯坦福大学的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希(Paul R. Ehrlich),被激怒的埃利希给西蒙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地球的资源不得不按当时情况每年以七千五百万人的速度而增加的人口来分配,这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地球上食品、淡水和矿物的储存量。随着资源的更加短缺,商品一定会昂贵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西蒙以挑战的方式做了答复。他让埃利希选出任何一种自然资源——谷类、石油、煤、木材、金属——和任何一个未来的日期。如果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资源将变得更加短缺,那么资源的价格也要上涨。西蒙要求以打赌的方式肯定价格反而会下降。

埃利希接受了西蒙的挑战。他精心挑选了五种金属:铬、铜、镍、锡、钨。赌博的方法是,各自以假想的方式买入一千美元的等量金属,每种金属各二百美元。以 1980 年 9 月 29 日的各种金属价格为准,假如到 1990 年 9 月 29 日,这五种金属的价格在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后果然上升了,西蒙就要付给埃利希这些金属的总差价。反之,假如这五种金属的价格下降了,埃利希将把总差价支付给西蒙。

打赌的合同签好了,有趣的是这两位打赌的主角和对手至死未曾谋面。当然这并不妨碍埃利希和西蒙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互相攻击。

这是一场时间和金额不成比例的赌博,期限长达十年,而标的仅有一千美元。这当然算不上豪赌。但世人对这场赌博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拉斯维加斯这些大赌城的任何一场豪赌。因为它涉及人类的未来,与此攸关者何止千元——其中有对地球最终极限的看法,有对人类命运的设想。一位看见的是杀虫剂渗入地下水,而另一位眼中则是农场的谷仓里装满了创纪录的大丰收;一位所见的是热带雨林被大批毁坏,而另一位所见的是人们寿命的延长。这其实是一场乐观论者和悲观论者短兵相接的论战。

乐观论者和悲观论者的交锋

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希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教授。1968年他的代表作《人口炸弹》一书发表后，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之一。该书销售量为两百多万本。如果埃利希不是在斯坦福大学教书或研究蝴蝶的话，那就可以发现他在搞讲座，参加领奖或在“今日”节目中露面。人们认为他是悲观论者。

《人口炸弹》一书是这样开头的：“养活所有人类的战斗已经结束。20世纪70年代将死于饥饿者达亿万之数。什么也防止不了世界死亡人口的大幅度增长。”1974年他预言到：“1985年以前，人类将进入一个匮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许多主要矿物供开发的储蓄量将被耗尽。”

经济学家朱利安·L.西蒙，是马里兰大学的教授，据说他的观点经常影响着华盛顿政策的形成。但有意思的是他却从未在学术上或知名度上有埃利希那样的成就。他是乐观论者。

这两个人分别领导着两个思想派别——有时也被称作毁灭论者和兴旺论者，这两大派别为世界是在蒸蒸日上还是在走向毁灭而争论不休。

西蒙坚持认为环境和人口危机被夸大了。他抱怨说，“一旦一场预测的危机没有发生，这些毁灭论者就匆匆转向另一个。为新的问题担忧，这无可非议，但是情况总的来说在好转。”

在学术界，西蒙在这场辩论中似乎占上风。许多科学家对他的一概都表示乐观的思想感到不舒服，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过去的良好趋势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一致的意见都不赞成埃利希视人口增长为极大罪恶的见解。

然而，若提起谁在公众中占上风的话，西蒙远远落在后面。1990年地球日之前，埃利希在电视上推销他的新作《人口爆炸》，此书声称“人口炸弹已经起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地球日集会上，当埃利希告诉人们人口增长可能产生这样一个世界，即他们的子孙将在美国大街上忍受食品暴乱时，超过十万人的人群都为之鼓掌。

同一天，在只隔一街区远的一个小会议室里，西蒙针锋相对地将人口增长称为人类对死亡的胜利。他说：“这是难以置信的进步”，接着西蒙矛头一转说道：“你本指望人类生命的热爱者们欢欣鼓舞；可相反，他们却在为如此多的人仍然活着而痛惜。”为西蒙发布的这个消息而祝贺的听众只

有十六人。

“价格机制”战胜了“资源匮乏”

埃利希和西蒙的打赌在1990年的秋天平平淡淡地了结了,埃利希不过是给西蒙寄去了一纸金属价格计算账单以及576.07美元的支票。埃利希所选的五种金属中的每一种,在剔除了1980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因素以后,价格都下降了。

西蒙在赢了这场赌博之后说,自己一开始就对赢得赌博充满了信心,因为他相信人类社会的价格机制和技术进步。

其实对于许多经济学家来说,这场赌博并没有什么悬念。就好像美国和伊拉克战争一样。我在1990年代读到有关这一赌博的消息时,那时我仅仅是一个正在读经济学的大学生,当然称不上什么经济学家,但我知道埃利希不会赢。因为,西蒙掌握的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经济学理论。早在1931年美国经济学家霍特林已经在其论文《不可再生性资源的经济学》中充分地分析了这一问题。他把不可再生性资源价格的上升率称为这种资源存量的利率,这种利率会随着其他资产的利率上升而同比例上升。这被称为霍特林原理。这一原理证明了使不可再生资源不会耗尽的是价格机制。这正是西蒙敢于打这场赌的理论依据。他的获胜不是偶然的运气,而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调节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价格随供求关系变动而灵活、及时地变动。价格反映了资源稀缺的程度。当某种资源短缺,供给小于需求时,价格必定上升。价格上升,增加了供给,减少了需求,最终使供求平衡。反之,当某种资源过剩,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必定下降。价格下降,减少了供给,增加了需求,最终也使供求平衡。所以,只要让价格自由浮动,价格就可以准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有效地调节供求。

埃利希所选的五种金属无疑是不可再生性资源,但也同任何其他资源一样由价格调节。当这五种金属越来越短缺时,其价格必定上升。但为什么现实中这五种金属越来越少,而价格反而下降,西蒙赢得了这场赌博呢?秘密就在于价格上升刺激供给的作用。

匮乏会导致更好的替代品

经济学家罗塞尔·罗伯茨曾写过《看不见的心——一部经济学罗曼史》,这是一部以小说形式介绍经济学的书。这本书的主人公爱德华学校的经济学教师山姆·戈登在第一天给学生上经济学课时,向学生提了一个问题:世界现已探明的石油储藏量为五千三百一十亿桶,每天石油消耗为一百六十五万桶,我们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将用完这些石油?他要求学生一分钟做出回答。许多学生开始用计算器计算。最后山姆·戈登告诉他们,答案是永远用不完。因为当石油越来越少,价格上升过高时,人们就不会用石油,而用其替代品做燃料了。只要石油价格上升到足够高,一定会有替代品出现,剩下的石油由于开发成本太高,无人开发,石油自然不会用完。

这个故事与西蒙和埃利希的赌博都说明了同样的道理:在市场机制和价格的作用下,资源匮乏会导致更好的替代品出现,从而解决了人类面临的资源短缺问题。三千年前,希腊人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就是由于锡贸易中断而引起的。制造青铜需要锡,而锡的不足使得希腊人试用铁。同样,十六世纪的英国因木材短缺而开始了用煤的时代;发生于1850年左右的鲸油的短缺促成了1859年第一口油井的开发。

世界上大多数资源都有其替代品,不可再生性资源同样也有替代品。当这五种金属的价格上升时,就刺激了人们去开发它们的替代品,发明并大量生产替代这五种金属的塑料和陶瓷制品就变得有利可图了。电话改由卫星和光导纤维传递而不再是铜线,切削刀具使用的是陶瓷制品而不再用钨。金属的许多用途都被更便宜的材料取代了,特别是塑料制品。当这些替代品大量生产出来时,供给增加,价格下降,人们就会用替代品取代这些金属。这时,这些金属的需求大大减少,价格自然就下降了。可见在刺激替代品的开发和生产中,价格十分重要,只有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当开发和生产这些金属的替代品有利时,才能刺激这种创新活动。

替代品的开发与大量生产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但刺激这种技术进步的是价格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包括专利在内的产权受到立法保护,人们可以从自己的发明创造中获得丰厚利益。这是激励人们开发各种替代品的动力。发明者寻找和开发这五种金属的替代品——陶瓷或光导纤维等或许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面临的这五种金属短缺问题,而是为了获利。但

在他们为获利而开发这五种金属的替代品时,他们就为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价格调节使发明者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这就是市场调节自发刺激技术进步的机制。有这种机制,人类就可以生产出一切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替代品。因此,像这五种金属一样的不可再生性资源,不会枯竭,价格也不会无限上升。而且,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必然由于替代品的大量生产而再下降,甚至低于原来的价格水平。所以,西蒙赢了。

价格机制能否解决一切

人们对这个十年之赌的结果之所以平静地接受,就在于从一个角度看这不是一个公平的赌博,降低了代表性,可信度打了折扣。埃利希的不聪明之处,在于其舍弃丰富的生态知识,而以其可怜的经济知识赌博其最不胜任的经济游戏。这就好比《三国演义》中精于马战的北方士兵"舍鞍马就舟楫"一样。而西蒙很聪明,他很巧妙地把一个自己并不拿手的生态问题转化为一个自己擅长的经济问题。因此,赌博未始,而胜负已见。

环境和经济、资源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具有可比性。不可再生性资源随着消耗的加大,会出现短缺,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这种资源的短缺和匮乏并不一定和价格上升相联系。通过埃利希和西蒙的赌博,人们普遍懂得了这个经济学原理。从这个方面讲,二人的打赌与其说是有关人类前途的赌博,不如说是一场经济学专业知识的竞赛。这样看来,这场赌博的意义并不大,还是没有解决地球的明天。

价格机制能很好地解决人类面临的资源匮乏问题,但是资源不会耗尽,并不能表明现今的生态系统和生产方式不存在问题,也不意味着人类不存在危机。当前全球存在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多种多样、数不胜数,与此相比,资源匮乏仅仅是一个很小的方面。价格机制和技术进步能否完全解决这些问题,目前还是未知数。

埃利希看到了问题,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他却没有找到正确分析问题的方法,也就谈不上什么解决问题了,以至于给经济学家找到了漏洞。也许有人会问,这场赌博如果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结果又如何呢?我想深谙经济常识的西蒙肯定不会和埃利希打这个赌,如果真打,西蒙必输无疑。可见,埃利希还不是一个彻底的悲观论者,因为在真正的悲观论者眼中,通货膨胀本身就是一个危机,是大可指责的。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人类虽然依靠市场机制和价格的作用，解决了不可再生性资源的短缺问题，但是本来不需要市场和价格调节的可再生性（俗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资源，却不得不由价格机制来调节了。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像空气、水等这些可再生性资源的状况越来越糟。原先被认为是“无限的”洁净空气和水反而变得稀缺，价格机制又可以大显身手了。

如果我是埃利希，即使真要打价格赌，我也不会选择不可再生性资源，而选择那些再生性资源，就赌一个“水”，西蒙必然不敢应战。因为，替代效应在这个问题上目前还完全束手无策，在可预见的未来，起码在十年之期，人类不会找到替代食用水的好办法。

未来不是昨天

埃利希赌输了以后并不服气。他说：“看看新出现的问题吧：臭氧洞、酸雨及全球变暖。如果下一世纪生态系统继续走下坡路的话，我们有可能面对巨大的人口总崩溃，对此我毫无疑问。”

听到他的对手的反应，西蒙并不吃惊。他以嘲讽的口吻回击道：“这么说埃利希在谈人口大崩溃，这听上去倒是更好的赚钱方法，就此打赌下注，我给他特大优惠。”看来只好再赌一把了。

1995 年埃利希联合了同事史蒂夫·施奈德教授和西蒙再次对擂。这次不是“价格战”，而是就关系全球环境和人类发展的十五种趋势打赌，每一趋势下注一千美元。埃利希终于转向了他擅长的环境问题。这些趋势包括全球气温升高、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热带雨林缩减，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等等。如果这些趋势恶化，埃尔里奇就赢了，如果这些趋势得到改善，西蒙就赢了。这次比赛仍然为期十年。

可惜西蒙“出师未捷身先死”，1998 年 2 月在华盛顿去世。不过事情并未完结。乐观派后继有人，丹麦奥尔胡斯大学的副教授比约恩·隆伯格继承了西蒙的事业，扛起了兴旺论的大旗，赌还要打下去。

这一场赌不像上一次那样能轻松地预测其结果，因为它涉及的问题比第一次要复杂得多。不可再生性资源问题，的确可以用价格机制解决。但有关人类未来的十五大趋势就远非一个价格机制所能解决的了，何况这些问题要涉及全球各国。在去年的南非环保峰会上，各国就争论不休，

难以达成协议,由此可知环保难度之大。即使有了协议,像上次峰会的《京都议定书》不照样被美国踢来踢去,难以落实。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乐观派也乐观不起来。

虽然赌博胜负难分,乐观派与悲观派仍在争论。悲观论者认为,人类还没有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并借用环境保护论者的一条标语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我们不是从父辈那儿继承地球;我们是从孩子们那儿借用它。”。西蒙说,美国的空气和水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变得越来越清洁了,这应归功于更大的富裕(更富有的社会有能力支付控制污染的费用)和工业技术(与本世纪初烧煤的炉子所释放的煤烟和马所排放的粪便相比,我们城市中由汽车所引起的污染是微不足道的)。但乐观的西蒙忘了一点,美国提升了产业结构,把众多的高污染企业转移到较贫穷的国家,使这些国家原本清洁的空气和水污染了。

2001 年底,隆伯格出版《环境怀疑论者》一书,对悲观论者进行了驳斥。此书和西蒙的文章一样,立即受到了悲观论者及环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自然》、《科学》、《科学美国人》这些著名杂志都对该书提出尖锐批评。看来即使是 2005 年,这次赌博结束之后,乐观论者与悲观论者的争论也不会结束,也许还会有下一场、再下一场赌。

乐观者也指责悲观者:“为什么总盯着世界糟糕的地方,而对人类的进步却熟视无睹。”“除了坏消息,什么也看不见。”其实喜欢批评现实的人,并非是完全不满意现实,只不过是期望通过批评现实来改善现实罢了。人类不就是在否定和批评中得以前进的吗?埃利希的讲话赢得了十万人的鼓掌,并不表明他们都是悲观论者。他们怀着巨大的希望,期望明天变得更美好,是真正的乐观者。“悲观者”期待变革,乐观者追捧已有的成就,这可以看作理性的乐观和盲目的乐观的区别。

2005 年已到了,这涉及人类未来的十五种趋势,有的的确有好转的趋势。但只要看一看历年的西方八国首脑会议都像防刺客一样把环保主义者防御于“会门”之外,就可知,地球的前途并不像乐观派宣称的那样“一切都在好转”。

不管这场赌博的最后结果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今天人类的任何行为都要明天来继承,未来不过是今天人类活动的成果。这样看来,今天是明天的赌注。

三、资源特殊:后弯曲线是危机深化原因

欧债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欧洲难以继续印钞,美国也采取了紧缩的政策,对此人们可能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欧洲在世界都在印钞的情况下不继续印钞逃避债务,为什么美国不继续宽松下去?美国没有推出 QE3 而是进行了扭曲操作,对于前两轮收购的16000亿美元债券只是用卖短买长的办法交代了4000亿,其他都没有交代,而扭曲操作实际就是紧缩!这里我们就要从资源的属性上进行深入认识了。美国继续货币宽松会让资源价格涨到天上去,结果是便宜了资源国家,让资源国家在美国印钞的过程中取得了比美国更大的利益,这对美国更为不利。

对于商品的供需关系,一般都知道是价格越高供给越多,反之越少,这个也是供需经济理论的基础,但是世界上有没有价格越高供给反而下降的东西呢?这个特例是有的,一个是劳动供给,一个是70年代的石油危机时的石油供给。这两个例子的现象相同:都是随着价格上涨而先供给增加,然后随着价格的继续上涨而供给减少,这种现象后来被经济学家称为“后弯曲线”(既供需曲线向后弯曲)。后弯曲线的形成原理在于,对于劳动力而言是随着收入增加,人们在时间分配上会增加休闲娱乐的时间而减少工作时间,而对于石油则是在石油涨价和美元印钞贬值的预期下,谁也不愿意多卖石油而持有美元,资源国家要出售石油的原因是他需要美元还债和外汇平衡,只要石油收入能够平衡,他们就不会出售更多的石油,因此影响石油供给量的决定性变量是销售额而不是销售量,在价格提高的时候出售更少的石油就可以达到国家需要的销售额,因此供给的石油会更少。

现在世界资源市场其他资源产品也出现类似于石油的情况,资源供给的后弯已经发生,即随着资源价格的上涨,资源供应反而减少。美国是资源消费国,这种情况无疑会造成巨大的危机。美国的次债危机以及随后的金融危机,都是油价暴涨引爆的,石油的暴涨是导致美国房价暴跌的元凶,因为美国房价之所以便宜是因为美国老百姓居住区没有集中市政支持、没有市政投资,上班要依靠车轱辘而生活取暖用电等都要依靠柴油发电机和燃油壁炉,这完全是依靠廉价石油的生活方式,如果石油价格暴涨一定要挤压房价的空间,尤其是油价暴涨的预期,将是那些依靠石油维持生活和低房价的美国老百姓的噩梦。而美国摆脱危机还要等待房价的回暖呢,房地产复苏将使得各种债券担保公司手上止赎持有的房产可以高价卖出,如果房价能够上涨回到2008年水平,这些公司不但不会亏损还会暴赚呢!因此石油价

格必须控制在"合理"的价位，为了平抑石油价格坚决不能搞量化宽松。这样合理的推论就是必须挤爆某一个经济体，让它为危机埋单、让它的石油需求降下来，这样才能够保持低油价，等这个倒霉蛋经济体被挤爆以后才有进一步货币宽松的条件，而欧洲目前就在这样的危险境地之中，因此欧洲为了石油价格降下来自身不被挤爆，搞环境保护、搞绿色经济、搞碳排放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同时中国自身的风险也是很大的，出口的压力、增长放缓的压力、通胀的压力、高利贷崩盘的压力等，中国的有限经济资源应当更关注自身的经济安全，这场危机是一定要有人倒下埋单的，中国帮助他人的同时要注意自身安全，如果中国出现问题，谁能够救中国呢？

在资源供给特殊性的情况下，不断地印钞实际上是让资源供给减少，资源价格涨到天价便宜了资源国家，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更不能接受的事情，而为了把资源价格打下来只有收紧流动性反而更加剧了欧洲的危机。在欧洲印钞遇阻不能量化宽松的时候，欧洲的流动性是紧张的，尤其是欧盟与美国不同，世界大量的交易是美元结算的，美联储不施行 QE3 以后是欧洲的流动性更紧张，尤其是在欧洲交易中的美元流动性更是如此，前面还有多国央行联合给欧洲注入美元流动性的事情。欧洲债券的价格在流动性紧缩的情况下必然下跌，债券的收益率提高了，新的债券发行就必须要有更高的利率，但是更高的利率又带来了更高的风险，必然要导致原来已经债台高筑的国家雪上加霜，更高的风险必定带来更高的利率，这个利率增加的过程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必然要导致危机的发生，而危机下的利率飙升本身就会使得 CDS 暴涨，CDS 持有者就已经在此过程中取得暴利了，因此欧债危机与资源的特殊性在深层次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资源供给特殊性使得连续印钞行不通，印钞中断所带来的紧缩挤爆了欧盟，在紧缩的背景下欧洲危机正在发酵。

四、资源挤爆市场经济体系

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需要的就是市场出清、信息充分和绝对理性，但是在资源危机的压力下，这样的市场经济假设被打破了，市场经济的信用体系出现了巨大的危机。

市场出清假设是说，无论劳动市场上的工资还是产品市场上的价格都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可以根据供求情况迅速进行调整。有了这种灵活性，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都不会存在超额供给。因为一旦产品市场出现超额供给，价格就会下降，直至商品价格降到使买者愿意购买为止；如果劳动市场出现超额供给，工资就会下降，

直至工资降到使雇主愿意为所有想工作的失业者提供工作为止。因此，每一个市场都处于或趋向于供求相等的一般均衡状态。

在市场出清的假设之下供需曲线很快达到均衡点，而凯恩斯主义主张非市场出清假设，由此得出需要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学理论，他的非市场出清的基本含义是，在出现需求冲击或供给冲击后，工资和价格不能迅速调整到使市场出清的状态。缓慢的工资和价格调整使经济回到实际产量等于正常产量的状态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处于持续的非均衡状态。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资源曲线后弯的情况下，市场出清的假设没有出现更大的变化。

在微观经济学里面是迅速达到均衡点，在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里面是供需达到均衡点的时间很长、需要政府的干预，而对于资源的后弯曲线则是政府干预和长时间也无法解决达到均衡点的问题，因为曲线后弯以后，过了拐点就不是供给随着价格的提高而增加，供给是随价格的增加而减少的，但是资源的需求却相对刚性，这样的曲线可能就没有交叉点、没有均衡点，结果就是通过市场无法达到均衡，然后就是以价格交易体系所建立的期货、金融衍生品等交易体系的整体崩盘，市场经济的信用体系就出现了危机。

资源的曲线后弯与当今世界的货币发行机制是有关的，在媒介货币和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的发行量是无限的，但是资源却是有限的，因此在曲线上无限对有限，而在本位货币的时代资源曲线就不是后弯的了，因为在价格暴涨的时候是没有那么多的货币的，其结果就是恢复到了没有后弯的情况，但是在无限的货币之下，必然是引发资源持有者的惜售，因为货币会贬值。

资源曲线后弯造成的价格暴涨，最终将导致西方金融市场的崩溃，最终导致08年危机的爆发和巨大损失，随后世界博弈的要害就是谁最终为损失埋单了。

五、资源的特殊性与危机再探底的必然性

在2011年7月13日美联储说可能推出量化宽松，当晚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结果就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7月14日在国会作证时，改变此前“可能采取新货币刺激政策”的提法，表示“近期不会推出新的刺激措施”。美国对于石油价格的暴涨非常敏感，此前美日等国共同向市场投放6000万桶石油战略储备，联手做低石油价格，在这里还要对于资源供需的特殊性进行分析，让大家看到在资源的压力下，经济危机再一次探底的必然性。

供需经济理论的基础是价格越高供给越多,但是特例是资源品的价格越高供给反而下降,因此出现了后弯的供给曲线,在后弯的供给曲线下拐点的上方是供给随价格的升高而下降,下方是供给随价格的升高而上升。

萨缪尔逊(P. A. Samuelson)和诺德豪斯(W. D. Nordhaus)在谈到后弯的供给曲线时用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劳动供给,一个是70年代的石油危机时的石油供给。这两个例子的现象虽然相同:都是随着价格上涨而先供给增加,然后随着价格的继续上涨而供给减少。后弯曲线的形成原理在于,对于劳动力而言是收入增加人们分配时间上会增加休闲娱乐的时间而减少工作时间,而对于石油则是在石油涨价和美元下跌印钞的预期下,谁也不愿意多卖石油而持有美元,资源国家要出售石油的原因是他需要美元还债和外汇平衡,只要石油收入能够平衡,他们就不会出售更多的石油,因此对于石油的供给是销售额的问题不是销售量的问题,在价格提高的时候出售更少的石油就可以达到国家需要的销售额,因此供给的石油会更少。现在世界的资源市场不仅仅是石油,其他资源产品也出现类似于石油的情况,对于经济发展的二次探底压力巨大。

对于后弯的供给曲线,需求曲线可能会与之交叉两次,也就是能够形成两个均衡点,一个高油价的均衡点另外一个是低油价的均衡点,在经济发展、石油需求不断走高的时候,由于需求巨大而供给却不能通过价格增加而提高,新的均衡点形成是不易的,供需曲线可能出现走势接近或重合,均衡点不稳定的情况下,传统微观经济学里面要求的市场出清的基本假设不存在,此时甚至也可能形不成均衡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价格不断涨上去也得不到足够的石油,这样的结果就是以供需关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崩溃。在当今金融衍生品发达和石油与货币美元直接挂钩的情况下,以石油等大宗商品和证券构建的金融衍生品体系就必然会出现坍塌,这就是08年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之一。

对于08年的金融危机,石油的暴涨暴跌非常引人注目,中国的航空公司等在石油产品的套期保值上损失巨大,但实际上如果对于石油的后弯曲线有所研究的话,通过简单的金融工程学就可以计算在后弯曲线下是形成了不同的均衡点,在油价147美元的高位以上由于需求增加而供给不能随价格的增加而增加来满足需求,因此与需求形不成供需曲线的均衡点必然造成系统的崩溃,市场将大幅度下探到后弯曲线的下方去形成新的均衡点,这也就是油价能够下跌到36美金的原因,因此对于石油后弯曲线的研究非常重要,但是对于西方经济学大师们发现的供给曲线特例却被主流学界在公开场合选择性的失明了,但是他们在给中国企业制作套保产

品的时候,著者内心确信是有人明确知道的。

在油价高涨下现在世界的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给又出现了后弯的拐点,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复苏好于预期,中国的经济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9.6%,石油等大宗商品的需求继续增长,与欧佩克的限产不放松和俄罗斯的出口降低相对应,新的能源压力非常巨大,中国的发展必然变成为高昂的资源价格所奴役,在以后越来越高的能源价格下,制造业为主的国家是要被资源国家资源食利越来越厉害的,这样的结果必然是经济发展受制于资源暴涨而轰然倒下,因此资源问题不解决,在资源供给的后弯效应下08年那样的系统性崩溃会必然发生,这也是经济会二次探底最大的原因之一。

美日等国为什么在此时抛售大量石油储备打压石油价格,就是要改变石油供给曲线后弯的状态,但从目前的市场走向来看非常不乐观,欧佩克也扬言报复,而对释放第二轮储备的问题上德国等国也有分歧,世界的资源供给曲线通过后弯拐点进入涨价轨道而供给减少的趋势难以逆转,资源供给的高价萎缩,实际上已经勒紧了经济发展的缰绳,经济在复苏的初期就被资源勒紧的结果,只能是再一次走向衰退让资源低价释放,世界经济的再度探底就如08年石油创天价后的金融危机一样,还要有二次探底深度调整的需求,这是资源供给特殊性导致的必然性。

第十三章 不动产在信用体系的重大作用

一、不动产构建信用基础

金融的衍生过程是黄金成为通货,而房地产形成抵押品,大量的金融衍生品在房地产的抵押价值上构建。

一般世界危机都是三部曲,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再从经济危机到信用危机。实际上房地产在信用领域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信用危机的层面上,我们会发现作为信用的产品经营也好,外汇也好,都是流动的,可以从中国流动到全球。但是房地产相当于信用的“锚”,这种不动产是谁也拿不走的。而且很多时候,银行的信用产生在不动产上,我们用房地产去抵押,去贷款获得的钱,并不是全部都用来开发房子或者用来买房子,相反有很多抵押贷款都是以房子为担保产生的。

香港曾经在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有一波楼市下跌,受到重创,原因也是在这儿。香港有非常高的楼价,他们的楼是相对拿来抵押担保的,不是指着去卖的;按照这个楼价抵押担保,就可以开出“信用证”,香港就可以作为国际贸易港;而一旦房价下来,“信用证”就开不出来了,因为没有那么多担保物了,那贸易额就下来了,随后香港的经济也就出现萎靡了。所以说,房地产对于整体经济链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信用影响上,它相当于我们的很多金融信用的来源。我们讲金融,金融不是银行,实际讲的是银行和产业资本的结合才叫金融。结合点在哪儿? 在房产。因为各种产业资本所谓的要去获得银行资金,就要去靠房产从银行抵押获得,拿来的资金再发展生产。这是相辅相成的问题,所以要真正理解金融就可以理解房产是什么,理解金融不是理解银行,这是有绝对差别的。

房地产是一个社会的财富积累过程,房价是一个重要的价格体系,反应了社会财富的总量,而信用的来源与财富总量是密切相关的。社会财富当中会快速贬值的商品和消耗品,由于价值很快归零,对于信用体系的贡献是很少的;社会财富当中的动产,由于财产可以移动和转移全球流动,对于国家而言是可以流失的,对于

信用体系的贡献也不稳定；只有不动产无论其产权怎样转移，实际的物质是留在原地不动的，这样的财富才是信用体系的堡垒和基石，对于信用体系的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诸君请看下面的背景资料，历史上中国在衰落的时候地产的价格与世界地产价格的比例是严重暴跌的，背后就是中国的衰落和财富的外流。

背景资料：中国历年基地皮和世界基地皮的对比

麦迪逊世界千年经济史中估计中国历年基地皮和世界基地皮的对比

单位（百万美元）

公元元年		1000 年		1500 年	
中国	26820	中国	26550	中国	61800
世界	105402	世界	120379	世界	248445

1600 年		1700 年		1820 年	
中国	96000	中国	82800	中国	228600
世界	331562	世界	371428	世界	694598

1870 年		1913 年		1950 年	
中国	189740	中国	241431	中国	244985
世界	1110951	世界	2733365	世界	5331698

1973 年		2003 年	
中国	739414	中国	6187984
世界	16022888	世界	40913389

对比一下中国 1820 年到 1950 年的数据，悲剧啊！

二、为什么外国要妖魔化中国房地产

房地产是中国财富积累的过程，而洋人大力唱空中国房价的背后也是中国高房价所带动大量资源流入、抬高了资源的价格造成世界资源再分配的压力，所以他

们说金砖四国中发展最好的中国房地产是泡沫,但是对于比中国房价高得多的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的房价却语调低了很多,因为中国房地产的发展导致这三国的资源大量流入,如印度、巴西的铁矿石,俄罗斯的能源、有色金属等,这三国的房价高企实际上遏制了资源流入,中国的房价高企却促进了资源流入,哪怕是外资进入中国炒房子,也是拿这些资金买成了带有实物资源的房子等固化在中国的土地上,而西方各国房价低廉的背后是西方人口减少、人口乡村化和工业外包化导致的资本、资源、财富从房地产领域的长期流出。中国房地产被妖魔化的背后,是房子、基建等等都建设在中国,即使是土地财政也是被中国政府肉烂在锅里,外国人是最难吃到的,而他们鼓励我们的奢侈品、医疗保障(药品要进口或使用外国专利)、汽车(大量是外国收费技术和外国合资厂)等是外国资本最好吃肉的领域。所以外国资本一边鼓吹打压,一边想方设法进入这一领域分一杯羹了,更重要的是房地产建设全部形成社会财富的积累,而汽车、医疗等等是要消耗社会财富的,将来国力的竞争不是 GDP 的增量关系而是社会财富总量的关系。

不要说什么中国工资水平低等等是因为没有高科技和生产率不足,这都是西方强加给中国的理由,西方很多二流国家的生产率已经不如中国了,其社会平均工资也是非常高的,这背后是供需关系和社会的财富积累,中国如果社会财富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中国的劳动力就不会那样便宜了。很多人说中国的工业化成功就是因为劳动力便宜,这句话不完全对,因为中国现在是要用廉价的出口换取中国发展所需要的资源,等中国富裕以后中国是用不着那么多出口的,大量产品是满足国内富裕人群需求的,中国富裕的背后就是西方人能够分配到的世界资源的减少。

也不要说中国的工资涨了世界加工工业就会转移到外国,中国目前的薪金水平只占 GDP 的 12% 左右,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工人的工资就算是涨 10 倍,也比美国工人便宜很多,而东南亚的人口是有限的,难以承受世界工厂地位对于 10 亿劳动力的需求,而唯一能够供应足够劳动力的印度却因为基础设施的巨大问题无力承担世界工厂的国际分工,印度目前核心城市孟买等地的房价是中国北京等地的一倍,与此不同的是印度土地私有制决定了房地产一建设就要获得土地食利,而中国的建设是依靠土地公有制完成的,土地的转让住房价格变成基建投资又回归了土地,二者是有根本不同的,所以中国这样积累下的人员工资上涨是可怕的,所以中国给老百姓涨工资也是被西方妖魔化的,把中国给老百姓涨工资变成世界通胀的罪魁。

西方或受西方影响的专家们说高房价对许多其他正常消费已经形成了挤出效

应,但是非地产类消费是以财富消耗为前提的,而房地产的建设和住房消费是以财富积累为前提的,住房将成为具体的财富长期积累存在于社会经济之中,如果计算资源紧缺造成的资源价格上涨,其重置成本是不断提高的,这里需要计算的不仅仅是房子的造价,还有房子所在的土地相关的各种附属设施的造价等等。在西方人的眼睛里,似乎只有消耗掉的东西才是消费,他们所希望的就是你的消费是完全消耗性的,不给你的社会经济留下财富的积累,这样只要你的积累总是达不到发达的程度,你就永远要受到他们的盘剥。而目前西方社会为什么对于积累性消费不太重视,关键就是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了发达社会,社会的积累极其丰富,在这样丰富积累的背景下,财富积累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边际效应已经式微,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积累所产生的边际效应是西方社会所无法比拟的。

对于中国的房地产建设就是一个最大的资源积累的过程,我国的富强需要资源的积累,但是资源总不能堆积在库房里面,而中国的房地产建设就是把这些资源固化在这些基础建设里面,固化在房子里面,只有中国有足够的资源有足够的积累,才能够保障将来中国的消费能够有足够的资源支持。所谓拉动内需其实是西方的陷阱,对中国而言,没有供给保障的内需就是通胀,拉动内需的结果只能是恶性通胀。小国拉动内需会使世界的资源向其流动,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拉动内需则会导致资源难以足够供给,全球市场也难以满足其需求,结果就一定是通胀,现在中国经济走势已经呈现出这样的端倪。中国的反复拆建就是没有超前建设的结果,中国没有超前建设一来是舆论的压力二来是资金的问题。想一下德据时代青岛人口不到一万的时候德国人就建设了足够几百万人使用的市政核心体系,这样的超前建设在中国会怎么样?不要说中国的房地产和基建的超前建设,这些超前建设就是中国最大的资源积累,在全球资源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现在能够积累资源就是最大的成功。

回首五年、十年前的基建,考虑到各种资源的增值,现在即使是翻倍的投资也建设不起来了,这样的超前建设就是资源的积累,中国必须在有人口红利的时候积累,才会在后人口红利时代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消费基础和经济支持,想一下真到了老龄化社会你还有能力这样搞建设吗?而这样的积累过程是房地产埋单的,基建的成本投资是土地转让取得的。

三、渡过危机需要房地产

对于当今的危机,大家都关心美国的房价,关心美国房地产的情况,其中真实

的原因就是要渡过危机,世界需要地产复苏。不要说中国的高房价问题引发了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全球眼光下,本次危机的解决是需要房地产的。

本次危机的出现,很大原因也是房地产的问题,因为房价暴跌,导致以房产为抵押的各种融资出现了信用风险,西方银行体系的资金信用来源也是需要由房产的抵押产生的。

1929~1933 年的大危机,美国的解决方案之一就是房地产泡沫!美国当年建造帝国大厦,就如现在的迪拜的大兴土木,帝国大厦的造价折合成当时跌到低点的白银,居然是可以超过中国的马关条约赔款总额的,其 100 平方米的单元的造价就超过白银 10 万两,这样的高房价的背后是大量的融资可以通过房地产抵押来完成,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动力。

当今世界的信用危机房地产就是有很大的贡献,因为房价下跌直接导致整个融资体系的问题,以房地产为信用的体系非常庞大而不是仅仅为房地产交易和住房贷款,对于银行、企业等的信用评级是要考虑其资产价值的,这些资产包括他们持有的房地产等,评价经济实体的信用不动产具有非常高的权重,房地产的崩盘实际上是经济社会的信用崩盘。当今世界要走出危机,依然要依靠地产,所以大家都在关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变化,美国的房地产数据的利好与世界股市均有较高的关联度。

回想中国当年,银行系统的巨额坏账也是地产埋单的,国企改制还是地产埋单的!当房地产价格暴涨以后,原来抵押给银行不足值的抵押财产突然就成为香饽饽,买下这些不良资产的背后变成了廉价的获得土地使用权,而当初要破产的国企,只要把所属的土地卖出以后,就足够来解决工人福利和债务问题了,土地市场化是让中国走出了上世纪末的危机的,虽然当年推进房地产市场化走得非常激进,没有保留足够的公房作为保障房,给现在留下安居的社会问题,但是不能忘记的就是房地产的市场化让中国走出当年的危机,给中国带来了本世纪的黄金十年,这与房地产的信用是密切相关的,现在银行贷款基本是房产抵押、担保的,如果房价下跌太多,关键点不是在建的房屋和开发商的坏账,而是整个社会的融资能力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充分认识房地产与信用的关系,不动产是信用体系的基石,本次世界走出危机还要依靠房地产的支撑作用。

第四部分
信用不平等条约

导读：世界的评价霸权掌握在美国手中，主要是三家机构：美国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服务公司、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这三大评级巨头垄断全球95%的评级业务，这意味着全球金融市场的信用基本上都由这三大机构来"审判"。三家评级巨头及其背后的金融寡头们制定了有益于西方的评价规则，而评价体系是整个信用体系当中的制高点，信用评价权则是西方霸权的核心，认识评价霸权以及其中的不平等，是认识世界信用体系的关键点之一。支撑美国评级霸权的，是巴塞尔协议。巴塞尔协议的实质就是一个信用和风险的管控协议，旨在建立一个各国联系在一起的信用体系。协议支持次级债的金融证券化国家，支持美国的评级霸权，在制定游戏规则上向发达国家倾斜，将不平等的行为通过协议合法化，又利用货币结算权等方面的西方在全球化上的优势地位，迫使世界各国不得不接受协议的内容，完成一个完美的掠夺食物链。这个由巴塞尔协议框定的金融架构，成为维护西方金融霸权的信用体系支撑。全球评级霸权，是西方利用信用元规则统治世界的利器。

第十四章　评价霸权与不平等的巴塞尔协议

一、认识世界的评级霸权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说，“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弗里德曼甚至说，在上世纪 90 年代，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来说，最重要的访客也许不是其他国家的首脑，而是来自穆迪的职员。弗里德曼所说的景象就是评级霸权的真实写照。

世界的评价霸权掌握在美国手中，主要是三家机构：美国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服务公司、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美国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and pooks）创始人普尔于 1860 年，顺应欧洲投资者希望更多地了解自己在美国新发展的基础设施的资产的愿望而创建。穆迪投资服务公司（moody's）创立于 1909 年，首创了对铁路债券信息进行信用评级；1913 年对公用事业和工业进行债券信用评级。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fitch ratings）创立于 1913 年，规模小于标准普尔和穆迪，但在全球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的评级上，惠誉的敏感度要高得多。三家评级机构各有侧重，标准普尔侧重于企业评级方面，穆迪侧重于机构融资方面，而惠誉更侧重于金融机构的评级。这三家机构主要都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评价权是信用体系的核心。由于金融业发展的需要，美国政府认定的三家“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逐渐发展壮大并掌握信用评级话语权。据了解，三大评级机构都有至少 60 年以上的历史，经历了全球金融市场的重大变迁，拥有的经验和人才其他机构难以匹敌。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于 2008 年就曾发报告指出，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巨头已垄断全球 95% 的评级业务。这意味着，全球的金融市场信用基本上都由这三大机构来“审判”，影响力不言而喻。

世界的评价霸权在三大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在金融市场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但实际上这些评级机构在评定资信级别并不那么可靠。这里先从经营层

面的利益冲突来说的,一方面信用评级公司要从请求他们进行评级的上市公司那里收取可观的费用,另一方面要向投资者提供上市公司有关信息的资询服务。在利益的驱动下,信用评级公司难免要提高上市公司的信用等级作为巨额费用的回报而提供给投资者的信息难免有虚假成分。

评级机构是受控于世界的金融大鳄,例如在穆迪的股东名单之中,第六大股东是摩根士丹利,后面还有GP摩根、高盛、美联等。评级机构与各国政府的关系也是微妙的,评级机构是西方信用霸权的核心,但是却未必受到政府的欢迎,对于这次危机以后,美国的评级已经引发世界的公愤!因为对于危机的评价很多是助涨助跌,有帮助金融大鳄操纵的嫌疑,近两年来,上述三大国际评级机构陆续对美国、日本,以及深陷欧债危机的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以及大批金融机构的评级进行了下调,在资本市场掀起轩然大波,引起美国、欧盟强烈不满,称其“落井下石”。评级机构的评级时机以及下调幅度遭受广泛而严厉的质疑。由于三大评级机构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糟糕表现,被指“在危机爆发前后无所作为”,评级的独立性、有效预警作用备受质疑,甚至被认为是“危机的制造者”。从短期角度看,评级在较短的时间内加大了经济上下波动的振幅。同时,他们大多缺乏前瞻性。

评级机构是可以操纵金融市场的,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三大评级机构总是依据过去的历史数据构建评估模型,对房地产市场、CDO、CDS等结构复杂的金融创新产品蕴藏的风险估计不足,给不少次级债3A评级,误导投资者,结果制造了巨大的泡沫。比如,雷曼银行倒闭前,三大评级机构还给予A级以上的评级。当时,评级机构的行为最终“惹恼了美国国会”。早在2002年至2007年间,三大评级机构就已将美国华尔街制造出的数千种创新债券评为最适宜投资的“AAA”级,而在这其中不乏“有毒”债券,直到2008年5月份,他们看到了国际市场出现危险的苗头后才开始降低了新发行次级债的评级,但仅过了两个月,三大评级机构又大范围调低全部次级债的评级。美联社在当时评论道,“降低评级直接导致了全球投资者的恐慌抛售,从而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而三大评级公司却早已赚取了大量利润。”评级机构本身也是金融大鳄手中的工具,他们制造着信息不对称。

在经济层面的利益冲突和评价的不准确等问题面前,更不可靠的就是他们都是有立场的,评价权是西方霸权的核心,他们制定了有益于西方的评级规则,比如他们将评级的规则当中加入了国家制度作为评级的第一标准,不仅仅把西方自己

的制度定义为最好的，即使是这样，在具体评级的时候也是双重标准，对于当初英国发生骚乱，评级机构就没有按照这样的评级标准来降级，对于资产的安全，首先是是否有抵押有保障，对于中国地方融资平台这样的有抵押有收入保障的债务的评级却还不如西方那些不但是资不抵债而且收不抵支的国家的负债标准是严重的有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立场的问题，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的标准则是政治、经济、财政、货币政策及外汇资产。对于国际评级机构将“政治”因素放在首位的做法，肯定就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在评价债券债权的信用当中立场因素也不可以忽略，不同的债权人的立场是不同的，这里的关键就是债权人有多大的能力让债务人履行债务，在我们的司法执行难等等环境下就是造就了欠钱的是爷爷，都是有权人有钱人欠钱，但是历史上有各种严酷手段让欠债还钱成为天经地义的时候就不同，就如黄世仁的立场下他可以强抢杨白劳的女儿而且杨白劳还是有一个让人眼馋的美丽女儿，这样黄世仁就可以评价杨白劳的信用要高一些，反之要是黄世仁借了杨白劳的钱，黄世仁不还账杨白劳对于黄世仁是没有什么追偿债务的办法的，这样的情况即使是黄世仁很有钱，对于杨白劳的立场上而言也是没有信用的，而现在社会的发展就是已经从杨白劳借钱变成了黄世仁借钱了。因此对于这样的信用评估，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的结论也是不同的，这样的立场本身是难以回避的，而不是外来的说可以有一个完全公正的立场以及我们的评估公司有自己的立场。对于美国的评估公司当然会回避这样的立场，因为美国人欠钱谁能够像黄世仁一样的对他逼债？对此评级机构也是忽略的。

这些评级机构对于西方的体系是偏袒的，尤其是美国的金融体系得到了最高的推崇，哪怕是美国负债累累的时候美国的金融体系依然如此，而欧洲被债务危机困扰的时候，欧洲多个国家还发生了骚乱，但是这些国家的评级依然是AAA，对于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就不那么幸运了，评级是普遍偏低的，就连亚洲的经济老大日本也不是AAA评级，这样的评级是带有西方人特有的偏见的。

西方评级机构对于中国的立场问题和利益取向表现得特别明显，2003年年底，中国银行业正在谋求海外上市，标准普尔宣布维持其10年来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BBB级，即“适宜投资”的最低限。判断一个国家主权外债的信用级别的唯一标准是该国是否具有按期偿还外债本息的能力。但无论是总债务余额、财政赤字，还是外汇储备占GDP比例，中国政府的偿付能力都要优于美国。很显然，国际评级机构的标准是因人而异的双重标准。在美国评级机构蓄意压低中国主权外债评级的背

后,还掩藏了另一个目的:为国际垄断资本低价攫取中国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同样在2003年,他们将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评为“垃圾等级”,同时又高调肯定境外投资者参股中国银行业,为国际垄断资本抢占中国国有资本造势。更有甚者,三大评级机构有时还会配合美国政府,对他国政策横加干涉。2004年,当布什总统在争取连任的选举中表示要通过国际压力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时,穆迪立即跟风,表示将会降低中国主权债券的评级。

金融市场越发达,投资者对评级机构的需求越大,评级有可能低估或高估信用本身,如果偏离度过大,评级机构也会失去信用。但评级机构的话语权不可能替代、超越其评级的信用本身,评级的垄断背后就是一个评价霸权,评价体系是整个信用体系当中的制高点,认识评价霸权以及其中的不平等,是认识世界信用体系的关键点之一。

而这些大机构的评价霸权的由来是怎样的,其评价霸权真的是完全由市场竞争形成的吗?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认识信用体系当中最重要的国际条约巴塞尔协议,以及巴塞尔协议是怎样地维护了评价霸权的。

二、巴塞尔协议的诞生和发展背景

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协议》III通过。之后,海外银行股纷纷以大涨相迎接。亚太市场,日本最大的银行三菱日联以及澳大利亚银行巨头联邦银行涨幅超过1.5%;欧洲市场开盘后,主要银行股也纷纷走高,汇丰控股、法国兴业早盘涨幅在1.1%至3.3%不等。对于中国,则以集体回调来回应。因为巴塞尔协议对于中国是不平等的,是一个枷锁。而巴塞尔协议的实质就是一个信用和风险的管控协议,是建立了一个各国的联系在一起的信用体系,这个协议背后是有着巨大的利益博弈的,是有针对性的一个信用游戏规则,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让对手被迫接受的城下之盟。

对于巴塞尔协议怎样博弈限制了当年日本的发展,我们可以引述乔良将军的论述:

众所周知,1985年美国通过“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成功打击和遏制了日本出口的势头。可令美国始料不及的是,签订“广场协议”之时的日元已经成功地迈入了国际化进程,已经是国际可兑换货币,在东南亚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为和美元比肩的硬通货,有的国家已把它作为储备货币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欣喜地发

现，当日元从252日元兑换1美元上升到80多日元兑换1美元时候，日元一下子变得值钱了。于是，日本人非常迅速地抓住了这个时机，掉转头来，从原来的产品扩张转向资本扩张。那时的日本开始狂买纽约帝国大厦，狂买哥伦比亚兄弟电影公司、甚至发出了“买下美国”的豪言壮语。

这让美国一度颇感紧张，惊呼“日本想买下美国的灵魂”，在这样一种势头下，美国人通过瑞士国际清算银行提出了“巴塞尔协议”（巴塞尔协议Ⅰ），也就是8%的银行储备金率的问题。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针对全世界所有银行为规避金融风险制定的游戏规则。但实际上它主要针对的是当时日本的资本扩张势头。日本对此当然不接受，它与当时全球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德国连手，一起拒绝签字。

在不具备战争条件的情况下，美国人怎么办？美国人用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就是和英国签订了双边巴塞尔协议。两国率先实行巴塞尔协议，率先执行8%的银行储蓄准备金制度。但这个协议最有意思的条文，不是双方准备为全球做表率自律的问题，而是它的最后一条，即：今后凡与我两国银行打交道的任何国家的银行，都必须实行8%银行准备金率。这样一来，美国人用多边协议未能拴住日本，却用这一狠招迫使日本不得不就范。因为这世界上还有哪国的银行，既不在伦敦金融交易中心，又不在纽约金融交易中心进行业务往来或结算呢？美国用这一狠招迫使日本不得不回到巴塞尔协议上来，而这一回来的结果，最终导致了日本的证券业和房地产业泡沫的破裂，从而走上了“失去的十年”。

巴塞尔协议在日本崛起前就有了，不过不同时期的背景是不同的，1975年的巴塞尔协议是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破裂和石油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是在没有了金本位以后需要一个机制来限制银行的印钞行为而诞生的，但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确实是乔良将军所说的为日本人量身订制的，但最近的巴塞尔协议Ⅲ却对于中国构成了新的枷锁，因为这个协议对于市场经济地位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支持次级债的金融证券化的国家，支持美国的评级霸权，在制定游戏规则上向发达国家倾斜，西方利用巴塞尔协议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把公平的市场竞争变成对自己有利的游戏，等于是为西方的掠夺找到理由，将不平等的行为通过这个协议合法化了，又利用货币结算权等方面的西方在全球化上的优势地位，迫使世界各国不得不接受协议的内容，完成一个完美的掠夺，这个由巴塞尔协议框定的金融架构，成为维护西方金融霸权的信用体系支撑。

背景资料:了解一下巴塞尔协议

《巴塞尔协议》是巴塞尔委员会(其成员来自十国集团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的代表)于1988年7月在瑞士的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的简称。该协议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其后又发展出了新巴塞尔协议。其目的公开说是为了扼制与债务危机有关的国际风险,但是这些协议也是各个国家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有利游戏规则,在此规则下对于不同国家和不同金融体系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中国银行业不断膨胀的融资需求就是巴塞尔协议的结果,可对于西方银行却没有这样的压力。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7个成员经济体2010年9月12日共同达成的新协议,到2015年1月,全球各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而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则提高得更为明显,将达到7%,其中包括2.5%的资本留存缓冲。现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仅为2%。此外,新协议还对银行资本的定义和风险评估做出了更加严格的界定。不过,新协议也为银行执行缓冲资本新规设定了更长的过渡期,商业银行可以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之间分阶段落实。分析师普遍认为,由于最新的巴塞尔协议采纳了长达8年的过渡期,短期内对银行的冲击有限。

Herstatt银行和富兰克林银行倒闭的第二年,即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出台。这个协议极为简单,核心内容就是针对国际性银行监管主体缺位的现实,突出强调了两点:1. 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2. 母国和东道国应共同承担职责。1983年5月,修改后的《巴塞尔协议》推出。这个协议基本上是前一个协议的具体化和明细化。比如明确了母国和东道国的监管责任和监督权力,分行、子行和合资银行的清偿能力、流动性、外汇活动及其头寸各由哪方负责等,由此体现"监督必须充分"的监管原则。两个巴塞尔协议因此也就没有实质性差异:总体思路都是"股权原则为主,市场原则为辅;母国综合监督为主,东道国个别监督为辅"。但是两者对清偿能力等监管内容都只提出了抽象的监管原则和职责分配,未能提出具体可行的监管标准。各国对国际银行业的监管都是各自为战、自成体系,充分监管的原则也就无从体现。

巴塞尔协议的实质性进步体现在1988年7月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简称《巴塞尔报告》)。该报告主要有四部分内容:1. 资本的分类;2. 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3. 1992年资本与资产的标准比例和过渡期的实施安排;4. 各国监管当局自由决定的范围。体现协议核心思想的是前两项。首先是资本的分类,也就是将银行的资本划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类,对各类资本按照各自不同的特点进行明确地界定。其次是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报告根据资产类别、性质以及债务主体的不同,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表内和表外项目划分为0%、20%、50%和100%四个风险档次。风险权重划分的目的是为衡量资本标准服务。有了风险权重,报告所确定的资本对风险资产8%(其中核心资本对风险资产的比重不低于4%)的标准目标比率才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可见,《巴塞尔报告》的核心内容是资本的分类。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直接就将《巴塞尔报告》称为规定资本充足率的报告。

巴塞尔委员会彻底修改资本协议的工作是从1998年开始的。199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以三大支柱——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为主要特点的新资本监管框架草案第一稿,并广泛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新协议将对国际银行监管和许多银行的经营方式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首先要指出,以三大要素(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为主要特点的新协议代表了资本监管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实践证明,单靠资本充足率无法保证单个银行乃至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自从1988年资本协议问世以来,一些国家的监管部门就已在不同程度上,同时使用这三项手段强化资本监管,以实现银行稳健经营的目标。然而,将三大要素有机结合在一起,并以监管规定的形式固定下来,要求监管部门认真实施,这无疑是对成功监管经验的肯定,也是资本监管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与1988年资本协议所不同的是,从一开始巴塞尔委员会希望新协议的适用范围不仅局限于十国集团国家,尽管其侧重面仍是国家的“国际活跃银行”(internationally active banks)。巴塞尔委员会提出,新资本协议的各项基本原则普遍适用于全世界的所有银行,并预计非十集团国家的许多银行都将使用标准法计算最低资本要求。此外,巴塞尔委员会还希望,经过一段时间,全世界所有的大银行都能遵守新协议。客观上看,新协议一旦问世,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很可能会采用新协议

来分析各国银行的资本状况,而有关国际组织也会把新协议视为新的银行监管的国际标准,协助巴塞尔委员会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新协议,并检查其实施情况。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认真研究新协议的影响。

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宣布,各方代表就《巴塞尔协议III》的内容达成一致。根据这项协议,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将由目前的4%上调到6%,同时计提2.5%的防护缓冲资本和不高于2.5%的反周期准备资本,这样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可达到8.5%—11%。总资本充足率要求仍维持8%不变。此外,还将引入杠杆比率、流动杠杆比率和净稳定资金来源比率的要求,以降低银行系统的流动性风险,加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新协议将普通股权益/风险资产比率的要求由原来的2%提高到4.5%,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也由4%提高到6%,加上2.5%的防护缓冲资本,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达到8.5%。同时也提出各国可根据情况要求银行提取0%—2.5%的反周期缓冲资本,以便银行可以对抗过度放贷所带来的风险。此外,还提出了3%的最低杠杆比率以及100%的流动杠杆比率和净稳定资金来源比率要求。

三、巴塞尔协议不能覆盖西方银行风险

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巴塞尔协议真的能够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吗?尽管《巴塞尔报告》的执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的信用风险,但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主的市场风险却经常发生。这说明仅靠资本充足率已不足以充分防范金融风险。最典型的案例是巴林银行。这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1993年底时远远超过8%,1995年1月还被认为是安全的,但到2月末,这家老牌银行便宣告破产。而就在近期的高盛丑闻中,也是有银行的参与导致巨额亏损的,这样的情况发生的原因就是西方发达国家银行是可以参与风险极高的衍生金融业务的,这些业务的风险远远要高于中国银行的贷款损失风险,而且这样的风险还不在西方的评价体系中显示,因为在西方的财会体系中这些金融衍生品都是有足够的担保,保证金不足可以平仓的,但是对于银行都参与博弈的大额仓单,平仓的风险也是巨大的。

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西方银行的衍生品业务均损失巨大,但中国的银行资金甭说是炒作金融衍生品了,就是进入股市、楼市等领域都是被严格限制的,银监会时不时地就检查是否有违规银行资金进入证券市场,中国银行资产的风险实际上

是比西方要小多了，在中国这两年信贷新增17万亿的基础上，除了令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捉襟见肘外，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都出现双降，拨备覆盖率也急速上升。据银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6月30日，我国境内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4549.1亿元，比年初减少425.2亿元。不良贷款率1.3%，比年初下降0.28个百分点。银监会曾要求商业银行在2009年末提升拨备覆盖率达到150%，截至2010年6月30日，我国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达到了186%，比年初上升了31个百分点。

还有就是对于造成危机的次级债、衍生品等的风险，在巴塞尔协议上也没有特别的规定，而且对于西方银行的债权，巴塞尔协议进行风险资产管理的时候所计入的风险权重还不同，西方的发达国家的权重与发展中国家的权重定义不同，这本身就是带有歧视的，而当今的金融危机和风险，恰恰发生在西方这些认为最安全的大银行里面，但巴塞尔协议对于这些大银行的资产风险权重却是最低的。

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资金信贷的主要方向是实业，发达国家的银行资金在金融衍生产品，虽然在巴塞尔协议规定下两者同样为银行的风险资产，但是实际的内在风险却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完全不同性质的资产采取同样的标准，本身也是极大的不公平，是主导游戏规则制定的发达国家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添加了对于自身有利的利益诉求。

对于巴塞尔协议下资产充足率要求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不同，各自银行资产的风险也不同，这样的不均衡继续发展下去就是“兴登堡凶兆”，预示着世界将进入混乱和动荡。为了世界的和平，在巴塞尔协议Ⅲ的博弈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由于自身的特点不同本身就应当有不同的标准，置于同样的标准之下实际上就是人为地设定了一个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枷锁，对于这个枷锁，我们首先需要充分认识到它的存在与不公，然后就是奋起抗争、力求打破，在这样的博弈中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机制和与发达国家沟通的南北对话机制都是可以利用的平台。认识世界利用规则是中国崛起博弈世界的重要原则。

背景资料：欧洲将禁止无担保信用违约掉期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1月15日 20:57 新浪财经微博

新浪财经讯 伦敦时间11月15日（北京时间11月15日）消息，从12月1日开始，“无担保信用违约掉期”（Naked CDS）将在欧盟全线被禁。这是欧洲首次禁止一项金融产品。欧盟认为这项投资产品是建立在投机一国债务的基础上的，并提速了债务危机。

在上个月与欧盟政府达成协议后,欧洲议会今日正式投票通过此决议。641名参与投票的立法者中,以507票的绝对多数赞成票通过。立法者甚至颁布禁令,禁止短期卖空公司股票。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欧洲将禁止一项旨在投机一国债券的金融产品。”在此次立法担任主要谈判人的Pascal Canfin在投票前对欧洲议会表示。

信用违约掉期(CDS)原本是一项用于抵抗公司或是政府违约风险的保险产品,但是,假设是无担保的信用违约掉期,投资人就不需要拥有债务,并下赌注认为假设违约发生,他们可以今后再以一个便宜的价格买入。因此,无担保CDS被反对方认为是允许市场对政府违约几率进行投机。(郝倩)

四、为什么巴塞尔协议是不平等条约

巴塞尔协议为什么说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关键就是这个协议设计上对于次级债的依赖和对于衍生品的风险控制是不足的。在次级资本的设计要求和风险资产的构成上,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完全是双重标准。

根据巴塞尔协议规定,银行资本金由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构成。一级资本即核心资本,由普通股和公开储备构成。二级资本也称附属资本,由非公开储备、资产重估储备、普通准备金、混合资本工具和次级长期债构成。次级债务计入资本的条件是:不得由银行或第三方提供担保,并且不得超过商业银行核心资本的50%。商业银行应在次级定期债务到期前的5年内,按以下比例折算计入资产负债表中的“次级定期债务”项下:剩余期限在4年(含4年)以上的,以100%计;剩余期限在3~4年的,以80%计;剩余期限在2~3年的,以60%计;剩余期限在1~2年的,以40%计;剩余期限在1年以内的,以20%计。

我们知道西方银行大部分的资金来源就是次级债,按照巴塞尔协议的标准,这些次级债是要被计入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当中的,这样西方银行大量的次级债融资反而成为银行的次级资本,可以大量计入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当中,外国的银行杠杆率实际上是远远高于中国的银行的,经常是达到30~40倍的杠杆,这些杠杆都是通过次级债来实现的。中国的银行是没有多少次级债的,中国的银行发行次级债需要审批而且及其不易,因此造成中国的银行在巴塞尔协议下的不平等待遇,中国的银行必须不断地再融资。

同时巴塞尔协议对于风险资产的规定也是不同的,这里对于中国也是不平等

的。《巴塞尔资本协议》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资产分为四大类，分别以相应的权重(K)反映其风险大小：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央政府的债权风险暴露权重为0；
- 对于OECD的商业银行及OECD以外的中央政府的债权风险暴露权重为20%；
- 抵押贷款的风险暴露权重为50%；
- 其他所有商业银行、企业、个人的风险暴露权重都为100%。

我们看到中国不是OECD国家，OECD国家被他们定义为所谓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不被西方所承认的，因此中国的所有的商业银行、企业、个人的贷款风险暴露都被计算为100%，中国政府的国债的暴露风险是20%！但是西方这些OECD国家的国债在银行资产里面的风险权重是为零的！因此西方国家不断地发行超额国债，这些国债均可以被银行不计成本的持有，中国的银行持有中国政府的国债还要计算20%的风险资产权重，需要有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持有地方政府债务的要求就更高，这样中国进行市场化和证券化的金融改革的时候是与西方根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的。更可笑的是这一次欧债危机的欧猪五国竟然是OECD的创始成员，他们的中央政府的债权风险暴露权重为0，但是这些国家的国债等风险显著要高于中国的。

更重要的是持有西方OECD国家的银行债务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规定是只计算20%的风险权重，持有中国的银行债务就要被计算100%的银行风险资产权重，这样的结果就是银行的金融杠杆率受到了巨大的差别待遇，西方这样的低杠杆的背后就是给银行炒作衍生品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且让西方的金融机构可以极其方便的用极高的杠杆来炒作金融衍生品，因为次级债到其到期的前五年就可以最高100%的比例计入银行的次级资本了，最少的一年内到期的也有20%，而这些银行债务的风险权重才20%，炒作他们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要求是不到其次级债金额的2%的，在巴塞尔协议III以前，这个资本要求甚至不足次级债金额的1%。但是中国的银行要发行次级债，中国的银行持有的话就要被计算100%的风险权重，与银行的贷款的风险权重是差别不大的，中国的银行要持有其他银行的次级债本身对于核心资本就要有高于西方的银行5倍的股权资本的需要，银行股权融资的压力可以想象。

西方金融机构在巴塞尔协议下可以这样的大量发行次级债不受限制，同时金融机构持有这些次级债资产也没有多少的资本要求和负担，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一家金融机构发行的次级债被另外一家持有,然后是另外的发行次级债又被其他金融机构持有,最后可以循环回来再由这家金融机构用发行次级债所得的资金购买持有,出现了次级债循环持有这样的怪圈,而且这样的持有经常是隐秘的,而对于持有银行 CDS 等金融衍生品,其风险与其担保额相比被计入风险资产管理的比例也是很低,因为虽然是其风险权重按照评级高低有所不同,但西方给了这些债券高高在上的信用评级,按照他们的高评级这些债权债务的风险权重很多只有 20%,想一下把欧洲这些 OECD 国家的国债的风险权重已经变成了零,持有这些国债的 CDS 的风险权重能有多少?造成这些金融衍生品与次级债一样可以高风险高杠杆的交易和循环持有,炒作金融衍生品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在巴塞尔协议下也是很低的。

在这样的高杠杆和循环持有下,风险被杠杆放大,在巴塞尔协议下对于银行的风险管理上是刻意的“忽略”了这样的资产关联性,有关协议根本没有考虑到不同资产间的相关性是很不正常的,其背后就是给这些西方的银行带来巨大的利益,08 年的经济危机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生的。在 08 年危机前,在 98.7 万亿美元的利率衍生产品中,摩根大通独占鳌头,占有 74 万亿的份额。在金融领域中,用 10:1 的资金杠杆比例进行投资已属非常“冒进”了,100:1 则是“疯狂型”投资。90 年代著名的超级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在两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指导下,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复杂的风险对冲数学模型,拥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硬件设施,在用这一杠杆比例投资时,一不留神就输了个精光,还险些拖垮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摩根大通做利率衍生产品时的杠杆潜在比例竟然高达 626:1,堪称世界之最。在这样的高杠杆的情况下居然他们都符合巴塞尔协议要求的资本充足率和资产风险控制的要求,在次级债模式下理论上是可以不受任何巴塞尔协议限制无限的加大金融杠杆的!对此你还觉得巴塞尔协议的设计本身没有问题吗?

就算是新的巴塞尔协议 III,对于这样的根本框架也是没有改变的,改变的只不过是一些数字比例,对于西方的金融机构限制高杠杆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却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银行金融资产的杠杆率死死的限制住了,中国等国家的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存款而不是次级债,中国的金融机构就算是持有国债或者其他机构的次级债也要计入比发达国家多得多的风险资产数值,在金融起跑线上已经受到了不平等的限制。

综上所述,这样的协议就是一个不平等协议,西方利用其制定游戏规则的特权,在巴塞尔协议的规则制定上倾斜,使得看似公平的一场按照规则的市场化的行

为，早已经成为一方绝对占制度性优势的一场不平等博弈，所谓的市场公平在前提规则不公平之下，就是掩耳盗铃的表演。

背景阅读：经合组织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简称经合组织（OECD），是由 30 多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旨在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府治理等方面的挑战，并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成立于 1961 年，目前成员国总数 34 个，总部设在巴黎。

经合组织的前身是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该组织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支持下建于 1947 年，目的是协调二战后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作为北约组织的经济对应体而创建的经合组织在 1961 年取代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CD 成立条约是于 1960 年 12 月 14 日在巴黎签署的。该条约附有多项关于组织特权、豁免权以及欧盟在 OECD 地位的补充协议。

目前经合组织共有 34 个成员国，它们是：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智利、爱沙尼亚、以色列、斯洛文尼亚。2010 年 1 月 11 日，智利正式签署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协定，使其成为该组织第 31 个成员国；同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010 年 5 月 10 日宣布，同意吸收爱沙尼亚、以色列和斯洛文尼亚三国为新成员，使其成员数量增至 34 个。智利是第一个加入经合组织的南美洲地区国家，以色列则是第一个加入经合组织的中东地区国家。

五、巴塞尔协议维护美国评级霸权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风雨飘摇当中，谁有话语权谁就有了最大的力量，美国控制的三大评级机构怎样把他们的评级变成能够左右世界的力量，很多人仅仅认识到了世界对于他们的关注这一个层面，实际上通过巴塞尔协议，对于这些评级机构的权力是被固化的，评级的下调是直接关系到你的银行的杠杆和资本充足率的，这样

三大评级机构就有了对金融市场生杀予夺的大权,巴塞尔协议维护了美国的评价霸权。

巴塞尔委员会针对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不同,提出了信用风险计量的两大类方法:1. 标准法,基于商业银行资产的外部评级结果,以标准化方式计量信用风险;2. 内部评级法,基于商业银行自身健全和完备的内部评级体系计量信用风险,但必须经过监管当局的技术检验和正式批准。

巴塞尔协议的信用风险计量标准法对主权、商业银行、公司的债权等非零售类信贷资产,根据债务人的外部评级结果分别确定权重,零售类资产根据是否有居民房产抵押分别给予75%、35%的权重,表外信贷资产采用信用风险转换系数转换为信用风险暴露,过分依赖于外部评级,对于缺乏外部评级的公司类债权统一给予100%的风险权重,缺乏敏感性;此外,也没有考虑到不同资产间的相关性。这样的风险权重评估就是对于没有经过西方三大评级机构进行评级的金融资产100%的计入银行的风险资产,再对于风险资产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乘以资产充足率得出银行必需的资本金数额,而对于经过评级的金融资产则可以降低计入风险资产的比例,降低比例后,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必需的银行资本金随之降低,因此这个评级实际上就是决定了银行的资金杠杆水平和银行的发债成本,因为高评级可以降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就会有更多的银行愿意持有你的次级债等债权,金融机构持有这些债权的成本不仅仅是利率,也受制于资本充足率,如果大量持有的都是高评级的资产,银行的金融杠杆就可以很高,否则在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下金融杠杆是高不了的。

巴塞尔协议信用风险计量的内部评级法要去商业银行建立健全的内部评级体系,自行预测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违约风险暴露(EAD)、期限(M)等信用风险因素,并根据如下权重公式计算每笔债项的信用风险资本要求(K):

(1)公司、主权及商业银行暴露:①非违约风险暴露;②违约风险暴露。

(2)零售暴露:根据对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体系依赖程度的不同,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两种:①初级法要求商业银行运用自身客户评级估计每一等级客户违约概率,其他风险要素采用监管当局的估计值;②高级法要求商业银行运用自身二维评级体系自行估计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违约风险暴露、期限。初级法和高级法的区分只适用于非零售暴露,对于零售暴露,只要商业银行决定实施内部评级法,就必须自行估计PD和LGD。

我们看到巴塞尔协议的信用风险计量的内部评级法是要求必须经过监管当局

的技术检验和正式批准的，这个监管部门是谁呢？这里也是不平等的，因为这个监管部门是在国内各国有各国的主权，但是到了国际之上，是你要打交道的货币是什么，发行货币的国家有监管的权利，现在美元是世界的结算货币，你要以美元结算经过美元的结算机构，你是否符合巴塞尔协议就是该结算机构说了算了，因此不要简单地看这个协议是怎么定的，这个协议实际执行起来的结果就是谁做结算货币谁监管，除非交易的双方有特别的约定！因此这个内部评级法实际上就是美国以及美国认可的金融机构可以使用，其他的金融机构只能使用标准法来进行风险计量，而使用标准法的风险计量的结果就是你必须屈从于美国控制的三大评级机构之下。无论是你让美国三大评级机构进行评级还是你内部评级被美国监管机构认可，这协议运行的结果就是让你逃不出美国评价你的如来佛手掌心！

不但如此，这个协议还要对于你的信息安全进行挤压，如果你让三大评级机构评级你的信用等级，就是对于这些评级机构来一个信息大公开，而采取内部评级法也是要求信用暴露的，也是要对于监管机构信息公开的，结果就是中国的金融信息必须向美国公开，对此中国显然是难以做到，结果就是中国银行的资产均要按照100%的权重计入风险资产受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的限制，这对于中国显然是不平等的。美国金融机构对美国评级机构和美国监管机构信息公开是没有什么额外风险的，但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和核心秘密之一，完全是不对等的。这样美国的金融机构通过信用风险计量的评估可以大幅度降低银行资产成为要被资本充足率约束的风险资产的比例，因此可以有比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更高的金融杠杆，通过金融优势就可以掠夺他国的财富，金融优势是美国等发达国家霸权的主要体现，巴塞尔协议保障了他们的评价霸权，并且使得评价霸权通过协议转化成为金融的实际优势地位。

在美国的评级霸权下，三大机构的评级对于金融市场是绝对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为评级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各个银行的风险资产的变化，尤其是西方银行大量持有其他银行的债权，也就是其他银行发行的次级债和衍生品，评级下调以后银行的信用风险资产的数额变化是巨大的，这个巨大的变化直接影响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而按照巴塞尔协议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足的话，各种金融交易立即就要受到限制，银行的业务立即就要限于瘫痪，同时其他债权人看到资产充足率不足必然会发生银行挤兑，在挤兑下银行的风险和社会的恐慌二者之间是正反馈的放大不断加码，立即就要造成社会恐慌。

这里大家可能会问：既然下调评级对于银行的压力巨大，为什么美国要率先下

调自己的评级呢?这里问题的关键就是美国要通过下调评级来攻击欧元。因为此时下调评级在美联储16000亿美元的两轮量化宽松之后,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非常冗余,银行把大量的货币以超额准备金的形式存储于美联储,同时美国的金融业杠杆到了历史低点,2011年10月美国银行业杠杆为7倍,接近历史最低水平6倍,而在2007年12月,该杠杆还高达36:1。美国是低杠杆,欧洲银行却在欧债危机下维持很高的杠杆率,美国降低评级以后就是其他国家和金融机构要以美国评级为标杆大幅度调整,紧跟着就是欧洲的很多金融机构被下调评级,欧洲股市大幅度下泻,欧洲的金融市场完全被评级所左右,这是美元进攻欧元,美国评级机构要主导全球话语权的博弈。

国际评级机构的评价霸权是被巴塞尔协议绑定的,中国现在在提倡自主评级摆脱西方的评价霸权,光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有什么机制如巴塞尔协议一样来保障其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权威影响力。先从国家的政策倾斜开始,然后就是联合其他受制于评级机构的国家进行评级评价的互相认可。在信用战元规则支配下,西方的评价体系是西方信用体系的关键环节,也是信用战的制高点,中国要信用崛起,有独立自主的评价体系是关键,这是中国信用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六、巴塞尔协议是套牢中国的枷锁

从巴塞尔协议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到中外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在美国和欧洲大量的银行在没有多大贷款压力的情况下惜贷,金融体系的货币乘数下降货币总量减少,导致银行的风险资产会大量减少,西方大量银行资金可以存储于央行,并且由央行操作一些有风险的金融衍生业务。对于美国这样的做法导致美联储的资产规模急剧膨胀,总规模由2007年6月的8993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2.31万亿美元,不到两年时间是原来的2.57倍。美联储筹集、运用资金的图景是:财政部将增发国债筹集到的资金存入联储,联储用各种创新工具投放到市场,金融机构则将得到的流动性通过超额储备的方式存回联储,完成一个循环。这样的结果就是美国银行的风险资产在不断的减少,这些资产变成了美联储的风险资产了。所有这些都会导致西方的银行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的风险资产越来越少,而银行原有的资本数量如没有亏损就不会减少,导致银行肯定会出现资本充足率的冗余。因此海外银行股在得到巴塞尔协议Ⅲ通过的消息以后纷纷大涨相迎。

为防止过快实施更高的资本标准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巴塞尔委员会要求，自2019年开始正常条件下商业银行的普通股（含留存收益）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总资本充足率应分别达到7%、8.5%和10.5%。银监会表示，巴塞尔委员会定量测算结果表明，按照新的资本监管标准，国内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均高于国际同业平均水平，在新兴经济体中也位居前列。

对比中国不断增加信贷导致的资本充足率不足和西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冗余，背后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和资本方面的市场模式不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处于自由竞争阶段，存在大量企业在一个行业内激烈竞争，企业过多、市场识别成本过大，是不可能都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只有其中极个别的佼佼者可以上市融资，于是贷款成为产业融资的主要方式；对于一个以贷款为主的经济体，随着经济体的扩张发展，贷款规模越来越大，背后的结果一定就是银行的风险资产总额大增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下降。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每个产业只有三五家企业，每一家企业的情况都可以了解得非常清楚，资本市场的识别成本低，每一家企业都可以成为上市公司，融资基本通过证券市场而不是贷款，发达国家是高度资产证券化的，因此发达国家的银行主要收入来自为融资和付款服务的中间业务部门而不是信贷部门，银行的资金没有了大量贷款的金融货币衍生效用以后，货币乘数是很低的，银行的风险资产的数量也是随着资产证券化比率的提高越来越少，因此同样面对一个相同标准的巴塞尔协议，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压力也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巴塞尔新协议为银行执行缓冲资本新规设定了更长的过渡期，商业银行可以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之间分阶段落实。由于最新的巴塞尔协议采纳了长达8年的过渡期，短期内对银行的冲击有限，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影响却不可忽视。我们要仔细想一下这个8年意味着什么。现在世界在经济危机过程中，然后会有几年意料之中的萧条阶段，其后才是经济周期的发展和高涨阶段，巴塞尔新协议要实施的阶段正是在经济周期发展和高潮的阶段，这样的阶段也是世界各国竞争最激烈的时期，别的不说，仅就这个协议推出的时间点就值得好好思考一下，“危”正在过去，“机”正好来临，在金融危机发生两年的时间点推出，执行协议时间八年，而西方普遍的经济周期正好十年……

而对于巴塞尔协议的枷锁，更可怕的在于很多人没有看到其问题，甚至主动地自缚手脚，这样的被西方不战而屈人之兵，实在是发展中国家的悲哀，发展中国家要想真正崛起，思想理论在认识上的崛起才是更关键的。据彭博社的报道，有知晓内情人士透露称，中国的银行业监管机构最高可能要求国内各大型银行在2012年

底前将资本充足率提升至15%的水平。对此的影响有多大呢?数据显示,中国2009年全年10万亿的贷款投放使得银行业平均资本充足率由2008年底的12%下降到2009年底的11.4%。根据2010年上市银行半年报显示,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普遍下降。工、农、中、建、交5大银行中,除交行和中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上升外,其他3家普遍下降,农行降幅最大,达1.02%。由此可以看出,在巴塞尔协议Ⅲ逐步提高的资本充足率面前,中国的银行业的压力将不断增大,枷锁也越勒越紧。

七、为什么中国几年内不会彻底宽松

对于中国的政策宽松,市场上可以说是期盼良久,但是中国的货币宽松实际上是受到了多重枷锁的限制,在中国几年内都难以出现巨大的宽松政策,对于其中的原因这里也进行一下深入的分析。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巴塞尔协议对于中国的枷锁作用。巴塞尔协议从Ⅱ升级到Ⅲ,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翻倍,这本身对于银行的融资就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每年是8%以上,中国的利率是6%,这样的发展速度和利率,基本上已经决定了中国的货币增长每年必定是百分之十几,在货币不断增长的同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提高,银行再融资的压力是空前的。对于现在大约80万亿的M2来说,中国的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需要的资金就是大约8000亿元,这已经与银行业的总利润相当,如果再每年增加10万亿的货币风险资产,就要再融资超过万亿元,如何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如果达不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世界上的美元银行和英镑银行则不会与你业务往来,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谁能够既不是用美元也不是英镑参与国际金融业务呢?因此在这样的压力下,央行是具有非常大的动力提高准备金率来降低货币的金融衍生,降低货币乘数来降低银行的风险资产,使得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的高要求。

而且中国的宽松降息,对于银行业而言是降低银行的政策性利润。因为银行的大部分存款为活期,降息实际上降低了银行的存贷息差,未来中国的经济如果下滑,银行的坏账增加,再降息以后银行业出现全面亏损的可能性很大,直接影响人民币的海外信誉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这对于中国的崛起也是有致命影响的。

对于美联储的不断宽松,我们只看到了QE政策的不断宽松却忽视了美国在此

之前的紧缩政策。在QE之前美联储采取了给银行在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付息的政策，使得在危机风险阴霾下银行把大量的资金存入美联储吃利息而不是到市场中放贷，美联储的准备金存款一度达到12000亿美元左右，对于原来7万多亿的美元广义货币M2来说，等于是客观上提高了准备金率17%以上！

同时我们要注意到美国政府在奥巴马上台以后，债务上限提高了接近三万亿美元，这些债券的发行也是要从市场中吸纳资金的，因此美国实际上已经从市场上回收了大量的流动性，把金融危机中境外M3流入美国避险成为M2、衍生品崩盘后的M4、M5等货币进入到M2领域等等的流动性大量回收，在这样大力度的回收下才出现危机开始后美国有一定通缩压力的现象。这样大规模的收回流动性，必然会造成流动性的不均衡，因此对于这样的不均衡就有了进行量化宽松来定向的购买债券资产，通过量化宽松使得美国的流动性均衡起来。美国在把利率下降为接近零的实际负利率的同时，是采取给超额准备金付息和大量发行国债的方式大量的收回了流动性，是采取的降息和变相提高准备金率的方式对抗危机的，其量化宽松只不过是后续的跟进政策消除流动性因为提准降息差别化操作所造成的流动性是不均衡的，用他们当时的话说就是要消除在金融体系内的流动性淤积。

与美国的危机应对政策对比，我们看到欧洲是没有经过美国这样的变相提准阶段就采取了宽松，这样过度宽松的背后就是各国财政状态的压力巨大，欧洲债务危机由此而来。而中国的政策是什么呢？中国是搞了四万亿人民币救市，导致地方融资平台的崛起，导致中国为了在建项目不下马、不烂尾，后续的投资和融资需求非常巨大，对于这样的投资和融资的宽松，要保持总量上的稳定和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在其他方面必定是需要进行紧缩的，而中国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在海外的不断走向宽松下，会有大量的外来流动性进来，造成外汇占款导致的被迫货币发行和宽松，这也使得中国对于其他方面是无法宽松的，因为全面的宽松必然造成恶性通胀的风险加大，直接威胁了中国的政治稳定，而中国的崛起，国家稳定是最根本性的问题，为了稳定一定会牺牲发展，一定会以紧缩的政策来保持稳定。

因此，在中国的银行业没有最终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之前，在世界的危机没有稳定之前，中国是不具备长期宽松的条件的，即使是为了刺激经济的宽松一下，也必定是短暂的和临时性的，大家应当做好过较长时间的紧日子的准备，这与世界在08年危机以后各种危险没有解除是一致的，这也到了中国崛起的关键性时刻，需要的就是政策的一贯性和忍耐。

八、应对巴塞尔协议和评级霸权

在2011年12月25日召开的第三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高调质疑穆迪、标普、惠誉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他同时提出,中国应减少对信用评级的依赖,并支持本土评级机构的发展。

中国的自主评级机构已经开始了发展历程,2010年7月11日,中国独立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在北京发布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等级。这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个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第一次向全球发布的国家主权信用风险信息。大公还发布了《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大公对中、美、英、法、德等主要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大公对中国国家信用评级为本币AA+、外币AAA;美国评级为本币AA、外币AA;英国和法国的本币和外币均为AA-;德国本币和外币均为AA+。大公国际报告中的本质性亮点——大公国际给予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新兴市场国家的评级,明显高于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的评级结果,但对欧美18个国家的评级则一致低于后三者。50个国家中存在明显级别差异的国家占到了总数的54%。大公国际的这份报告中,对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希腊、冰岛等18个国家的评级,均低于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信用等级。因为"这些国家的财政风险已经成为该国国内最大的系统性风险来源,也是世界范围内有可能引起经济二次探底的主要风险源。"报告解释说,与此相反,对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9个国家的信用评级,大公国际给予了高于三大国际评级巨头所给出的评级。理由是"这些国家经济的增长潜力长期稳定,财政稳健性、抗击外部冲击的能力也日益增强。"这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报告,亮点的关键就是打破的西方评级机构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在评级上的不公平。

大公的报告受到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广播公司的文章分析说:中国这一评级报告发出的时机正是西方信用评级机构饱受非议之时,中国这一信用评级报告的发表是对西方信用评级机构的一个挑战,也是中国增加其在全球市场上影响力的表现。法国"财经"网认为,主权债务信用评级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穆迪、惠誉、标准普尔,这些基本上就是耳熟能详名字的全部,一个中国信用评级的出台,更多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即这个封闭世界需要一种不同的声音。澳大利亚新闻网站"商业观察家"指出,大公国际进军主权信用评级,不仅折射出中国对西方评级机构的不满,而且反映了中国致力于培养独立判断主权债务质量的能力。美联社

的报道称，有专业人士提醒说，尽管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巨头经济增长强劲，但西方评级公司给他们的评级却低于债务问题缠身的西班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往往得不到充分的肯定，评级基本上是落后的。文章认为，大公国际对新兴经济体的评级更高，符合市场对中国、印度等国家的情绪。

中国的评级机构的发展是可喜的，但是中国评级机构的发展需要有足够的政治扶持，就如三大评级机构是由巴塞尔协议所保障的，中国的评级机构也需要有足够的政策保障，对于中国发行的债券等我们应当强制由中国的评级机构进行评级，要扶持优势企业，这里一定要摒弃一切均要国企、均要国家国有和国家插手管理的固有思路，因为评级机构是要对国家的主权和央行、货币进行评级的，如果是属于国家、央行或者由国家、央行监管的评级机构，自己下属机构评级自己的信用，则会变成评价失去公信力了，只要这个评级机构是中国的，只要受到中国的司法管辖，中国对之的控制力就是存在的，要从大处着眼看问题。美国聪明之处就是由美国安全情报系统关系密切的一些名义上的私人机构来完成经济领域维护美国利益的使命，比如著名的胡佛基金、福特基金等，由这些机构进行美国利益的战略传播，插手各国事务和收集情报，在这个世界我们要适应世界的游戏规则。

进一步讲中国的自主评级机构还可以广泛的联合其他饱受评级霸权压制的国家和机构，建立一个同盟是非常重要的，而这样的同盟也是由私人机构出面的合资比较容易，在国家层面很多事情是没有私人机构容易操作的，因为现在世界通行的规则是私有制社会，中国要适应这样的国际环境。在国际上俄罗斯总理普京已宣布建立本土评级机构；韩国加强双评级管理，规定发债主体必须选择韩国的国家信息和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作为双评级机构之一；日本政府出资支持其控制的亚洲评级协会扩大日本评级机构在亚洲的影响。中国在国际上并不缺乏潜在的伙伴，大家联合才有挑战三大评级机构垄断的希望。

目前只有获得美国“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资质的评级机构，才被国际普遍认可。然而时至今日，美国对于进入其市场的外国评级机构依然“苛刻”。截至2010年年底，全球近200家评级机构中只有10家在美获得资质。中国独立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在美国市场受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大公”在美没有办公室和客户、无法确定其法律框架能否适用于“大公”为由，将其提交的美国“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资质申请列入拒绝程序。对抗美国的市场准入，中国需要干的就是在中国限制美国机构的业务，只有这样双方才可能坐在谈判桌上来解决问题。

而对于巴塞尔协议,我们要合理的利用,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巴塞尔协议的执行要有自己的思路,对于国际金融业务和人民币业务完全可以双重标准,具体的做法就是我们可以让银行的国际业务都独立成为一个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他分行的人民币业务体内循环,对于自己人民币体内循环的部分不要自己搞一个比巴塞尔协议还要严格的东西,有效避免银行为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不断再融资压垮资本市场。巴塞尔协议是披着金融安全的外衣,实际上是一个限制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我们的思维应当是怎样巧妙应对而不是严于律己地执行!

中国应对世界霸权,要有自主的应对思维,只有依靠自己对于国内市场的控制,不盲从的同时利用游戏规则,才有中国从容博弈的空间。

第十五章　欧债协议：新“慕尼黑阴谋”

新鲜出炉的欧债协议是西方资本大鳄掠夺老百姓和新兴市场国家进而祸水转嫁的新“慕尼黑阴谋”；在当年的慕尼黑阴谋，希特勒还打着为了苏台德地区德裔人士人权的旗号侵犯捷克主权，现在的欧债协议已经不顾人权直接侵犯私人财产向大银行输送利益了；而希腊开始减记国债，欧洲的核心强国法国和德国也可能照此办理，下面美日也可以照办，这就变成了发达国家逃避债务对于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大掠夺。西方如此无所不用其极地赖债，如此令人齿冷地巧取豪夺，貌似得计，其实是在侵蚀自己的信用基础，是在自毁长城。而中国在大变局中应当避免为他人火中取栗，要先己后人，顺势而为。

一、十月围城：希腊之乱的背后

2011 年 10 月欧盟峰会终于就欧债问题达成了一揽子协议，要点包括把希腊主权债券减记 50%、扩大欧洲稳定基金到 1 万亿欧元等等，似乎完全可以救助除希腊以外其他几个债务危机深重的国家，此议一出举世欢腾，欧洲股市领涨全球，舆论普遍认为这是解决欧债危机的重大利好，但实际上这样的欧债协议却是西方资本大鳄掠夺老百姓和新兴市场国家进而祸水转嫁的新“慕尼黑阴谋”。

第一个跳出来“以命相搏”的是希腊人。先是希腊军队未遂政变震惊世界，紧接着时任希腊总理的帕潘德里欧出人意料地宣布将就欧盟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新方案举行全民公决，同时还将在议会上进行信任投票，公投的内容包括希腊会不会继续留在欧元区。欧美股市随即大跌，意大利、希腊股市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6%。未几希腊迫于压力放弃公决，然而在反对党的压力下总理下台，一位有欧洲央行任职经历、能够执行欧债协议的新总理上位。

坊间普遍不理解希腊人的行为，认为他们得寸进尺，纯属一场无厘头的闹剧，各种媒体也推波助澜，但是有哪个媒体报道了希腊人民反对欧债协议的真正原因

呢?坑爹的缩减开支计划希腊人民都已经接受了,为什么非要反对看起来是在援助他们的债务减记计划?其实只要深入分析这个协议的真相,洞悉背后金融博弈的结果,就知道这个协议掩盖的是怎样血淋淋的掠夺了——这个欧债协议已经不能简单地称作金融大鳄们对于其他人的剪羊毛了,而应直接冠以新"慕尼黑阴谋"的称号,因为剪羊毛还要遵守现有游戏规则,要在游戏规则下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力量的不对等来达到目的,但是此次欧债协议则是改变游戏规则的犯规,是一场彻底的阴谋活动,与二战前英法向德国出卖捷克利益的臭名昭著的慕尼黑阴谋如出一辙。

对于不熟悉国际资本市场运作的人们来说,欧盟的援助资金增强了希腊政府的偿债能力,而公债虽然减记了50%,但是总比希腊政府违约、债权人损失100%要强的多,似乎是一个各退一步、互利双赢、共度危局、看起来很美的方案,但是问题的实质是这样吗?实际上此次欧债协议减记主权债务,是公权力对债权人个人资产的强制征收,而这种强制剥夺私有财产的行为据说是以尊重私有产权为纲的西方政治法律体系的大忌。

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明白对于希腊主权债务的清偿,是有第三方担保的,是有违约保险的,基于这个保险还形成了金融衍生品——信用掉期合约CDS。希腊国债的CDS就是帮助希腊进入欧元区的特洛伊木马,当年为了达到加入欧元区的条件,高盛为希腊量身定做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SWAP)方式,为其掩盖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同时高盛又向德国银行购买了20年期、价值10亿欧元的CDS来对冲风险,由此可以看出CDS才是希腊债务危机博弈的要害所在,其与债券的对冲性使得CDS在希腊债务危机当中应当与债券本身受到同等关注。

再回到希腊事件上,对于希腊债券减记的欧债协议,国际掉期和衍生品协会(the 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采取了颇为怪异的立场,认为对希腊债务进行50%减记不构成"违约事件",这一术语甚至在20年前都未存在。这都不是违约,那什么才构成违约事件?既然不算违约那么债务担保方就无须赔偿,这个不赔偿才是关键,是犯规者修改了游戏规则。这就如我们的孔乙已先生说读书人偷书是窃不是偷一样,你掌握了高端的话语权,就可以把偷变成不属于偷的窃了。

2012年3月1日据法新社报道,国际掉期交易和衍生品协会(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ISDA)宣布,希腊与债权人就债券达成的协议不会触发信贷违约到期(CDS)的保险赔偿。换而言之,从CDS层面而言希腊没有违

约。据路透社报道,希腊政府已接近与私人债券持有者达成初步协议,从而防止这个债务深重的国家陷入无序违约,但希腊债券的投资者最高可能蒙受70%的损失,即债券票面价值将减记70%。私人债券持有者最可能的结局是实际蒙受损失65%至70%,旧债券所换取的新债券为期30年,将提供给债权人均值为4%的累进利息。

另据新华网报道,希腊政府官员2012年3月8日透露,希腊债务置换计划中私人债权人的“参与度”,即愿意参与希腊债务置换的私人债权人所持国债占私人所持希腊国债总量的比重,已经达到85%以上,这意味着希腊将成功启动债务置换计划,并进而顺利获得国际救助贷款,避免了近期无序违约的风险。然而希腊债务置换计划中所谓私人债权人85%的“参与度”,是在希腊政府威胁如果不愿意就将拒绝偿付的情况下被“自愿”的,更有所谓“愿意参与希腊债务置换的私人债权人”,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债权人,而是代理债权人进行市场操作的各种金融机构,西方的资本市场是以机构为主的市场;所谓私人债权人主动参与希腊债务置换,实际上等于古代代理主子打点产业的管家背着主子把主人家里东西全低价典当了——而主人对此竟然无权置喙。今天的中国“公知”们对于所谓非法强拆深恶痛绝,但是希腊的债务置换计划对于希腊国债债权人来说,是比非法强拆更令人发指的“合法强拆”——是经过欧盟最高层官方背书的强拆,是对私有财产的合法掠夺。

你可能不懂信用保险和金融衍生品,但是如果你是涉身其中的希腊债券持有人,就可以轻易知道问题的要害,本来是你拿100元买债券,到期要偿还你100元本金加利息,如果政府还不起的话,有欧洲著名的大保险公司和银行等做信用担保,他们将偿还你应得的款项,你放心地购买这个债券很可能就是看到了这些债券背后的信用担保,但是现在让你损失50%却保险不赔,你干吗?就如我们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银行承诺本金和收益保障,结果金融危机理财产品赔本很多,这时候银行说保本保收益在理财产品中是违法约定无效,你是不是要抗议?如果这个法律还不存在,是国家领导人与外国签署的条约规定的,你不想造反吗?想明白这个,就知道希腊人为什么舍得一身剐也要把皇帝拉下马了,希腊债券的持有人除了西方的银行和主权基金外,更多的是希腊本国国民持有,虽然希腊国债是被欧盟各国为主的外国持有高达70%左右,但是国民持有30%仍然是最大的份额,现在他们的资产都被减半洗劫了,所以这样的协议如果要进行希腊的全民公投,其结果可想而知,因此西方对于公投才如此激烈地反应。

二、聚焦 CDS:致命武器和利益腾挪

对于 CDS 的厉害,人们都还记得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s,CDS)是市值 2000 亿美元的 AIG 濒临破产的主要原因,AIG 不得不接受美国政府的救助。AIG 是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实际上为次级债券进行了担保,而没有为该风险拨备额外的资金。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后,其债券 CDS 合约规模被预测高达 4000 亿美元! 眼下这个信用担保的风险更大,而且美国人更是深陷其中。据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各大银行 2011 年上半年向"欧猪五国"政府债券、银行债券和公司债券持有人提供的保险总价值比去年同期增加 807 亿美元,至 5180 亿美元。几乎所有保险都是信用违约掉期合约(CDS)。数据显示,信用违约掉期的增加意味着总风险敞口达到了 7670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0%。国际清算银行并未透露哪些公司出售了多少信用违约掉期,也并未透露其向哪些公司出售了掉期合约。欧债危机背后的 CDS 交易,实际上是把美国资本也深深的捆绑其中的,欧洲的协议没有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默许是难以办到的。

本次欧债协议是有巨大的利益输送的,欧盟所谓的援助和减记的背后不是为了希腊而是转嫁自己子信用掉期合约中存在的崩盘损失。希腊民众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主要持有的是希腊债券,而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大鳄们持有的是这些债券的信用保险和约 CDS,欧盟的所谓"援助"和他们大银行的债券减记损失,远远比不上希腊违约他们的信用保险需要赔偿的款项,他们给希腊的"援助"实际上是给自己堵窟窿的,希腊得到他们的减记和援助是抵不上他们的 CDS 给希腊公众的赔款的,因此希腊社会不接受这个协议具有极强的逻辑合理性,希腊政府接受这个"看起来很美"的掠夺协议只能说是弱国无外交的最新版本了。而希腊公众说"政府还不起债让欧洲其他国家来偿还"这种看似无赖的话语背后,也是有其内在合理性的:如果没有 CDS,公众起码会有一些风险意识,而在 CDS 的担保下反而让公众丧失了判断力。公众是要用真金白银来投资债券的,而保险公司做担保搞 CDS 却没有资金投入反而取得高杠杆的利益,纯属空手套白狼,在这个博弈当中如果西方所谓的契约精神真的那么毋庸置疑就应当是持有 CDS 的大鳄们承担损失,现在减记债务但不违约,CDS 还是赚钱的。仅仅 2001 年高盛给希腊的债券的 CDS 就卖了 10 亿美元,达到了 10% 的比例,当初希腊的危机可没有什么端倪哦! 这个减记的模式,就是一个人傻乎乎地在希腊债券价格很高的时候买了希腊国债,之后发现希腊

国债因为存在很高的违约风险开始下跌,于是亡羊补牢,每以一个并不很低的价格买入 CDS 进而锁定希腊债务的风险,然而现在突然希腊国债出现了 50% 的减记,而 CDS 也并没有起到当初所希望的锁定风险的作用,而是在 50% 的损失之外,又白白浪费了一笔买保险的钱。这样的话,CDS 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买 CDS 不是成了白送钱了吗? 对于这样的惯例,以后其他国家比如说意大利万一还不起债,也可以用类似“自愿减记”的方法。所以原本打算购买意大利国债并且同时用 CDS 保险的人,只能选择不买意大利国债了,因为没法锁定风险。

很多人说希腊包装国家债务情况,以虚假数据达到加入欧盟的条件,现在也是希腊拖累了欧盟和欧元,所以希腊要负责任。希腊有问题不假,但是更有问题的实际上是国际金融大鳄的欺诈问题,对于持有希腊债券信用担保 CDS 的金融大鳄,他们对于希腊的债务情况应当比谁都清楚,他们隐身于欧元区和欧盟幕后操盘,希腊要进入欧盟使用欧元,绕得过他们吗? 而把希腊包装拉入欧元区,使得他们的 CDS 风险降低,这个降低的风险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收益,因此希腊政府做假账骗进欧元区是有持有 CDS 的金融大鳄共谋的,而对于债券持有人而言,其债券的收益率却不会因为希腊加入欧盟而改变,因此让 CDS 持有人承担全部的希腊债务违约责任才是最公平的。对此,郎咸平教授曾讲过一段精彩的故事:“2001 年希腊想加入欧盟的时候,它自身的条件其实并不达标:根据欧盟规定,国家的财政赤字不能超越 GDP 的 3%,但希腊却是 5.2%。想加入又不达标怎么办? 这时希腊就找到了高盛,高盛后来帮助希腊发行一笔融资 100 亿美元债券可收回 74 亿欧元。后来高盛又通过汇率调整把可收回的债务变成 84 欧元,刚好多出 10 亿欧元而这 10 亿欧元不会在希腊的债务账面上出现,相当于是高盛把它借给了希腊。而后高盛又通过保险的形式把这 10 亿欧元借给了德国,它意思非常清楚:希腊还不了钱,德国人也可以还!”实际上高盛作为投行就是债券的发行代理,而德意志银行购买这些担保 CDS 也不是傻瓜,公开发行 100 亿欧元这样的巨款是难以保密的,实际上希腊债券和 CDS 危机本身已经在资本大鳄们当中酝酿了,高盛只不过是出面的人,面对显而易见的风险没有巨大的利益,谁也不会购买这样的 CDS 产品,把希腊拉入欧盟的大池子,符合他们转嫁已有风险的一贯解套策略,最终这个风险要让欧盟整体来承担,然后欧盟就要施压希腊让他们债务减记来解决 CDS 风险的问题。但是这个利益却被 CDS 持有者占有了,仅仅包装希腊进欧盟的 CDS 就价值 10 亿美元呢,这是债券金额的 10%!

另外国际金融协会(IIF)主席、私营部门谈判代表查尔斯 · 达拉拉(Charles

Dallara)表示,希腊债务协议是一项自愿协议,是经过一次持续到深夜的“马拉松会议”之后,才得来的不易结果,该协议不大可能对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s,CDS)产生重大影响,因为通常这只会由债务违约引起。这样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少数直接持有希腊债券的人以外,私营部门的谈判代表实际上是把间接与债券相关的人也代表了,这样的代表授权体系黑幕重重,因为很多债券是基金和银行的理财产品等购买持有的,基金或者银行的操盘手为了本机构 CDS 的利益同意了减记,损失就是这个理财产品或者基金的持有人损失了,私人机构的同意自愿减记,实际上是坑害了他们的投资人利益而保护了 CDS,这是一个超级老鼠仓的行为,但是对于这样的行为却不受西方司法的制裁,反而以“合法”的方式占有了投资人的利益,而这些投资人很可能就是各种养老基金账户,是民生的根本,所以西方会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

再进一步我们看到如果希腊违约触发信用保险赔偿,欧洲其他弱国的债务危机信用违约赔偿压力也会同时释放,在风险压力下信用掉期合约 CDS 的市场价格就要暴涨,让卖出 CDS 的西方机构们濒临破产,由此足以摧毁欧元乃至欧盟体系。因此在各国恶性博弈、各怀鬼胎的欧洲,欧盟一下子非常合作地达成“解决”希腊危机的欧债协议,背后就是共谋转嫁危机让他人埋单,而中国不仅仅是欧盟债券的持有者,也是希腊债券的持有者,对于西方转嫁危机的危险性中国人还没有足够的清醒认识,学界和媒体还在人云亦云,这枪口说不准已经在暗中对准中国了。

转嫁危机的欧债协议 10 月 27 日达成,以“慕尼黑阴谋”的方式催生了“解决危机”的重大利好,除了西方股市的大规模上涨,香港市场上众多外国投行就展开了对各种看空衍生产品的围剿,当天共有 12 亿份熊证街货被强制收回,创下了香港自 2006 年来的最高纪录,这样的冲击也带来了中国内地股市久违了的反弹,但是“慕尼黑阴谋”的如意算盘就那么容易成功吗?希腊现在正受到国际社会巨大的压力,其领导人被迫放弃了公投计划,希腊总理也经历了信任投票,然后与反对派组成联合政府,老总理辞职新总理上位……希腊内部的矛盾在发酵。希腊人民和政府对于可能违约的前景反倒不是很紧张,紧张的反而是那些欧盟国家,为什么?因为希腊人民和政府都知道,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不了国家破产而已,但是其他国家购买了太多的金融衍生品,如果希腊违约,对他们来说就是金融体系什么时间崩溃的问题,多米诺骨牌效应下有可能使得整个欧洲沦陷。

很多人会说针对 CDS,市场上也有做空和做多,是两方面双向操作的,在这样的买卖以及各种金融工具的杠杆下形成了庞大的衍生品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债券

的减记也是有人得利有人吃亏的,以此来说明减记没有利益的输送,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债券的减记肯定是债券持有人失去了利益,这部分失去的利益肯定要有人得到,在 CDS 不赔偿的情况下,CDS 担保所得款项就成为 CDS 的利益,这个利益实际上是从债券市场转移到了 CDS 市场,是两个市场间的利益输送,是债券市场的损失补贴了 CDS 市场,虽然不一定能够把利益的交换双方锁定,但是这样的利益流动是发生了的,这个利益维持了 CDS 市场的净利润和繁荣,而在金融危机以来,CDS 市场一直是西方金融市场的核心,维护 CDS 市场不崩盘,让 CDS 市场里面的金融大鳄们渡过难关也是西方强国的目标,因此这样的利益输送的发生就不奇怪了,就如当初为了将德国祸水东引而搞慕尼黑阴谋来绥靖希特勒德国一样。实际上,所谓“金融衍生品”,其最大的历史意义就是成倍放大了信用元规则的影响力道,加速了信用元规则的正负反馈系统的运转。

三、债务减记:“被自愿”的人权阴谋

西方一贯宣传他们的普世价值,提出私人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但是欧债协议却对于私人财产进行了彻底的侵犯,这个协议不需要债权人同意吗?虽然欧盟达成协议号称是征求了数个债券持有大银行的同意,但是对于一般希腊债券的公众持有者难道就不能参与得到表态的机会吗?国际衍生品协会说,“因为减记是自愿的,所以不触发违约赔偿的事宜”,但是这个所谓的“自愿”,既没有经过公投表决,也没有看到公开的授权取得过程,如何确定是自愿的?这个自愿非常的不透明,就算有某些机构自愿了,也仅仅是代表他们自己的行为,这个自愿减记也应当是其自有而不是代持的债券,这里我们要注意到参与谈判的私营机构是很多投资人的代理人,这些人购买的是机构理财产品而不是直接购买债券,但是这里我们发现这些代理人经常是自己持有了 CDS,因此与被代理人利益冲突是应当回避的,这是无效代理,这样的自愿实际上是“被自愿”的。而且就算是自己仅仅持有债券,这样的大规模减记给股东造成损失,也是公司重大事项需要董事会和股东会的表决的,这个表决和授权也是需要时间的,怎么就成为定论了呢?所以欧债协议的减记在司法上依据严重不足,这“被自愿”的债务减记是违反西方“普世价值”和法律的、赤裸裸地掠夺私有财产,西方的人权到哪里去了?

很多中国人迷信西方的司法制度,会关心地问:希腊国内公民持有政府债券的,如不同意减记 50% 的话,可否根据希腊法律,向政府提出诉讼?中国很多被西

方洗脑的人认为:如果根据司法独立的原则,理论上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这样的诉讼发生,应该也会是世界瞩目的焦点。但是按照现在的欧债协议,希腊的主权都不存在,还有什么司法独立?按照主权原则一个国家的国债只能接受该国的司法管辖,怎么能够通过国际协议来处置?所以对于西方的制度和“普世价值”千万不要太傻太天真了,真以为他们的法律是万能的!对于这样的案件,西方的法院都未必会受理,就算受理了也不会有媒体报道,他们对于希腊债券持有人的抗议就基本没有报道,就算是“占领华尔街”这样声势浩大席卷各地的群众运动的报道也被尽量压缩,只有对于中国等他们想要颠覆的国家,有个别人搞那么点活动,他们的大使就要“刚好”路过,而且要搞一个“举世瞩目”。

在西方的法律体系当中,任何剥夺公民资产的行为是必须要有法律依据的,而希腊的公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立法的过程,然而就算是这样的立法程序,西方欧美发达国家也是不容的,原因就是不需要受害人投票来决定强盗是否要抢劫,他们仅仅通过国际条约来解决本质上国内法管辖的问题,这是违背国际公法的基本原则、严重践踏国家主权的。一个国家的国债在司法领域只能由这个国债发行国的国内司法进行管辖,这是重要的国家主权,希腊债券的减记只能在希腊司法管辖下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国际条约高于国内法的国家实际上就是殖民地,对2000年前就在西方开创殖民地模式的鼻祖希腊,当然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西方对于人权问题也是双重标准的,比如中国所谓的“强拆”问题,在美国就算是交通违规,你不听从警察的指令他就可以直接开枪击毙你,但是中国即使是遇到暴力抗法,警察也无权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开枪!我们反对违法拆迁,但是欧债协议实质上就是对于所有的债券持有人进行“强拆”而且只给一半的补偿,所以欧债协议对于人权和国家主权的侵犯,与中国的一些违法个案相比,就是州官放火与百姓点灯之间的区别。在当年的慕尼黑阴谋,希特勒还打着为了苏台德地区德裔人士人权的旗号侵犯捷克主权,现在的欧债协议已经不顾人权直接侵犯私人财产向大银行输送利益了。希特勒也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民主不是万能的,历史是会重演的,现在世界的格局与当年二战前的格局颇有几分神似。就如二战没有因为慕尼黑阴谋满足了希特勒的野心而终止那样,本轮金融危机也不会因为一两个协议而终结,还要有长期血淋淋地博弈。

不能忽视的是希腊只不过是一个开端,此例一开,下面类似的做法就会成为惯例,私人减记了以后主权减记就更成为必然,冰岛的公决不偿还英国和荷兰的债权就是例子。这对于负债远远超标的欧美日各国都有共同的利益驱动。把这种华丽

赖债的可能性仅仅说成一个道德风险是不够的,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就必定会发生,而这可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谋求走出债务危机泥潭的终极方式。

据路透社报道,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超过7%,这一水平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表明投资者认为可能收不回所投的资金,这类忧虑也反映在了意大利债务违约的担保成本上。清算机构 LCH. Clearnet 2011 年 11 月 9 日宣布提高意大利国债交易的保证金要求。意大利的危机,最可能的出路也是类似希腊那样减记债务,而且这种减记会先从私人机构逐步发展到主权机构,如果它们的私人机构已经减记,私人势必要求其他机构也跟着减记,谁不减记谁是破坏世界经济“安定和谐”的邪恶力量、谁就会成为他们的公敌,这个时候反而可以在他们国内通过立法来减记你的债权了,2008 年冰岛破产就是通过全民公决不偿还英国和荷兰储户形成的主权债务的。前车之鉴,只要私人机构减记了,未来主权机构的减记就非常容易了,西方是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要高于国家的,私人减记困难而国家减记容易,未来国家如果不同意而让私人单方面减记,马上就会在舆论上妖魔化你的国家。而如果欧洲大国开始减记国债,下面欧洲的核心强国法国和德国也可能照此办理,下面美日也可以这样办,这就变成了发达国家逃避债务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进行的大掠夺。

如果减记债务不算违约不需要 CDS 进行赔偿成为惯例的话,将是对所有债券持有人和债权国的血腥掠夺,对于中国天文数字的外汇储备,这些储备大部分已经变成了各种债券,对于这些债券中国的主权基金是难以止赎取得抵押财产的,因此一定要有信用保险和 CDS,未来出现问题是保险公司赔付债券应得款项后取得抵押财产进行变卖的,但是现在如果直接减记不违约,中国就要遭受重大损失,就如两房债券,中国主权投资无法取得其中的抵押房产,必然有著名投资机构的信用担保形成 CDS,以往大家说次贷危机打击下中国的两房债券会有巨大损失的说法是不对的,因为有 CDS 要赔偿,现在如果可以减记不算作违约,中国巨额外汇损失的风险就无法控制了,而外汇占款是中国货币的主要发行方式,如此规模的损失必然是中国被彻底掠夺,中国的崛起大业就要夭折。

因此对于欧债协议减记希腊债务不算违约这样的做法,我们要认清其中的血腥和黑暗,要大声疾呼支持希腊人民的抗争,这样的抗争就是帮助中国就是帮助你自己。现在西方是减记私人机构,如果私人都已经成功减记以后,中国等主权机构不减记并进行援助,就会被他们妖魔化,就会被他们挑唆成为危机的罪人,发动他们的反华和战争情绪,搞贸易保护主义和针对中国的战争,以战争来转嫁危机,一旦有了军事冲突就可以合理合法地冻结你的外汇财产,以此来达到减记债券的目

的,对此大家必须警醒,要坚决反对这一场新的慕尼黑阴谋。

四、希腊危机需要透明化

对于希腊危机,不断地有各种消息传来,按照这些消息,希腊的私人部门需要减记大量的债务,从开始说的要减记50%到后来的70%,同时要债权人同意对于债务的利息同时下降到4%,这样的协议,我们要说的就是里面是有利益输送的,我们需要危机解决方案的透明化!

对于欧债协议,我们应当看到的就是欧债协议让私人部门所谓的自愿减记债权,这样的做法是不算作违约的,但是希腊债务违约是有人担保的,也就是违约以后由担保人承担损失,债权人是不承担损失的,这个担保人是谁?这里更关键的是为什么债权人在有担保的情况下不愿意让担保人承担责任而是自愿自己承担损失?这个"自愿"也是很可疑的。

在西方的国债发行模式下,国债的清偿是有一个重要的金融衍生品——信用掉期合约进行保障的,就如高盛把希腊包装到欧盟和欧元体系,就与德意志银行合作进行了CDS交易,德国人和美国人是要对于希腊进入欧元体系负责的,所以在欧债协议下,债权人遭受损失而担保人不承担责任,是根本违背商业准则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CDS是如何赔偿的:假如你是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希望为自己在欧洲的投资做一些保险,于是买了某家银行发行的1000万美元希腊债券,对应保险费(CDS价差)为10%。如果希腊没能违约,你需要支付一笔100万美元的年保险费;如果希腊真的违约了,你可以用债券换回1000万美元的本金。

根据大型证券信托清算公司(DTCC)估计,希腊违约并触发CDS的赔款金额最高为33.4亿美元。尽管这部分赔偿额相比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时小,但不可忽视的是这33.4亿美元可能是没有计算杠杆的,一旦卖方是通过银行贷款进行赔偿,那么最终风险将转移到银行和其投资者身上。当前国际上每天金融市场交易与希腊有关的CDS总额超过700亿美元,这里已经成为资本巨大的博弈和利益输送的场所。

我们这里还要看到的就是希腊的减债,对于CDS的担保人而言,不仅仅把原来要承担的违约损失转嫁了,其担保保险本来要承保的范围也发生了变化,就如原来他们是担保了100块钱的债务,由于减债50%或者70%,他们担保的债务标的就已经变成了50块或者30块了,可是这样的保险责任降低,保险费可没有降低,欧债协

议当中 CDS 可没有退还费用的条款,欧债协议是有意回避的 CDS 在希腊债务当中的主要作用和责任。事实上早在 2011 年 12 月中旬希腊的 5 年期 CDS 就已经高达 113.1%,这意味着投资者需为 1000 万欧元希腊债券付出 1131 万欧元的保费。保费已经高于债券本金,如此高昂的保费在债券本金减少到一半以下的时候,CDS 的保费就不应当承受一些损失吗?

希腊 CDS 如果触发,会否传染至其他欧元区国家的 CDS? 根据欧洲银行管理局(EBA)测算,合计有 71 家银行出售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五国发行的 CDS,金额高达 1780 亿美元。为对冲风险,大量银行采取同时买入并卖出 CDS 方式,比如巴登符腾堡邦银行出售上述五国 CDS 达 54 亿欧元,买入类似 CDS41 亿欧元,净风险约 13 亿欧元。一个极端的假设是,如果大量银行都采取同买同卖,那么这无异于"击鼓传花"模式,一旦最终赔偿方失去赔偿能力,那么整个链条都将断掉。

这里认识到了欧债协议存在着利益的输送,更需要的就是透明,应当知道希腊的私人机构到底是哪些,持有希腊债券的都是什么人,同时更应当知道的就是 CDS 的持有情况,到底是谁持有的 CDS 在欧债协议当中得利了,而西方的金融监管我们发现是有意规避了对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这部分的信息是严重不透明的,这些不透明就存在着被渔利的嫌疑。

知道了这样的利益输送也知道了其中的不透明,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希腊民众对于欧债协议是普遍反对的,对于债券的持有规律,本国的老百姓一般是最大持有者,很多老百姓是购买各种理财产品或者养老保险等,这些理财机构和养老保险机构再投资本国债券,这是一种间接持有的方式,但是这样的方式在欧债协议和债权减记当中,你的权利就有被代表的可能,老百姓凭什么要承受全部的损失而不能对于 CDS 的问题有话语权呢? 这里难道没有对于 CDS 的持有者的腐败吗? 我们也知道炒作金融衍生品有较高的门槛,投资金融衍生品的大多数是金融家、富人等,对于这协议的表决,不把 CDS 的持有情况公开是对于民众的不公平,民众不能有充分的信息和了解真相,所谓的民主就是谎言。

现在西方宣传和舆论上在绑架中国的外交,在叫嚷着要中国帮助欧洲救市,但是欧洲的市场到底是怎么样中国也不了解,中国应当做的就是要欧洲债务危机的各种细节公开透明,要让世界和国人知道中国帮助欧洲到底是帮助了谁,没有真相没有监督的帮助是傻子把钱丢到了水里,这是对于中国人民的不负责任,因此中国援助欧洲应当首先以欧债、欧元和欧洲经济的透明为前提的,中国不能做不明真相

的援助者,即使是做好事当雷锋,也要确实帮助了好人和需要的人,给掠夺者填窟窿的事情是不能干的。

现在欧洲的政治家们为了希腊和欧债的解决是会没有少开,争吵也很多,但是实质的问题是什么谁也没有公开在媒体上言明,谁也没有把协议所涉及的各方利益消长给说明白,是各怀鬼胎的状态,这样的状态下中国进入是非常危险的,费力不讨好和没有好效果的危险性是巨大的,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首先就是要了解真相,在真相下做出合理的决策。

因此著者对于这次欧债危机中国的对策的看法,就是中国应当首先要求欧洲的透明,要让所有人了解真相,在真相下面再进行人道主义的援助和互通有无的帮助。

五、减记阳谋将留下历史污点

希腊债务置换计划中私人债权人的"参与度",即愿意参与希腊债务置换的私人债权人所持国债占私人所持希腊国债总量的比重,在 2011 年 3 月 8 日已经达到 85% 以上,这意味着希腊将成功启动债务置换计划,并进而顺利获得国际救助贷款,避免了近期无序违约的风险。不过在这一个利好的背后,恶例已经造成,私人债权被"自愿减记"70% 以上,本来应当赔付的 CDS 起先不赔付,在兑换了 95.7% 的债券以后又突然宣布对于不足 5% 的国债进行赔付了,国家和金融机构这样的阳谋私人财产,必将成为历史的污点。

2011 年 7 月,欧元区领导人就新一轮希腊救助计划达成初步协议,规定私人债权人将对所持希腊国债减记 21%。此后由于希腊改革措施执行不力、债务形势恶化等原因,2011 年 10 月欧元区领导人不得不决定将债务减记规模调高至 50%。2012 年 2 月 21 日,欧元区财长再次决定,将账面减记幅度进一步调高至 53.5%,私人债权人的实际损失将达 75%。

按照欧元区财长会通过的 1300 亿欧元(约合 1726 亿美元)第二轮希腊救助计划,发放救助贷款的前提是希腊成功实施债务置换计划。鉴于希腊在今年 3 月 20 日将有 145 亿欧元(约合 192 亿美元)的国债到期,因此如果得不到这笔贷款希腊将不得不宣布债务违约。希腊目前国债总额为 3500 亿欧元(约合 4650 亿美元),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60%,其中大约 2060 亿欧元为私人债权人持有。按照 53.5% 的债务减记比例,假设全部私人债权人参与债务置换的话,希腊国债规模将能够减

少近 1000 亿欧元左右(约合 1328 亿美元)。

到底有多少私人债权人参与债务置换一直是市场各界关注的焦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必须有 95% 以上的希腊国债私人债权人参与债务减记,才有可能使希腊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 2020 年前由现在的 160% 降至 120.5%。根据希腊议会 2012 年 2 月底通过的“集体行动条款”,只要参与度超过三分之二,希腊政府就可以启动这一条款,强迫所有私人债权人参与债务置换。在私人债权人持有的 2060 亿欧元的希腊国债中,有 86%(约 1770 亿欧元)是希腊政府依据希腊法律发行的,因此希腊政府有权强迫持有这部分国债的私人债权人参与债务置换。对于剩余的依据其他国家法律发行的国债,希腊政府则无权这样做。我们看到的就是希腊在政府领导人更迭以后,对于私人的国债持有者采取了异常严厉的手段,希腊政府日前威胁说,有可能拒绝偿付不参与债务置换的私人债权人。以政府的公共权力对于私人的产权持有者进行了赤裸裸的威胁,在不愿意减记债务就不还债的威胁下,这样的自愿减记还是自愿吗?西方势力代表对于中国的依法拆迁如果强制执行的话还要极力地反对,怎么对于希腊这样的赤裸裸的威胁却视而不见呢?希腊政府这样的威胁征收个人财产,强迫私人机构同意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对于市场经济的恶例,是绝对的市场经济的历史污点。

对于这一次希腊国债的置换,希腊政府将依据英国法律发行新国债来置换旧国债,债权人将获得更加可靠的法律保障。也就是说希腊政府将无权制定法律进行征收私人债权,但是依据外国法律处理本国金融事务,将是国家主权的丧失,在债务危机下放弃国家的主权,本身也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污点。2012 年希腊债券置换前希腊债务的 36% 是由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持有的,也就是说这一部分的希腊债务是由相应的纳税人持有的,但是到 2015 年经过义务的债务重组和第二轮金援,希腊债务的 85% 将由欧元区的纳税人持有。希腊这样的债券置换清洗了私人债权,最终将主要的债券变成了欧盟的负担,如果这样的趋势继续,欧洲其他国家效仿的话,欧盟的负担将是巨大的。希腊这样的行为本身,对于未来世界的规则影响将是巨大的,一个国家的国债基本被外国和国际组织持有,并且以后发行国债要依据外国的法律,本国政府以征收相威胁让个人“自愿”地降低了财产权利,都是西方私有制社会所不允许的。

北京时间 2012 年 3 月 1 日晚间据法新社报道,国际掉期交易和衍生品协会(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ISDA)刚刚宣布,希腊与债权人就债券达成的协议不会触发信贷违约到期(CDS)的保险赔偿。换而言之,从 CDS 层

面而言希腊没有违约。债权人损失了70%还不算违约?这就是赤裸裸的掠夺了。就如我前面论述过的希腊的欧债协议对于债券持有者和CDS持有者之间是一个不平等协议和利益输送,希腊的CDS非常的不透明,粉饰希腊加入欧盟的国际机构估计总共只有32亿,德国银行仅占其中一部分损失有限。但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国是不能承受不援助希腊的压力的。现在德国对债务危机的风险敞口已经从2110亿欧元蹿升到了2800亿欧元。

过去讨论过CDS时代如何套利,讨论如何购买CDS还对冲国债违约的风险,这些讨论都在此变得没有意义,因为假如有希腊的先例,未来其他国家也可以出现类似的情况,购买CDS根本无法起到应有的规避风险的作用,这会让整个市场产生怀疑,担心以前建立的债券、CDS等市场整体的游戏规则是否还有效,因此希腊债券置换而CDS不算违约的行为意义深远,必定是要载入史册的,而且是一个不光彩的历史记录。如果没有CDS的保障,对于风险巨大的国家国债的购买就要变得谨慎,可能因此没有人敢买欧猪五国债了,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国债发行将要受到巨大影响,他们的国债发行必然要以更高的利率进行补偿,因此欧洲再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包括前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Jean - Claude Trichet)在内的政策制定者均反对结算希腊信用违约掉期合约,原因是担心交易商将因此做空陷入困境的国家,从而导致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

为了这些国债的出售,欧洲央行开始了LTRO,也就是Long Term Refinance Operation,即长期再融资操作。欧洲国家的国债可以作为欧洲央行发行国债的抵押品,包括本次置换以后的希腊国债,国债利率和欧洲央行利率之间形成了利率套利空间。同时欧猪五国竟然是OECD的创始成员,按照"巴塞尔资本协议"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资产分类,分别以相应的权重(K)反映其风险大小,按照协议规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央政府的债权风险暴露权重为0,也就是说他们的国债被欧洲的银行持有根本不算做是风险资产,不会受到巴塞尔协议的限制,因此商业银行通过国债抵押贷款套利可以随意加大银行杠杆而不受巴塞尔协议的任何制约,这些国债被抵押给欧洲央行就是变相印钞,欧洲的印钞将可能因此而失控,这也是希腊危机的相关协议造成的间接影响,也是市场经济的历史污点。

然而在使用"集体行动条款"来强迫私人投资者承担损失以后,已有95.7%的投资者同意参与该国的债券交换计划后,CDS承担违约的比例已经不足5%的时候,国际掉期和衍生品协会(ISDA)于2012年3月10日宣布,希腊动用"集体行动条款"(CAC)迫使投资者承担该国债务重组损失之举将触发30亿美元的违

约保险,也就是在此前宣布不触发 CDS 的问题上来了一个出尔反尔。该协会表示,在其下属测定委员会判定使用“集体行动条款”为重组信用事件以后,总量为 4323 份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现已可被结算。荷兰国际集团(ING)驻阿姆斯特丹的高级利率策略师 Alessandro Giansanti 则表示:“维持投资者对这种工具的信心是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将影响主权国家发行债券的能力。”他表示,这一决定将可恢复投资者对这一市场的信心。在违约赔偿规模于不赔偿和拒付的威胁下,让 95% 以上的私人机构接受了损失以后,又开始赔付损失了,因为据美国托管信托和清算公司(Depository Trust and Clearing Corp,DTCC)发布的数据显示,置换以后的由信用违约掉期提供保险的希腊债务总额为 31.6 亿美元,上千亿的希腊私人机构持有的国债,被置换了 95.7% 以后再由希腊政府强制兑换承担 30% 左右,剩下该由 CDS 赔偿的也就是 30 多亿了,30 多亿的事情在欧债危机这样的全球危机面前,根本算不上什么,但这样的出尔反尔,根本没有半点诚信可言,在国际金融博弈当中,完全可以看到西方国家、金融垄断机构等对于私人产权的兵不厌诈！这样的国家与国际资本的合谋,威胁利诱的减记了私人机构的债权,西方经济社会哪里有什么光明！

这希腊债务危机背后的金融衍生品就像一个赌场,这金融赌场是大鳄们开的,规则也是他们定,想换就换想改就改,解读权也在他们那里,对于 CDS 的操作和法律的解释、私人财产的征收和违约是想咋说咋说,而这些 CDS 和国债的发行也是他们,也就是筹码也是他们制作。这样的赌场就是掠夺公民财产的机器,想一下他们先包装有污点的希腊上市,然后再渲染希腊的危机在违约、拒付、强制兑换的情况下让私人债券损失超过 70%,在 3 月 1 日还说不触发 CDS 违约赔偿但等到 3 月 10 日强行减记兑换了 95.7% 的债券以后,对剩下的债券就说要赔偿了,这是一个赤裸裸的坐庄操纵啊！

我们如果再深入想一下,这没有兑换的 4.3% 的希腊债券,到底又是谁持有的呢？在政府威胁拒付而 CDS 协会公开说不赔的情况下没有幕后交易谁敢持有这些债券呢？在其后又是谁让 CDS 协会改变主意的呢？这里是可能存在腐败和利益输送嫌疑的,因为在 CDS 不赔的情况下希腊债券是大幅度跌价的,在兑换前的市场价格已经与协议减记的水平相当了,谁在此以市场价甚至还可以加上财务杠杆的买入希腊债券并且拒绝兑换新债券的情况下是可以赚取暴利的,虽然最终 CDS 赔付的是 30 多亿的份额对于整个市场数额很小,但是对于一个腐败的官僚群体而言也已经是天文数字的巨款了,这里面的腐败嫌疑也是需要注意的。

所以希腊危机和相关的欧债协议,就是一次腌臜的利益博弈和利益输送的过程,其中的腌臜将留下历史污点,也证明了在西方的金融垄断之下,是没有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的,对于那些抱有市场经济梦想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更是应当反思,前车之鉴难道还要中国重蹈覆辙?

六、思考中国:先己后人的中国攻略

《金融时报》头条刊文《亚洲开发银行敦促印度和中国帮助欧元区》,西方已经就中国救助欧洲在舆论上制造气氛了,中国不救助就似乎是在落井下石,但是对于中国的利益如果保障却没有什么说法。对于本次欧债危机,中国首先要认清其中的博弈本质,认识到资源供给的特殊性与危机深化的关系,认识到债券减记与CDS利益输送的关系,认清目前的博弈是债券持有人和CDS持有人谁为危机埋单的博弈,中国作为债券持有人,一定要从各个角度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要维护其他债券持有人的利益,这样中国才有更广泛的利益同盟者,如果任由他人不顾法理、主权、人权的将其他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围剿,中国作为债券持有人能够利益不损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对于西方减记债券的做法要坚决反对大声疾呼,揭穿其中转嫁利益的阴谋,不要被西方所谓的中国能够拯救危机的高帽子和迷魂汤所麻痹,中国对于欧洲的一切救助活动都要首先站在中国核心利益不受损失的前提下进行,不要成为他人慕尼黑阴谋下的牺牲者。

很多人认为欧洲不能倒,欧洲一倒,中国跟谁来制衡美国?但是从欧洲目前的危机来看,中国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判断欧盟是否能够救活?欧盟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怎么办?现在欧盟一盘散沙、各自为了自身利益恶性博弈,中国刚刚有了一点发展成果哪里有那么多家底可以力挽狂澜?如果中国因此而受到拖累,谁又能够救中国?中国制造业的崛起给欧洲非常大的压力,而中国的倒下反而减低了欧洲制造业的竞争压力,所以你把他拉上来了,他没准还要把你踩下水呢!虽然美国要走出经济危机也要发展它的制造业,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制造业跟美国是有代差的,美国需要的是欧洲的高端制造业,因此中美经济上是互补的。当前中国需要的是进一步发展,距离与美国争霸的境界还很远,即使欧盟解体,中国距离美国还是很远,解体后在欧洲还要诞生新的强国,欧盟解体也是德国崛起的机会,德国与美国的竞争和威胁比中国要大,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德国打起来的,在欧盟解体后德国会垮掉吗?我们看到的是欧洲的资金在欧盟和欧元受到压力的时候都涌向了

德国,在欧洲各国国债利率飙升的时候,德国最近的国债收益率居然是负值,这已经非常说明问题了,中国的科技实力、高端制造业和金融实力、国民素质、国内政治稳定性等能够与德国相比吗?当前德国的极右势力也在发展,与二战前是很像的,德国照目前情况的发展趋势看来,CDS 的利益转嫁德国有利,德国将要是欧债危机的得利者,因此欧盟和欧元的倒下很可能造就德国的崛起,德国 HOLD 不住美国的霸权还有俄罗斯呢!

中国实在没有必要为欧洲的火中取栗,中国的主要矛盾在国内,如何把救助欧洲的资金拿来解决好本国的矛盾,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幸福才是问题的关键,中国的主要矛盾来自国内,中国也到了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性阶段,同时也到了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历史时刻,中国救助欧洲就要有中国合适的回报,此天道也!我们的总书记提出的条件是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和开放高科技出口,中国花了钱了就应当得到市场和高技术来满足人民的生活,中国制造也不应当再不断地被欧洲反倾销税掠夺,同时中国应通过上市银行用人民币参与欧洲援助基金和欧元区银行重组!这样的方式将使得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更加顺利,为未来开创一个人民币进入国际市场的通道。

中国对于欧洲的救助,更可以在违约已经发生,CDS 赔付导致欧盟金融机构非常困难的时候进行,中国的救助应当是救急不救穷,现在欧洲是花钱没有节制造成的“穷”的问题,只有到金融体系出现崩溃的时候才是真的“急”的时候,欧洲的损失要先由他们自己承担,只有他们自己扛不住了中国才有必要进行人道主义救助,现在 CDS 的出售者们还有巨额利润,你救助债券让债券不违约就使得出售 CDS 的人白白赚钱,中国的救助就等于给 CDS 的持有者们送钱,这样的救助不是救助而是利益输送和给金融大鳄进贡,我们需要在 CDS 的持有者也承担不起的时候再谈救助的问题,让他们把 CDS 交易的利润吐出来才有救助的前提,因此目前还远远没有达到救助欧盟的时候,现在中国提供资金不是救助而是交易,中国必须为付出的资金取得合适的对价,直接利益不足也要间接利益丰厚才可以。现在欧洲人比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要好得多,哪里有让没有足够福利保障的中国老百姓勒紧裤带来救助欧洲的高福利人群的道理?因此中国应当等到欧盟和欧元真的要破局的那一天再强势介入,要在欧洲老百姓与中国老百姓福利水平相当的情况下再去救助才更好,先人后己的做法势必会加重本国老百姓的不满,中国政府首先要让中国人民幸福起来,因此救欧洲不如救温州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资料链接:

国际金融协会(IIF)的表态

环球外汇网 IIF:希腊减债协议不会导致雷曼事件重演

国际金融协会(IIF)主席、私营部门谈判代表 Charles Dallara 表示,与欧盟达成的减记希腊债务 50%(总计约为 1000 亿欧元)的协议不会导致与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类似的信用事件。

Dallara 表示,希腊债务协议是一项自愿协议,是经过一次持续到深夜的"马拉松会议"之后,才得来的不易结果。他表示,该协议不大可能对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s,CDS)产生重大影响,因为通常这只会由债务违约引起。

在提到 CDS 时,Dallara 表示:"我们不负责判断(协议对 CDS 的影响),在我们看来,这是一项自愿协议。"他还表示,欧盟政府承诺为新发债券提供 300 亿欧元的担保,这十分重要。

Dallara 称,为新发债券提供担保是至关重要的,由于提供了资金支持,这些新发债券的信用将会相对较高。他说:"这是避免债券转换被贴上非自愿标签的关键条件。"Dallara 认为,欧盟所提供的担保金额已足够避免发生信用事件。

如果债券减记不是基于自愿基础,那么这将酿成灾难。然而,对于市场将如何理解这项交易,人们仍持谨慎态度。

Miller Tabak 的 Peter Boockvar,表示:"虽说欧洲人希望这是一项自愿交易,但周三(10 月 26 日)晚上的协议却是在枪口下'自愿'达成的。如果国际掉期与衍生产权协会(the 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ISDA)拒绝承认这项协议是自愿的话,这将是对 CDS 开的重大玩笑,并将可能毁灭这个市场。"

ISDA 已于一份声明中表示,它将这项协议视为自愿。然而,若是部分债权人不愿承担 50% 的损失,则仍有可能引发违约事件,尽管这种可能性目前已经变小。

通常来说,只有当 ISDA 被要求宣布信用事件时,它才会这么做,因此如果没有债权人向其进行申诉的话,一切就将无果而终。由于银行业是希腊债务的主要持有者,且它们本身也同意这项协议,因此自然也不会向 ISDA 申诉。

当前的两难局面可能只是在于,超过90%的希腊债务是在希腊法律之下撰写的。据ISDA称,多数希腊债务并无集体行动条款(collective action clause, CAC),这就意味着这一小部分的非银行债权人不需要跟随主流,他们可以单独行动。而如果存在CAC,那么他们除了跟随主流之外,就别无选择了。

因此,相对规模较小的那部分非银行债权人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接受协议,二是申诉。若是选择后者,则希腊可能会选择向这一部分债权人支付所有资金,而不是任ISDA宣布信用事件。此外,就算希腊拒绝100%支付这一小部分债务,由于规模有限,这一小部分债权人也无法引发类似于雷曼事件的资本市场连锁反应。

除了希腊之外,市场还担忧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券风险。Dallara表示:"在当前环境下,提高其他主权债券信用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金融时报:亚洲开发银行敦促中印帮助欧元区

2011年11月15日08:04 来源:腾讯财经 翊海

北京时间11月15日早间,《金融时报》头条刊文《亚洲开发银行敦促印度和中国帮助欧元区》,现全文摘要如下:

目前亚洲开发银行敦促印度和中国做好准备,帮助欧元区走出债务危机,避免因欧债危机导致的长期经济下滑对亚洲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

亚洲开发银行常务总干事Rajat Nag在本周一对外表示,作为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已经在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直接双边协议的方式加速全球经济的复苏。Rajat Nag同时向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告诫称,目前欧洲地区正处于极为艰难的环境之中,亚洲国家提供的财务救助将与欧洲当局的努力将共同避免全球经济陷入长期的溃退之中。Rajat Nag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表示:"我们都是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因此任何能够帮助欧洲跳出危机的国 家都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欧洲危机对亚洲的冲击相对有限,但亚洲不可能完全独善其身,因此中国和印度应对全力帮助欧洲走出债务危机。"

第十六章　陷阱重重的中国道路

——资本开放路径图、世行报告与欧洲 LTRO

央行调统司司长盛松成领衔的课题组撰写的一份《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的报告正式公布，同时世界银行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指摘中国国有企业行为，遭到独立学者抗议，抗议者杜建国表示：银行不能私有化，国企不能私有化，华尔街都是骗子，世行报告是对中国经济的毒药。在这两个事件发生后我们看到欧洲央行第二轮 LTRO 开始了。2012 年 2 月 29 日据 MarketWatch 报道，欧洲央行周三宣布的第二轮三年期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总规模 5295 亿欧元(7134 亿美元)，共 800 家银行竞标。再融资规模高于接受彭博和路透调查的经济学家平均预期的约 5000 亿欧元。根据 LTRO 相关规定，银行当时可使用抵押品以 1% 的固定再融资利率获得欧洲央行的贷款。在此之前 2011 年 12 月的第一轮 LTRO 为 4892 亿欧元，共 523 家银行竞标。把两轮 LTRO 合并计算，欧洲央行共计 LTRO 上万亿欧元，折合美元约 14000 亿，规模与美联储的两轮量化宽松是相当的，而且 LTRO 与之类似也是一种定向宽松，哪一个银行向欧洲央行可以融资就是有选择的，这个选择怎么样也不够透明，例如希腊的银行就有特别的待遇。哪怕是站在央行的高度，这些资金的规模也非常可怕了。

下面详细解读一下 LTRO。LTRO 的英文全文是 Long Term Refinance Operation，即长期再融资操作。它为什么重要呢？因为首先可以压低欧洲债务深重国家的国债收益率，降低它们的借贷成本。欧洲央行这一向银行系统注资的工具为银行提供了新的套利交易渠道，本质上就是银行从欧洲央行以极低的利率(1%)贷款，然后可以用这笔钱购买主权国家的债券，赚取息差。举例来说，你今天购买 3 年期意大利国债，其最新收益率约 3.06%，你就可以赚 2.06%。去年 12 月 21 日的首轮 LTRO，就使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短期国债收益率发生了巨大变化。此外，货币供应数据显示，第一轮 LTRO 还扭转了欧元区 1 月份的信贷紧缩。

欧洲央行的LTRO就是变相的印钞。依据1992年通过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等欧盟的立盟性法规，欧洲央行不能直接购买各国的国债，只能打擦边球。再融资操作让欧洲央行成为中间人，欧洲央行出钱（其实是印钱），银行拿到钱后购买国债，然后再把国债返还给欧洲央行当贷款抵押。这些国债最终还是回到欧洲央行的手里，欧央行其实“买了”国债，但它没有违法。这和美国的盖特纳与伯南克采取的手段是一样一样的。虽然再融资操作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它能把债务问题推后。所有的印钞为了不出现通胀让本国社会承担，必然是需要将所印钞的货币变成资产，也就是要用这些货币购买到资产，就如我们的老话所说，只有花掉的钱才是你的，印钞不解决问题，关键是印钞的钞票换取了资产，只有印钞换取了资产才是印钞最终的成功。联储的第一轮量化宽松规模是1万2500亿美元，第二轮是6000亿美元。以美元形式计，德拉吉已经搞出了1万3000亿美元，而英国的金爵士（Sir Mervyn King）也搞出了5070亿美元，这就意味着，欧洲人现在所做到的已经和联储不相上下了。

更为要命的是，LTRO还在对全球经济造成持续性的扭曲，那些来自意大利或者法国等制造业国家的资金倾泻最终都要流到俄罗斯或者沙特阿拉伯之类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我们看到这一次欧洲印钞上万亿美元，美联储前面的量化宽松也印钞约2万亿美元，这些货币经过金融衍生以后就是十万亿美元以上的规模，而放眼全球，哪里有十万亿美元以上规模的资产可以被购买呢？西方世界的资产都已经私有化，都是有主人的，而亚非拉其他国家的资产也是被西方控制的或者是私人的，唯一一块可以想象的十万亿美元以上的资产就是中国的央企啊！想明白这一点大家就可以知道西方的各种舆论和机构都把眼球盯住了中国央企，都为中国所谓的深化改革“开药方”了，中国与世界相比还是一只弱小的乌鸦，周边的一大群狐狸已经盯住了乌鸦嘴里的奶酪了，正以各种方式让乌鸦唱歌呢！相比海外发达国家的印钞，中国央行把流动性收紧到了历史高位，中国的资金非常紧缺，想一下如果此时央企私有化，中国国内可会有足够的货币购买这些资产？中国当前的货币才多少？目前国内货币多么紧张？按照货币数量理论的费雪方程式，MV = PT，央企的私有化增加了资本市场几十万亿的T，我们没有足够的货币的情况下价格P会是怎样？此时我们还看到央行要开放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央行名为《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的报告将资本账户开放步骤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个阶段。短期安排为1~3年，放松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鼓励企业“走出去”。直接投资本身较为稳定，受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中期安排3~5年，放松有

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管制,助推人民币国际化;长期安排5~10年,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先开放流入后开放流出,依次审慎开放不动产、股票及债券交易,逐步以价格型管理替代数量型管制。在世界金融危机流动性泛滥的时候,让海外印钞的货币流动性进来,这些货币以外汇的形式卖给央行后换成人民币购买我们的央企资产,然后我们的央行又剩下一大堆冗余的外汇储备只能再买西方的债券拿着西方的欠条,中国就将再一次的被彻底掠夺。西方印钞再融资的LTRO推后了危机的发生,就是在等着中国资产出售的盛宴的到来以此摆脱危机,欧洲央行LTRO的时间是三年,而我们资本市场开放的短期目标和开放外资直接投资的时间正好是1~3年。而且中国的资本开放是先开放外资购买国内资产,西方印钞换取中国资产将更为方便。

在世界印钞的模式下,一切的货币持有者都要贬值受到损失,唯有持有资产可以避免,中国老百姓的福利需要政府来保障,这个保障的来源就是政府的资产,如果央企卖掉了变成一堆欠条,而欠条的利息还几乎为零,欠条的货币价值还在进一步的贬值,这样的结果就是把西方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危机转化为了中国老百姓社会保障体系的危机了,虽然现在央企分红、回馈老百姓做的不足,但是我们的政府、社会和老百姓还可以提出要求,如果这些企业成为外国人的,谁有权提出主张要他们对中国的社会保障负责呢? 因此这些央企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在本次危机当中是生死存亡的关键,不仅仅是中国的关键,也是西方摆脱危机的关键,在列强都惦记着你的财富的时候,就如中国老话所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我们现在根本不是什么重大的历史机遇,而是面临了重大的历史性危险,如果不是世界的危机和西方的印钞,他们还没有如此的惦记着中国的央企呢!

中美问题比较起来,中国的问题才是可疏解的,因为中国的财产在就是分配问题;美国则是财产已经没有了,社保体系几十万亿美元的负债印钞都无效,因为印钞造成通胀社保负债同步增加,只有印钞买了中国的国有资产才可以解决问题。要掠夺中国已经是昭然若揭。世行报告里一条核心要点是这样表述的:“改革须包括推进银行系统的商业化,逐步取消利率管制,深化资本市场,进一步建立独立的、强有力的监管机构来支持中国的金融部门最终融入全球金融体系。未来二十年的金融部门改革应该是果断、全面和配套的改革,按照一个合理排序的路线图推进。一个优先重点是按照市场原则推进利率的自由化。”这样的表述与资本管制的开放报告内容是互相呼应的,把中国的核心金融资产卖光以推进银行系统的商业化为掩盖,这实际上是“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华盛顿共识”是1989年由洛克菲勒

系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在华盛顿共同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提出的。会后“华盛顿共识”得到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推行。

华盛顿共识主要内容包括：利率自由化；竞争性汇率制度；资本准入、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自由化；私有化；贸易自由化等。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就是把一个国家的金融主权国际化置于国际货币美元的从属地位，从而被美联储及其背后的金融大鳄所控制。在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华盛顿共识是毒药已经成为共识，它已经被历史所抛弃，2009年，英国时任首相戈登－布朗在20国集团峰会上宣布了华盛顿共识失败，但是新的世界银行的药方，将由这个过时的东西借尸还魂，这也不难理解独立学者要说世界银行的这个药方是毒药。所以中国的政策千万不能被忽悠，西方的经济、金融理论先进，让众多的中国学者和从业人士、政府官员神往，但是就如大家质疑韩寒一样，很多理论做的再漂亮，也离不开常识，违反常识的事情就是值得怀疑的，西方现在印钞多少是明摆着，印钞要真的取得利益必须把钞票换成资产这是常识，而这样多的印钞能够满足其置换的资产只有中国央企也是常识，因此他们的目的在哪里就很好理解，但是你要是追寻着他们的思路去思考问题，就会深陷其中被他们忽悠，我们还可以回望一下美国当年赶出英国的做法，美国当年实行的是孤立主义，而不是与英国接轨，美国当年的成功经验应当借鉴也是常识啊！

中国当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成功，但是背景是什么？当时是美联储把利率逐步拉高到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历史高位让全球美元回流美国，时移世易不能刻舟求剑也是常识，对于那么多的常识给出的指引，我们难道不应当多想一下吗？所有违反常识的事物，我们都应当质疑一下，这也是探究真相的科学精神，通过常识和逻辑关系得到的结论还被西方司法以心证的形式予以认可。

我们的资本开放路线图、世界银行的报告和欧洲央行的LTRO似乎是完全不相干的事件，时间赶到一起似乎也是巧合，但是太凑巧的事情如果太多，则不得不让人思考一下更深层次的原因，这还是常识。在这样的常识思维下，杜建国的抗议和质疑似乎越来越有道理了。所有权不等于分配权，中国需要改变的是分配权，在分配上给老百姓更多的实际利益。而不是简单的把所有权私有化，在现在这样的被权贵和外资掌握的时代，如果所有权改革就是让他们的私利合法化，只有所有权是国家的老百姓才有权主张分配权。对于中国当今的社会问题的关键是改革分配制度，完善分配权的问题。改革历来都是危险最大的时刻，现在西方都在虎视眈眈，改革确实立即死的可能性巨大；而不改革会出现危机不错，但当前西方危机更大，

不要说等死,当今国际博弈本质是谁先死,你等一下对方先倒下你就成功了,然后中国进行改革走向摘取果实,等一下后发制人是上策,就如当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也是西方石油危机出现巨大问题倒下后中国开放摘取了果实,才有中国快速崛起的今天。关于中国前途要光明做大家的蛋糕吃到应得的果实,这点中国各阶层人士甚至是中国的权贵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被西方及其带路党、买办们忽悠,现在各界改革呼声都很大,但怎么改分歧也很大,任何不提利益分配只讲制度设计的改革都是伪改革——要么是分赃,要么就是洗钱。

在社会巨大分歧中推动改革很容易出问题,特别是国企改革、社会福利和保障改革、农村土地问题改革和确权等更容易搞成动乱。中国只要继续稳定发展5年,欧美的债务就要发酵了,到时候就是西方国家的公知来煽动西方愤青来搞分裂动乱了。中国用电量超过美国具有历史性意义反映实体经济消长,美国能源信息局2月2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美国净发电量比上年下降0.5%,总量为41057.34亿千瓦时。中国同年总发电量44667亿千瓦时,中国超过美国3610亿千瓦时。美国的发电量下降说明美国的经济好转数据有水是货币贬值造成。中国总发电能力105576万千瓦,美国105709万千瓦,中国落后美国133万千瓦。以此态势,中国再发展几年会如何?据《瞭望周刊》,2011年中国GDP达到47.2万亿元人民币,约合7.45万亿美元。2012年1月27日,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GDP占美国GDP比重近半,达到49%。相比较,奥巴马上台的2009年这个比重为30%,十年前的2001年为13%,二十年前的1991年为7%。

中国崛起的速度很快,这个过程不能被所谓的远期危机必须变革打断进程。为此2011年2月,在与美国硅谷头面人物的晚餐会上,奥巴马询问苹果公司老板乔布斯,"要想在美国制造iPhone都需要什么?这些工作为什么不能在美国进行?"苹果公司2011年出售的7000万部iPhone、3000万台iPad和5900万件其他产品,绝大部分都在中国制造。苹果公司创始人直言不讳地告诉奥巴马,"这些工作机会不会回来了。"

已经持续了3年多的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快了全球经济体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对比的变化。2010年,中国制造业以1.995万亿美元的产值,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当年1.952万亿美元的美国制造业产值,从而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这是自1885年美国制造业产值超越英国以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又一次重大变化。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1年美国货物对外贸易总额3.734万亿美元;按中国海关统计,去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为3.642万亿美元,中美差距已经缩小到区区920亿美元。

商务部研究院等诸多机构预测,2012 年中国将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所以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很着急。

这意味着,在全球经济的三大“制高点”——全球制造业总额、全球对外贸易份额和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已于 2010 年在制造业领域和 2012 年将在对外贸易领域超越美国。这样的超越美国如何遏制?对于美国最现实的做法就是要在中国制造的价值还没有完全在资本市场上体现时,在美国还有全球印钞能力时,动用其金融优势把中国崛起的制造产业买下来和控制住,因特网的广泛使用,使国际资本流动速度以几何级数加快。依据《瞭望周刊》的数据现在全球 GDP 为 70 万亿美元,而债券市场则为 95000 万亿美元,是全球 GDP 的 1000 倍以上,各种金融衍生品的价值则达到 466000 万亿美元,是全球 GDP 的 6657 倍还多。世界上每 2.4 小时流动的资金总额,就相当于一年全球 GDP 的总值,对此中国区区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折合不足 10 万亿美元的股市和债市等金融市场怎能承受?如此庞大和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不通过生产环节便能将其盘剥的触角伸往世界各国、各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直至家庭直接攫取金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和金融产品的大发展,从本质上讲,只是为贫富两极分化提供便利的工具罢了。这是一场国家崛起的殊死搏斗,为什么我们的资本开放就不能晚一点,等到中国制造产业彻底崛起的时候再开放呢?

对于中国与外国的金融市场,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中国与外国目前不是出于一个平等的地位,这个地位是由巴塞尔协议造成的,对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国债的风险资产敞口是 0 而我们的国债是 20%,对于他们金融机构的次级债等的风险敞口是 20% 而我们的是 100%,对于发达国家以次级债为主的金融机构资金渠道次级债是可以计入次级资本的而我们不行,所以西方国家可以印钞而金融机构的杠杆可以几乎无限的放大,但我们国家的金融机构杠杆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而我们货币政策一旦放松则银行风险资产增加银行就不得不再融资,对于这样的不平等条约的状态不改变,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必然是死路一条,中国根本没有与外资平等竞争的机会,中国在开放资本管制需要的是与外国人讲好条件改变金融不平等地位,也就是要让中国加入经合组织(OECD)和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为前提的,没有这个前提就谈中国的外汇资本管制开放,让外资可以印钞和高金融杠杆的收购中国资产而中国的金融机构却被巴塞尔协议捆住手脚,这就将是如同鸦片战争后的情况,中国再一次打开国门让外国强盗公开掠夺。所以在西方没有承诺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加入经合组织的时间表、路径图之前,中国单方面承诺时间表和

路径图是非常过激和被动的。

所以看到这个报告,很让人联想起国际金融资本的需要,在刚刚墨西哥城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上,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还对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改革方面做出的努力表示肯定。他说,中国目前的经济政策确实起到了负责任以及稳定世界经济的作用。中国领导人访美不久,给美国做出一定的让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定要知道中国的底线在哪里?风险在哪里?过于激进的进行市场化的放开管制,就是被他国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需要有金融边疆的,历史上的强国不是依靠长城来防御的而是长期保持进攻,长城成为不了绝对的保险箱,但对于劣势的一方长城却是重要的安全保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绝对的实力保障之前,绝对不能自毁长城。不用依靠长城保卫国家是大势所趋,但是在群狼环伺的时候自毁长城是万万不能,当年西方列强为了打开中国的金融国门是进行了战争的!中国的门户洞开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怎样的巨大灾难,这历史并不久远,因此本人虽然认同中国的金融开放、中国的资本开放是大势所趋,但是以目前中国的国情在金融边疆上自毁长城的拔苗助长行为,是本人极力反对的,中国当前需要的是前门防狼后门拒虎,绝对没有到可以门户洞开的时刻。

为什么那么多赞成私有化的言论,除部分网特五毛外,大部分是对现有国企在管理、用人、灰色收入、腐败等不满,所以尽管私有化对他们没有好处,甚至长远来说还要利益受损,他们仍然强烈支持私有化,其实是发泄心中的怒气。米仓里面有老鼠和米仓是老鼠的,是两个概念!但是中国的一些人就是要利用老百姓对于米仓内老鼠的憎恨,拿出外来的可爱动人的米老鼠形象,推动所谓的私有化把米仓变成老鼠的!尤其是准备变成米老鼠的。现在西方遏制中国是迫不及待,西方是要你先改革有机会先搞死你,你倒下释放资源给他们渡过危机的机会。现在西方就是利用一切力量和西奴们在中国推动对于他们有益的共识,这些共识会把中国带入深渊的。如果仔细看一下私有化者的逻辑,实际上就是因为米仓有老鼠就要把米仓变成老鼠的,私有化得到巨大利益的必然是控制米仓的硕鼠们,对此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清醒认识。

第五部分
重构未来全球信用

导读:世界在负利率的模式下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世界了,以历史观念应对当今格局的刻舟求剑是行不通的,尤其是美元成为世界霸主,且不存在国际金本位的条件下,又建立了政府破产优先保护本国民众福利和民众个人资产不承担国家债务的规则以后,现在负债和破产的责任已经与几十年前的世界极大不同。而美国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就是定向宽松和维护美元霸权的政策,其力推的TPP(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计划正是美国为后危机时代重建全球信用体系预伏的一步杀招。中国未来需要的也是定向宽松、把宽松的利益留在国内而不是给外来热钱方便,是要配合人民币国际化的海外战略而不是被海外舆论所绑架。在金融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国家的货币政策要有信用元规则的意识,要有全球博弈的视野和全面系统的思维。

第十七章 解析美国 深入认识量化宽松

一、负利率下西方的国债腾挪

对于西方主要国家负债超标,我们总有很多人认为西方这样的局面是难以维持的,因为在二战前西方列强也是通过竞争性货币贬值激烈博弈的,并且最终导致世界的主导权从欧洲向美洲的转移,但是笔者经过分析认为西方在当今负利率的模式下,通过不断的负利率降低财务负担,当年英国等国衰落的历史未必会重演。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指出,历史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的20%用于债务本息支付时,该国货币必然出现恶性贬值,伴之恶性通胀;当达到40%的时候,整个"帝国"会崩溃。因此有人预测到2035年,美国的国债占GDP的比例将会达到200%,如果以现有的国债利率计算的话,美国的财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债务本息的比例将高达46%,这就是1939年英国面临的情况!大英帝国正是从那时开始走向衰落。因此有人进一步预测美国在2035年会信用破裂,美元体系大崩溃。

但是西方主流负利率政策使得政府的财政负担实际上是在相对降低的。我们以美国为例进行分析,美国的负利率政策导致美国现行的国债利息在大幅度降低。美国30年国债利率在过去近三十年中从1981年九月的最高的15%到08年12月的2.5%,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到2011年初长期利率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从前期高点3.7%回落至3.45%,处于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短期利率方面,美国2年期国债利率水平也出现回落,利率从0.85%一度回落至0.7%以下,不过整体回落幅度小于长期国债,美国10年期国债和2年期国债的利差也从历史高位的290bp下降至270bp,利率曲线的陡峭程度下降呈现出平坦化趋势。这样的低利率实际上就是美国国债达到了GDP的200%、而其债务成本也只有GDP的4%以内,难以超过财政收入的20%。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也是类似的。

现在的负利率政策恰恰是使得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很可能不会重蹈覆辙的主

要原因,因为美国国债的利率在持续降低,美国的财政收入却因为经济增长而增长,美国的国债利息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却是下降的。这是一个负利率逐步加剧的状态,随着美国高息的旧国债到期和低息的新国债发行,美国的国债利息负担将逐步降低而不是随着国债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美国甚至还可以通过类似08年危机一样进一步降低美国国债的利率,同时现在美国的国债与历史上不同的是全球化持有的程度越来越高,持有美国国债的世界其他主权机构的金融体系也严重依赖美元的信用,结果实际上就是美国印钞得利、而要以国债负担惩罚印钞却是难以完成,这样的破裂是全球的经济破裂。这就是美国人利用其对于信用元规则的深刻认识而推行的"金融恐怖平衡"的驾驭地球。

因此在当今本位货币破产、负利率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历史上以债券财务成本挤兑限制西方政府大规模增加负债得利的模式是难以生效的,西方各国均有增加负债的欲望,这也是负利率的吸金大法,对抗这样的吸金大法同样不能再按照以往的思路,对于这些负债的恶性增加,应对措施就是让一些国家的货币贬值同时提高劳动力和资源的价格,让该国的进口产品的成本大幅度增加,这样就可以把这些国家通过负债印钞输出的通胀再一次回输到他们国内,以他们国内的通胀和民生来挤兑其印钞。因此中国已经意识到升值与通胀的关系,央行副行长胡晓炼2011年4月发表文章称,抑制通胀是当前稳健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未来将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减缓输入型通胀压力。这是央行首次提出以汇率来应对通胀,这是在西方负利率下中国对于以往政策的重大反思。

综上所述我们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负利率给西方社会、经济、财政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变化,世界在负利率的模式下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世界了,以历史观念应对当今格局的刻舟求剑是行不通的,尤其是美元成为世界霸主,且不存在国际金本位的条件下,又建立了政府破产优先保护本国民众福利和民众个人资产不承担国家债务的规则以后,现在负债和破产的责任已经与几十年前的世界极大不同,就如刚刚希腊接受欧盟援助政府紧缩却引发民众大规模示威一样,中国怎样跟随、怎样利用世界的新规则是最重要的课题,最起码是不能被世界其他国家利用规则合法掠夺。中国有自己独立的思维和理论已经是当今中国崛起的瓶颈问题了。

二、美国暂停印钞为什么反而美元走弱

我们看到美国终止量化宽松QE2以后,也就是美国暂停印钞了以后,美元不是

走强反而是走弱了,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们也是需要深入分析的。

对于美元的不断走低,很多人都认为是美国印钞的结果,因此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只要美国终止了印钞,必然是美元出现走强的趋势。本次美国暂停印钞是盼望美元走强的投资者所深切期望的,而且暂停印钞也完全符合市场预期,因为美联储有决策权的委员们的态度在本次会议前的表态让市场已经很明确了,但是美元反而不断走低,美元的走势与利好的预期完全相反,对于这样的反常走势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其中必然的经济运行规律,那么让市场做出相反反应的原因何在呢?

弱势美元的结果与美国国债信用的潜在危机有关,美国量化宽松政策让美联储不断地以收购美元的方式印钞,如此操作的结果不仅仅是印钞,同时也是对于美国国债价值的一个担保,美联储收购美国国债,是对于美国国债价格的重大支撑,确保了美国国债的市场价值,如果美联储不再收购国债了,美国国债必然面临巨大的下跌压力,而持有美国国债的全球金融机构和主权基金必然的选择就是抛售国债,并且把抛售的国债取得的美元卖出而买入收益更高的金融产品,美元被大量卖出的结果必然是美元走低。

美国国债的下跌对于美国政府也造成了巨大压力,因此标普会下调美国政府的信用评级前景,而美国国债的低收益也是一个问题,美国新国债的收益率不断降低,降低了世界持有美元的吸引力;而美国国债利率的提高对于美国政府的财政负担是巨大的压力,美国的财政收入支付国债利息的比例会让美国经济崩溃。到2011 年初长期利率方面,美国 10 年期国债利率从前期高点 3.7% 回落至 3.45% ,处于 2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短期利率方面,美国 2 年期国债利率水平也出现回落,利率从 0.85% 一度回落至 0.7% 以下,不过整体回落幅度小于长期国债,美国 10 年期国债和 2 年期国债的利差也从历史高位的 290bp 下降至 270bp,利率曲线的陡峭程度下降呈现出平坦化趋势。

美联储在暂停印钞的同时也做出了保持低利率的政策承诺,这样的低利率导致美元与世界其他货币的利差,尤其是在欧盟已经加息的背景下,欧元的利息收益优势一定要反映到货币的强势上,因此美国停止印钞却没有加息,在其他经济体高利率的吸引下,并没有改变美元被不断卖出的境地,导致美元进一步的弱势。

因此对于货币的走势,不是简单的一个因素所能够决定的,在一个系统化的运行模式下,单一的利好经过系统性的博弈很可能会走向事物的反面,这也是非合作的纳什均衡博弈的基本原理。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货币市场,就是这样的一个各国、各金融实体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非合作博弈,全球金融体系这盘棋上很多人

是美元的囚徒,著名的囚徒博弈的现象会一再发生,因此我们对于某个政策所能够产生的后果,也是需要有一个系统性、博弈性的全面思考才可以。

三、美联储的扭曲操作是指鹿为马式的宽松

2011 年 9 月 21 日,美联储麾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宣布,维持 0 - 0.25% 的现行联邦基金利率不变,推出价值 4000 亿美元的扭曲操作。受此影响,隔夜美股三大股指均大跌 2% 以上。随后欧股深陷苦海,法德英三大股市的跌幅都超过 4.5%,银行、矿业和石油板块哀鸿遍野。美联储宣布的扭曲操作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失望情绪,联储有关经济前景的警告更让投资者忧心忡忡。

对于美联储这样的操作,有不少分析人士说这是美联储的一种变相的宽松,是 QE2.5,是为了 QE3 的推出做准备。在市场已经用脚投票以后,评论家们还可以把这样的政策说成是宽松的,显示了美联储操纵市场舆论的强势;这个政策实际分析来是一种带有紧缩性质的政策,而且是对于奥巴马的打击,却被说成是宽松,这是华尔街指鹿为马的强势舆论把持了世界。

量化宽松是一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以提高货币供应,创造出指定金额的货币,也被简化地形容为间接增印钞票。其操作是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入证券等,使银行在央行开设的结算户口内的资金增加,为银行体系注入新的流通性。所以量化宽松是有明确所指的,但是各种舆论却把所有的美联储政策现在都解读为量化宽松或者是变相量化宽松,背后舆论被控制的影子是明显的。

在雷曼兄弟于 2008 年 9 月倒闭后,美联储就赶忙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在随后的三个月中,美联储创造了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储备,主要是通过将储备贷给它们的附属机构,然后通过直接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自 2010 年 4 月份美国的经济数据开始令人失望,进入步履蹒跚的复苏以来,美联储一直受压于需要推出另一次的量化宽松,因此推出了 6000 亿美元规模的第二次量化宽松(QE2)。对此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上的前两次量化宽松是向市场注入了万亿以上的流动性,直到 2011 年 9 月份美国卖出 4000 亿,再买入 4000 亿,这一操作本身对于市场上美元的数量来说,是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但对于前面的 QE1 和 QE2 来说,是只交代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债权的处理方式,余下的以前量化宽松所购买的债券到期之后不再买的话,那这些到期的债券所对应的美元是要从市场上回收的,这样流入市场的美元净数

量要减少,这实际上已经就是紧缩了。

对于扭曲操作的关键是要看扭曲操作的资金数量与前面量化宽松的数量和美联储持有的债券数量和美联储的资产规模,这次的“卖短买长”只涉及了以前宽松购买债券其中的四千亿,相对于美联储近3万亿的资产规模和前两次量化宽松还有2万亿以上的缺口,现在美联储的政策于其他的那些到期债券该怎么处理,都没有交代。因此相对来说,它是一个偏紧缩的政策,而如果是搞了14000亿,那么还可以说是一个宽松的政策,在这里操作的数量对于政策的松紧是有质变性质的影响的。

大家可以注意到,4000亿买入的扭曲操作,美联储解释说是为了压低长期利率促进经济发展,实际上美国的长期国债利率已经处于了历史的低点,由于风险的存在美国的信用卡利率已经到达了历史高点,经济社会真实的商业利率与美联储利率和国债利率已经脱节,美联储的行动背后不是为了压低长期利率。而且长期利率对于这个短时间内的经济危机来讲,并没有什么好处,短时间内更应关注的是短期利率。那么这“卖短买长”更主要的目的是政治的博弈,它实际上是给了奥巴马“一耳光”。

有消息说,共和党的国会领导人集体给伯南克在会议前写了信,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所没有的,信的内容没有完全公开。不过这个4000亿正好是奥巴马公布了4000亿美金所谓的就业促进计划之后,数额也基本对应,巧合之外难道就没有什么必然吗?美国当初在2011年8月2号的时候不能提高债务上限就要违约了,美国政府的财政预算是没钱的,这笔钱就一定要靠卖新的国家债券来筹措。这个计划是短期计划,美国政府对此也要发行短期国债是可以预期的事情,现在美联储也在卖短期债券,也就是说,在美国政府要发行短期债券的时候,美联储在抛售短期债券抬高债券收益率,美国政府不得不为发行的债券支付更多的利息,这给了奥巴马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朝野两党的政治博弈,也可以看到美国资本也需要更高的收益而不是雷锋式的支持政府。

各路资金回流美国促使美元大涨,追踪美元兑其他6种主要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从周三尾盘的77.089点上升至78.501点,盘中最高上涨至78.798点,创自1月18日以来新高。分析师指出,避险资金正在流入美元、美国国债与德国国债市场。美联储这样带有紧缩政策的扭曲操作,美国的QE3不推出,是对于美元指数的有力支持,所以市场会有这样的反应。

在美联储扭曲操作出台的同时,评级机构给美国银行下调评级,也是因为美联储采取了这种相对紧缩的政策,紧缩给美国的银行业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而对

于欧洲就更加雪上加霜,刚刚因为欧洲银行美元融资的压力,西方五国央行联合向欧洲货币市场注入美元流动性,在美元注入以后美联储的紧缩政策导致美元指数的上涨,这笔流动性的注入就立即带来了汇率损益,流动性不足的一方必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因此现在美国的适度紧缩提高实际资本收益率是符合美国资本家的长期利益需要的,美国不宽松的背后,是其他欧洲国家需要过更紧的日子,同时还要给美国输送利益,美国主导舆论的指鹿为马,背后是维护美国金融道德制高点和其他国家需要美国 QE3 的预期进行画饼充饥,世界的舆论从来也是为了利益服务的,只不过是忽悠的水平更高级而已。

四、量化宽松谁埋单

当今世界看似走出金融危机,实际上危机是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见到的就是美国的负债严重超标,不得不依靠提高负债的上限才能够维持不违约的状态,而欧洲则是债务危机此起彼伏,已经朝向意大利这样的传统欧洲强国蔓延,而对于日本则是负债早已高企,又祸不单行地赶上了地震和核污染,世界传统的强国都在债务压力中风雨飘摇中。

在世界主要强国都负债超标的情况下,世界如果是通缩的,那么就是这些国家给所有的债权人当奴隶,这样的情况就好比黄世仁要伺候杨白劳,即使是债权人只要你没有足够的武力,也只能忍受债务人不断赖账,这样的赖账就是不断通胀、不断印钞把庞氏骗局不断地进行下去。这样不断印钞的过程就是向其他国家不断的输入通胀,在通胀周期当中谁先持有货币去购买没有通胀的产品,谁就有了减免通胀的能力,因为你买到的产品是涨价前的价格,这样的印钞就是印钞者最先拿到货币然后到全球购买未涨价的产品,然后把货币流动性留在其他国家;中国的外汇储备这一年来上涨了很多,西方印钞流入巨大。

为应对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美联储于 2008 年 10 月启动了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第一轮购买 1.7 万亿美元政府债券和抵押债券的量化宽松措施于 2010 年 3 月份结束之后,美联储 2010 年 11 月再度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半年内向市场投放 6000 亿美元购买国债。另依据央行的公开数据,到 2011 年 6 月美国的第二轮量化宽松结束时中国外汇储备 31974.91 亿美元,而美国宣布实施 QE2 前的 2010 年 9 月中国的外汇储备为 26483.03 亿美元,中国流入了约 5500 亿美元的流动性;在 08

年10月启动第一轮量化宽松时期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8796亿美元,到2010年3月第一轮量化宽松结束时4月份中国的外汇储备是24905.12亿美元,中国流入了6100亿美元的流动性,这仅仅是中国内地流入的流动性,如果计算了大中华圈就更多,现在大中华圈的外汇储备有7万亿美元,实际上美国等国量化宽松所印钞的货币总量,基本都流入了中国以及相关的经济实体,美国保持其通胀压力不大的背后,是这些货币流入了其他国家,而其他国家为此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

在这里我们就要体会出其量化宽松的"量化"二字背后的含义,其数量是非常精准控制的,是能够向他国输出多少流动性、就量化地释放多少流动性的。2011年7月13日统计局的报告出炉,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0445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6%;美联储主席伯南克13日在美国国会就上半年货币政策及经济报告作证时表示,如果美国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美联储已经做好准备出台更多经济刺激措施,其中包括继续收购国债。这是美联储首次就新一轮"量化宽松"的可能性做出明确表态。中国刚刚公布GDP上半年增长9.6%的良好态势,美国的美联储主席当晚就说QE3可能实行,这背后就是中国的经济好转又有了被量化宽松输入流动性的可能。

中国央行连续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使得中国的利率高涨、实业发展要承担比美国等国家高得多的利率。西方的利率接近零而中国的银行利率已经是6%以上,社会利率更高达60%以上,中国实际上是在为西方的宽松政策埋单,这实际上就是建立了一种模式,那就是只要中国能够紧缩,美国就能够宽松,我们紧缩出来的空间将被美国宽松出来的货币填补,而这样的填补过程中还要造成流动性的不均衡,也就是中国的紧缩是面对全社会、而从美国外来的流动性掌握在国际资本手中,这样的不均衡还要造成渔利,也就是资金每过手一次都是要挣钱的,你缺钱要从我这里得到钱是要负利息或者贱卖的。这利息和贱卖也就是中国企业的高利贷枷锁和中外价格的倒挂来源。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的就是中国的防通胀和紧缩,在世界金融市场一体化和全球化的今天,流动性是如同流水一样的到处流动的,哪里低洼就要流向哪里,你搞壁垒筑坝还要被WTO等国际规则限制,这样你的紧缩和防通胀实际上就是在对于全球的防通胀,你是否有这个能力值得深思。

不仅仅美国量化宽松的预期强烈,欧元区领导人2011年7月21日就希腊新一轮救助方案达成一致,同意再为希腊提供1090亿欧元的贷款。此外未来为希腊提供的贷款的还款期限将从现在的7年半延长到最少15年,最多30年。同时新贷款的利率也将由目前的4.5%降低到3.5%左右。对于垃圾进行补贴和降息,是欧洲

版的量化宽松,中国成为他们输入货币的焦点,为此他们还要求人民币升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度向中国施压。我们可以看到要求人民币升值是在西方唱空中国、说中国金融体系和地方债风险和汇丰 PMI 创造 28 月新低是同一天发生的,中国走空、金融风险和 PMI 降低本来都是货币贬值的重要理由,这说明西方要求人民币升值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使得热钱等泛滥的流动性有了流入中国的理由。

这样的机制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国可以一再地量化宽松,直到中国倒下,如果等到美国不断量化宽松导致中国难以为继的时候,也就是到了中国不得不倒下的时候,必然是中国经济的灾难和崛起大业的中断。中国对于这样的一个不断反馈印钞的循环,是必须要着眼打破的,中国的准备金已经屡创新高,企业的利息如果计算了社会融资成本早已经超过 10% 达到了高利贷的水平,而我们此时如果放弃紧缩政策,原来关进牢笼的流动性就要猛虎下山了,通胀一定会出现报复性反弹,这个过程中国政府如果失控就是政局的不稳,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了。

认清谁在为量化宽松埋单是比量化宽松是否推出更重要的问题,驾驭信用元规则的人从量化宽松中得利,为信用元规则所奴役的人为量化宽松埋单。中国为西方量化宽松的印钞埋单,总要有买不起的那一天,到时候就是中国崛起大业的彻底失败。中国当前的问题是通胀虽然重要,但是国际比国内重要,受控比失控要重要,也就是政治比经济重要,稳定比发展重要。中国最需要的是政局的稳定而不是经济暂时的发展,必要时刻可以牺牲发展保障政权稳定。在美国不断量化宽松的压力下,需要比通胀更关注失控的风险,如果美国量化宽松不断输入中国这样的循环模式不被打破,中国有多少经济资源能够经得住这样水流不断式的失血?失控将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我们应当以受控的方式让经济减速着陆,打破这样的流动性输入循环,使得在中国渔利的外来资本流出去减少中国过剩的流动性,使得这样的流动性回流美国,让美国无法不付出严重通胀代价进行所谓的宽松印钞,才是博弈世界的根本。

五、美评级下调后不会再推出量化宽松

美国评级被下调,这是百年来美国第一次失去最高的债券评级,在上世纪的 1929 ~ 1933 年的世界性危机中美国也没有失去这个最高的评级,这个主权评级的下调的背后,主流声音都认为这是美国在为新一轮量化宽松进行准备工作,世界股

市大跌似乎也使得推出新量化宽松政策的理由更加充分,这些呼声代表了世界很多人的期望,量化宽松是会让很多人得利的,但是美国政策是要服务于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这些鼓噪者的利益,综合各种信息进行分析,著者认为第三轮量化宽松反而不会推出了。

美国的QE3(第三轮量化宽松)就是印钞,评级机构对于美国的降级表明资本不愿意政府印钞,央行购买国债是西方主要印钞方式,而国债的低利率和货币贬值也是美国资本的损失,降级以后利率上升是美国资本得利和限制政府印钞,评级背后的主导力量是美国资本。

对于世界的局势,著者认为货币政策是国家权力和资本权力博弈的过程,以债券抵押发行货币的方式,背后是国家享有货币贬值、负利率的债券缩水,而资本是以低成本印钞得到更高的债券利息,这样的一个博弈过程也是贯穿世界政治的,是美国政府主导、还是美联储和评级机构主导,这也要有一个竞争的过程。不要简单地看到标普是一家英国机构,世界的金融资本早已融合成为一家,尤其是英美关系更加紧密,在此时英国人的机构出面比美国本国机构要方便,下调评级对于政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易被美国的政治贵族们报复,评级下调应当是与量化宽松等一协调致的资本行动。

首先我们看到,美国评级被下调美国国债反而创造了新高,2011年9月15~25年期的美国国债期货合约飙升至141~06的高位。30年期国债涨3 21/32,收益率报3.375%,为2009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这反常现象的背后是:美国银行破产还优先保护小债权人,因此对于大资金在银行可能破产的情况下,持有美国国债反而变得比银行存款更安全,美国的现金如果不存在银行,则要有现钞和现汇3%的差价,大资金也无法拿着纸币现钞,美国信用比欧日等西方诸国还是安全优质的,因此就造成美国国债反而上涨的局面。美债上涨造成美债的收益率比以前降低,量化宽松给美联储所带来的收益也是下降的,这本身也降低了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的动力。

其次美国量化宽松的前提是面临通缩压力而不是通胀风险,宽松出来的货币可以输出,QE3后如果美元不能外流到世界,必然是美国自己通胀,所谓的“量化”是看可以输出多少再量化多少的。例如美联储2010年11月QE2投放6000亿美元到2011年6月结束时中国外汇储备31974.91亿美元,而QE2前的2010年9月中国的外汇储备为26483.03亿美元,中国流入了约5500亿美元的流动性,因此能够输出多少才会量化多少。现在世界危机风险加大,资金回美国避险,量化宽松后印

出来的钞票是难以输出的。美国当初提出量化宽松的背景是美国陷入通缩的风险,当年通缩的背后就是其国内的美元大量外流,而美国现在却进入了通胀,美国的 CPI 同比增长已经达到了 3.6%,超过 3% 的通胀警戒线,而今年 7 月的最新数据表明美国的 CPI 环比增加 0.5%,有加快的趋势。

不要看现在大宗商品在降价,世界一样是可以进入涨价通道的。不仅是中国的猪肉涨价,世界的农产品也在涨价通道之中,世界的 CPI 提高导致的通胀会让商业利率走高,如果世界进入了正利率的模式,那么你宽松得越多,利率就要越高,资金就要越疯狂,通胀反而越厉害,利率上升导致销售渠道的财务费用等上升,最终的价格照样可以是通胀,就如中国菜价上涨不断,但田里的菜却不断降价、菜农因为卖不出菜自杀。危机造成的资金风险会让利率成为高利贷,这种时候进行量化宽松无异于自杀。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源的特殊性,美国主动倒下压倒世界,美国降级是自己主动的调整,当初放任雷曼兄弟破产是主动刺破危机,现在降级也是一样,原因就是石油等资源价格的高涨后供给曲线出现了后弯,价格上涨反而供应量下降,在抛售 6000 万桶石油未能见效以后,评级机构主动捅破了泡沫。石油后弯曲线出现以后,如果还是量化宽松,结果必然是石油等价格的暴涨,不但让石油等资源国家的得利超过美国,也使得资源的供给曲线更加弯曲,进而造成美国的通胀和市场崩溃。QE3 使得资源国家更加抓紧资源而不是多卖资源换取美元,如前述的资源供给曲线出现后弯,资源供给量随价格而减少,必然导致全球资源市场供需均衡点无法形成而崩溃,美国是严重依赖世界资源供给而生存的国家,资源市场崩溃就是美国经济的崩溃。

美联储在美国主权信用遭降级后宣称将维持零利率政策到 2013 年不变,但是决定美国商业利率的不仅仅是美联储的利率,美联储的利率是银行间的拆借利率,而国债利率和信用等级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参考因素,由于降级风险增加,美国国债利率是要攀升的,尤其是降级的连锁反应使得其他债券的评级无法高于国债而被进一步降级,其他债券的利率会攀升,商业实际利率会攀升,就如危机后的信用卡利率攀升到 10% 以上,这会让利率掉期衍生品崩盘,而 2008 年的危机是信用掉期衍生品崩盘,利率掉期比 2008 年的信用掉期规模更大。因此对于衍生品的压力是巨大的。利率攀升实际上是在金融体系内发生的悄然变化,原来量化宽松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金融体系内的流动性淤积,这些流动性在低利率高风险的背景下成了超额准备金,对此变化必须加以关注。

所以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法定的存款准备金之外,美联储有约8000亿美元的超额准备金,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联储实行给超额准备金付息的制度,导致美国银行业将富余的资金以超额准备金的形式自愿存储于美联储,这与我们的银行缴纳存款准备金都非常紧张不情愿是极大不同的。而这些超额存款准备金在美联储的存在,也是美联储进行量化宽松的动力,因为购买国债的利息是要高于美联储给这些资金付息的,美联储的盈利虽然受到法律限制,但是亏损的话资本家是不干的,赚钱是最起码的要求,这样的交易使得美联储利润丰厚,美联储的财务报告显示2010年美联储向美国财政部上缴了793亿美元利润,比2009年增长67%,盈利主要来自于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增长而买入的抵押贷款债券的利润增长。而美国实行QE2的时候恰恰是流动性淤积金融系统内,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从危机前的几十亿美元上涨到万亿美元左右,因此量化宽松能够盈利和有超额准备金的资金来源也是是否继续量化宽松非常重要的方面。

美联储这些超额准备金的利率目前是0.25%,而美国一年期的国债利率是0.66~0.68%,如果美联储承诺2年利率不变,那么银行在准备金账户的存款和国债之间的利率差是完全可以套利的,这样的套利会让原来存储于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从美联储撤离进入到金融流通领域成为新的流动性,而银行的商业利率增加和衍生品的资金压力也会让这些资金撤离,如果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几十亿美元的水平,也就是超额准备金基本上全部撤离,这8000亿美元的超额准备金与美国的7万亿美元的广义货币M2相比,相当于存款准备金率下降了11%以上,我们现在央行上调准备金0.5%给市场的压力都很大,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进入市场,给市场的影响可想而知,这8000亿美元经过金融衍生放大作用会增加货币乘数,给社会所带来的货币数量是惊人的,以我国的货币乘数为基础估算,是要有近3万亿美元的货币增加量的,因此评级下调造成美国实际存款准备金率的巨幅下降,带来货币衍生和货币乘数变化的乘除法,永远是比单纯的QE3所带来的货币增量的加减法对于金融市场的货币数量贡献大得多。这些流动性的释放不但可以满足美国继续发行国债和不断扩大债务上限的需要,也使得美元进一步贬值,通过贬值让美国的巨额国债不断缩水,因此现在美国评级下调所带来的市场变化,起到了比QE3更好的经济和金融的效果,以这一视角观察,美国QE3的推出是多余的。

美国维持零利率的政策,是受到了巨大挑战的,其所受到的反对也是多年来罕见的,很多人把这个政策理解为评级下调股市暴跌导致的。对此美联储委员的表

态是耐人寻味的。费城联储行长是普罗索(Charles Plosser)在接受彭博广播采访时表示,伯南克表示接近零的基准利率至少将维持到2013年中的表态,是“在不恰当的时候推出了一项不恰当的政策”。达拉斯联储行长费舍尔(Richard Fisher)指出,央行不应该推行保护股市投资者的政策。两名美联储理事称,美联储在未来两年时间里将基准利率维持在接近于零的承诺可能会带来有关该行旨在提振股市的误解,也就是发出一个亲股市的信号,这是他们反对这一措辞的原因所在。所以美联储的维持利率不变根本不是为了救股市,而是在QE2时就提到的要将金融系统内淤积的流动性释放到市场上来。因此美国的8000亿超额准备金进入金融市场,应当看作前面量化宽松效果的释放,而不是一个新的变相量化宽松。

美国自己的主动调整的目的除了对付资源国家以外,还是对于欧洲的巨大打击。例如2011年8月10日AAA级的法国国债的信用违约掉期(CDS)飙升至161.7创新高,相反AA级的美国国债CDS只有52.9。美国倒下会造成经济二次探底,但是探底的调整以后美国反而是赢家。美国不进行QE3的结果,是欧洲等国更无法进行宽松,进而挤暴欧元。

据德意志银行估计,若希腊债务重组导致25%的国债价值缩水,欧洲央行的直接损失额度将达到其目前全部资本金的近一半。此外,如信用违约扩散到西班牙和意大利,那么违约的主权债务规模将再度增加超过1万亿欧元,并殃及德国法国等欧元区核心国家,对虚拟经济带来的冲击可能会更甚。据ISDA的估计,欧洲基础金融市场规模和衍生市场规模的比例在1:10至1:25之间。政府主权债务被广泛用于构建各种信用衍生品,因此债务违约带来的负面效应很可能由衍生品市场成几何倍数的扩大。

欧盟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虽然有统一的央行和统一的货币,但是没有统一的财政部,也没有美联储那样巨额的超额准备金可以释放到市场,因此在竞争性贬值的时候欧元是没有美国这样释放流动性的机会的,美国评级已经下调、同时美国拒绝简单印钞的话,如果欧洲因为债务问题而采取宽松政策直接印钞,不但融资成本要增加很多,评级也会立即下调,美国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已经堵死了欧元印钞的道路,在世界竞争性贬值的过程当中占据先机;欧元不能贬值就是欧洲债务不能通过贬值而缩水,下面就将是欧洲债务危机的深化了,所以我们看到不断有美国即将推出QE3的言论,实际上是给欧洲风雨飘摇的市场注入一些强心剂,现在世界都盼望美国的QE3,这反而更会让美国的QE3离世界远去,因为世界的竞争是丛林法则,在2008年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下行通道,比拼的已经不是经济上行时谁发展得更

好、而是谁摔得轻,谁比对手过得好以及谁能够让对手先倒下的问题了。

在世界金融紧张的时候,美元作为世界主要结算货币的优势开始显现,同时美国监管机构已开始审查欧洲最大型的贷款银行,美方担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将导致欧洲银行业融资困难。据2011年8月20日的《华尔街日报》报道,美联储与美国监管机构已加紧监督美国针对欧洲大型银行的补贴,以评估金融压力增大时这些银行的下属机构能否承受。官方担心欧元区债务危机有可能会伤害这些银行偿还贷款、及美国规定的其他要求的能力。美国对于欧洲的严查表明美国不是在放松美元在世界的流动性,反而是在收紧世界美元的流动性。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世界经济和能源危机下,美国把利率提高到20%以上应对危机,现在金本位破裂美联储实行近似零利率,但是实际的商业利率是高企的,美国的信用卡利率已经创造新高,尤其是美国的信用卡违约利率已经达到30%以上,美国下一步的行为是有收紧海外流动性的意图的,美国是使得淤积在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等流动性释放的同时再在全球收紧流动性,这样实际上是美国实行了内外有别的货币政策,是外紧内松的定向宽松政策,而不是流动性输出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国的评级下调本身也是一种紧缩的政策效果而不是宽松的政策效果,这是很容易认识到的。

对于中国的政策,美国刚刚开始量化宽松的时候,中国是不能够紧缩的,这样的紧缩是给他们的宽松提供了空间,现在这些热钱资本实际上已经进来了,使得我们的外汇储备增加到32000亿美元!所以现在情况不同了,美国在查欧洲的美元贷款,外国的银行股暴跌,这些进入中国的热钱现在要回流本国救市,此时中国万万不可宽松,要继续紧缩让热钱割肉到地板上,反而中国的老百姓被套牢也可以死抱着不割肉,而外来资本是必须割肉的,因为他们海外银行的资金链断了,欧洲2011年下半年利率掉期合约的暴涨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希腊的债务延期让多少欧洲银行本来应当收到的资金变成了未来时?欧洲其他国家的债务也突现这样的延期风险,导致欧洲银行的银根异常紧张,这才是去年年末欧洲股市银行股暴跌的元凶。现在各种中国股市到底的言论实际上是要让中国的社会资金冲进场,只有这样海外资金才能够撤场回去救市。

所以时移世易啊,对于欧洲资金的紧张,美联储这时候可能会成为欧洲的拯救者、施恩似的实施QE3吗?美国虽然嘴上不说,实际上是巴不得让威胁美国地位的欧元解体的。对于中国而言,显然理想上希望欧元能够挺住、继续存在下去对抗美元。在中国崛起的情况下,美欧和亚洲同时发达、三足鼎立看似是一个美好的政治格局,但是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中国崛起的10亿人口数量是与世界现在的发达人

口数量相当的，这必然是一次全球资源再分配的过程。当年的日本发达和亚洲小龙的腾飞都是没有这样的再分配需求的，如果中国能够在本轮危机的调整当中突破当前的资源瓶颈，必然是要有其他经济实体深度调整、释放资源，想着三足鼎立集体不败是不现实的，中国保住改革开放的果实和保障民生才是最关键的。

美联储不推出 QE3 不代表美联储不会以 QE3 的大棒来引导市场预期，以此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伯南克在 2010 年的全球央行年会上暗示将实行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引发此后股市狂飙突进，结果是 QE2 真的推出了中国的股市也开始调整了，美国使用这个大棒的效果是很好的。2011 年 8 月份标普下调了美国的评级，实际上是抢了美联储的话语权，引发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对于标普的调查，调查标普是否有消息提前泄露的问题，而以前对于美联储的各种暗箱决策，实际上也是有很多人可以提前知道的，起码是美联储的股东们可以合法知道，而现在是被标普的股东们合法获知了，也就是英国人占了先机，美联储需要争夺话语权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此后美联储对于 QE3 的各种暧昧的表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所以美国下调评级实际上已经替代了 QE3，世界危机后欧日经济比美国更差使得美元回流美国，美国的国债发行正好是从市场回收富裕的流动性，如果此时再进行 QE3 则非常可能导致美国国内的通胀，因此评级下调如果能够取得美元回流的效果，QE3 已经没有必要。

实际上美国主动调整的策略，恰恰能够使得他的通胀得到控制，并且在危机中得利，这个利益要相对地看而不是绝对地看，只要竞争对手相对获利少就是得利。降级比 QE3 在全球金融博弈中更能够给美国带来利益，美国不进行宽松的背后是欧日等国家更无法宽松，会让他们的债务危机发酵。所以，假设没有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按照当今形势发展，美国的 QE3 是不会推出的，而即使是不推出 QE3 和大宗商品降价，但是由于美国评级下调所造成的利率上扬，商品中的财务成本增加，世界依然处于通胀的巨大危险之中。

六、美联储还有什么武器威力超过 QE3

美联储不施行 QE3 的背后，实际上是美联储手中还有比 QE3 更有威力的调控工具，这个工具就是取消对于超额准备金的付息政策。商业银行上缴央行的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本来是不付息的，但是在 08 年金融危机中，美国的货币实际上处于严重泛滥的威胁之中，美国国会于 2008 年 12 月授权给美联储的新工具——“超额

准备金利率",最初的利率计划1.25%,到目前该利率为0.25%,这个利率使得有大量超额准备金存储于美联储,这是西方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因此美联储如果使得淤积在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等流动性释放出来,同时使得欧洲难以宽松,客观上就是再在全球收紧流动性的,这样实际上是美国实行了对内对外不同的货币政策,是外紧内松的定向宽松政策、而不是流动性输出的量化宽松政策。

准备金付息政策的出台导致负债方的"准备金存款"快速增加。自2008年9月份开始,原来构成负债方主体的"流通中货币"占比迅速下降,2010年1月底下降到40%左右。而存款机构的准备金存款占总负债比重相应上升,2010年1月底上升到57%左右,危机前2007年6月,准备金总量160亿美元,而2009年9月准备金总量高达8480亿美元,扩张53倍,其中超额准备金高达8220亿美元。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膨胀创纪录。2010年1月13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升至2.274万亿美元。其中,金融机构存放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亦从2007年初的22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11月份的1.16万亿美元。

现在如果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从8000亿以上恢复到08年金融危机前几十亿美元的水平,这8000亿美元的超额准备金与美国的8万亿美元的广义货币M2相比,相当于存款准备金率下降了10%左右。这样的宽松效果是远远超过QE3的,对于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而言,"量化"Quantitative是重要的限定,而准备金利率下调导致的超额准备金流入市场,对于市场的影响是远远要超过QE的影响的。

美联储如果取消超额准备金利率,那么这些超额的准备金就要进入市场来购买国债了,资金是要在国债和美联储的准备金利息之间进行选择的。2011年8月10日美国2年期国债收益率0.169%,10年期国债收益率2.153%,随后10年期国债跌破了2%。根据专业机构统计,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周四盘中最低跌至1.98%,成为自1950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有记录显示,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只有在二战和大萧条时期曾跌破过2%。而就在不久以前,2011年4月1日,2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触及0.893% 创2010年5月28日以来最高

美国国债从较高位置到跌破准备金存款利率这样的表现,已经充分说明了市场对于准备金利率取消的判断,市场资金愿意买收益率更低且刚刚被降低国家评级的国债,原因就是国债预期的收益率和安全性要高于在美联储的现金,能够产生这样预期的背后就是美联储会取消超额准备金利率,对于这一点西方机构的操盘手是只做不说的。

美联储的两轮"量化宽松"共投放2.3万多亿美元,而美国国内却是通缩和低

通胀,这里我们不能忽视在08年危机开始初期美联储以给超额准备金付息的方式来收走了社会富裕流动性,对于危机发生后泛滥的流动性美联储是在降息的同时客观上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以高点的1.16万亿美元计算,相对于当时美国7万亿美元左右的包含存款的广义货币M2而言,这提高了准备金率17%,美联储瞬间上调了准备金、降低了利率的,而美联储在危机后这样的快速收紧流动性,必然造成社会流动性的不均衡,对于不同领域的流动性紧缺,显然是需要有资金宽松作为补偿的,因此美国的量化宽松就出台了。对于美国的量化宽松要更全面的理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美国施行QE以来美国的货币量M1、M2没有巨大的变化,M2在08年8月底是7.772万亿美元而2011年4月是8.69万亿美元,增加的数量远远小于美联储的QE数量,背后就是超额准备金的增长降低了货币乘数和货币总量。现在美联储取消或者降低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让超额准备金从美联储出来,就不能简单的称作变种的量化宽松,其中的目的和方向是完全不同的。

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美联储现在最大的王牌就是把当初其给准备金付息政策收紧在美联储的巨额超额准备金放出笼,这些资金进入市场再经过市场金融衍生和货币乘数放大以后的乘除法,远远会比QE的加减法释放更多的流动性,美联储释放超额准备金的威力是远远超过QE3的,美联储不是没有牌可以打,只不过是连续打QE牌效力衰减了,但是美联储真正的王牌实际上还没有打出来。

七、量化宽松是定向宽松和维护美元霸权

美国实行了两轮量化宽松,购买了上万亿美元的债券,很多人把这个量化宽松看作是美元印钞,但是却随着西方主流舆论一起,被忽略了其中更关键的因素,那就是美国的印钞里面是有巨大的利益输送的,印钞只不过是第一步,关键的第二步是发钞,这个钞票发送给了谁才是核心问题。

对这个问题,虽然迫于美国国会和法庭的压力,美联储已经向公众提供了更多的透明度,但该行在2007年~2010年之间实行的货币互换计划仍旧处于高度保密的状态,以至于就连美联储都可能对借款人的身份信息不知情。换而言之,也就是美联储并不知晓这些应急贷款的最终去向。这真的是不知道吗?这个“不知道”更像一个掩耳盗铃的说法,美联储的量化宽松中的“怎样宽松”更是一个秘密。

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就是购买数千亿美元的国债,这样的规模从二级市场上购买根本是流动性不足的,是要大宗交易的,这就要有故事了,你到底是买谁的债券,

到底是买了什么债券？你买谁的债券就是印钞给谁,买哪一类的债券则是印钞支持债券的发行者,这是一个定向的行为,这肯定存在巨大的利益输送,按照西方的价值理论和我们的社会常识,钱每过手一次都是要赚钱的,谁先拿到钱肯定是谁得利的,在这一点上恰恰是美联储不透明的地方,这些被购买的债券是美联储定向发行钞票的结果,而且这定向是保密的,并且是被刻意忽略的。美联储是私人银行,这些在西方的司法制度下变成了商业秘密和隐私了,按照西方国家的宪法,私人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很多时候是监管权力受限的,国家都受限,公众和媒体就更不要说了。而中国的央行是国有的,有什么行为都要监督和公开,在这里竟争存在制度性的差距。

美联储定向货币操作的原则是维护美国利益和美元霸权,原来美国印钞是为了支持美国国债等债券价格、同时给美国的金融机构足够的资金流动性支持,流动性的充裕来维护西方金融市场不在危机后进一步崩盘,但是随后的资源暴涨使得美国肯定不会再度推出量化宽松来让资源国家取得暴利,美国不量化宽松则世界上其他国家就更难以印钞了,欧日的量化宽松就要付出通胀的代价。但是如果欧洲出现危机,这个危机深化到一定程度,美元一定会通过某种宽松的方式抢占欧元的地盘的,就如前面多国央行联合释放美元流动性给欧洲一样,我们要在这里注意的是欧盟已经统一了货币,为什么不是释放欧元流动性呢？这就是问题的要害所在,是美元宽松挤占欧洲市场,为了促使欧元继续衰落,美国还会释放流动性进一步挤占欧洲市场,但是美国这样的量化宽松的目的与前两次的量化宽松的目标是根本不同的,前两次是定向宽松、给自己的利益集团输送利益,如果下一步还有宽松,则是挤占欧元的市场。

综上所述,美国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就是定向宽松和维护美元的霸权,对于其真实的目的我们应当看到本质,中国未来需要的也是定向宽松把宽松的利益留在国内而不是给外来热钱方便,是要配合人民币国际化的海外战略而不是被海外舆论所绑架。在金融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国家的货币政策要有全球博弈的视野和全面系统的思维。

第十八章　TPP 未来的资源版图和信用体系

一、TPP 衔枚疾进 APEC 或临拐点

从 1991 年中国正式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起，至 2011 年已是中国加入 APEC 20 年。在这 20 年间，APEC 成为中国与亚太地区其他经济体开展互利合作、开展多边外交、展示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舞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区域合作研究室主任王玉主曾经在华社采访时表示，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面临复杂国际环境的情况下，加入这一组织为中国打开了与外界沟通对话的渠道，这对中国随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APEC 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成立的，其宗旨是坚持开放性多边贸易体制和减少区域内贸易壁垒，以使这个地区的成员能够相互依存，共同受益。如今，这个拥有 21 个成员的多边机制已成为亚太地区机制最完善、层级最高、影响最大的经济合作组织。

然而，在 2011 年 11 月的 APEC 会议上，美国等国高调推出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 TPP）计划，奥巴马总统亲自拍马上阵，在会议期间强力推销，日本、加拿大、墨西哥、菲律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 5 国宣布拟加入谈判，中国则未获邀请。

一时间，美国用 TPP 架空 APEC，从而以达到主要制衡中国目的的分析与评论蜂拥而起。仔细分析，如 TPP 能够在美国的强力主导下被顺利推行的话，那么诞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的 APEC 也许在鲜花和掌声中走过 20 多个年头后，迎来它的拐点。

TPP 是美国布局未来资源版图的重要战略步骤。面对美国的强力攻势，中国不可不谨慎分析，切实以对。

二、美国的新合纵连横

从历史沿革上，TPP可以说是脱胎于APEC，它最早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等四国发起，从2002年开始酝酿的一组多边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原名亚太自由贸易区，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

本来这个由四个地区小国发起组织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在各种自贸条约满天飞的全球化时代，几乎注定是只能出现在各种财经媒体不起眼的角落里的，但是在2008年以后，事情起了变化。当年2月，美国正式宣布加入TPP，地球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加入使得原来小国创立的小组织TPP立即影响力大增，并且成为美国主导的地区性组织，并于同年3月、6月和9月就金融服务和投资议题举行了3轮谈判，这标志着TPP协议正式进入准备实施阶段。

2009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参与TPP谈判，并邀请澳大利亚、秘鲁等一同加入谈判。2009年11月，美国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澳大利亚和秘鲁同意加入。美国借助TPP的已有协议，开始推行自己的贸易议题，全方位主导TPP谈判。自此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开始进入发展壮大阶段。2010年，马来西亚和越南也成为TPP谈判成员，使TPP成员数量扩大到9个。

如果TPP的扩张脚步仅止于此的话，人们还可以认为这不过是美国人的独角戏，对世界经济的大格局还不至于造成太猛烈的冲击。然而2011年11月在檀香山召开的APEC领导人峰会上，TPP变成了美国人重炮轰击现有世界经济秩序的重磅炸弹。会议上美国力邀日本和韩国加入TPP，中国则“出人意料”地未获邀请。

11月13日上午，日本横滨召开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宣布日本将与有关国家开始协商谈判“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据日本《朝日新闻》11月14日报道，韩国总统李明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韩国也在考虑之中。李明博表示：“（加入TPP）虽然会有相对的效益，但目前还不很清楚是否会有实际效益。”

继日本之后，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宣布加入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使参与这项协定谈商工作的经济体增至12个。加拿大总理哈珀表示，加拿大是在奥巴马的鼓励下参与的，“我们看了协定的条文，加拿大可以轻易地符合有关的要求，所以，我们有兴趣参与。”墨西哥经济部长费拉里同样表示“有兴趣”，并认为协定为墨

西哥提供了推动经济成长的机会。

美国贸易代表柯克对此评论道,日本、加拿大与墨西哥的加入说明了协定扩展的动力,也显示协定在太平洋两岸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努力获得了热烈的回响。随着日、加、墨等国驶入通往 TPP 的快车道,TPP 也进入了快速扩容和发展的阶段,实力迅速增加。

反观欧洲,欧盟开始达成一致,要建立严格的财政纪律。就欧洲的紧缩长线而言,势必将压缩欧洲经济发展的潜力,因此在其执行过程中必然矛盾重重。欧洲协议的达成,也对美国的减债带来巨大压力。而美国为转移矛盾,必然会予以回应,欧美之间的博弈还将进行下去。

为了跳出这个博弈的圈子,美国重视欧洲以外的市场就显得更为重要。美国在 APEC 会议上高调推进 TPP 即是这样一个举措,如果亚洲的日、韩入伙,再加上北美的加拿大、南美的墨西哥等资源国家,TPP 的影响力势必要高过欧洲。欧洲在欧债危机下逐步衰落已经难以避免,而 TPP 就很有可能成为欧盟衰落后,取代北约联盟的一个新的世界利益集团。

背景阅读:2011 美军重返亚洲

11 月 16 日,奥巴马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宣布,美国将从 2012 年中开始在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部署 200~250 名海军陆战队员,并计划在 5 年内将驻澳美军总人数增加近 13 倍,最终建立一个规模为 2500 人的海军陆战队员军事指挥中心。风景如画的澳大利亚北部港口城市达尔文一时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美澳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的协议内容还包括:美国海军将增加在澳大利亚附近海岸的行动频率,预计有更多的美军战舰将使用位于珀斯市南部的斯德林海军基地。美国空军计划增加进出澳大利亚的美军军机架次,包括 B-52 远程战略轰炸机、FA-18 战斗机、C-17 运输机以及空中加油机等,它们将驻扎在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廷达基地。部分相关协议还需最终确认。

军事基地的增减是军事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分类,美国军事基地一般分为三类:小型军事设施、主要军事设施和军事基地。履行单一职责,仅有少量军事人员维持军事设施运转的基地为小型军事设施,比如通信站、雷达站等。凡是面积大于 100 英亩,驻军超过

250人的被称为主要军事设施。凡是驻军超过1000人,能够为一个陆军师或一个空军联队提供支持的综合体,则被称为军事基地。此前,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唯一驻军地点是位于澳大利亚中部的松口联合情报和通讯站,只有178人,相比在夏威夷的4.2万人,驻日本的4万人,驻韩国的2.8万人,驻关岛的4000多人,驻澳美军是亚太地区美国驻军中人数最少的一支部队。

此次美澳两国将美国驻军点从小型军事设施升格为军事基地,说明美国对其军事战略做出了重要调整,是美国军事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的重要举措。

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背靠南极洲,同时濒临太平洋和印度洋,距离中国南海很近且有一长串群岛作为缓冲。澳大利亚往东北可以跟美军关岛基地呼应,往西北通过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则很快就可以进入南海。

达尔文是澳北地区首府,被澳大利亚视为通往东南亚的大门,离印度尼西亚帝汶岛仅一海之隔,离中国南海也很近,约2000公里,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澳大利亚重要的海军和空军基地,也是澳大利亚唯一经过战火洗礼的城市——1942年2月19日,日本联合舰队对达尔文发动了突然袭击。日军以4架飞机的代价击沉或重创近30艘盟军舰船以及22架盟军战机。这次袭击被称为“澳大利亚的珍珠港事件”。同样在1943年,达尔文又成为盟军反攻日本的跳板,美军轰炸机从达尔文港起飞攻打日军占据的印度尼西亚。

三、TPP的资源版图

分析TPP对于美国和整个世界的战略意义,要害在于未来资源版图的划分。在当今信息爆炸和交通技术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各国对于地缘政治的认识应当全面刷新,所谓“国家版图”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相应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和扩展。要深入理解各国的博弈,应着眼于资源的占有和归属。把资源的占有及归属与版图结合起来,引入资源版图的概念,将有助于大家认识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博弈格局。

何为资源版图?当今世界与百年前已有了极大不同,各国的领土不再是一个

绝对的概念,领土在国家关键资源中所占有的比重不断降低,国家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利用国际游戏规则占有他国资源,甚至是占有他国大量土地的产权进行粮食生产,起到与本国土地资源一样的效用。由于用武力占领别国领土的方式会遭到激烈反抗、贻患无穷,反而变成了“不够经济”的手段。尽管在过去60年,世界保持了相对和平,只有局部战争发生,但事实上,世界各国对于资源的追逐不是降温,反而是加剧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权和生存空间是依靠资源维持的,包括国土资源在内的资源版图是任何国家民族的生命线。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建立以资源控制为核心,超越传统主权国家领土和版图概念的广义生存空间,就是一个国家的“资源版图”。

一个国家疆域内的资源版图包括该国的领土和领土上的资源,但是要扣除被外资和外国人控制的权益部分。在一国国土内能够被该国控制和支配的资源才是自己的资源。如在我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股权由外方控制,但企业注册在中国,中国也有一定的权力,其占有的资源权利是中外共享的资源权利,其中国家权力大小与国家对待外资的政策有关(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对外资越优待,我们自己所拥有的资源版图也就越小)。同时一国的资源版图也应当加上该国在海外拥有和控制的资源、海外资产、可以换回资源的外汇。

借助资源版图概念,有助于看清我们的资源形势、生存环境以及整个世界的发展变化。

从总产值上看,上述TPP国家(包括拟加入谈判的国家)总产值26万亿美元,现有成员为17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为14.66万亿美元,其工农业总产值只有23%。比较而言,中国总产值为10万亿美元,工农业总产值占比57%。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与全部TPP现有成员国家相当,且中国工农业从业人员的工资远低于国际标准。如果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恢复到世界正常水平,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还要大幅上升。

从工农业总产值上看,中国几乎以一己之力,就可抗衡于整个TPP;但是,如果我们将TPP放到资源版图上,结果就会大为不同。TPP现有成员国包括:美国、智利、秘鲁、越南、新加坡、新西兰、马来西亚、文莱和澳大利亚,此外是拟参加谈判的日本、韩国、墨西哥、加拿大。在TPP的相关国家当中,美国自身资源丰富不开采不说,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都是传统的资源国家,有广袤的国土或者金属矿藏资源,而其他国家也有丰富的资源潜力,这里分别介绍一下:

秘鲁是传统农矿业国,矿产丰富,石油自给有余;智利是拉丁美洲最主要的工

业国和最大的原材料出产国,它拥有世界上已知最大的铜矿,有"铜之王国"之称,此外智利还有石油,天然气和不同的宝石,智利的农业、渔业很发达,控制着太平洋东南海岸线,由于铜价上涨,2010年智利人均GDP位居南美洲第一,第一个成为位于南美的发达国家。

文莱在东南亚石油储量和产量仅次于印度尼西亚,文莱石油已探明储量约为14亿桶(预计可采至2020年),天然气探明储量约为3200亿立方米(预计可采至2035年),其石油产量在东南亚居第三位,天然气产量在世界排名第四位,而人口只有40万左右,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石油和天然气总储量为194.9亿桶,自然资源丰富,橡胶、棕油和胡椒的产量和出口量居世界前列,还曾是世界产锡大国。而越南和菲律宾是美国在南海方向上遏制中国的重要国家,他们在美国的支持下已经实际窃取了中国南海大量石油资源,而且越南和菲律宾都与美国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渊源。越南矿产资源丰富,种类多样,煤、铁、铝储量较大,最关键的是越南拥有稀土资源,虽然储量数据没有公开,但可以部分抵消西方对于中国稀土出口的依赖,日本等国已经大力在越南投资开发稀土了。此外,美国还在菲律宾留下了英语的主导地位以及对西方文化的认同。

在TPP里面(含拟加入国家),韩国和新加坡都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关键点,新加坡控制的马六甲海峡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咽喉要道,是全球战略的核心节点,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韩国是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地理中心,朝鲜半岛就是东北亚的火药桶和巴尔干。

最后说一下日本,日本看似资源缺乏,但是日本利用当年日元升值的机会,在全世界收购资源和购买矿藏,实际控制的资源数量非常庞大,这些都属于日本的资源版图,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白益民先生在《瞄准日本财团》一书中写道:"日本这几十年凭借财团模式的发展,在海外掌握了大量的矿山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镍、有色金属。日本是世界最大的金银铅和铟的资源国,其铜、铂、钽也位居世界前三位,这个数据是对于日本国内积蓄的可回收金属总量计算得出的。"其中"铟"是一种重要的半导体元素,在发光半导体器件、太阳能电池和液晶显示器中都离不开它,是发展新能源和新兴产业最重要的资源。中国是铟的最大产地,但是日本对于铟的拥有量却排名世界第一。

进一步观察还可以发现,TPP国家很多是环境保护良好的,如发达工业国日本的森林覆盖率超过60%,因此TPP所规定的环保条款也有特别的意义,在环保主义者设计的碳排放和碳交易模式当中,很多国家可以给美国这样的高碳排放国家提

供碳资源。因此考虑到环境的资源因素,TPP的整合同样是具有巨大资源版图价值的。

综上,从资源版图的概念可以更深入地理解TPP存在的意义,也有助于了解其未来的博弈规则。

四、日本将交出生存命脉

令TPP成为世界舆论焦点的,是日本的准备加入。没有日本这个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加入,TPP是美国一家独大,而且其他小国和资源国原本就是美国的盟国,很多还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他们与美国的国际贸易量是有限的。日本则不同,美日之间贸易量巨大,且在美日贸易中美国逆差很大。同时日本在原来的WTO框架下没有开放国内的农产品市场,保持了粮食自给率很高的独立地位,而TPP协议将使得日本的农产品市场对美国开放,日本的粮食安全被美国控制,实际上是把日本独立生存的命脉绑定在了美国的战车上。

正因此,在日本野田政府高调宣布决定加入TPP谈判的背后,是国内强烈的反对意见。农林水产省认为2010年3月政府出台的新农业补贴政策不足以弥补日本农业因加入TPP可能遭受的损失;日本民主党政策研究委员会经过仔细研究和多次协调后表示,“政府将在决定是否加入TPP前继续进行谈判收集信息。”日本能否加入TPP将最终取决于其国内政治斗争及TPP是否最终放宽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标准。

甚至对于是否加入TPP,严重对立的日本政界出现再次重组的趋向。2011年10月25日,日本全国农协向众参两院提交反对加入TPP请愿书,签名支持的国会议员多达356名,国会全部201名自民党众参议员中166人署名,408名民主党众参议员中124人署名。在执政的民主党内,野田佳彦、前原诚司、菅直人、仙谷由人等人极力推进加入TPP谈判,而鸠山由纪夫、渡边恒三、原口一博等则明确反对。自民党内的河野太郎、中川秀直等赞成,而森喜朗、大岛理森、町村信孝等则公开反对。其他政党中,除“大家的党”外,公明党、共产党、社民党等都公开反对。

地狭人稠、精耕细作是日本农业的主要特征,但也导致了农业成为日本经济的软肋,长期依赖财政补贴和贸易保护。而TPP原则上要求各成员取消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所有商品进口关税,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显示,加入TPP会导致日本农业损失7.9万亿日元,粮食自给率也将从目前的40%陡降至13%。因此农业团体认

为加入 TPP 将给日本农业带来灭顶之灾。根据 TPP 规定，如果日本加入 TPP，将取消 10 个成员国之间的进口关税，从而进一步打开日本价值 480 亿美元的农业市场。

菅直人政府原定于 2010 年年底宣布加入 TPP，但是遭到国内农业部门的激烈反对，不得已把宣布决定的时间推迟到 2011 年 6 月，原指望利用这一段时间，加紧舆论宣传工作，制定相应的农业改革计划，最大限度减少因加入 TPP 对农业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 2011 年 3 月 11 日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忙于抗震救灾和处理福岛核危机，此事暂时搁置，但是经过一年时间，当前日本国内反对 TPP 的声音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幅上升，反对派与支持派旗鼓相当。在这种情况下，为何野田政府逆势而上，决然宣布此项决定？

对于日本而言，TPP 最大的吸引力就是美国。在 TPP 多边框架下，日美经济关系将得到进一步提升，这不仅仅会给日美两国带来丰厚的经济利润，同时也会在政治及安全上制造足够的信任价值，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美国，而且农业占日本 GDP 比重很低，仅为 1.2%，比起庞大收益来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不是问题的核心，经济利益与国家粮食安全孰轻孰重对于政治家而言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其中的要害是日本对于自身农业的未来展望非常悲观。据统计，目前日本农业人口仅为 260.6 万人，平均年龄竟高达 65.8 岁，必将使得未来日本精耕细作型农业模式走到尽头。以日本目前的农业成产率，要使种地收入能够与工业生产率可比，本国产的农产品价格早已经是天价了，在农产品进口的压力下降价压力巨大，更关键的是日本已经是没有年轻的农民了，日本农民平均年龄 65.8 岁的背后，就是再过 10 年这些人将达到 75 岁，对于农业生产这样的体力劳动是根本无法胜任的，而日本年轻人根本就没有种地的，也不会种地，而种粮食的精耕细作其实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技术活和经验活。日本多山，农业机械化的可能性很小。

此外，大地震造成的核泄漏也使得日本的大片农田受到影响，日本的东北部渔业受到影响，这些都极大影响了日本农业的未来，日本的农业命脉在本土实际上已难以维持了。这里有人可能会说日本可以把农业放到海外，在海外租地发展农业生产。然而，海外租地需要足够的军事实力做保障，更何况在粮食危机可能爆发的情况下。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近日报告称，人口快速增长、气候变化以及土地和水资源退化可能使世界更易遭受粮食安全威胁，并对到 2050 年养活全球人口构成挑战。

此外，要把粮食运输到日本离不开海运，海运离不开海军的保护，而在海上没有谁能够与独霸天下的美国海军抗衡，所以要在海外建设自己的农业，就离不开美

国海军的保护。如果这个离不开美国，那么何不如把整个粮食安全就交给美国呢？美国有广袤的耕地和廉价的农产品，农产品增产的余地也很大，因此就不难理解日本能够在此时开放农产品的决定。

日本的政治家不是傻瓜，但是同样的农产品开放，却是中国所不能承受的，因为满足13亿人的粮食安全与满足日本1亿多人的粮食安全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由此可见，这个所谓“开放农产品市场”的条件带有天然屏蔽中国的作用，对此日本的政治家心知肚明。

五、美国的控制力在哪里

TPP已明显成为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新框架，其制度安排、规则制定、机制建设等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及政策，换言之，美国就是TPP的主导力量。

美国主导TPP的目的是要在亚太地区重建其控制权。欧洲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美国自身在金融危机打击下其东海岸的传统产业和中部的汽车工业均受到巨大冲击，美国经济未来的希望在西海岸的硅谷，加州的GDP已经占全美GDP的三分之一左右，西海岸的气候还属于最宜人的地中海气候，美国国内经济重心也必然继续西移。

而在太平洋西岸，中国快速崛起，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也发展迅速，是全球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必定要从大西洋沿岸倾斜到太平洋沿岸，TPP将是美国在太平洋沿岸展现其超级大国霸权的“非战争武器”。

有分析认为，美国的真正意图在于以TPP为基点，数年后逼迫亚太发展中国家更加开放其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并通过所谓知识产权保护肆意寻求“赔款”。这是美国的利益诉求之一，但不是主要方面。因为TPP的主要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本来就不错，日韩等国也有不少先进技术，这些国家与美国原来就有类似的协议；而美元本来就是金融霸主的地位，在TPP里面只不过是再发展和重申一下，最多是锦上添花，不是问题的核心。

问题的核心在于美国在哪些领域中控制力最强，也就是美国的核心竞争优势在哪里。美国对粮食和石油的控制由来已久，且控制能力强大。基辛格有句名言，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所有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对于TPP国家来说虽然也有一些东南亚的石油出口国、资源国，但是总体来说

这些国家金属矿产资源丰富，而石油匮乏，石油的安全和控制是非常关键的。

还有分析认为 TPP 会成为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前身。然而，世易时移，当今世界军事手段已经退居二线，况且美国与日、韩、澳、新等国早就有军事条约，TPP 自然更多主要地是以经济手段来达成战略目的。而美国的军事能力更多地集中在 TPP 国家之外，集中在世界各大洋游弋的航空母舰战斗群。TPP 内部主要的历史军事强国日本已经在二战战败后被强制解除了武装，和平主义成为社会主流，军力不张，而美国是绝对不愿意让日本重新发展军力的，就如在北约冷战时代不会让联邦德国成为军事强国一样。如果日本不重新武装，那么 TPP 成为军事同盟的可能性就没有。至于其他小国，军事力量的差距太大，难以成为美国有力的军事盟友，所以其他 TPP 国家的军事力量只不过是美军的附庸，断不会形成欧洲那样的英法军事伙伴。

美国最需要的就是控制石油的海上通道和石油的最大产区中东。美国纵容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背后，是降低自身恐怖袭击的压力，同时将中东问题从阿以矛盾转化为穆斯林的教派矛盾。同时，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还是中俄内部分裂势力的源头之一。而美国控制了石油，也就控制了 TPP 主要制造业国家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命脉，而这些制造业是 TPP 体系内财富的发动机，美国的金融机器则是财富分配者。

对于 TPP 内的产油国，其石油供给在 TPP 内部原本就不足，而且他们的石油也是被长期协议绑定的，这些协议同样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强权所主宰，定价权受到美国严格控制。

在石油之外，TPP 关于农产品的贸易协定使得粮食成了更重要的武器。对于 TPP 里面人口密集的国家，粮食安全是主要的安全压力，在工业化时代，东亚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劳动生产率是无法与工业生产相比拟的，TPP 的整合必然导致大量农业人口向工业转移，尤其是美国广袤的土地可以搞石油农业，其农产品的价格足以摧毁其他国家的传统农业生产，而其他国家却难以搞石油农业，因为既不控制石油，也不具备美国这样的土地优势，难以搞大农业。更重要的还有，美国的农业生产方式是以单产降低为代价的，美国一个人种上千亩土地可以不在意亩产少了 20% ~30%，总体计算下来生产率仍然非常高。但是对于亚洲国家粮食如果减产 20% ~30% 就是彻头彻尾的灾难。

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人口主要以稻米为主食，世界上的稻米贸易总量才 3000 万吨左右，按照中国人均 900 斤的粮食消费量，也只够五六千万人食用，这个贸易量

与东南亚和东亚的人口数量相比完全不对称。这些国家的粮食安全形势是非常紧张的,如果被美国控制,那就意味着国家的主权就要听命于肚子,而饿肚子是难以独立自主的。这就如当年的朝鲜,朝鲜1980年粮食产量950万吨,1995年跌落到仅为350万吨,减少65%以上。2005年粮食生产水平有所恢复也仅为470万吨左右,不到80年代的一半。

针对朝鲜的饥荒问题以制度说事是说不通的,因为1980年以前粮食高产年代的朝鲜施行的依然是现在的制度,朝鲜的问题就是农业机械化以后,机械、石油和化肥等受制于人。苏联解体才是危机真正的来源,朝鲜是通过向前苏联出口农产品并进口石油等资源来发展经济的,朝鲜单一依靠前苏联造成其外汇储备主要是卢布,苏联解体,卢布恶性通胀,同时断绝了对朝的石油供应,朝鲜才陷入到粮食危机中。

粮食危机就是国家危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做法就是如此,非洲在西方援助前是粮食自给的,但是在西方援助以后,反而因为西方粮食的低价倾销,摧毁了本国农业,结果被西方死死卡住了脖子,稍有他念,西方停止供粮,这些国家就因为本国粮食产量严重不足而饿殍遍地。亚洲国家人口密度较大,实际上更难以抵抗粮食倾销的冲击。而TPP的一个核心恰恰就是农产品的开放,以往各种贸易协议中粮食问题都是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一般予以回避。所以,TPP的农产品开放政策,才是最吸引美国加入一个未由它创办的组织的最大动力,美国一直在推进农产品的开放,就是要为其优势的核心竞争力找到出口,有了农产品的控制权,也就是如基辛格所说的控制住了TPP国家中的所有人。

六、劳动力资源再均衡

TPP协议中关于劳动服务的内容是不同于一般贸易协定的,这也是认识TPP协议的关键。这样的协定是对于各国劳动服务的再均衡,是保障美国制造业发展和金融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由于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严重,很多民主党议员将责任归咎于过去的自由贸易协议。面对国内的反对声音,奥巴马表示,与先前的协议相比,TPP协议号称将对美国的工人和环境提供更强大的保护。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声称谈判目的之一就是开创21世纪贸易协议的新标准:更加关注工人、中小企业、农民和环境。

这个美丽的说辞背后,真实目的之一是要限制美国工会势力的过度膨胀。美

国强大的工会组织历来是选举的票仓，由于政客的选票需要，使得工人工资和福利过度膨胀，在 2008 年危机时蓝领工人已经达到人均 14 万美元的年薪，远超大学教授，过高的工资使得美国丧失了制造业的竞争力，现在美国要恢复其制造业的竞争力就一定要让制造业大国日本的工资涨起来、美国的工资降下来，二者拉平才可能，因此所谓“更加关注工人”是对日本人说的，更是说给美国工会的，就是要以此倒逼美国工会。更关键的是美国要通过这个协定，完成其势力范围内的劳动力资源重新布局，建立一个以美国为顶点的劳动力资源均衡格局。

美国的今天让人想起 17 世纪的荷兰，这个只有 150 万人口的小国，历史上是曾经垄断了全球远洋贸易的强大海洋国家，成为世界最富庶发达的地区。然而荷兰的强盛却是昙花一现，被后来的英国迅速超越取代。著名历史学家伯克提道，荷兰“统治阶层……只从他们的房产、土地和证券(公债)上攫取收入。”从 1618 年到 1758 年，荷兰的无职业者增长了一倍多，而有乡间别墅的人增加了三倍。在 17 世纪的最后 25 年里，商人们传统、朴素、节俭的生活方式让位于铺张的风格、乡间别墅以及高官贵族的生活。荷兰发达的金融市场确实令荷兰政府和人民获得了大量财富，全民都变成了食利阶层。在这种背景下，荷兰越来越远离生产经济而蜕变为食利者经济。

美国的经济目前就与之类似，美国失业率高企的同时华尔街照样纸醉金迷，美国本土的中低端制造业正在逐步走向枯萎。美国要从危机中走出去，避免荷兰的历史重演，就必须重振制造业，如果不能立即振兴制造业，也要控制足够多的制造业国家、人口和劳动力，扩充自身的资源版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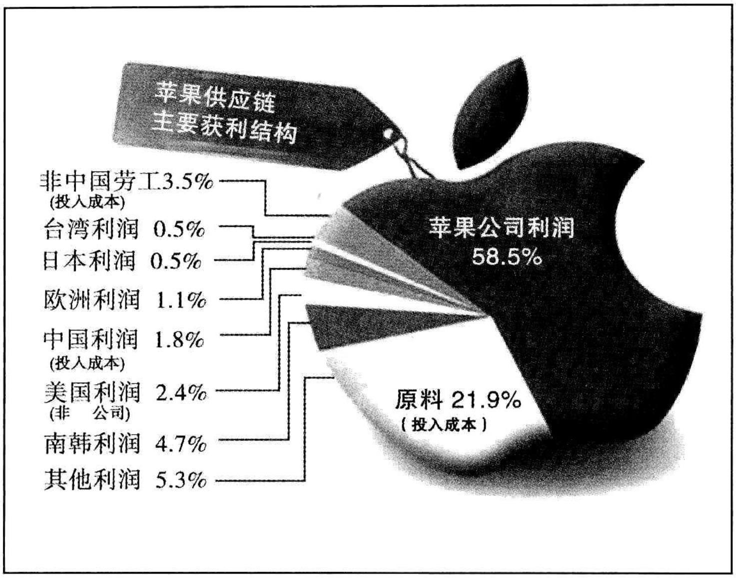
TPP 协议的达成将促使服务业的自由化进程加快。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贸易政策委员会举行的 TPP 谈判征求意见会议上，美国服务业联合会(Coalition of Service In - dustrie，CSI)提出服务业应该是 TPP 谈判的重点。因为美国服务业占据 GDP 的 80%，吸纳了 80% 的就业人口。在 TPP 谈判中美国应该重点关注快递服务、金融服务、电子支付、电子商务、电讯服务、视听服务、知识产权和能源服务等服务部门的市场准入、透明度和投资者保护问题。而服务业的就业人口是需要制造业的人口劳动创造来支撑的，把服务业就业提高上去的前提，是要把足够的制造业人口控制在体系内。美国要控制制造业，最关键的是要控制制造业核心人口群。在整个世界当中，真实创造价值的就是制造业人口，从事服务业的人口主要是对于价值的再分配，金融虽然是食物链的最高点，但是它的财富来源依然是生产部门，而生产部门中农牧渔业等所占比例都很小，生产率也很低，现代社会的发达依仗的是

工业生产,尤其是使用机械制造等大工业的生产,是高端制造业的生产,这些生产对于工人的素质要求非常高。

在参与TPP协定的各个国家当中,仅仅有资源是不够的,如果没有足够的高端制造生产能力,资源就只能维持初级产品的低价格。就如中国没有稀土分离能力时,中国的稀土就是廉价的;中国拥有世界80%的钨,但还要进口高纯度的钨,而高纯度钨的价格是中国钨砂的上百倍,中国出口钨的所得抵不上进口钨的支出。因此具备高端加工能力和制造能力是必需的。

而要培养能力,资本问题容易解决,劳动力很难解决,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就算培养新劳动力也要等孩子长大,这个周期很长。因此美国要保持自身的实力,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高端制造业人群,这些人群就是有足够技术的工科工程人员,尤其是以男性为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科男",这是非常重要的劳动力资源。对于这些高端制造业人群,日本和韩国可以提供大量的劳动力资源。日本人口1.28亿,韩国人口5000多万,在日本和韩国的外向型经济当中,日本人和韩国人的人口结构中都有大量受到良好训练的产业工人,尤其是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度,使得企业和员工自身都非常注意职业能力培养,这也是日本制造高质量的根本保障。同样,德国工业制成品的高质量也来源于德国家庭,德国的孩子小时候在家里就进行各种机械加工了,德国一个家庭里经常是备有机床的。这些人口的工业素质非常关键。而日、韩未来的粮食还要依赖美国,一旦这些国家的人口彻底受控于美国,那么这些国家的"工科男",也就被纳入了美国的资源版图之中。

因此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为什么美国一定要将日本和韩国拉入TPP内,因为在世界财富和资源的资源版图再分配过程中,高端制造业人口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这些高端制造业人口是可以带来巨大利润的,就如苹果手机,苹果掌握产品研发和渠道物流,一部iPhone为苹果创造了多大价值?360美元。掌握关键零配件的为187美元。我国纯粹做制造、组装,价值只有6.54美元,如果要是以其利润来计算,差距就更可观。我们可以以苹果的全球化生产的利润分配的例子看一下:



由图可见,虽然苹果公司赚取了暴利,但在其利润构成当中,提供配件的韩国所得的利润远远高于中国。这就说明,韩国的高端劳动力确实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在制造业的低端,辅助性的劳动力补充也很重要。在这方面,东南亚其他国家具有潜力。菲律宾人口 9400 多万,越南人口数量为 8700 万,马来西亚人口 2700 万,墨西哥人口 1.12 亿,总人口数量超过了美国,这些人口在 TPP 协议实施后农产品涌入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下跌、农业收入低下将迫使大量农民离开农村走向城市,成为城市工业发展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廉价的劳动力本身对于中国的农民工有很强的替代作用,尤其是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这些人口将成为美国需要的低端制造业廉价劳动力的来源,他们的发展既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也提供了工业品市场,其市场规模以人口论是不少于欧洲的,因此这些人口也是美国主导的 TPP 体系内重要的工业化资源。美、日等发达国家要保持着“后工业化”的奢侈生活,就必须有世界其他地方足够多的低端工业人口为之打工。

七、TPP 构建危机后信用体系

2008 年的经济危机对世界信用体系造成了颠覆性的破坏,货币问题是国家金

融信用问题,债务问题也是国家信用问题,社会保障泛滥还是一个国家的社会信用问题,在危机后原有的世界信用体系难以维持,美国急需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危机后的新信用体系。

对此,TPP 更关键的战略意图就是建立危机后新的全球信用体系。美国希望 TPP 成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美国借此可以提升与亚太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关系,创造出一个美国主导的适合 21 世纪经济发展趋势的高标准区域经济合作平台。该平台涉及的经济体将占据全球一半的 GDP 和 40% 的贸易份额,即便是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TPP 国家的 GDP 也占到全球 GDP 的 1/3。

从表面上看,美国主导 TPP 的目的之一,是将亚洲尤其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纳入到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来,从而制衡中、日、韩等区域大国的经济影响力。但是,考虑到日韩与美国之间的紧密政治关系,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次主要是针对中国,意在削弱中国的区域经济影响力。

针对中国只是美国的战术目标之一,美国积极推进 TPP 的根本战略目标,就是在摆脱危机的过程中,保持和扩大自己的资源版图,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重新构建危机后的信用体系,达到在危机后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财富的目的,继续持保持美国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

从 TPP 的金融开放等协议,可以看到 TPP 建立的是一个以美元为主导的核心金融系统,以此来保障未来美元信用不发生坍塌,未来这些国家的金融资本将在 TPP 的框架下深度整合,从而互相绑定力量大增,这也是 TPP 协议对于金融等领域开放的规定比一般的国际贸易协议走得更远的原因。

以前世界各国对于自己的金融均视为核心利益,对外的开放都是有限的。因此 TPP 整合各国的金融就成了关键问题。有人认为,TPP 出台就是为了遏制中国,但问题来了:如果美国成功遏制了中国,中国经济垮了,中国哪里有那么多钱进口美国产品?失去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美国制造业的出口又在哪里?

美国能够向中国大量出口的前提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有足够的购买力来进口美国的商品。所以,美国当前的战略绝不是放手中国崛起,也不是搞垮中国,而是抑制中国的崛起,保持“世界工厂”的低端制造业地位,继续为西方打工。因此 TPP 的作用更关键的在于要把中国出口的产品价格压制在低位,压低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美国就要降低对于中国世界工厂的依赖,即便是现在中国的出口产品利润很低,但是如果形成对于中国制造的依赖,中国产品的利润提升

是迟早的事情。更进一步的是，中国企业的利润可能很低，但是中国的工资处于上涨周期，如此一来，进出口博弈的不只是企业的利润和收入，更大的部分是本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本国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也是重要的部分，在创造的价值分配里面，中国的工资增长才是关键，涨出来的工资在国际贸易当中是要西方埋单的。

因此美国建立 TPP，是在高端制造业上与日韩结盟压制中国的产业升级和产业附加值的提高；在低端上扶持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以他们的低人力成本压低中国劳动力的收入水平。而澳大利亚、智利、加拿大等国拥有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最需要的金属矿产资源。石油紧缺是世界各国都类似的，有色金属和铁矿石等的紧缺却是中国特色，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必然的结果。

综上，美国主导的 TPP 在资源上对于中国的控制也是有特色的，这些因素通过 TPP 整合，是要在整体上控制中国的根本信用，也就是控制中国产业的劳动力收入水平和金融能力，把中国控制到“血汗工厂”的水平，从而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

美国主导 TPP，在亚太区域上看是针对中国，放到全球上来看也是对付德国和俄罗斯的手段。俄罗斯有丰富的资源，德国有过人的制造业。在欧洲衰落以后，欧洲留下的经济空间是要被人填补的，从当前趋势来看，这个空间的得利者很可能是德国；而金融危机以来大宗商品的暴涨使俄罗斯成为得利者。因此，美国强势主导 TPP 的野心，不仅仅是在亚太遏制中国，而是在世界范围内，遏制所有最强的对手，建立危机后全球的信用新秩序。

在 TPP 中关于环境的约定也是重要的方面。环境保护已是全球性的重要课题，环境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信用体系，甚至有人提出以碳交易为背景建立碳本位，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等。在这个议题里面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欧洲人，其集大成者就是美国拒绝加入的《京都议定书》。而 TPP 的建立和未来对于环境问题的讨论，很可能将架空《京都议定书》，等于是借助 TPP 建立一套新的环境信用体系。其中关于环保的协定，其愿景是要抗衡欧洲主导的以碳排放为主的环保信用体系。TPP 把日本拉进来，日本在环保等问题上的立场也必须符合 TPP 的要求，也就是要与美国的立场保持一致了，这样与欧洲抗衡的太平洋环保体系就可以建立起来。未来人们可以看到世界围绕环保信用的大博弈。

TPP 这个信用体系建立起来后，不但是要架空原有的 APEC 这样松散的区域性组织，还要在环保问题上架空欧洲主导的绿色力量和《京都议定书》，还要与欧盟、俄罗斯、中国等整个欧亚大陆国家竞争，因此认识 TPP，要站在全球高度来认识，这是美国的一个全球战略而不是简单的区域性战略，是美国在危机后继续主导全球

新信用体系的雏形,在这个信用体系下进行全球财富和资源的再分配。可以说 TPP 就是美国人巧用信用元规则,谋划出的制胜全球信用争霸战的深远战略举措,对此中国应当有更深入的认识,应当早日着手建立应对的长期战略。

八、TPP:结婚容易持家难

TPP 在未来是否能够发挥美国希望的作用,成为危机后一个主导全球的新的信用体系,关键在于协议的执行和发展。但是协议中各国承担义务是不对等的,以后的摩擦会很大,甚至有破裂的危险,因此 TPP 的未来道路还有很多问题,就如结婚容易持家难。

问题还在于,一旦有更多的成员加入 TPP,兼顾各方利益的难度就将加大,TPP 的各项规则将受到影响,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将可能打折扣。虽然日本宣布拟加入 TPP 谈判,但是否会接受 TPP 的规则还不清楚,甚至在面临强大的国内压力下有退出的可能。

TPP 也可能像一些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议那样,缺少强有力的执行力,在面对有争议的跨国政治经济议题时常常表现得软弱、低效。而 TPP 协定本身,必然会影响到成员国内部的经济调整,如日本的农业就是一例。日本加入 TPP 以后如果在对美贸易上吃了亏,国内反对的声浪就将更大。

同样的考验也发生在韩国身上。2011 年 11 月 24 日韩国国民大会已经批准了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对于韩国来说,协定将使韩国成为唯一与世界三大经济集团(另外两个是欧盟和东盟)签署此类贸易协定的国家。有韩美 FTA 为基础,加入 TPP 对韩国来说收益并不多却要承担更多的义务,而韩国的农民对于韩国政治的影响力巨大,加入 TPP 以后如果韩国农业受到巨大影响,韩国的政治稳定也将受到威胁。

事实上,对于已加入 TPP 的成员国来说,收益也没有预期的那样好。2010 年美国成为新西兰第三大乳制品出口国,新西兰出口到美国的乳制品为 7.11 亿美元,然而并没有详细数据显示自由贸易在这一方面的贡献。相反,可信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向美国的出口额从 2008 年的 179 亿美元下降到去年的 145 亿美元,算来算去,还是美国占便宜,小国想从中获利难如登天。

加拿大加入 TPP 谈判,在乳制品、禽肉、禽蛋等供应链管理政策等方面需要巨大的改革以满足 TPP 成员要求。加拿大能否加入 TPP 取决于其能否开放本国乳制

品、禽肉等农产品市场，以及 TPP 是否最终放宽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标准。

TPP 协定与原来 TPP 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协定怎样整合也是一个大问题，其衍生出的利益冲突会成为未来 TPP 矛盾和争议的源泉。除了刚刚生效的韩美 PTA，TPP 成员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很多个。除最初 4 个创始国签署的“P4”外，其他协定（生效时间）包括：澳大利亚 - 智利自由贸易协定（2009 年 3 月 6 日）、澳大利亚 - 新西兰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1983 年 1 月 1 日）、澳大利亚 - 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2003 年 7 月 28 日）、澳大利亚 - 美国自由贸易协定（2005 年 1 月 1 日）、美国 - 智利自由贸易协定（2004 年 1 月 1 日）、美国 - 秘鲁贸易促进协定（2009 年 2 月 1 日）、美国 - 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2004 年 1 月 1 日）、秘鲁 - 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2009 年 8 月 1 日）、智利 - 秘鲁自由贸易协定（2009 年 3 月 1 日）、新西兰 - 新加坡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2001 年 1 月 1 日）。此外美国还与越南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2001 年 12 月 10 日）。因此这些复杂的协议，以及这些协议与 TPP 的不一致，也是需要长期磨合的。

九、TPP 与中国：孤立、忌惮和不需要

中国没有被邀请加入 TPP，成为国内外议论的焦点。美国用此举来制衡中国是显而易见的，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英国《金融时报》认为，任何没有中国参与的协定都将缺乏“关键规模”。华盛顿或许有意借此制衡中国，尤其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相对实力及影响力下降的背景下，但美国寻求的未必是强硬的“遏制”，也可能是平和的“均衡”。

TPP 目前肯定有孤立中国的含义，在 TPP 的框架内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被限制，TPP 所要求的开放农业、金融和私有化等问题是中国不能接受的，这样的条款也起到了限制中国参与 TPP 谈判的作用，而且如果中国也加入 TPP，势必会带动更多国家加入，对于现在 TPP 国家的竞争力进行了摊薄和贬值，TPP 就将成为另外一个 WTO，这对于已经在 WTO 中起主导作用的美国是没有意义的。由此可以推论，美国主导的 TPP 就是要把一些国家隔离在外面。

但另一方面，中国如果加入 TPP 谈判，虽然在农业、金融等领域中国难以让步，美国其实也有难以让步的地方。首先是美国高科技贸易的放开，美国一直限制中国购买美国的高科技；还有就是金融等投资领域开放后，中国也可以到美国进行投资，现在美国限制中国在美投资，中国投资都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予以否决，加

入 TPP 以后中国能够进入了,这是美国人不愿意看到的;再有就是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如果中国加入了 TPP,在 TPP 内部不能以所谓的中国不具备市场经济地位为由对中国产品进行不公平的反倾销,那么美国遏制中国经济崛起的王牌就又少了一张。

回顾历史,中国加入 WTO 之初充满了疑虑,但事实证明 WTO 的开放给中国更多的产业带来了机遇,尤其是有些原来中国弱势的产业,反而成了龙头,比如汽车产业取得爆发性增长,这与中国加入 WTO 是分不开的。美国等国之所以不邀请中国加入 TPP,确有对于中国忌惮的成分,中国如果加入了 TPP,那么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将更上一层楼,这是美国人绝不愿意看到的。

美国之所以不邀请中国加入 TPP,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已经在中国取得了 TPP 所能给出的利益,中国过去 30 年的“请进来”的招商引资政策,让外资在中国获益良多,国外资本实际上已经大大分享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而中国企业现在如果走出海外收购或者创建一家企业,所受到的阻力是空前的。

更进一步的是,中国在 WTO 当中承诺的农业开放比日本和韩国都要多,美国的大豆已经彻底打败了中国大豆;美国的转基因种子也占领了中国市场;美国的粮商巨头在中国成功布局,大肆收购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建立粮食购销渠道;高盛也进军了中国的养猪业,在进军中国农业上美国已经颇有斩获。

再有就是金融市场上,我国的大型银行都有美国机构参股,而且美国机构“帮助”中国设计了金融体系,对于中国金融的情况也非常了解,但是美国可能让中国资本这样影响其核心银行吗?更进一步的是中国的审计市场完全被美国控制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左右,通过对中国核心企业的审计,美国人对中国的核心经济信息了如指掌;最后就是中国的富人大量移民外流,中国富人的移民主要就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TPP 国家,这些富人在移民的同时,也带走了中国大量的财富。

以上这些都使得美国已经实际在中国取得了 TPP 协定所约定的利益的大部分,美国让中国加入 TPP 的结果就是美国要付出更多的利益,因此美国等国不愿意中国加入 TPP。认清这些利益关系后,中国目前亟须做的:就是大力扶植民族企业,无论国资还是私人资本,都是民族企业,而且要改变外资优待的经济环境。

十、中国应对 TPP 的王牌:高端人力资源

中国的经济能够崛起,中国制造影响世界的关键因素是在于人,在于中国的劳

动力。虽然中国人口出现老龄化的趋势,人口红利即将过去,但是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仍具有很大优势。

中国的经济未来就在于中国的核心劳动力资源,这些劳动力资源就是高端工业人口,是有技术密集型的人口。印度人口也很多,但是印度人口形成的劳动力与中国是不同的,印度更多的是走向了服务外包而不是加工生产,工业生产需要的是有工科素质的人口,在这方面日本和韩国有很大优势,德国人的工业素质举世瞩目。在美国的 TPP 体系当中,关键的着眼点也在于日、韩的高端技术人口。

中国被定义为"教育落后的国家",但笔者为什么还是要说中国的劳动力王牌是高端工业人口呢?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要从中国的教育说起。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同于西方的应试教育使得中国的创造性人才比较缺乏,但是应试教育也培养出了最好的工科人才。因为,工科人才在更大范围内,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创造,而是更严谨地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是应试能力。中国的数理化教育水平在中学阶段远远高于欧美,因此会有欧美报纸把中国中学生的试题登出来让他们的国民看有多难。

美国的教育是让人的思想开阔,但培养了创新力的同时,其对知识掌握的深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中国学生相比是不行的,关于很多美国孩子笔算加减乘除都困难的报道常见于报端。中国理科学生在中学毕业后的水平,已经可以满足很多工科项目的实践需要,如中国技校毕业生的水平,已达到西方很多工科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水平,所以在中国找工作,技校生比大学生更受欢迎。

甚至中国的很多农民工也是高端的工科人才,这一点是国人不容易认识的。因为中国的农民工搞建筑等行业,是需要手艺的,就如一个泥瓦匠,要培养起来成本同样很大,要学徒很长时间,干活质量不好的话,返工成本很大。中国建筑工人大军的背后,是这些人有干建筑活的手艺。而中国的其他行业,如修理等也是需要手艺的。中国制造的工厂里,技工是重要的财富,这个人群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增强未来中国的竞争力,也是要保持中国的高端制造业的人口。目前中国技术工种的工资暴涨,未来他们的工资还会且应当更高,中国教育应当给更多这样的高端技术工人学历,在社会当中给他们正名。

中国的未来就是要让制造企业高级工人的收入高于一般文员,中国能够有今日的经济规模和制造业大国地位,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下海、企业人员收入高导致大量人才涌入是高度相关的。现在中国进入到了产业升级阶段,如果中国的产

业对人才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让大量人才冗余到公务员队伍,那么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是必然要下降的。

跟社会舆论中的某些担忧相反,中国高端技工涨工资,不仅不会削弱中国的竞争优势,反而会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到中高端制造业工作中来,从而加强中国的竞争优势。美、日、韩、德等国相同人才的收入都比中国高 10 倍以上,而印度、越南等国家虽然人口众多,但缺乏高端技工。中国当年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和"艺不压身"的传统观念,造就了当前中国优良的工匠传统。如果中国工匠的收入水平大涨,那些消费中国产品的发达国家就要为之埋单。但是中国目前的工资体系对于工匠手艺的劳动力价格溢价不足,尤其是建筑业当中的农民工工匠们,他们的工资低估使得建设成果分配中,占据资本、资源的人和炒房者得到了大头。中国工匠工资水平的低估使得资本得到了利益,外国贸易得到了利益。让中国工人的工资涨起来,同时还会让西方算计中国的反倾销不成立,中国将获得更大的利益。

针对 TPP 构建的信用体系,提高中国信用的根本在于人才,中国自身的制造业高级技工人群是中国产业升级的根本保障,是中国经济发 展的未来,中国博弈 TPP 的关键王牌在于中国的人才,在于提高这部分人才的收入和经济地位。

西方发达国家遏制中国的关键,就在于把中国人的收入压在低位,使得中国制造所创造的财富在分配上被他国剥削。因此中国一定重视人才、提高产业人群的劳动力价格,不要让西方给中国的劳动力定价才是问题的关键。信用是推动历史演进的元规则,而人则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信用元规则中"人"才是唯一活跃的要素,中国要反利 TPP,建立自己的信用体系,关键在于树立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信用关系,这需要从中国国内的分配体系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改变。笔者相信,这样的改变将提高国内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本身就是最好地提高中国国家的信用,最好地提高国家竞争力,中国涨工资,全球都要埋单。

十一、资源版图下的地缘政治博弈

中国成为东亚的区域核心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崛起,就需要有自己的资源版图,应对 TPP 就是需要中国构建自己独立的资源版图。

在资源版图的构建方面,中国是有地缘优势的。因此对于 TPP 的博弈,中国也

要搞好地缘政治，远交近攻。当前日本离不开东亚市场，日本在经济上对东亚的依赖度已超过对美依赖度。韩国为什么对加入 TPP 也不是太积极？日本和韩国对于中国的出口均是顺差，中国给韩国提供了主要的外汇来源，如果没有中国的进口，韩国的外汇收支平衡必然出现巨大问题；而日本的出口和外汇收支平衡在 TPP 打开日本市场以后，预料对美顺差将下降，日本的外汇平衡也亟须中国的进口。

因此如果我们限制日、韩对中国的出口，将直接影响日本和韩国对于中国的态度。中国进口日、韩的产品，很多是所谓的“刚需”，比如液晶屏等，对日韩的贸易限制会加大中国内部的成本，但是如果没有进口限制的保护，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就难以发展。没有了中国市场，将是对日韩工业的重创，他国对于中国的支持是求不来的，需要的是利益交换，需要的是“打谈结合”。

鉴于中国对于日、韩的重要性，日、韩在拟参加 TPP 谈判以后，也对中国进行了“绥靖”。根据日本新闻网消息，在印尼巴厘岛参加东盟领导人峰会的中、日、韩三国首脑在 2011 年 11 月 19 日上午举行三方会谈。三国领导人都表示，将目前正在研究阶段的 FTA（自由贸易协定）向更高级别推进。

这则报道更多的是外交辞令，因为没有具体的谈判进程时间表。中国要想真正抓住日、韩，就需要对日、韩的在华投资和日、韩的对华贸易进行一定限制，有限制才有筹码。等到中国与日韩等国建立了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大量的产品成为日韩商品的零部件，难以分割，中国也就实际融入了 TPP。

博弈 TPP 也要放眼全球，培育新的贸易增长点。2011 年 1～11 月份海关数据显示：我国对东盟出口 1535.1 亿美元，增长 23.4%；自东盟进口 1754.5 亿美元，增长 26.5%；对东盟贸易逆差 219.4 亿美元，扩大 53.5%。对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等国家双边贸易进出口总值分别为 1063.5 亿、775.6 亿、720.5 亿和 414.5 亿美元，分别增长 33.8%、36.7%、44% 和 82.5%，均高于同期我国总体进出口增速，表明我国对新兴市场国家贸易增长强劲。

对 TPP 的压力，中国寻找 TPP 之外的增长点，寻找欧美日韩之外的贸易伙伴也是非常重要的，加强与东盟的区域关系，加强中国和非洲的关系，加强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关系等，也是博弈 TPP 孤立中国的重要套路。

而对于澳大利亚等资源国家，他们金属矿藏资源的主要埋单者也是中国，中国如果限制对于这些国家资源的进口，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总说中国不能不买铁矿石，但实际上澳大利亚等国也不能不卖铁矿石，没有了铁矿石等高额收入，他们国家的经济和外汇收支平衡也要被打破。近期中国经济减速，铁矿石降价，澳

元的汇率马上就有所反应。中国也可以对一些垄断铁矿商进行反垄断特别征税,让世界其他地方的小矿商成长起来,

反垄断从来都是国际间博弈的筹码。中国反垄断法的制定对于国际间的博弈考虑不足,西方遏制中国常搞反倾销,中国限制西方同样可以搞反垄断,只有让他们受到利益上的压力,他们才会坐到谈判桌旁边,这个道理跟朝鲜战争时的板门店谈判是一样的。

商场就是战场。对于外国在华投资,同样要施加一些压力,不能也不应给他们太多的投资便利,让他们取得额外竞争优势,从而抑制本国民族企业的发展。应该建立法制原则,即便不给外资歧视待遇,至少应当内外资同等待遇。

所以中国应对TPP,最主要的是修炼内功,只要国内政策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对待TPP国家中对中国依存度不同的国家有的放矢,各个击破,就可以分化他们在TPP组织内对华的态度。

在中国加入APEC二十年的整数关口,美国衔TPP疾进,虽然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在以“自主自愿、协商一致”合作原则的APEC舞台上,中国依旧能够有所作为。因为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对外合作是友好合作,这与美国的强权政治有着根本区别。因此,中国仍然可以借助APEC大舞台,寻求与其中的TPP国家签订双边或者多边贸易投资协定。中国不断单独地与TPP缔约国签署独立的协定,本身就能够起到架空和抵消TPP的作用。中国制造的很多产品也可以成为TPP缔约国产品的部件,从而融入TPP组织的产业链条里面去,这将是中国博弈TPP的有效战略前景。

第十九章 博弈后福利社会时代的新信用体系

一、西方的福利体系也是计划经济

经济讲的是经世济民，保障民生与发展生产是同等重要的经济环节，社会保障体系就是保障民生以“济民”的关键环节，而这个环节是需要“计划经济”的，绝对不可以市场化操作，“济民”讲究计划、平等、公平。西方有当前世界最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说西方的福利体系是计划经济可能有些令人意外，但是从计划经济的定义和本质来看问题却的确如此。

在当今世界，各国实际上都是一种混合经济体制，区别只不过在于计划经济的成分和市场经济、传统经济的比重是不同的，这里我们要说的是世界各国的福利体系也是计划经济的，各国的福利分配都是由政府和慈善财团事先进行计划的，都是依赖国家的法律或者政策由政府进行分配和生产的，符合标准的计划经济定义。社会福利分配的主要特点是全民享有，包括农民和外国人，越穷享受的福利越多，这就是计划经济的基本特点，对此我们先来看一下西方福利社会是怎样的一个优越的体制：

> **美国**：穷人医疗政府埋单，社会福利开支占 GDP 的 21%。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失业，一点也不必感到恐慌，因为他可以领一年的失业金，然后再申请政府的救济金，救济金每月 1600 美元（1 美元约合 6.7 元人民币），房贷供不起，不要紧，也由政府无偿补助，日子照样过得很体面。研究数据显示，1995 年夏威夷一个有两个孩子的母亲领取的福利相当于年薪 36000 美元的工人工资。美国的小学到高中教育免费，大学教育经费主要由政府负担，学生只负担一小部分。社区大学的学费低于每年 1500 美元，约是美国从业人员平均年收入的 1/30。为确保条件具备并且愿意读书的孩子

能读大学,政府对贫困家庭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美国有专门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救助(Medicaid)系统,为买不起医疗保险的低收入家庭提供优质的医疗保障,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医疗救助预算占州 GDP 的 22%,其中联邦政府补贴 57%。2008 年,美国共有 4900 万人享受到了医疗救助,联邦政府支出部分为 2040 亿美元。由于经济危机,美国不少家庭收入降低,享受医疗救助的人数剧增。2009 年,美国有 9 个州享受医疗救助的人数达到州总人口的 9%。2010 年 3 月 23 日,奥巴马总统签署法案,将医疗救助的标准降低到贫困线的 133%(2009 年,美国多数州贫困线为:一口之家年收入 10830 美元,两口之家年收入 14570 美元,三口之家年收入 18310 美元),这样,将有更多的人纳入医疗救助体系。美国医疗制度的着眼点是,对任何危及生命的疾病,不管有钱没钱,先看病,后埋单。你有钱,那你就自己掏腰包或由保险公司支付;你是穷人,就由政府埋单,连住院的伙食费都由政府出。

法国:种 1 公顷农田补贴 400 欧元,社会福利开支占 GDP 的 34.9%。在法国,公民从娘胎到死亡受到 400 多种福利的保护。法国社会福利的特点是不管国籍,只要在法国有合法居留身份,就可享受。笔者在法国留学时,照样享受他们的住房补贴和育儿补贴。法国医疗保险全民享有,根据个人收入情况,公民每年仅交几百欧元的医保费,大致是一个星期的最低工资,失业者则免交此费。家庭如果只有一人工作,可将配偶及子女纳入自己的保险中,交费不变。病人每看一次医生只交 1 欧元的挂号费,其余所有费用在自己的保险账户上由社保机构划拨。在法国,农民每种 1 公顷农田补贴 400 欧元(1 欧元约合 8.9 元人民币),每养 1 头牲畜补贴 300 欧元,补贴农产品要求符合环保生产标准。对无工作或低收入家庭,根据家庭人口数每月领取 405.62 欧元到 851.81 欧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则每增加一个孩子,每月加 162.25 欧元。孩子从在娘胎里的第 5 个月起到满 3 岁,如果父母收入低于一定标准,每个孩子每月可领取 156.31 欧元的幼儿补贴。如果父母为照顾孩子而停止工作或减少工时,则每月可领取 320.67 欧元到 484.97 欧元的育儿补助。如果雇用保姆照看小于 6 岁的孩子,并且收入低于一定标准,每个孩子每月可享受 65.46 欧元到 199.78 欧元的补贴。如果家庭有两个孩子,每月补助 108.86 欧元,以后每增加一个孩子增加 139.47 欧元。孩子长到 11 岁时,

每月补助再追加30.62欧元,16岁时每月再追加54.43欧元。此项补助直到孩子找到工作为止。法国国民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免费,如果家庭收入低于一定标准,孩子每个学期开学时可领取249.07欧元的补助。从初中到大学,学生可获得每个学期54.9欧元到3456欧元的助学金。残疾人根据残疾情况,每月可获得109.40欧元到1025.72欧元的补助。法国一些城市对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人提供免费公交服务,有的城市则对所有人提供免费公交服务,或提供免费自行车。

英国:难民也享受高福利,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5.9%。英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笔者有个朋友在英国生孩子,从入院到出院不用花一英镑,伙食费都由政府埋单,出院时,政府还给买好了婴儿车。英国大学阶段以前的教育均免费,大学阶段也有90%的大学生可获得政府津贴。所以,对低收入家庭来说,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是一路免费的。英国的社会福利覆盖所有在英国居住的人。笔者采访过一名在英国的难民,他在英国享受很舒适的福利住房,居住面积约80平方米(与另一人合住),洗衣机、电冰箱、煤气灶、电视机等家电应有尽有,想要什么生活用品,跟福利官说一下,也会免费获得,床单、毛毯定期免费换洗。英国政府每周给他发生活费,第一周是90多英镑(1英镑约合10.5人民币元),从第二周起,每周35英镑。他照样享受与英国国民同等标准的免费医疗,他不会英语,看病时由政府出钱为他聘请翻译。

德国:买“伟哥”也报销,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7.6%。德国人一生下来就享受抚育金,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为每月184欧元,第三个孩子为每月190欧元,从第四个孩子开始,每月215欧元,这笔钱一直领到25周岁或有了固定收入为止。对困难家庭来说,社会福利几乎包办了一切,领取的救济金只是“零花钱”,购买价值超出30.68欧元的日用品由社会福利局支付账单。德国《图片报》的一个记者走访了一个拿救济金的家庭,男主人30岁,妻子23岁,他们有一个出生不久的孩子,这个家庭几乎所有用品,从拖鞋、衬衣、小孩床,到洗衣机、电视机、炉灶都是由社会福利局付款购买的。除此之外,他们每月还能领到350欧元的房租补贴、385欧元的生活费。德国黑森州有位弗先生靠社会救济生活,每月从社会福利局领取350欧元的救济金和112欧元的养老金,社会福利局同时还要为他支付居住面积100平方米的住房的房租。弗先生由于靠服用性刺激药

物才能过正常的性生活,政府还必须为他每年支付购买"伟哥"的4900欧元费用。

加拿大:穷人教育一路免费,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3.1%。在加拿大,如果没有收入来源,单身可每月领取500-700加元(1加元约合6.6元人民币)的生活保障金,三口之家每月可领取1100-1300加元的生活保障金,如果一直没工作,这笔钱可以一直领下去,直到死亡。任何65岁以上的公民不管过去工作与否或工作时间长短,均可申请联邦养老金。对低收入家庭,政府提供廉租金住房,保证人人有房住。租金不是按照房子大小收取,而是按照工资收入收取,基本上用25%-30%的工资就能住上宽大舒适的房子。如果父母收入低于一定标准,不满18岁的孩子每月可领取100加元到200多加元的牛奶金。加拿大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12—13年),学费是分文不收的,大学教育有的社区学院也是免费的,学前教育虽然不是免费,但对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根据家庭收入情况,由政府部分或全部支付教育费。

瑞典:丈夫有9个月的全薪产假,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8.2%。瑞典1847年通过了《济贫法》,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帮助。瑞典把福利当作公民的基本人权作出法律上的承诺,当公民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不能实现或受到侵犯时,可以向地方公共保险法院或高等公共保险法院申诉。在瑞典,老婆生孩子,老公也跟着休9个月的全薪"产假"。在孩子年满16岁以前,父母均可获得生活津贴;年满16岁以后,完成9年义务教育的青年,如继续读大学则领取教育津贴,这样,大学也和免费差不多。在瑞典看病个人只掏60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约合1元人民币)的挂号费,其他一切费用都由政府埋单。瑞典的失业保险分两部分,即基本失业保险和自愿失业保险。所有20岁以上的失业者,可领取每日320瑞典克朗的基本失业保险金。除此之外,自愿失业保险职工参加全国36个失业基金,如果失业,在头200天里,可以领取过去12个月平均工资的80%,第201天到300天(有未满18岁的孩子为450天)期间减为70%,超过这个期限则由工作发展保险支付。2006年,全国有90%的工人加入了失业基金,553000人受到了失业基金的资助,平均每人得到54069瑞典克朗。失业基金的资金主要由政府提供,会员费只占基金的9.4%。

挪威:带全薪休病假,社会福利占GDP的33.2%。挪威实行全民免

费医疗，所有公民都享受毫无差别的高品质的医疗服务，病假期间的工资与正常工资分文不差。产妇有42周的全薪产假，生产之前的3周也是法定产假。产妇的丈夫享有4周的全薪“产假”。挪威实行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在内的所有等级的全民免费教育，不满2周岁的婴儿如果不去托儿所，可以获得最高每月3000挪威克朗(1挪威克朗约合1.1元人民币)的现金补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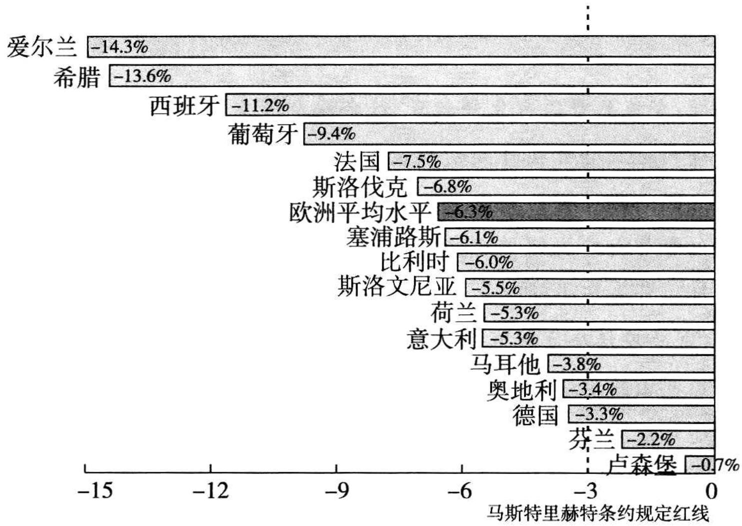
丹麦：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7.9%，丹麦的社会福利覆盖所有在丹麦居住的人，不分国籍，只要在丹麦的领土上，就享受他们的各种福利。丹麦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看病、住院分文不花，连住院伙食费都由政府埋单。病房一切生活设施应有尽有，病人住院空手进去即可。丹麦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免费，学生就近选择学校，如果选择私立学校，则政府按公立教育标准报销一部分学费。孩子从生下来到18岁的牛奶费也由政府支付。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学前教育也由政府埋单，学生每月还可以拿到生活补贴。失业人员在失业后的4年里，可领取相当于失业前工资90%的失业金。如果4年内还找不到工作，则领取每月约合14000人民币元的失业救济金。

看起来西方的福利社会就是很多人的理想社会，但是构建这样的理想社会是需要现实物质基础的，这样的物质基础又来自何方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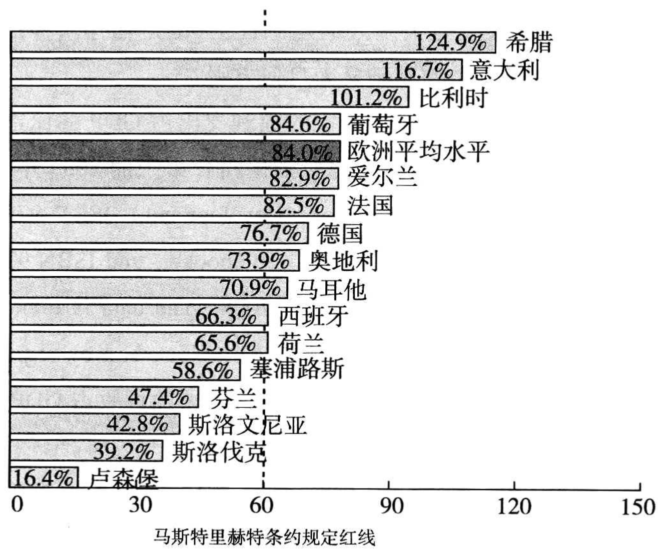
对于这样高企的福利，西方各主要国家的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了20－40%，而他们的税收又占到GDP的多少呢？根据经合组织的2008年数据(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SBN 978－92－64－05139－3(book), ISBN 978－92－64－05140－9(ebook), and ISBN 978－92－64－05148－5(CD). Publication date: October 15, 2008. The data is found in Table A. Total tax revenue as percentage of GDP. By OECD nation, and by regional averages. 1975 to 2006. With provisional data also for 2007.)各国的税收占GDP的比重：美国28.3%，英国36.6%，瑞士29.7%，瑞典48.2%，西班牙37.2%，斯洛伐克29.8%，荷兰38.0%，新西兰36.0%，挪威43.4%，波兰33.5%，葡萄牙36.6%，德国36.2%希腊31.3%，匈牙利39.3%，冰岛41.4%，爱尔兰32.2%，意大利43.3%，法国43.6%，芬兰43.0%，丹麦48.9%，捷克36.4%，加拿大33.3%，比利时44.4%，澳大利亚30.6%，奥地利41.9%。

通过这样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主要的西方国家政府的支出当中70%以上都是福利支出,这样的支出比例是入不敷出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产生导致现在危机的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

2009 年欧洲各国公开赤字与 GDP 比值



2010 年欧洲各国债务与 GDP 比值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各国的赤字和债务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美国的负债比例也是GDP的100%,日本的比例就更高,西方媒体总说希腊债务危机是希腊

人的懒惰和好福利，但是从上面的统计而言，西方的哪一个国家不是这样的好福利呢？而西方的税收实际上就是与福利的支出相当的，再加上政府的其他开支，这样的债务危机就不可避免了，这也是西方计划经济的一场危机！

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这个福利里面还不包括企业的福利，西方很多企业的福利也是好得惊人的，在计划经济的定义当中对于控制国家的垄断财团们的指令性的计划，也是一种计划经济，我们看一下西方的垄断财团又是怎样“为职工谋福利”的：

在08年金融危机当中令人震惊的是，在AIG获得政府注资850亿美元及贷款378亿美元之后，其高层仍动用44万美元到加州度假、动用8.6万美元到英国狩猎。对此种奢侈习性，连带美国纳税人再次抨击政府动用财政的救市方案。香港财经评论以大摩为例分析，2008年初至危机爆发前已向员工发放薪酬共达107亿美元，超过了大摩目前的总市值！雷曼破产前也支付了61亿美元，摩根大通是65亿美元，高盛114亿美元，美林117亿美元，花旗高达259亿美元。

不少人只注意到厂商垄断、资本垄断对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的危害，其实，工会特权和工会垄断同样会阻碍新技术，阻碍生产力的提高，形成社会经济之癌。汽车工人工会是美国最大的工会之一，就叫做联合汽车工会（UAW），他们在工资增加、福利增加、医疗方面是寸土不让的，他们现在还要求通用减少在墨西哥和外国的生产，要把产能转移回到美国。为保住汽车工会成员的高工资高福利和工作岗位，汽车工会不允许美国汽车公司管理层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引用新技术和进行业务重组以及减员增效，被裁减的工人只能下岗，下岗后继续享受原有工资和福利待遇。美国大学教员的平均工资是年薪 $73,207美元，其中有27%是福利。笔者所见到的大部分教员的年薪，包括福利在内应该是9万美元，比通用汽车工人少6000美元以上。这样的工资水平，还有退休、医疗加起来，比计划经济的国企待遇还要好。

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当中的资产规模也是庞大的，截止2011年6月30日，美国私人养老金总资产达18.2万亿美元，占全美家庭金融资产的比例为37%。如果再加上美国公共养老金总资产2.609万亿美元，则全美养老金总资产达20.844万亿美元，占全美家庭金融资产的比例高达42.3%。截止2011年6月30日收市，美国国内股票总市值为17.858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不仅全美养老金总资产超过了美国国内股票总市值，而且私人养老金总资产也超过了美国国内股票总市值，更不要说是超过GDP很多了。

美国养老保障体系主要以稳健著称,被人们形象地称为“三条腿的板凳”。其中,第一条腿就是全国统筹的社会养老保险(OASDI)计划,它是美国人养老保障的最重要“精神支柱”;第二条腿是指雇主发起设立的私人养老金(欧洲称为“职业年金”,我国称为“企业年金”),它包括以401(K)为代表的DC计划,还有传统的DB计划;第三条腿则是家庭个人开设的个人退休账户(IRA)或购买的商业人寿保单,以及家庭用于养老目的的住房、储蓄或投资等自我保障计划。美国的养老金等都是在专业机构的管理下,实际上也是实行计划经济体系的,除了政府的全国统筹的养老金以外,最多的是私人养老计划,由企业福利和工会组织来帮助完成的是大部分,私人家庭的只不过是补充,政府和垄断企业的养老金实际上都是计划性的。

从养老金投资结构来看,美国比较保守,中国比较开放。在公共养老保障基金投资上,美国社会养老保险(OASDI)基金自创设以来一直坚持不入市,并规定当年收支结余只能投资财政部特别发行的国债。同样,中国地方社会保险基金也是不允许入市的,只能存款或购买国债,但由中央政府单独设立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则可以入市投资股票和基金。与此同时,在私人养老基金投资上,以401(K)为代表的美国私人养老金可以入市投资,而且重点投资共同基金,股票型基金投资占比高达50%左右,但股票投资一般不超过20%。在中国,企业年金同样可以入市投资,其中,股票投资比例不得超过30%。养老金的资金是政府国债的主要购买者,与政府管理养老等社会保障形成了循环,这就是政府控制和计划的产物。

在西方的福利体系里面,慈善也是一个主要的方面,2000年以来美国每年的慈善捐赠总额都在2 000亿美元以上,2007年突破性地达到3 060亿美元。从相对规模来看,2007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占到当年GDP的2.21%。从慈善捐赠的流向来看,美国的慈善捐赠主要流向了宗教、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事业等领域。慈善方面也是非市场化运营的,西方主张的全面市场化是一个伪命题。

西方的福利体系,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主义体制,我们一般只认识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西方其实在存在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成分,法国社会党就执政很长时间,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党的目标,更有北欧式的社会主义,以瑞典为代表,从1920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执政直到现在,虽然执政几度易手,但大多数时间还是社会民主党执政,在此期间(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把瑞典从一个落后国家建设成世界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前几位的经济发达国家,从社会福利来说,则是第一位,标志着分配的社会化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而现在北欧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得到西方世界广泛认可的,西方的福利建设也是朝着北欧的方式演进,因为西方的选民胃口

就是不断地增加福利，有北欧的榜样在，所有的西方国家的福利体系建设就朝着这样的方向在发展，所以西方是在逐步向社会主义方向迈进的。

所以我们看到西方庞大的社会福利体系，就知道西方计划经济的成分实际上是要超过他们的市场经济成分的，在福利社会的主导之下，西方实际上是一个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是一个社会福利为核心的信用体系。而中国现在却是一个全方位的市场化的体系，我们的医疗、教育、住房等全部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原有的公有制城市全民计划福利体系是被打破的，而中国的农村计划经济福利体系的建设才刚刚开始，养儿防老的传统经济模式是中国养老保障的根本，中国人的福利保障实际上是由子女承担为主的传统经济模式，考虑到这个经济模式的规模，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崛起的过程中，传统经济是主导而不是计划经济为主导。

西方福利体系为主的社会是计划经济为主导，所谓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博弈场，是一个产品交换的经济行为和竞争、套利、侵占、赌博、再分配等掠夺行为并存的平台，完全依靠市场经济就是一个美丽的天堂神话，西方人自己都不相信的。

二、信用社会的瓦解伴随着巨大的财富再分配

当今社会是信用社会，而信用社会的瓦解是伴随着物质财富的巨大再分配的，这是一个系统性的掠夺和反掠夺的过程。

我们知道货币是信用的一种体现，在信用社会瓦解、信用崩溃的时候，货币的信用肯定也是要崩溃的，货币信用的崩溃就体现在恶性通胀的发生，恶性通胀之下你的现金会遭受巨大的损失，在经济生活当中，你是不可能手上没有一点儿现金的，在经济越发达、金融化程度越高的社会，人们不得不持有现金的情况就越多，这个社会的货币如果是现代货币不是贵金属要绑定国家信用的话，货币的恶性通胀就更大，恶性通胀将席卷社会的财富。

信用体系的崩溃还体现在商业运行中违约现象暴增，违约使得社会进入了双输的博弈，违约的背后伴随着非法占有和得利，这样的违约横行进一步加剧了财富的非正常转移。

在信用崩溃的时候，破产也会大量发生，在破产和违约的压力下，人们倾向于停止生产和交易，这样就要使得经济的运转停下来，经济运转停滞的结果反过来也加剧危机，加剧供给不足和通胀的发展，使得信用危机正反馈扩大。

现代社会是有证券等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信用的危机使得衍生品市场的交易体系崩溃,各种的投机资金的存在和获取暴利,使得正常的交易和投资反而无法继续,市场就要向过度投机的方向转化,过度投机后的泡沫破裂进一步造成新的信用危机。

如果信用危机造成市场供应体系混乱,尤其是粮食等刚需物品的供应体系恐慌,必然造成社会的政治危机,政治危机会使得国家强制力保障的司法体系崩溃,社会纠纷需要司法来解决,产权需要司法来维护,司法体系的混乱的结果就是社会的产权体系也要出问题。

现代社会,所有人的财富都是在信用体系上构建的,货币是信用体系产权也是,债权更是,在信用体系崩溃坍塌以后,社会的财富体系也就不存在了,这些财富归属权这样的问题就要出现了,新的信用体系的构建就是新的财富归属权的确权,就是新发行货币替代恶性通胀的老货币,这样的重建就是一个财富的重新分配;因此信用战就是再分配社会财富的战争,信用体系完了就是你的财富完了,信用的变化实质上就是财富的变化,财富的变化受信用元规则的支配。

三、福利信用与经济空心化

西方建立了庞大的福利体系,这些福利体系是西方社会信用的根本,而且在西方政府不断被选民绑架的情况下,福利体系是只能扩大不能缩小的。但是在负利率挤爆社会保障的保险体系的同时,政府的各种福利救济等工作,也因为经济的空心化和征税权的外流而陷于困境。

西方的福利体系出现巨大的问题,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制造业的大转移,制造业转移导致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征税权的转移。在产品制造环节本来应当由发达国家政府征税的,变成了由产品生产国家征税了,这些税源的外流,直接导致西方政府的税收水平直线下降。在本轮危机当中,拥有良好制造业的国家如德国的处境就最好,而另一个制造业大国日本,虽然负债与 GDP 的比值最高,但是日本的处境也大大好于欧洲国家。西方国家的税收大部分都是用来支撑其福利信用体系的,税收不足对于福利体系的影响是巨大的。

西方无比发达的福利的结果,就是通过这样的高工资制度在国际贸易当中取得相应溢价;因为看似等价国际间交换,是在不同的劳动力价格上形成的所谓等价交换,如果以同等的劳动量来计算,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贸易就不再是等

价交换了！如果再考虑其中资源的价值，则这样的操作还大量赚取了资源。

但是西方的高福利维持劳动力的高价赚取国际贸易利益进行信用剥削的体系，在运转过程中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副作用，就是高工资赚取进口利益和资源利益时，高工资也同时会让本国的实体经济埋单，实际上就是使得西方人的工资收入高到了不合理的地步，让制造业的竞争力严重不足，制造业的外迁就是定局了；而制造业的外迁又影响国家的税收，税收低了又影响社会福利信用体系的循环，造成连锁反应和恶性反馈。

在这次危机当中希腊的福利被炒作的最厉害，似乎希腊人就是懒惰的代名词，希腊的福利被各种西方媒体妖魔化地传播着！但是我们如果对比一下，希腊人的福利远不如北欧这些著名福利国家的福利好，甚至比不上美国汽车工人的福利好。而希腊的福利体系为什么要崩盘，就是制造业都不在希腊上税，希腊的税收资源面临枯竭。

大家都说希腊加入欧盟是赚了欧盟的便宜，但是我们怎么对于欧盟从希腊得到什么好处视而不见呢？希腊的好环境是欧盟各国富豪和国民享乐的好地方，希腊爱琴海的地中海气候是世界上最宜人的气候和风光宝地，由于希腊加入了欧盟，欧洲各国人都可以到希腊享受好时光了，但是他们都不给希腊上税，却要享受希腊的公共服务，因此希腊财政本身就是需要欧盟各国支持的，就如在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就是要进行财政平衡的；很多地方征税就是占有了其他地区的好处，如果没有关税，就应当进行地区之间的补贴，就如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知道要“平准”和“输均”（见《盐铁论》），所以世界制造业大转移确实给西方的福利社会和信用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在西方政府税收不足的情况下，印钞就成了常态；西方政府在二战以后进入福利社会，然后制造业外迁，然后就开始不断印钞。很多人认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印钞会不断收割世界，但是著者认为这样的想法也是片面的，现在西方福利制度的破局，与西方过于仰赖印钞也是有关的，这里不仅仅是有制造业外迁的影响，印钞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在制造业外迁以后，西方的金融统治集团就是通过印钞来剪羊毛的，印钞给西方的金融统治者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印钞也剪了西方福利体系的羊毛，原因就是西方福利体系当中除了依靠福利维持的体系以外，更有很多养老金、社会保险等是依靠资金的投资取得收益来维持的，印钞使得资源的价格涨到了天上，现在美国不再推动大规模的量化宽松的背后，就是资源价格的暴涨，美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大部分都是资源消费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统治集团是一个资源消费的金字

塔尖上的食肉集团,所以让资源涨价得利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干的,再进一步宽松的结果就是资源国家上天堂,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当中资源丰富的国家在这一次信用危机当中都是日子过得最滋润的国家。美国是控制全球货币权的国家,美国不印钞以后,欧洲其他国家就要受到无比的压力,如果未来美国再度印钞释放流动性的话,必然是有些国家倒下,然后美元抢占他们的资源版图,去抢占胜利果实了。因此现在在印钞也走不通的时候,福利信用体系的入不敷出就要成为信用危机了。

西方每一届政府对于选民的承诺中关于社会福利的方面都是有增无减的,西方的福利体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也是无法及时变革的,西方福利体系的增长是快于西方财政收入的增加的,结果就是西方的财政收入被福利体系绑架,国家赤字不说,整个福利体系陷入了寅吃卯粮的地步。我们拿美国来说,平均每一个美国人要给信用福利体系 11 万美元,却要从这个信用系统拿走 37 万美元,也就是每一个美国人要从信用体系无偿得到 26 万美元,这个体系是美国巨大的包袱。如果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等所有隐性债务统统加在一起,那么,2007 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高达 53 万亿美元。如果我们把诸如"两房债券"那样的抵押债券、美国各大财团所发行的、说不清是公司债还是政府债务以及市政债券等——总计 20 万亿美元(依据 2007 年末美国国债协会 SIFMA 统计,现在这些债务在连年赤字的情况下只能大幅度增加)的债务再统计进来,那美国债务更是高达 73 万亿美元。按照 2007 年的市场公允价格计算,美国全部资产的总市值约 76 万亿美元(来源:中国经济周刊),而危机后这个市值已经缩水 30% 以上——最多还剩 50 万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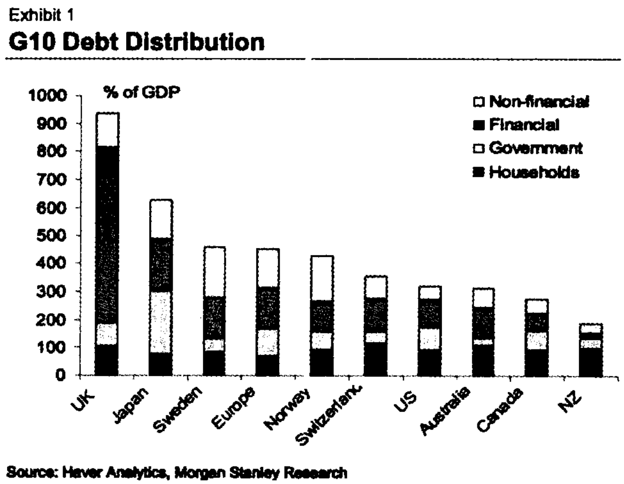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73 万亿美元的债务,50 万亿美元的资产,意味着美国已经资不抵债;而这种财务状况,放到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早该破产了。现代西方的福利信用体系就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一个庞氏骗局,维持庞氏骗局就是不断地制造泡沫和寅吃卯粮,直到有人坚持不住倒下为止,目前世界就是在博弈谁先倒下,等待着吃倒下动物的腐肉来渡过危机。西方的福利信用体系在进入到庞氏骗局来维持的时候就已经实际上被挤爆了,最终的庞氏骗局崩盘博弈的戏码正在进行着。

西方社保之所以有这样大的隐形负债,前面的章节已经论述了负利率对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负利率使得民众的社保资金没有足够的增值造成巨大的问题,但是西方的政府在税收权外流以后进入到赤字时代,政府的负债与 GDP 的比值早已经超过警戒线,如果不是接近零利率的实际负利率政策,政府将出现巨大的财务成本,我们可以想一下美国政府的 15 万亿美元左右的负债如果利率达到 5%,则仅仅是利息就要达到 7500 亿美元,美国如何能够还债?美国的财务收入增长是绝对

赶不上债务的利息的，而美国此时如果再印钞，导致的资源价格暴涨和通胀，一样会让美国的政府成为黑洞，原因就是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会随着印钞和通胀上涨得更快。

下面摩根士丹利的图，英国和日本是全球债务最深重的国家：

英国总债务（包括非金融、金融、政府和家庭债务）占 GDP 比重接近 1000%。



<u>**小资料：庞氏骗局**</u>

查尔斯·庞齐（Charles Ponzi）是一位生活在 19、20 世纪的意大利裔投机商，1903 年移民到美国，1919 年他开始策划一个阴谋，骗人向一个事实上子虚乌有的企业投资，许诺投资者将在三个月内得到 40% 的利润回报，然后，狡猾的庞齐把新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的人，以诱使更多的人上当。由于前期投资的人回报丰厚，庞齐成功地在七个月内吸引了三万名投资者，这场阴谋持续了一年之久，才让被利益冲昏头脑的人们清醒过来，后人称之为“庞氏骗局”。

四、福利信用的崩溃意味着什么

福利社会给西方世界带来了什么呢？为什么西方国家要不惜一切来维护这个福利体系呢？福利体系又怎样给一个国家带来了核心价值呢？认识到这些我们才可以真正认识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来源，这个差距就是劳动力价格的差

距,同工不同酬,发达国家的福利体系保障了发达国家高昂的劳动力价格,保障了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格的巨大差距,这样的差距在贸易当中看似等价交换的贸易,实际上还原成同样的劳动,就是劳动时间的不等价交换,或者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不等价交换,我们如果还认定价值来源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话,就是价值的不等价交换,这就直接造成了剥削;如果我们的价值还包含了资源,那么劳动力价值高的国家在交易的过程中商品的资源含量就低,直接造成了资源的再分配。

对于劳动力价格的变化规律,我们可以先从劳动力供给曲线特殊性上进行理论认识,劳动力供给曲线是后弯的,不同于一般的供需曲线。萨缪尔逊(P. A. Samuelson)和诺德豪斯(W. D. Nordhaus)在谈到后弯的供给曲线时用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劳动供给,一个是70年代的石油危机时的石油供给。这两个例子的现象虽然相同:都是随着价格上涨而先供给增加,然后随着价格的继续上涨而供给减少。劳动供给取决于工资变动所引起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随着工资增加,由于替代效应的作用,家庭用工作代替闲暇,从而劳动供给增加;同时,随着工资增加,由于收入效应的作用,家庭需要更多的闲暇,从而劳动供给减少;当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时,劳动供给随工资增加而增加,当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时,劳动供给随工资增加而减少。一般规律是,当工资较低时,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当工资达到某个较高水平时,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因此,劳动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

就一个人的生活质量而言,劳动时间(想获得一定数量的收入而必须投入的时间)和闲暇时间基本是替代品,但一定程度上又是互补品。收入和闲暇都能给自己带来幸福,并且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又是此消彼长的,所以它们是替代品。同时,如果有了一定的收入做保障,闲暇时的享受质量可以更高一些,所以收入对闲暇有互补的作用,这样超过一个节点之后就造成劳动力供给曲线随价格增加后反而供给减少。而更进一步的是在劳动力价格处于低位的时候,大家为了生存,则不得不加强工作取得足够支持自己生存的收入,因此在这样的后弯曲线下,就表现在价格降低反而所提供的劳动力更多了,不是一般传统供需曲线的随价格降低而减少。

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的社会福利之下,人们的劳动力供给与价格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人们在社会保障体系下有足够的社会保障,人们失业以后是不会着急生存去找低廉的工作的,尤其是不会牺牲自己的闲暇舒适去找工作,这样劳动力的价格就不会过低,保持了西方社会在危机当中,即使是失业率高企的时候,西方的工资等劳动力价格也不会下降!反而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很多人的收入过低,他们就必须要拼命地工作以挣足工资满足自己的生存,中国古代的农业

内卷化就是如此,西方在马克思时代的工人要每天劳作 15 个小时也是如此,中国现在的农民工在血汗工厂里面要干 12 个小时以上还是如此,这样的现象都体现在后弯的劳动力曲线之上。

这样的曲线在全球不同地区是同时存在的,发达国家以完善的社保福利体系的国家信用维持劳动力价格在后弯曲线的上方,使得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形成的劳动力价格的均衡点位置很高决定了发达国家的高工资;而发展中国家因为国家信用有限和社会财富积累不足建立不起福利保障体系,老百姓迫于生计则不得不在供给曲线后弯的下方,使得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形成的劳动力价格的均衡点位置很低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现在在中国的人口红利还没有过去,生育高峰的劳动力还没有老去的时候,中国很多地方就出现了用工荒,背后就是人们财富积累多了以后,尤其是在独生子女从小丰富的物质生活基础上,没有人愿意干血汗工厂了,人们寻求生活乐趣,工作时间大幅度地缩短,中国的社会信用提高了,中国的社保覆盖提高了,大家为了养老和医疗而拼命工作的动力大幅度下降,供给的减少造成了工资的提升。

因此我们看到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老百姓的工资是 10 倍以上甚至 100 倍的差距,背后就是福利体系的差距;同时西方不合理的福利体系维持了他们不合理的高工资,这些高工资之下,维系了他们高额的 GDP! 这是国家信用体系的差别,同工不同酬就是剥削。但是很多西方的思潮把这个现象解释成为西方科技的力量以此掩盖国家信用力量的剥削效应,如果真的是科技力量的话,那么从事科技研究的劳动者收入更高才对,但是我们在美国社会看到的却是汽车工人的工资要超过大学教授! 这里福利体系是有绝对的信用价值的,会产生信用的剥削。

我们认识到了劳动力价格不同的差别,在国际贸易当中就是不平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交易,就是不平等交易;而信用体系的坍塌影响还不仅仅局限于国际之间的贸易,还影响到国内的 GDP 和通胀,因为 GDP 的计算主要是要依据劳动力价格,GDP 根据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收入份额以及因从事生产活动向政府支付的份额的角度来计算,由全国各行业汇总的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生产税 - 生产补贴)、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部分组成。计算公式为:

GDP = 劳动者报酬 + 生产税净额 + 固定资产折旧 + 营业盈余

劳动者的报酬降低会直接降低国家的 GDP,发达国家的 GDP 当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高达 60% 左右,如果信用体系崩盘,则他们的 GDP 将大幅度下跌,与此同时他们的社会财富,将按照新的劳动力价格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价值重估,社会财富存量的重估价值也将大幅度地缩水,而 GDP 和社会财富存量是一个国家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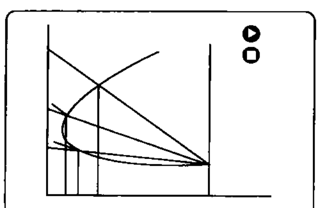
融和经济信用的根本，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货币信用；在这个信用体系坍塌的情况下，GDP 缩水、社会财富积累量的价值缩水，必然造成原来货币的发行量相对过高，必然使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和恶性通胀！但是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的信用提高了，劳动力的价值提高了，这个国家的 GDP 和社会财富积累重估提高了，这个国家的货币就有升值的空间，但是与前面不同的是，这不是简单的反转变成通缩，因为在现代银行金融体制下，央行发行货币是非常容易的，中国广义货币 M2 的连年增长也就是如此，这里不对等的原因就是货币超发、收回货币是困难的，货币数量不足增发货币是容易的，这就是泼水容易但覆水难收的道理。

因此如果出现福利体系的崩盘，国家信用必然坍塌，恶性通胀和货币贬值必然发生，因此欧债危机再大，美日的负债再高，政府也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这个福利体系。西方的金融资本大鳄不惜减债和广施慈善也要维护这个体系，出发点并不是简单的资本家良心发现，而是资本家的核心利益，因为如果出现福利体系崩盘的信用坍塌，是要发生恶性通胀或者恶性贬值的，是要把有产者的资产剥夺光的，首当其冲的是金融资本大鳄的利益。大鳄们不是雷锋也不是慈善家。

背景资料：后弯的劳动供给曲线

劳动供给曲线的形状表现为一条向后弯曲的曲线。它指劳动供给曲线呈现出的劳动供给量随着工资上升先增加后逐渐减少的特征。

参见图 1 和图 2，横轴 H 为闲暇，纵轴 Y 为收入，E 为初始状态点。当劳动价格工资为 W0 时，可以得到相应的预算线 EK0，与 U0 相切于 A。当价格上升到 W1，W2 时，相应的预算线 EK1，EK2 分别与 U1，U2 相切于 B，C 点。每一个切点都对应着一个最优闲暇量 H0，H1，H2。相应的劳动供给量分别为(16 - H0)，(16 - H1)，(16 - H2)。于是可得劳动供给曲线上三个点 a，b，c。连接 A，B，C 得价格扩展线 PEP，连接 a，b，c 得劳动供给曲线 S。



后弯劳动供给曲线

图：时间资源在闲暇和劳动供给之间的分配

劳动供给曲线是向后弯的，当 W 较低时，随着 W 的上升，消费者将减少闲暇，增加劳动供给，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当工资涨到 W1 时，劳动供给量达最 大。继续增加工资，劳动供给量不增加反而减少，劳动供给量从 W1 处起开始向后弯曲。

五、博弈世界信用体系的重建

由于西方不断膨胀的福利体系，世界的资源不足，资源压力是巨大的，而且也没有足够人的工作，西方福利体系下一个养老的人，实际上是需要全球化的劳动服务来支持的，是必须有中国这样的廉价劳动力支持的，但是中国等国家自身的发展，使这样的输送会越来越少，此时的庞大福利体系就要崩溃和重建。所有国家都具备高标准的福利体系是不可能的，因此很多国家陷入了因为福利高企而引发的债务危机。世界很多福利体系运转良好的发达国家，基本都是资源国家，北欧社会主义福利体系能够运转良好的背后是北欧丰富的资源和稀少的人口。

西方国家信用体系是不断依靠印钞来维持的，已经存在巨大的隐形债务，西方的信用体系是要建立在 20% 的人口占有 80% 的资源的基础上的，每一次大国崛起，都要带来这样的变化。美国崛起的实质是美国当时(1900 年)近 8000 万人口要加入到全球工业化人口中来。当时全球老牌工业化人群也就差不多 8000 万。美国的崛起是 20 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结果之一是工业品价格的长期走低。这导致了原有世界帝国——英国的利润大幅减低，并最终影响了其全球霸权。现在世界工业化人口也差不多在 10 亿左右(欧美日加部分东亚俄罗斯韩国)，这是世界 20% 的人口占有 80% 的资源的二八规则的生动体现。

中国崛起将是与美国崛起类似的、另一个与崛起之前全球工业化人口规模差不多大的经济体崛起的历史事件，将是 21 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这将使工业化发达社会的人口翻倍，同时使得世界的百分之 40% 的人进入发达和工业化。历史的宿命是，要打破二八定律是异常艰难的过程，其间也可能是二八定律继续维持、而原有发达世界有国家没落或者中国不能让所有人口完全进入发达社会。这是一个艰巨的矛盾，足以引发世界信用体系的重建。

当年英国打败荷兰而崛起，结果之一是世界富裕人口翻倍，直接导致重新划分

殖民地。英国的崛起是伴随着日不落帝国的成长的,广袤的殖民地给英国这样崛起的基础。美国的崛起是世界富裕人口翻倍,需要英国释放资源,这是通过二次世界大战来完成的,世界大战的结果就是英帝国解体,目前英国只不过是一个大西洋岛国了。这些殖民地的解体使得美元成为世界的霸主,如果没有英国的解体,英联邦国家到今天贸易肯定是要使用本国货币英镑的!更何况他们是一个国家还有海关等贸易限制。

现在中国崛起了还是世界富裕人口翻倍的事件,世界信用体系必然重新划分;而中国能够崛起,在前期也是与苏联解体产生的资源释放效应分不开的,现在俄罗斯出口石油2.5亿吨左右,中国进口石油也是2.5亿吨,中国的崛起是需要有人释放资源的,需要有新的资源信用体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中国享受美国人那样的资源,将是世界的灾难,他的意思就是世界的资源要重新划分。

回顾历史,西班牙、葡萄牙的崛起,是伴随着伟大的地理大发现和奴役黑奴的,大量黄金白银从美洲被抢劫到欧洲,造成印加文明的灭亡,是侵略和掠夺造成的发达,是血腥屠杀和奴隶制建立的信用体系;其后的荷兰的发达与鹿特丹的高利贷者关系很大,荷兰的金融业和宗教改革带来了活力,东西方的海运贸易创造了财富,这就需要货币和金融定价权了;而英国的崛起,就比这些国家付出的代价要大,不是简单地进行抢劫和奴隶奴役,也不是仅仅通过贸易就可以发达了,光让英镑成为世界货币,仅仅有独步天下的英格兰银行是不足的,还需要进行必要的工业生产,是依靠产业工业化才发达的,是需要有工业化与银行相结合的金融资本的;而美国的崛起,在英国的金融霸权的基础上,更与技术革命、电磁学、现代物理理论的大发展有关,是需要新的信息社会的浪潮的。现在中国能够崛起,某种意义上还是拜信息浪潮所赐,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国家管理成本下降,在规模与管理成本的对比下,集权式的"大帝国"重新发挥了规模优势,信息化的结果是大国的优势,尤其是人口和制造业大国管理成本下降所带来的优势,这样的优势在原有的信用体系当中竞争,促进了新的世界信用体系的诞生。

中国威胁论的来源与当时美国威胁论一样,本质上是世界权力资源分配的问题,是中国打破了原有的信用体系,改变了信用体系的分配规则的问题。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谁先完成工业化,谁就先成为肉食动物,就在地球这个丛林社会中掌握发言权。英国首先工业化,当时就它一家,工业品少资源多,于是它可以为所欲为,它其实不需要收买资源,只要强夺就可以了。美国其实已经来晚了,所以它付出的代价比英国大得多;在殖民地时代,美国与他国打交道开出的条件也是各帝国中

最温和的，有点收买的意思。想一下当年美国对于中国的支持和友好，美国掏腰包给中国建造了最好的大学和最好的医院，就可以知道这样的代价有多么巨大，由此也应当可以理解我们对于非洲的援助。

中国现在要崛起，就是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中国人需要承受更高的社会痛苦，现在很多人让中国人与西方看齐，让中国人与西方一样的高消费和享受生活，中国没有足够的信用时是不成的，因为不会有那么多的资源供给你，作为一个超级人口大国，消费是要讲人均的，世界无法供给你需要的人均资源就会造成恶性通胀吞噬发展成果，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结果就是中国永远赶不上西方。中国要超过西方，需要的就是保障供给的信用体系，要在新的世界信用体系的重建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现在世界在中国崛起下就是要重新建立新体系，日本等小国的崛起是不会对体系造成类似根本性变革影响的，因为其需求规模既有国际市场可以满足，也不用改变现有的世界格局；而中国崛起必然改变世界的格局，现在世界的格局在改变，与中国的崛起有关；西方人均消费的资源大大高于中国人本人是不公平的，因为中国人的人权应当与其他人平等，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消费资源的权利，所以美国黑人总统奥巴马暗示说中国人消费要比美国人少是侵犯人权的。现在中国要崛起，毫无疑问，要付出的代价比美国那时候还要高得多，因为中国与西方还有信仰和种族的差异和冲突。现在已经是个工业品多资源少的时代，中国要“收买”资源国家，无疑要收紧裤腰带多干些苦力活，而资源价格也节节上涨，这是我们为落后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现在世界在危机当中，全球的信用体系要重建，在重建当中怎样保障中国的地位是问题的关键。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都是资源和信用的重新划分，现在也是为了划分而进行的新“世界大战”。中国崛起以后，西方人是不能如以前那样消费资源的，这就要造成西方的危机，现在就是这个危机的起始阶段，在这样的阶段下是西方有人倒下释放资源、还是中国崛起被遏制，才是世界博弈的焦点。中国想要联合西方人的想法是幼稚的，此时要做的就是中国人要自强，要自强不息！

你想要联合对方的结果，是对方正想着要出卖你，世界就是这样的丛林法则。美国的老大地位是难以撼动的，于是矛盾就变成了中国和西方二流发达国家谁倒下的问题，你想要联合他们一起打败老大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想一下别人会愿意与你一起干掉老大，还是跟随老大有酒有肉？

中国购买所有发达国家的国债就是持有所有发达国家的白条，这与仅仅持有

美国国债是不同的,中国要是供养所有的发达国家,那么中国肯定是供不起的,也是注定要当奴隶的,如果中国只供养最发达的国家,则其他国家要释放资源来换取中国的产品,中国人的勤劳才可能有回报!中国是不得不缴纳保护费的,因为世界霸主要支付巨大的军费,当老大也是要有额外支出的。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改变人均非常落后的局面,只要中国能够达到世界人均水平以上就可以了,指望达到世界第一的享乐标准是不现实的。

现在就是世界为信用而大战的时刻,也是国际信用体系重建的时刻,中国必须深刻认识信用元规则,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否则中国就将失去崛起的良机!

六、中国在全球新信用体系的竞争优势在哪里

对于正在孕育中的全球新信用体系,中国需要做的就是要博弈自身在新体系当中的位置,中国能够博弈的王牌在哪里呢?著者认为未来中国涨工资和征税权是博弈世界的利器。中国的崛起需要以中国人的高工资来实现,中国人的政府收入也是要以政府的全球征税能力来实现的,税收未必是国人埋单,税收也未必是针对本国的GDP,这里也有国人的误区,对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

中国的低工资实际上就是资源的流失。以前很多学者都认为通过加工出口,每进入中国的加工费都是中国从经济体外得到了收入,因此中国的主流经济理论支持下政策是大力扶持中国的出口加工工业的,并且把这样的工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但是我们要知道劳务的输出和对外加工也是要消耗成本的,这成本实际上是中国的资源外流。过于低廉的出口加工,实际上就是在输出中国的劳动力所必需消耗的资源,就是在输出这些劳动者生存必需的粮食、能源、土地等等,对于劳动者所必需的资源不仅仅是劳动者劳动时的消耗,还要计算劳动者的培养、成长的消耗,还要计算劳动者养家的消耗,还要计算劳动者养老、养病的消耗等等,这样的消耗是很大的。西方国家同样的劳动力为什么贵,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的劳动力在上述问题上的消耗要远远高于我们!

我们很多沿海地区依靠加工出口的经济发达,我们要分析其中的原因的,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不承担外来人口的附加消耗。在沿海打工的劳动者的成长、义务教育、养老等等是劳动者户口所在地承担的,如果让这些流入的外来务工者享受与本地人同样的待遇,让他们能够享有房产和社保,享有户口和子女义务教育,沿海很多地区就没有那样发达了,因此很多地区是限制他们外来落户的!

对于劳务输出地区，由于现在的人口是计划生育以前生育高峰时的人口为主力，这些人口还没有到要地方负担养老的时候，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他们抚养的人数和成本也受到控制。同时由于当时的出生率高，大量的农村富裕劳动力是没有工作的，劳动力供给的边际效应是明显的，所有这些都与中国当前的人口红利等等有关，在中国人口红利过去以后这样的情况都要改变。中国的廉价加工实际上就是中国的粮食等资源的流失。西方让中国这样的廉价加工出口，就是让中国这些出口企业的劳动力所消耗的资源出口，让西方占有和享受中国的人口红利而把灾难留给中国人的子孙。

对此著者时时记得很多年前与西方买办假洋鬼子的一段对话，该假洋鬼子说他对于中国做加工的赚钱规则，就是要把价格压榨到只够给中国人付一半工资的程度，你不干就没有钱吃饭而你要有全部的工资就只能是加班干！这样的买办比贪官还可恶，但是该买办还自诩自己自力更生没有贪污腐败。

现在中国涨工资就是要让全球为中国人的高消费埋单，涨工资是西方资本家最不愿意的，尤其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以后，中国涨工资是要全球埋单的。西方的金融资本之所以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热衷于紧缩、涨利率，实际上是金融资本要在实体经济发展中分一杯羹，经济向好了以后他们把利息增加的背后就是他们的金融资本收取的利益增加。金融资本是以利息的方式与实体经济分享利益的，因此以紧缩防止经济过热论调的背后，也是有西方的利益取向的。中国老百姓工资收入的增长，在全球通胀的模式下不能慢于通胀的发展，否则老百姓收入有限的结果就是产业所收到的加工费用的实际降低。

在通胀的模式下世界各国都是收入随通胀增长的，中国的收入增加与世界相比没有相对性的变化，不会给中国造成竞争的劣势，反而是中国收入不变被外国找一个所谓的市场经济替代国家可以计算出你的倾销要被西方恶意的征收反倾销税，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是一个有机运行的整体，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加实际上与中国的外贸平衡和外汇安全也是息息相关的，西方说中国增加老百姓收入和涨工资会引发通胀，但是要知道的是中国是世界工厂，中国涨工资的成本是消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人埋单的，也就是中国涨工资收入增加的是中国人，而承担涨工资的通胀成本的却是全球，这才是中国博弈全球通胀的制胜之道。

在涨工资之外，税收也是重要的手段，因为制造业在谁那里，谁就有征税权！在外向型经济下，为税收埋单的就是全球了，政府高税收和大型国企是要扒外国资本的皮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是全球产业和国际贸易链条当中的重要一环，中

国为全世界提供制造业服务,而西方使用中国制造的产品,就要为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埋单;如果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低,那就是在以本国的劳动力、资源和环境来补贴全世界。

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以后实际上就是向全世界征税,所谓“减税”就是减低外国资本撤离的税收成本!而央企的高服务费也是面向全世界收取服务费。要应对未来的经济博弈,这是必须的。因为西方资本想找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由于其他国家的基础建设不足,西方资本投资的成本实际上更高。西方资本可以通过所谓的定价权压低中国企业的利润和人工工资,也就是压低了名义上中国制造的GDP,但是他们无法压低中国的税收和央企的各种服务费用,这是强势政府的征税能力与金融资本全球定价能力的博弈,把中国税收增长简单地与GDP增长进行比较是非常片面的。

说中国的税收高就是中国老百姓的税负痛苦也是片面的,因为很多税收的GDP是向外国GDP征收的,例如中国进口产品的价格里面的增值税17%且没有抵扣,价格却要与国内竞争,这税就是外国GDP承担,而中国出口的产品也是不能100%退税,尤其是营业税不能退税,所以中国的税收里面是包含大量外国GDP和让外国消费者埋单很多的。中国的外贸增长大幅度快于GDP,中国世界工厂的份额增长大幅度快于GDP,当然中国的税收增长也要大幅度高于GDP,其中的速度应当与中国制造在世界的话语权以及中国外贸增长挂钩。

中国成为全球工厂的同时税收也是针对全球征税的。在中国的制造业取得全球竞争能力成为世界工厂以后,中国政府在制造和流通环节的征税能力也就向全球扩张成为全球征税能力。中国制造业过手的财富比中国制造创造的财富要多很多,这些过手的财富都可能成为被课税的对象,这个征税能力对抗的是全球资本的定价能力,定价能力的背后是货币发行能力,没有定价权是无法印钞的,印钞就要恶性通胀,而中国政府的征税恰恰是对抗印钞、对抗中国外汇贬值损失的有力手段。

这样的征税权博弈现在已经非常激烈了。欧盟提出了自己针对他国的税收,这就是碳税。根据欧盟的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起,欧盟将对所有到达和飞离欧盟机场的航班征收超出配额的碳排放税。中国共有33家航空公司在征收名单之内,据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简称“中航协”)初步测算,开征第一年,进出欧盟的中国航空公司将因此增加总成本8亿元人民币,并且这一数字会逐年递增至2020年的30亿元,此间9年累计支出约176亿元。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碳排放税就是针对外

国 GDP 征收的，中国飞往欧洲的航班所创造的价值显然是属于中国的 GDP，碳排放税就是巧立环保名目从中国、美国等外国的航运市场割块肉！所以中、美等国都在抗争。而美国则是开始让海外移民申报资产，这就是要对于这些人的海外资产征税了，因为美国是有遗产税的国家，而且超过 100 万美元就要交税的，而中国核心城市的一套大房子就达到了缴纳遗产税的地步，很多中国的海外移民都被套上了未来要交税的枷锁。

在美国拥有世界的印钞权、可以收取铸币税的情况下，中国是拥有征税权的，中国可以通过征税来抵消货币贬值损失；美国拥有军事优势控制资源和定价权的情况下，中国拥有劳动力优势，中国需要以涨工资来对抗资源涨价，而征税权和涨工资是中国在新信用体系当中的优势；在当今世界的信用体系的重建过程当中，没有美国的金融和军事优势，中国再不利用自身世界工厂的地位、祭出涨工资和征税权两样法宝，其他国家是要给中国让出信用体系里中国崛起的空间的，中国赢得世界信用体系有利位置的关键就在于此，因此中国必须将给老百姓涨工资提高到战略地位；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工资倍增计划是非常合理的，而西方要求中国减税则需要区别对待，中国老百姓的税收要减少，但是绝对不能减少外来资本的税收；欧洲现在搞的碳税和美国要移民申报海外资产，都是要对外国资产和 GDP 征税了。

中国要思考自己在未来全球信用体系的位置，在中国人民币没有国际化的时候，货币信用权利是非常有限的，中国能够影响世界的王牌就是中国的征税权和中国的劳动力，中国要打好自己的王牌。

第二十章　树立对中国未来的信心

现在各种社会舆论散布着中国未来将要有巨大危机的论调，世界银行也给中国开出了药方，社会上流行看空中国经济前景的观点和声音，中国经济的现状果真“冰冷”吗？笔者将以本文作为本书的结尾，让大家更好地看清真相，对中国的未来要树立信心！

很多人认为中国央行增发货币的数量过快、过猛，说中国政府有台“无法监督的印钞机”，据说这台印钞机开足马力，每年增发高达15%的货币投放量，以2010年为例，当年我国GDP为40万亿元人民币，而货币发行量（M2）却达到70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我们每创造1元人民币的财富，央行就发行了1.8元人民币。

然而这看似一目了然的“真相”仔细分析一下就露出了马脚，所谓GDP对应着每一年经济的增量，也就是这一年财富的创造额，财富的创造不等于总的财富量，而货币总量需要对应于当期全社会总的财富量，而且我国的积累率高达40%左右，也就是说每年40万亿元人民币的GDP增量中有多达10万多亿元的积累，在发行货币时就要对应于这个积累，所以中国货币发行必须相应增加，否则就是紧缩。

西方的积累率经常不到1%，对于美国每年15万亿美元的GDP而言，也就是每年增加不到2000亿美元的财富量，所以美国广义货币M2就只能增加那么多。而美国广义货币比中国少，还因为其金融衍生品等市场可以替代货币的流动性，如果计算衍生品市场的话，美国的超广义货币M3、M4、M5要比中国货币多得多，几乎是个天文数字。社会这些舆论偷换了“当年GDP财富增量”与“社会流通当中财富总量”两个概念，并以此作为全文立论的基础。而很多蛊惑人的“理论”之所以能够迷惑人，不在于其后的逻辑推导，而在于前提上偷换概念，将错误的前提公理化，使得人们在错误的前提下越走越远。

还有一些人以美国一个产业工人的劳动收入供养4.8人、德英法是1:6.8、韩日是1:3.8、我国劳动供养率仅为1:1.1的统计数据为根据，指责中国劳动者收入过低。虽然我国劳动者收入确实偏低，但这个立论的前提也是有问题的。同样的数

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中国的GDP构成中工农业生产总值等实体产业所占的比例,远高于第三产业发达的欧美日韩诸国。进一步讲,就是这些国家工业化进程用力过猛,产业工人供养率偏高是他们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问题。

再者,中国的劳动力供养比例如果仅仅看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构成确实是1:1.1,但问题是中国是世界的制造业工厂,中国劳动力所生产的产品实际上供应全球,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如此之低,也是因为能够从中国购买廉价商品。而如今,已经习惯了奢侈生活的西方社会,已经在为他们的懒惰而造成的制造业空心化而担忧了。

我们再想一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时代,80%的人口是农民,20%的工业人口一样满足了中国的制造需要,我们能够说在那个时候是1个中国产业工人养活5个人吗?因此所谓"中国制造业人口养活的人口比较少"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GDP每增长1%大致能创造出2000万个就业岗位,"保8"就是保证每年新增1.6亿个就业岗位,所以"保8"的核心是就业问题。对此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那就是中国当前是人口红利阶段,需要更多的就业,而且这些就业人口大多是在进行基础建设,而这些基础建设将成为中国社会的财富和资源积累,想一下等到60后、70后这一代人口高峰的人群老去以后,中国还有足够的劳动力进行国家大规模建设吗?80后、90后又有多少是建筑产业工人?

中国如果有大约2亿人的人口红利,那么合理的逻辑就是处在建设期的中国,就是要增长8%以上,所以中国"保8"保就业恰恰是正确之举,无可指责。处在建设期的中国就是要维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这个建设期和建设投资回收期肯定要比收费公路的收费年限多得多!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看,中国的"保8"是支持中国贷款利率5%~6%的保障,只有增长高于利率,大量的投资建设才是合理的,而中国要崛起不是GDP有多少,而是社会财富有多少,因此前面说的积累率高是非常重要的,所有这些都是紧密联系在同一个体系之中的。

更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极大地妖魔化了中国的房地产经济,说中国GDP当中房地产要拿走一大块(15%~20%),但是这个前提也有问题。因为中国房地产业创造的GDP不对应于房价,而对应于房地产当中的建设,土地价格的变化不是GDP!中国房地产业的产业链是非常长的,包括建筑、装修、建材等等,房屋建设创造的GDP中有大量是劳动者的收入,而且建设当中的资源成本价格是资源原有的价值,在统计GDP时是不计算入内的,所以说房地产分流了GDP、老百姓和实体经济没

有得到相应利益的说法是别有用心。

在宏观上我们更要看到,中国的城市化是世界完成城市化进程所需时间的几分之一,相应地中国的城市建设速度就要比世界快几倍。而中国处于建设期,建设量又要快几倍,再加上房地产是要讲人均的,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在中国崛起期的建设规模是现在西方的几十倍也是正常的! 因此"妖魔化"房地产 GDP 是有失偏颇的,曲解房地产 GDP 和房价的关系也不尽然合理。

对于近期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过快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是物流环节出了问题,全世界收费公路有 14 万公里,其中 10 万公里在中国,再加上名目繁多的进场费用等等。但我们的农产品渠道费用高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农产品的问题是价格暴涨暴跌不稳定,不能光看菜烂在地里的时候,也要看"拱猪"、"姜军"、"蒜狠"等价格疯长的时候,而更根本的是中国的粮食年产量是 1 万亿斤,按照每斤 1 元钱的产值也就是 1 万亿元,粮食问题的要害在于安全而不是利润。

中国农业的 GDP 占比只有 5% 左右,而外向型经济的 GDP 却高达十几万亿,中国的收费公路等物流环节服务于外贸和外资企业等出口行业,由此产生的物流费用大部分也由这些外向型经济部门埋单。至于农业问题国家是可以另外补贴的。中国的基础建设收费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组成部分当中外国资本没有定价权的部分,在外国资本通过定价权把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一再压低的时候,中国的各种收费公路等收费是他们无法压低的,如果中国的收费降低,他们就能够进一步地压低中国制造的出口价格。这其中实质上隐含着一个定价权的博弈,所以西方的吹鼓手要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国的基础建设投资运营模式,因为在这个模式下他们要埋单很大一部分。

研究宏观经济,在全球化和大崛起的背景下,一定要有全球的视角,国内的一个经济环节,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已经成为全球博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断章取义地来分析,必然得出片面的结论。

还有一些人将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所谓的政府税收过多和央企垄断问题,认为 2010 年 40 万亿元人民币的 GDP 首先被财政与税收的"抽水机"抽走 8 万亿元以上,这就占到 GDP 的 20%;再被垄断央企(石油、电信、移动、电力、金融等)隐性掠夺走 4 万亿元,大致占到 GDP 的 10%;似乎政府的过高税收和垄断央企成了阻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两大毒瘤。

这就有点滑天下之大稽了。我们要注意到,中国的油价比日本、欧洲、香港等地都要低,只比美国高,而美国低油价的背后是独步天下的巨额军费和全球军事部

署;另外美国电信收费是包月 100 美元左右,中国的平均电信费用有人均 500 元人民币以上吗?中国的电费和银行手续费等收费标准也低于美国。

为什么西方和国内部分媒体要攻击中国国企和政府税收呢?难道外国人这么好,愿意出头给中国老百姓当活雷锋?错!问题的要害就是:政府高税收和大型国企是要扒外国资本的皮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是全球产业和国际贸易链条当中的重要一环,中国为全世界提供制造业服务,而西方使用中国制造的产品,就要为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埋单,如果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低,那就是在以本国的劳动力、资源和环境来补贴全世界。

所以外国舆论及其国内"跟屁虫"以所谓的民生为名不让中国涨电价,其实中国的电价与世界接轨上调合理以后,国家可以补贴居民用电的增加费用,而目前中国的低电价让全球以较低成本进口中国的高耗能产品,中国才是真的吃亏!上面已经谈到,备受非议的中国收费公路,通车里程最多的区域集中在外向型经济区,这些公路的收费会转移成为出口产品的成本,是要全球埋单的。但如果是中国以税收支持公路建设使得公路免费的话,就是用税款补贴出口产品,也就是用国内纳税人的钱补贴全世界。油价的问题更是如此,中国的轿车保有量不足 1 亿辆,高油价影响的只不过是占中国人口 5%、最多不到 10% 的富裕人群,但是这个人群的话语权大,事实上中国的油价就应当涨起来多收税,以此补贴公共交通。

至于税收的快速增长,读者千万不要认为中国的税收就是完全针对中国的 GDP 收取的,事实上很多税收是要外国 GDP 来承担和埋单的。外国到中国投资产业、生产产品,以郎咸平教授经常挂在嘴边的玩具为例,每个玩具外国企业赚取 3 美元而中国企业赚取 2 美分,但是外国资本在中国生产的各种服务费用的营业税是必须缴纳的,中国来料加工的人工费用是要缴纳增值税的。虽然有出口退税,但是很多出口是当初进口的原材料加工而成的,如果这些原材料不是厂商自身一对一的进口,而是在中国不同的厂家之间转一圈,进口时的增值税也是很难退还的,退税制度实际执行起来条件异常严格,很多税是退不回去的。

另外我们的关税虽然降低以符合 WTO 了,但是进口环节 17% 的增值税是不得不缴纳的,而且国内的增值税有进项抵扣,进口的产品则不能抵扣。比如外国出口给我们铁矿石需要缴纳增值税,再把铁矿石炼成钢、制造出产品出口,退税率平均约为 13%,于是就产生出 4% 的税额,这个税额是对没有抵扣的铁矿石价格而言的。没有抵扣的 4% 的税,可能比有抵扣的增值税还要多。更关键的是这 4% 的税,是由铁矿石出口国的 GDP 带来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而进口产品17%的增值税经过市场竞争要与国内产品的售价可比,因此进口产品售价内的税收也是要外国GDP来承担,是要由外国厂商利润埋单的。

我们再以铁矿石为例。进口的铁矿石最终售价与国内铁矿石可比,但是国内铁矿石的增值税是有抵扣的、进口铁矿石是没有抵扣的,国内铁矿石是对国内GDP征税,而进口铁矿石的征税对象就是外国的GDP了。这些被征税的GDP都不是中国的GDP。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以后,在中国过手的GDP会越来越多,超过中国自身的GDP也是可能的,因此以中国的GDP和税收总额的比例来说中国的税负轻重是片面的。

以前外国投资基本不缴纳所得税,但是税法改革以后都要缴纳所得税。所得税是央企不避税,外企和外向型经济被海关数据管着难以避税,因此国内企业避税相对容易,而外企在一开始做得最多的就是把大量远期费用结到当期,让缴税时间延后。但现在这些外企已经到了缴税期,而且他们要撤离的话,在华各种利润都藏不住了,因此现在中国需要做的就是加税!把投资的个人所得税变成企业所得税,这样民营企业投资就没有了个税,与国企的国家投资红利不交税的做法平等了。对于税收的增减,不但要看绝对的增减量了多少,还要看税收调节收入的作用,要看到底给谁减税了。

读者不要片面地被西方所谓"中国税收过高论"给忽悠了,西方的制造环节不在其国内,征税的能力是被限制的。甚至非洲的酋长们也是以高税博弈外国资本的。笔者曾经与某位非洲酋长沟通过,酋长明确表示在避税方面本地人与外国人是不对等的,加税有助于本地人的竞争优势,因为不仅仅是人缘和各种只有当地人才懂的潜规则,外国投资在关税和他们本国的监管等等方面受到的限制会更多。

所以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以后实际上就是向全世界征税,所谓"减税"就是减低外国资本撤离的税收成本!而央企的高服务费也是在面向全世界收取服务费。要应对未来的经济博弈,这是必须的。因为西方资本想找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由于其他国家的基础建设不足,西方资本投资的成本实际上更高。

西方资本可以通过所谓的定价权压低中国企业的利润和人工工资,也就是压低了名义上中国制造的GDP,但是他们无法压低中国的税收和央企的各种服务费用,这是强势政府的征税能力与金融资本全球定价能力的博弈,把中国税收增长简单地与GDP增长进行比较是非常片面的。

说中国的税收高就是中国老百姓的税负痛苦也是片面的,中国的外贸增长大幅度快于GDP,中国世界工厂的份额增长大幅度快于GDP,当然中国的税收增长也

要大幅度高于GDP,其中的速度应当与中国制造在世界的话语权以及中国外贸增长挂钩。中国成为全球工厂的同时税收也是针对全球征税的。在中国的制造业取得全球竞争能力成为世界工厂以后,中国政府在制造和流通环节的征税能力也就向全球扩张成为全球征税能力,在中国制造业过手的财富比中国制造创造的财富要多很多,这些过手的财富都可能成为被课税的对象,这个征税能力对抗的是全球资本的定价能力,定价能力的背后是货币发行能力,没有定价权是无法印钞的,印钞就要恶性通胀,而中国政府的征税恰恰是对抗印钞、对抗中国外汇贬值损失的有力手段。

而对外征税的博弈,是以多做少说为最妙,我们的管理层能够耐得住寂寞不多说话是必要的韬光养晦之举,各国有能力都会这样做。但是一国如果要说他征的税里有其他国家的税源在里面,那么该国以后在外贸谈判税务互免时,就必然要吃大亏。

明白了前面的道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上有那么多的声音叫嚷着让中国减税了。在这里我们还要看到,西方某些人对于不同种类的税收态度极为不同,他们极力想让中国人收取房产税,因为这个税是完全面对国内的不会有全球转嫁问题。中国买不起房的人想要出台房产税借此降低房价,但是一旦无房者有了房子,肯定是不愿意缴纳房产税的。买不起房的穷人是弱势群体,但真正掌控话语权的不是买不起房的弱势群体,而是外来的资本。这些资本代言人发出的声音,我们一定要警惕!

西方的征税权同样是这样博弈的。就如最近欧盟要征收碳排放税,根据欧盟的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起,欧盟将对所有到达和飞离欧盟机场的航班征收超出配额的碳排放税。中国共有33家航空公司在征收名单之内,据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简称“中航协”)初步测算,开征第一年,进出欧盟的中国航空公司将因此增加总成本8亿元人民币,并且这一数字会逐年递增至2020年的30亿元,此间9年累计支出约176亿元。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碳排放税也是针对外国GDP征收的,中国飞往欧洲的航班所创造的价值显然是属于中国的GDP,碳排放税就是巧立环保名目从中国、美国等外国的航运市场割块肉!所以中、美等国都在抗争。

这是另外一个国际博弈的战场,在国际上因为危机进入紧缩周期而增税的时候,中国需要做的就是加税扩大国家收入,而不是减税给外国增税腾出空间。中国应当适时降低出口退税标准,在外资撤离中国的时候提高所得税征税标准。税收是博弈世界的重要杠杆之一。因此笔者再次强调,很多公知攻击中国经济危机的

立论是有问题的,是建立在似是而非的假象上的推论,而根本不是什么“真相”。

中国步入21世纪后发展遇到的真正问题是资源瓶颈。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是资源价格增长更快,大宗商品的涨幅哪一个不快过中国的经济发展? 而在这10年当中,中国是世界大宗商品的主要购买者。现在中国需要一场硬着陆让资源价格降下来,就如上世纪90年代一样,世界大宗商品价格在跌,中国经济硬着陆,但是老百姓的工资涨上去了,所以经济的下滑并未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的分配问题是被资源价格挤爆的,包括国内也是“煤老板”和“房老板”赚钱。因为中国的矿产和土地都是稀缺资源,开矿、搞房地产实际上就是搞资源,是资源先占者得利,是食利和套利行为,中国要大发展,必须让中国的生产者战胜食利者,必然要通过经济的调整使得资源价格体系下降。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感觉不舒服,但这是必须的。在全球仍然在经济危机的泥潭中难以自拔时,现在的国际博弈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矮子里面拔将军。笔者不否认,中国经济存在着很多问题,解决问题的这个过程必然很痛苦,但是世界其他国家的问题更多、更痛苦。在2008年全球危机以后,也许全球人民都应该意识到,想要生活得比危机前舒服是非常困难的,关键是看谁更能够坚持,熬到让对手先崩盘。中国不舒服,但竞争对手更不舒服。

中国当前已经迎来了最重要的历史发展战略机遇,也就是说在世界危机发展到现阶段,西方的证券市场还充满了泡沫,西方政府为了救市已经赤字连连危机不断,西方央行为了救市已经是宽松殆尽利率降无可降,再印钞则可能让资源价格涨上天,得不偿失。西方在欧债危机和赤字、评级下调压力下已经不得不开始紧缩,但是中国却是政府财政盈余超过预期,财政手段丰富,政府负债偏低;中国同时还有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抱死了美国国债,而美国国债是美元发行的基础,中国抛售美国国债美国是受不了的;于是中国央行紧缩后想要宽松的空间无比巨大,利率在高位,准备金超过20%更在历史高位区间;证券市场挤泡沫非常成功地处于低位,股市未来涨幅空间肯定大于下跌空间。不要说中国股市回到10年前,世界其他国家在如此的宽松刺激下与10年前也差不多,更关键的是10年前我们是外资在进来而现在外资在出去;甚至中国的楼市也被政府合理地控制住,可涨可跌全看政府的政策和经济需要!

简单地说,就是西方在危机当中把全部大牌打光了,但经济还没有起色。中国则是大把的牌攥在手里,经济压力虽然很大且问题多多,但仍在高速发展。只要熬到其他某个大型经济体倒下、释放资源后进入下一轮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周期,中国

是最有扩张能力抢占世界经济制高点的。所以,对中国的未来,对于下一轮大发展,著者由衷地充满信心。

现在西方的经济牌已经基本没有可打的了,限制中国崛起中最大的牌就是攻击中国的政治稳定,以军事战争和政治内乱为手段打断中国的崛起进程。为此西方除了加大外部战略干扰以外,还积极在我们内部发展并支持“带路党”,利用网络,故意以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造谣蛊惑,动摇中国人民的信心,并大肆诋毁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

综上所述,在各种危机论的背后,我们恰恰看到的是中国火热的崛起希望、政府韬晦的智慧和各种势力颠覆中国的冰冷的心,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稳定,西方遏制中国的发力点也就是中国的稳定,破坏中国的稳定,实质就是要摧毁中国的信用体系,用信用元规则来打垮中国,因而中国内部问题再多再严重,也要等崛起了以后再说,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容他国干涉。中国当前维持稳定、一致对外、抓住崛起的战略机遇的政治意义高于一切。在这一场正在发生的全球信用大战当中,中国需要的就是树立信心,信心也是信用的来源,全社会对于国家的未来有信心就是一个国家的信用体现,万众一心就是国家的凝聚力,也是中国崛起的保障!

后 记

大家谈论危机，谈论世界的本源力量，谈论世界的终极价值所在，这些都是一个思考者应当关注的核心问题。本人对于这些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而且在不断的完善成熟。我把这些思考的片段不断的撰写成文章，发表在《环球财经》杂志上。

整个体系要完善到瓜熟蒂落的地步，需要一个契机。而这个契机的出现，就是有一天我与乔良将军在咖啡馆纵论天下事的时候，话题从大家对次级债的错误认识开始，逐步提及了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各种危机都是按照金融、经济、信用这样的步骤发展的，中国和外国的文明发展也是一个信用的发展史，因此，有了“信用战”的概念。信用战是各种经济、军事、金融、货币相互博弈的结果，因此，这本书就以此为重点，加上原有的内容积累，写作的速度是飞快的，大约不到 2 个月就完成了书稿，然后又经过不断的编辑整理，联系出版等工作，现在终于可以面世了。

本书的创作得到了乔良将军的大力支持，在创意之初就有一个互相启发的过程，书成之后，乔良将军又为本书作序和推荐，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同时本书的创作还应当感谢一如既往支持我的山西人民出版社、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潘彤女士、林鹰女士以及我的助手薛晓明先生，大家都对于本书的创作给予了帮助，使得本书可以快速的面世。

对于本书的内容，由于篇幅有限，加上很多问题具有时效性，时间紧迫，所以没有足够充分地展开分析。

关于信用战的续集，本人也在创作之中了，乔良将军对于本书所提出的问题，本人将继续在《信用战》第二部中阐释，并且会不断地与乔良将军探讨世界的真相。后面还会针对世界信用博弈的历史、理论、定价权、泡沫规则等核心问题进行阐述，希望大家关注，也希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将信用规则阐释得更科学、更充分。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引言：全球信用危机的端倪
第一部分　血色的信用春秋
　　第一章　历史纵深：信用战争话古今
　　第二章　回看近代中国建立货币体系大博弈
　　第三章　信用社会的形成
　　第四章　金融世界的王者：信用体系
第二部分　全球信用争霸战开打
　　第五章　主宰人类社会的信用秩序
　　第六章　针对国家的信用战争
　　第七章　信用战下的军事新思维
　　第八章　当今时代：看清世界格局
　　第九章　信用争霸路径图
第三部分　当今世界信用系统性崩溃
　　第十章　次债谎言与信用危机
　　第十一章　负利率挤爆西方社保信用体系
　　第十二章　资源挤爆西方信用
　　第十三章　不动产在信用体系的重大作用
第四部分　信用不平等条约
　　第十四章　评价霸权与不平等的巴塞尔协议
　　第十五章　欧债协议：新“慕尼黑阴谋”
　　第十六章　陷阱重重的中国道路
第五部分　重构未来全球信用
　　第十七章　解析美国：深入认识量化宽松
　　第十八章　TPP：未来的资源版图和信用体系
　　第十九章　博弈后福利社会时代的新信用体系
　　第二十章　树立对中国未来的信心
后记